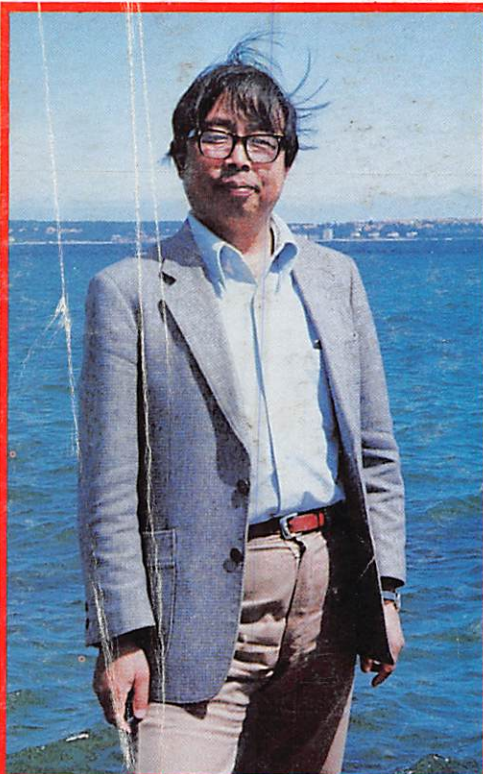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3月號 總45期
No. 45 MAR. 1987



1986年7月方勵之攝於波羅的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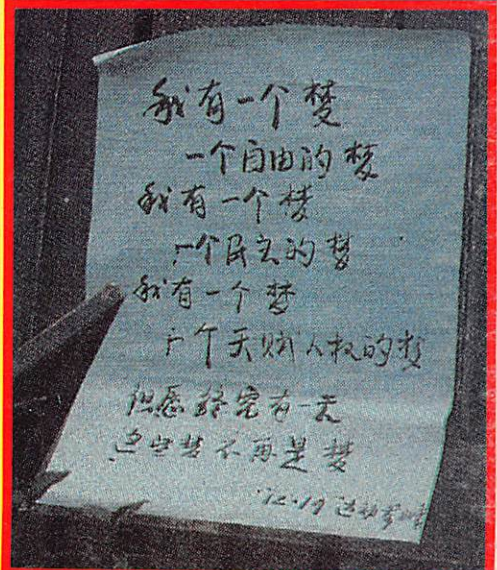
中國的
薩哈羅夫

方勵之

大陸的
民運
英雄

- 方勵之鼓動學潮的演講 (全文)
- 方勵之的傳奇經歷和家庭
- 方勵之遭受扣壓的散文
- 方勵之的學術成就

- 胡耀邦辭職內幕
- 趙紫陽地位不穩
- 中南海「新戊戌政變」



1986年12月21日上海的民運大字報

滴水成河，滙集民運眞面目

支援民運 ● 徵集資料

為加強報導、分析、研判去年十二月在神州大地掀起的民運高潮及其引起的一系列反應和對中國未來的深遠影響，以利民運的開展，本刊現公開徵集有關此次民運的各種資料，包括：

- (一) 各地大學校園張貼的大字報（原件、影印件、手抄件或照片）；
 - (二) 學生遊行示威場面的實況錄音、錄像或照片，遊行示威前後全過程的實況報導（參加人數、遊行路線、校方反應、遊行時與公安保衛人員的衝突經過等）；
 - (三) 參加此次民主運動的人士記述此次運動的日記、書信；
 - (四) 因此次事件被逮捕的民運戰士的人數、姓名、地址、工作單位，被逮捕的理由，逮捕過程的報導或照片，逮捕後預審時的答辯詞；
 - (五) 鼓吹民主、自由、人權的學者、作家所發表的文稿（手稿或剪報）、演講錄音；
 - (六) 曾刊登過「大膽言論」在大陸公開發行的各類報刊、雜誌或未公開發行的內部出版物（原件或剪報）；
 - (七) 中央及各級黨、政、軍機關針對此次事件的各種文件（原件、影印本或手抄本）；
 - (八) 中央及各級黨、政、軍負責人針對此次事件的內部講話、指示；
 - (九) 中央高層因此次民運引發的權力鬥爭的內情報告。
- 務求註明人物、時間、地點等基本情況。零星，點滴資料亦屬歡迎。
- 請註明資料可否發表。各種資料，不管發表與否，本刊均給予優惠稿酬。
- 您提供信息和資料，就是對民運的支援！

自由不分階級·我們要自由

自由是每一個人作爲人應有的權利，是人類共同的遺產，是祖先們經歷千年奮鬥爭來的，是不分階級人人享有的。

自由是爲保障自己的利益，同時保障他人的利益，在互不侵犯的原則下，每個人最能發揮他自身才能的最高權限。這種最高權限，得到法律的保障，任何人侵犯了他人的這一權限，就得受法律制裁。

我們承認，人類社會還未達到這一理想境地。我們還要世世代代不斷地去擴充自由的範疇，豐富它的內涵。這就是說，自由有它的時代性、階段性。但這不等於說：目前，它還不是最好的、最完善的；所以，我們寧可不要。也不等於說：一味限制人民自由的統治者有資格批判人民享有相當充分自由的另一個社會。

今天，生活在民主國家的人們，不分階級，每個人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政治層面的自由；享有選擇職業、調動工作、擁有並支配私人財產、罷工等經濟層面的自由；享有居住、遷徙、隱私、人身不受侵犯、信仰宗教等社會層面的自由。這一切早已成爲民主國家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對於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人民羣衆來說，還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奢望。

在我國封建專制皇朝時代，與當道不合者還可以歸隱山林，還有不表態、不講話的自由，還可以過一個對得起良心的生活；在中共統治下，連這一點可憐的自由都被沒收了。當人們起來要求「還我自由」的時候，中共一些享受特權、不懂民主爲何物的官僚，竟然大言不

慚地高談「社會主義民主」批判起「資產階級自由化」來，又如何讓已經覺醒，不再受欺騙的民心平服呢？

歷經文革洗鍊，八十年代的中國人民已經普遍意識到自由的可貴。自由是人的本性，自由不是讓掌權者隨意捏揉的麵人兒。自由就是

「中國之春」聲明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紐約中報刊載了中國大陸在美留學生一千人簽名的致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公開信。在公開信後，並附加了六點聲明。（詳情請閱本期五十頁）

自這份公開信發表後，中國之春收到許多電話，其中包括已在信上簽名者。他們均表示：在他們簽字以前，並沒有看到這附加的六點聲明，而且也表示不同意此六點聲明，因為這六點聲明主要是針對中國之春而發的。但在經我們解釋了我們的立場後，情緒才平息了下來。現在中國之春正式對此一事件發表聲明如後：

(一) 中國之春同意並支持這封公開信的內容部份，並對推動發表此一公開信的努力表示敬意。

(二) 中國之春在調查後深信，絕大部份簽名者事先並不知悉信後所附加的六點聲明；

(三) 至於對個別人士擅自加上信後這六點聲明並公諸於衆的做法，中國之春表示理

自由，自由有具體的實質內容，空洞地加上「資產階級」形容詞再也嚇唬不了人，官方宣傳工具把自由和混亂、「無政府主義」、不負責任等同，只有被羣衆當作無知。

「不自由，毋寧死！」爲自由前仆後繼的英雄史不絕書。中國人民要求自由的呼聲，再也壓不下去了。要求自由、要求民主的大規模示威遊行，還會再現，如果北京當局再不適當地放鬆管制的話，甚至有一天，自由的怒潮會淹沒了整個當權的官僚架構。

解和容忍。中國之春認爲：如果有個別人士認爲打擊中國之春能使他們自己的處境較爲安全，從而能對推動中國的民主產生更大的作用——中國之春願意忍受這種打擊。

自中國之春成立以來，由於處在國、共兩黨夾縫之間，遭致許多不同的人、組織和刊物對她的誤解、侮辱和譴責。中國之春除耐心解釋外，並均以包容的態度對待之。因爲中國之春相信他們之中絕大多數最終的目標也是希望中國能走上民主的道路。故中國之春在遭受打擊之後，並不反擊，因中國之春不願做出任何削弱民主力量的事情。

但中國之春並不懦弱。如果懦弱，中國之春今天根本不會存在。因爲中國之春他們知道面對的是什麼，故對一些立意爲專制獨裁政權辯護、甘心做專制獨裁政權打手的人士和刊物的造謠生事，中國之春決不姑息。一如人民日報對中國之春的污蔑和造謠，中國之春就會起來與之抗爭到底。在這方面，中國之春決不退讓。

民主就是包容。但，是有原則的包容。中國之春將本著原則繼續包容下去。

中國之春刊頭係中國民主運動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墨跡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Tel.: (718)507-6442
(718)429-6777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中國大陸留學生創辦的第一份民運刊物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一九八七年三月號總四十五期

一九八七年三月號總四十五期目錄 ■一九八七年二月一日出版 ■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Y.

●社論●

3 ■自由不分階級，我們要自由

3 ■本刊編輯部就千人簽名信報導的聲明

讀者●作者●編者

6 ■就教于周立仁先生·答李大牛先生等

李大牛等

專題 中國的薩哈羅夫方勵之 (上)

36 ■方勵之生平簡介 (本刊資料室)

11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方勵之在上海交通大學的演講 (全文)

24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方勵之在上海同濟大學的演講 (全文)

34 ■嵐山遊記 (散文) (國內)方勵之

37 ■共和國需要這樣的學者 (北大學生報記者)戈聖

專題報導 中南海的新戊戌政變

77 ■胡耀邦辭職內幕·趙紫陽地位不穩 (國內)柳平

43 ■胡耀邦免職的啓示 (中國大陸留學生)高揚

61 ■從胡耀邦去職談今日之鄧小平 (中國大陸留學生)宋佳佳

特輯 支援大陸民運●擊潰守舊派的反撲

44 ■學運狂瀾席捲·中國政局激變 (本刊記者·大陸留學生)馳遠、張森

49 ■中國民聯對當前中國大陸政治危機的聲明

50 ■中國大陸留學生千人發表致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公開信

51 ■千人公開信簽字者名單

54 ■附留學生寄語：致國內大學生 摘自「人民日報」

53 ■來函照登：對簽名信六點聲明的聲明 (美國)幾名在公開信上簽名的留學

55 ■舊金山僑、學界致中國政府公開信

83 ■紐約部分中國留學生就國內民主運動致北京政府的公開信

56 ■我們對國內大學生示威遊行看法

——美國南加州七十三位中國大陸留學生的公開信

57 ■就目前局勢致中共和中國政府的公開信

加州理工學院部分大陸留學生和華人教授

編者的話

由國內大學生帶頭的示威遊行，表現得非常平和、理性，雖然規模龐大，並沒導致警、民間嚴重的衝突流血事件發生；但却動搖了中共專政特權統治的根本，引起中共黨內守舊勢力的全面反撲，逼迫胡耀邦下台，並開除了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人黨籍，在全國範圍展開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整肅知識份子，重演反右歷史。可惜，中國已不再是五十年代的中國，中國人民早走出文革時狂熱崇拜黨中央的夢魘；守舊勢力能否如願？尚是未定之數！

大陸政局的動盪已現其端，北京紛傳中南海的新成戌政變。為此，本期特刊出國內柳平來稿，詳細分析胡耀邦辭職內幕。同時，除了繼續詳實報導國內民運之外，還報導了此次事件在海外留學生中引起的聲援和反應。

在學術上享有聲譽的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教授，對此次民運起了很大的催化作用，並因此被革職開除出黨。繼四十二、四十四期我刊登他的兩個演講後，並於本期全文轉載他在上海交通大學和同濟大學的演講錄音，以便讀者和中共的宣傳工具的斷章取義作一對照。

因為大量刊登關於民運的文稿；大批稿件被迫延期，在此特向作者們致歉。

下期預告

由于加強報導民運，原擬四十四期刊載的雲南五萬下鄉知青集體大罷工事件，移至下期。

方勵之教授兩年前在浙江大學的演講已預知改革的失敗，我刊已得到他的這篇演講稿，本期原擬一并刊出，因稿擠，只得割愛挪到下期。

下期還有大陸青年作家尹小明評論朦朧詩的大作。

54 ■ 鄧力群強姦民意又一例

——人民日報捏造「留學生來函」一位受害者人民日報的留學生

85 ■ 中國民聯的告諭與國內民主運動

(中國大陸留學生) 張森

58 ■ 從學運談大陸新聞自由的問題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 劉衛民

60 ■ 學生運動不應抓工人

(中國大陸留學生) 秦俠

62 ■ 學生運動與體制改革

(中國大陸研究生) 金戟

64 ■ 中共改革派面臨的抉擇

(中國大陸留學生) 史華

66 ■ 學運的啓示與歷史的沉思

(中國大陸留學生) 楊漫克

70 ■ 為了民主必須付出代價

——西德明鏡周刊對示威學生的訪問 (西德) 李台顏譯

43 ■ 公開信：普林斯頓留學生要求恢復方勵之職務

(普林斯頓廿四名留學生)

● 特稿專欄 ●

73 ■ 「輿論」能製造嗎？

(國內) 王若望

75 ■ 從上海的學運說到謝希德

(美國) 李目

76 ■ 支持學生要求民主的運動——與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商榷

(大陸留學生、美國) 朱益民

● 爭鳴園地 ●

82 ■ 台灣回歸者的肺腑言

(華僑·美國) 英華

84 ■ 中國留學生與政府的管理政策

(中國大陸留學生) 吳眉山

86 ■ 中共不等于中國

(中國大陸新移民) 懷奎

● 文藝園地 ●

33 ■ 風 (詩)

(國內) 小草

72 ■ 詩兩首

(美國) 李伯特

72 ■ 搶新聞的訣竅

(中國大陸留學生) 楊漫克

87 ■ 未來 (詩)

(中國大陸留學生) 歐陽也

69 ■ 情歌兩首 (詩)

(華國) 巴江

55 ■ 你不應該沉默 (詩)

加大柏克萊中國同學聲援國內行動組

88 ■ 為了忘記的回顧——八三年北京監獄的女囚側記 (報告文學)

(中國大陸作家·巴黎) 張諱

讀者·作者·編者

就教於周立仁先生

中國之春八六年十二月號（總四十二期）

刊出周立仁先生大文「寄望於台灣黨外」，讀後令人不免想起七〇年代台灣「小市民的心聲」，不知周先生是不是從台灣來的？或者曾否去過台灣？如果他和筆者一樣是從台灣來的，我們只有承認他的頭腦思維理路不清，如果他從未去過台灣，那麼我以一個台灣來的「避秦人」身份，指出周文中許多不明究裏或故做糊塗而造成的謬誤，及由此可能對讀者造成的誤導。

周文一開始便是「不管人們對今天統治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作何評價，我個人認為應該肯定它的價值。理由很簡單；由於台灣政府的存在，使中共爲了統戰的目的，對十億中國人和海外華僑，採取了溫和得多的手段……」言之成理，由於此種正面的影響「存在應予肯定」，而未提及該政黨或政權是否建立在合法及代

表人民利益的基礎上。誰都知道當今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是蔣介石的槍桿子建立起來的，四九年由於內部的過份腐化，在中國已被人民完全否定，長江既擋不住共軍的攻勢，只有指望共軍還沒有渡海攻擊的能力，而苟延殘喘，此時美國亦發表白皮書對這個「阿斗」只有放棄了。幸而五〇年韓戰爆發，美國重新考慮到台灣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而再予支持，軍援、經援又至，簽「中美協防條約」，且由第七艦隊協防台灣，從而喘過氣、站住腳；却又想由美軍支持，渡鴨綠江而重返大陸，（此乃麥克阿瑟元帥的主意，未獲杜魯門總統同意而作罷。）其後又期望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和二次大戰一樣，回去檢個現成的餡餅；五〇年代又建議美國支援原子彈，助其「反攻大陸」。請別忘了，這原子彈是用來對付中國人的，除軍事破壞外有多少百姓將無辜受害；反正蔣政權也不是靠百姓支持上台的。一九三八年黃河花園口決堤還有同年底的長沙大火。他漠視人民生命財產，是具有歷史習慣性的。

該政權由日本手上取回台灣後曾爆發二二八事件，軍隊大量屠殺居民。四九年撤至台灣後，又實行白色恐怖統治，直至五〇年代其可能的反對者和批評者都清除殆盡，其政權方稱穩固。

依周兄的邏輯，由於造成了中國人政治上的覺醒，「文化大革命」也該肯定它的價值，哀哉！

周文又提到「以台灣那麼一個彈丸之地：外匯儲存到一九八六年底預計可超過四百億元，……一千九百萬人過着中國近幾百年來從未享受的富足生活……」

這數目龐大的外匯都是工廠裏的作業員、農田裏的莊稼漢用血汗掙來的；如今用何種名

義存在何處？其居心安在？國民黨政權是否可給大伙一個明白交待？

「無論古今中外，居於統治階層的，事實上都是少數人組成的。他們常年累月聽到、看到的，盡是挖他們祖宗老底子、揭發一些不確定是事實的隱私、辱及他們先人的文章，怎會不動怒而有所反應……我們在美國看到的一些政要，哪一個是靠罵人起來的？相反的，一開口罵人，政治生命就完了。」周文動輒以美國爲例提出對比。須知美國大體說來是個民主政府，而中國兩個政權，至今仍是人治的集權政體，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東西，焉可對比。

民主國家的政界領袖、娛樂界名人，皆是無法保有個人隱私的，且慣常是書報雜誌的取笑對象。而在中國這種封建極權的傳統裏，要動官家的這種腦筋，可得要準備丟腦袋、進黑牢。而國民黨退避台灣後，任何對其近代史上的爛污賬、統治家族的不法行徑，提出質疑者一貫是採中國傳統的文字獄手段對付的。美國的政界領袖，捅了紕漏則難免輿論指責，甚至還可能面對國會的聽證。蔣介石的這些「豐功偉績」若拿到美國來，隨便提上一樁其「政治生命」早就玩完，還能在台灣浪費大量民脂民膏，建兩座「蔣廟」供人膜拜？

民主國家、政治諷刺也好，政治謾罵也罷，若不合事實，完全可以訴諸法律解決。那有動輒上印刷廠打、砸、搶的？

國民黨退居台灣後，爲向其美國乾老子展示民主姿態（表示錢和槍沒白拿），開始實行象徵性的基層選舉，對台灣居民而言這短暫的時光，也就成了所謂的「民主假期」，國民黨的競爭者（黨外），可在相當程度上對當局的施政提出批評，（其程度則隨政治氣壓而有所變動）。至於「統治家族」則是完全不可觸碰

的禁忌。直至蔣三世弄出了個「江南事件」，緊接着「斯德林·西格瑞夫」的「宋家王朝」又成了美國的暢銷書。台灣政權一時國際形象大壞，不得不把姿勢放低，而反對者也就乘勢一窩蜂挖掘統治家族的臭史，蔣家三十餘年的造神運動終毀於一旦。要知道面對着國民黨血跡斑斑的鎮壓史，敢於如此做還是要具備相當道德勇氣的。二世先生有鑒於子孫不肖、辱及先人，灰心之餘只有公開宣佈讓出茅坑。

早些年前台灣除了「民主假期」可辦官方批准的政件發表會外，連男女同學間的舞會也得向治安單位申請，結果是，若無特殊的關係或背景也別想獲准。一般學生也只有在「國民黨」或「青年救國團」的監視下方可舉辦團體活動。否則在戒嚴法的約束下，隨時會有一「紅色帽」或「台獨帽」臨頭的可能。在美國的示威，事先需得警方批准，警方可派人員維持秩序，及避免不同意見者發生衝突；但在台灣，反對者若提出申請，官方則是想盡辦法使事不能成。說起來都是警察；民主國家的警察是在保護人民，極權國家則成了鎮壓的工具；這麼淺顯的道理，周立仁先生難道還不明白？

共產黨不喜「民主選舉」它的乾親家「國民黨」又何嘗不然？只礙於掛的招牌，不得不形式形式耳，可是人們也就在一次一次機會教育下，得知了獨裁政權的腐敗和黑暗面。在犧牲了無數先知先覺的菁英份子之後，人們也漸漸敢於站出來支持為民請命的勇士，由於民衆的勇氣和數量，使得當局不得不一點點讓步。

「國民黨要憲警人員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群眾在食髓知味之後如果經常毆打憲警，那豈不是成了暴民政治。」

統治了台灣卅多年，人民教育水準又如此之高，怎麼反而成了暴民了？其實這完全是愚

民政治失敗的最好證明。

任何頭腦不糊塗的人都知道以赤手空拳的烏合之衆去攻擊持有武器、經過訓練、組織良好的軍警。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除非是反抗的極端份子欲藉此提高衝突，以便火中取栗。或是當局設計的苦肉計，以製造鎮壓的口實。美麗島事件的「未暴先鎮，鎮而後暴」和王玉雲市長安排的打手硬行製造事端；便給了當局最好的鎮壓藉口。好了！這回可將黑名單上的混蛋都收進佬佬的「聚仙袋」了。至於根本未參加者爲何被收了去？而參加者反而漏了網？也不必多加解釋了。

台灣這些年來的政治審判，那次不是自說自話、自導自演、倒霉鬼舉出多的如山鐵證，也抵不上導演製造的影子證人，律師們再費勁力爭，還是依照「事先內定」宣判。（在這點上，國共兩兄弟倒是作法沒什麼兩樣！）

這種猴戲周立仁兄若有興趣串演，也沒權強迫別人參加。

結語

吾鄉前輩李敖君曾謂「凡是國民黨贊成的我們就反對，凡是國民黨反對的我們就贊成。」（大意如此）美麗島事件後，其家屬却反受到選民大量支持。大陸上凡是受到官方圍剿的作品，立時成了暢銷書籍。難道這還不足以證明民衆對當權的態度？

兩岸受過各式教訓的民衆開始覺醒了，敢於公然面對不合理的現象提出抗議了，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鼓勵還來不急，那還能貌似忠厚的替極權圓場，舉出許多不倫不類的對比，爲極權開脫，以期誤導民衆。

周君若是認爲目前台灣當局和大陸政權對

比，相對而言其官方比較自我約束，言論開放尺度較寬。筆者完全贊同的。

由一般現象看來，中國兩個政權的當家主子都有開放、改革的胸襟，唯其政權中的大量既得利益份子仍不肯放手。中國人如何藉此良機重組合理秩序，爲子孫後代留下公平合理的生存環境，毫無疑問將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最主要的課題。

丙寅十一月於洛杉磯牛棚
(台灣留學生) 李大牛

答李大牛先生

編輯先生：

謝謝轉來李大牛先生對我一篇稿子的反應的文章。裏面的內容我太熟悉了，和我所看到過的一些刊物上的文章常年累月所說的，大同小異。

對於一些認同、認知的問題，我覺得不必在此浪費篇幅，「中國之春」的讀者自有他們的取捨。我與國民黨沒有深仇大恨，但也無意爲國民黨梳妝打扮，我無愛於黨外，但也無意必欲去黨外而後快。我希望黨外能有更積極和建設性的作法，但我也不能全盤否定國民黨在台灣卅多年的成果。我希望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有好日子可以過，我絕不希望朋友告訴我的，在上次選舉時，有人在台上說要殺外省人，台下的於是有人鼓掌叫好是事實。我同樣的也絕不贊成有些外省人所說，與其在台灣逼得外省人最後要跳海，不如打開大門讓共產黨來統一一算。

這些都是愚話。但愚話如果成爲事實會有不得了的後果。我的短文在結尾中，是希望國

民黨和黨外雙方都能心平氣和的，努力造成台灣的民主政治。一些足以引起仇恨甚至加深仇恨的話，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我承認有太多太多的問題，不是我的知識範圍所能討論的。我只能就自己接觸到的一些資訊，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此而已。

我無意、無權、更無那麼大的能力串演什麼猴戲，或誤導某些人。我尊敬工廠的作業員、農田的莊稼漢，但我也不同意台灣的龐大外匯都是工廠的作業員、農田裏的莊稼漢用血汗掙來的……而否定其它各種努力的說法。因為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工廠作業員、農田莊稼漢都比台灣多。至於外匯的運用，台灣也在討論。

我舉一兩個自己居住環境的事作例子，談不上動輒以美國為例提出對比。

對於上次的台灣選舉，美國一些平時對台灣談不上有好感的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大報，還是對國民黨的作法作了相當程度的肯定。台灣的某些作法，對大陸的民主運動也發生了一定的正面影響。我和李大牛先生有不同的看法，是因為各人接觸的材料不同、取捨不同，是很自然的事。對於國民黨政權的是否合法的問題，也是如此。

至於一些情緒性洩憤的話，我覺得沒有什麼意義。總之，我已經了解了他們的意思（李大牛先生一開始就說……我們只有承認……）。

編安
祝

周立仁

請看台灣可喜的一面

讀了四十二期「中國之春」後，感觸及感慨都很深，很想提供一些意見，供貴刊及作者參考。

在評論台灣時，希望能深入探討研究，而非非載一些不負責任的文章，如阿修伯所形容的，台灣是「姦殺、物慾橫流、道德沉淪、經濟停滯、政治震盪……」。儘管台灣在經濟發展、社會、政治方面都有很多問題與危機，但現在已的確以彈丸之地，發展成世界上經濟強國之一，擁有外匯四百億以上的國家。就政治而言，黨禁也在開放當中。我希望貴刊能以建設性的評論來督促國府更向民主、自由的道路上前進。這對中共的開放政策將會有鼓勵的作用。若以破壞性的手法評論台灣情勢，只怕會失去廣大華僑之心而使民聯的目的更難達成。

由中國的解體再談聯邦制

羅仲卿於美國

閱中春一月號總第四十三期王炳章博士分析中國政局的文章「中國走向癱瘓和解體」，本人略有所感，願就教於列位。

王文預測中國在十五年內將有大變。愚意以為台灣亦是一潭死水。這些都不是海外留學生與僑胞希望看到的。

台灣當權者，大可以組團往大陸訪問，進行反統戰。如張俠女教授以美籍香港人的身分在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前慷慨陳辭。無奈自俞國華任行政院長以來，反而不准台人經香港去大陸。我認為，統一與否，都屬次要，不如和平比賽，逐漸演成聯邦制，或許還能被各方接受。

台灣應響應學生運動

承蒙貴刊贈寄總四十三期「中國之春」，讀後深覺它是一本最好的雜誌。

才拜讀了王炳章在該期刊物上所寫的「從大一統走向癱瘓和解體」一文，想不到這個紅色帝國馬上就已經在解體的過程中了。

爭取民主和自由的運動已在國內風起雲湧，從合肥開始，擴大到武漢和北京大學，而且，這一波濤勢必繼續增長。你們以往的努力總算看到一些成果。這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

我心目中，第一個想到的是台灣。台灣不是誇下海口，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嗎？現在是很好的機會，也是一個測驗的機會。台灣反共的人士應可以大展身手，看看能拿出什麼辦法來領導大陸要求民主和自由的運動。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我們仍未聽到台灣有任何響應。希望民聯能夠呼籲一下，如果此次台灣不能站出來領導，今後恐難有更好的機會了。

趙志平於加州

閱中春，嚐禁果

在國內久聞「中國之春」之名，惜一直未能親睹風采。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自友人處覓得一本，居然整整一個星期天交給她了。雖然某些文章的觀點不敢完全苟同，但畢竟呼吸到了在國內得不到的氣息。打個比方，現在國內年輕的一代，就像當年的夏娃一樣，凡是禁果都想一嚐。儘管聖經上譴責夏娃違反天條，然私意却以為若無夏娃偷嚐禁果，豈會有今日人類之繁衍？

中國大陸留學生 李炎卿於澳洲

對中國之春出英文版的意見

中國之春要出英文版，是件值得慶賀的大事，我願提出一點小意見，供民聯的負責人參考，那就是英文版或以後增加的任何一種外文版，內容不必和中文版的完全相同。

我的理由是：英文版或其它外文版的讀者，所生活的社會環境、政治制度、所受的教育背景，使他們在思想方法和意識形態方面，與中文版的讀者有極大的出入，他們對中國問題的了解與認知，所關心的事物，與海內外的華人，也有極大程度的差別，所以大可不必把中文版的內容完全譯成英文介紹給他們。除了民聯負責人認為有必要讓英文版的讀者了解的文章外，英文版可以單獨刊出一些適合英文讀者的文章。

這種情形是有先例可循的。例如世界有名的讀者文摘，就有許多英文以外的版本，它的中文版就與英文版的內容不盡相同，納入了一些純粹適合中文讀者的內容。最近在台北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中文版，也有一部分是專供中文讀者的內容。在香港出的《花花公子》中文版也是如此。

英文版的中國之春，除了以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專家為對象之外，對美國一般民眾也不應忽略，美國是一個非常重視民意的國家，美國政客的言行與民選代表在議會的投票，完全要受民意的左右。但是一般美國公眾，對國際問題的常識遠不如中國人，尤其對中國問題恐怕更談不上有什麼深入的認識，有很大比例的美國人，到現在還不知道中國是共黨國家。基於這個因素，更使我覺得把中文版的文章原封不動的譯成英文，恐怕不易引起一般美國人

的閱讀興趣。

由於生活習慣、政治制度、對問題的看法南轅北轍，一些在中國人認為理所當然的事，也許是美國人覺得不可思議的，反之亦然。

當然，要中國人用英文直接寫作，而且還要選擇適合美國一般公眾閱讀的文章，談何容易。共產黨的種種作為，連沒有大陸生活經驗的中國人都難以理解，何況是外國人。要用英文言簡意賅的寫出對外國人有可讀性的文章，的確是不容易，但總是一個值得努力的目標，我個人認為這是件很有意義也很重要的事。

我還想到，美國有些青年學者，曾經在北京或台北學過國語，其中不乏可以聽懂國語而且也能講流利的國語，但是他們不一定有同樣程度的閱讀能力看懂中國之春的文章。因此我建議，由中國之春的編輯把文章的內容口述錄音下來，請這些人用道地的英文寫出，中國之春付給他們適當的稿費。

(華僑)周先生於美國

使中春更生動

我認為「中春」雜誌很多文章太長，理論性太強，缺乏內容生動的文章，只適合有一定理論基礎、時間充裕的人看。不能引起大部分留學生及移民的興趣。所以，我建議中春多登一些短小精悍，令人感興趣的文章。

大陸留學生于民於康州

中春徵求「酸甜白菜」

邇來編輯部收到許多來函，希望在「中春」看到更多短小精悍的文章，引發編者想一個故事：

話說從前有個王公貴族，請來各方的名廚，要求他們各表演一道最拿手的好菜，看誰做的菜最先被吃光，誰就贏得最佳名廚的頭銜。此語一出，各方名廚絞盡腦汁，想的無非都是，由最稀有名貴的材料做成的「大菜」。近處買不到的材料，也不惜千里跋涉，重金買來。買來後，又花了許多時間精心調製。唯有一位名廚却別出心裁，做了一道最便宜、也最容易的酸甜白菜。等到所有的菜餚被端到桌上後，由於大魚大肉之類的佳餚太多，大家吃膩了，反覺得那唯有的一道酸甜白菜清爽可口，十分開胃。不需多久，這道酸甜白菜就被吃光了。這位酸甜白菜的廚師也奪得了最佳名廚的頭銜。

由讀者不斷來信回饋中，我們歸結出中春予人的印象是，文章重理論分析、具有深度，強調理性和客觀事實，避免感情用事的文章。但也因此失之生動活潑，在忙碌的生活中，不易刺激讀者的「胃口」。

中春也許「大菜」太多，反顯得這些「大菜」不重要。今後將更努力避免不必要的冗長的文章，並十分歡迎短小精悍、有趣生動、取材自現實生活中的人和事、又能與「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多元」的宗旨相呼應的文章，以期達到「酸甜白菜」使人「開胃」的功能。

· 編者 ·

強烈反對阿昆為日本辯護

我們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華裔學生，讀了中國之春四十二期第六頁的為「日本鬼子」辯護一文，深感氣憤。因為中國之春是開放的園地，故想藉此發表我們的感謝。

阿昆先生的文章是反共的愛國作品，此點我們深表支持。但對於他在該文為日本鬼子辯護，我們在此表示強烈反對。

阿昆先生或許出自中國人的善心，呼籲我們不要太恨日本人，這種做法已有先例。當年抗日勝利，蔣介石也曾不顧軍民憤怒，不顧有仇不報非君子的真言。堅決饒恕日本「朋友」。日人不但毫無悔意和謝意，如今成為經濟強國後，又再次辱華，不承認侵華史實。試問這種沒有人性的禽獸值得原諒嗎？阿昆先生竟能寫出如此不愛國的言論。

請教阿昆先生為何竟罔顧昔日數千萬同胞的生命、今天數億國人的安危及不計其數的財物損失來作今天自己扮豪傑的大方？我們以中國人的身份和資格嚴厲表示我們的憤怒。

各位，日寇殺死的中國人有幾千萬之多，又怎是阿昆先生所說的不算太多？

在我們的心目中，國共兩黨都不配做我們的政府。他們親日、親蘇、崇洋媚外，還有半點民族尊嚴嗎？兩岸所使用的盡是日產汽車、日產電視、日產……、日產……，不然就是MADE IN U.S.A.A.。但「中國製造」實在太差。日本人永遠沒資格做中國人的朋友，永遠是我民族的第一仇人。在國仇未報的今天，國共却高呼中日友誼萬歲。

一雪前恥的機會和力量，被同樣是中國人的中共一手握住，甚至愛國學生示威也受到壓制。中共以為這樣很有威信嗎？其實日本人和全天下的人都在嘲笑他們腐敗無能的行為。

澤西市華裔學生 尊華

我可遇到了難題

我自四五在天安門衝鋒陷陣，坐大牢以來，一直被取笑為政治幼稚，但是憑我三寸不爛之舌，也說動了不少台灣、香港同學，相信在中國經十年人間浩劫反省後，會通過自我教育，體制改革，慢慢好起來的，深圳會趕上香港，海南島不日將超過台灣，全國都會出現民主、進步、繁榮的新局面。

「八六學潮」後，我的朋友們紛紛來質問我，

「共產黨的改革是已完成了，還是不想繼續下去了？」

「什麼叫等額選舉，人大代表的候選人是如何產生的？方勵之在合肥競選犯了什麼法？」

「鄧小平、胡啓立等是改革派，還是保守派，抑或是像周恩來對林彪、江青一樣，是『違心的』遠見？」

台灣同學關心兩岸統一後，大陸的做法在多大程度上會影響台灣？

香港同學則怕香港成為西藏第二。

大陸來的學人則注意玩味鄧小平、胡啓立指責方勵之為「中國的沙卡洛夫」同時，是否要使自己成為「中國的新沙皇」。

還有一個美籍華裔教授竟然又重提魏京生入獄的原因，他引用鄧小平對「中共中央一號」的說明，「你看魏京生，我們把他關起來，民主運動就消失了」，可是原來說魏京生的罪行是「洩露國家軍事機密」的？

看來在處理「八六學潮」問題上，咱們真是一大敗筆，今後何以取信天下人？又讓我們奉命「統戰」的，如何作人？

太德於俄州

向方勵之老師道歉

此間有港台大陸學生（者）七、八百人，在聖誕、新年期間談論最多的就是「八六學潮」，這不僅是出於自己的愛國心，就是眾多美國朋友不厭其煩的詢問學潮細節，也迫使人不得不廣為收集材料，以便有個正確的認識。可惜地處偏遠，消息並不比美國人多，姍姍來遲的人民日報，滿版謊言，只配直接丟進垃圾桶，「中國之春」就算主要來源了。在報導此次學潮的文章中，該刊特別推崇方老師，並尊為民運領袖。我們有過大陸生活經歷的人，都對此議有疑。因為誰都知道，大陸大學校長級中共高幹，多是當權者的鷹犬，是專職與進步為敵的，即使那些後來因黨內權勢鬥爭被整肅過的，如陸平之流，也都是曾操刀飲血之輩，當權時的作為是不恥於人的。所以中國之春剛報導時，我們沒人敢輕信方老師，但事態發展至今，我們不得不佩服中國之春消息可靠，分析正確，方勵之不愧為人師表。方勵之老師和它為中華民族進步做出了貢獻的學潮參與者們，勢將進入清末秋瑾、徐錫麟、五四陳獨秀、胡適、李大釗，四五魏京生這些民族英雄的行列之中，與日月齊輝，共天地久長。

太德於俄州

果然來個「兔死狗烹」

剛讀完貴刊四十四期林樵清寫的「牢記兔死狗烹的教訓」還不到兩個星期，中國大陸果然來個「兔死狗烹」。當初鄧小平把政治改革叫得震天價響，會幾何時，這些改革派却被一個個拋了出來。先是方勵之，然後是王若望、劉賓雁，最後連胡耀邦亦不保。這種專制制度，想起就會令人心寒。

方曉於紐約

知識分子和中國社會

(在上海交通大學的演講，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國內)方勵之

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寄上的兩稿分別是方勵之教授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五和十八日於上海交通大學和同濟大學發表的演講。在這些演講中，方勵之傳播自由、民主和基本人權的觀點。演講後不久，十二月五日，位於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們走出教室，舉行示威遊行。自此，一場轟轟烈烈的民運之火，在全國範圍內燃燒起來了。

這兩篇講話，是極為珍貴的資料，也是方勵之教授「惹禍」的歷史見證。黨內守舊派把方勵之的這兩篇講話斥為「散佈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典型。我們現在

公佈方勵之演講的全文，請大家對照一下最近人民日報的社論，看看誰的言論代表人民，誰的言論含有更多的真理。我們全文公佈方勵之講話的另一個目的，是防止黨內胡喬木、鄧力群之流對方的講話斷章取義。

方勵之的這兩篇演講，是根據錄音整理的，整理時儘量忠實於原意。整理稿未經方勵之教授過目，如與方教授講話原意有不符，由整理者負責。

敬禮！

中國大陸留學生 鄭芝珊

一九八七年元月十一日

剛才主席宣佈了我今天講的題目是知識分子和中國社會。這個題目可以說是包羅萬象，按我們在研究中的術語說就是「大口袋」題目，什麼都可以裝進去的。所以，這樣一個題目對我來說，也很難表達得很完整、全面、清楚。從外國回來，時差反應還沒完全緩過來。(主席端來椅子)，我不坐了，這裡這麼多人都

站着聽，所以我也應站着講(掌聲)。正因為沒有準備，所以我就講一個開頭，大家一定有很多問題，就我所知，我能夠回答多少就多少，這樣我們可以進行一種交流式的教學，而不僅僅是我講，大家聽。

開始由我來講講我今天我要講的題目的一些看法，以前我在一些地方的講話中，分別

都涉及或講到這些問題，大家也許都聽過了。所以今天我就不準備講過去重覆的東西，對於搞科研的人來說，新的東西才有價值，我本人也喜歡講新的東西。

知識的高尚勝過一切權威

我今天講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和中國社會，當然是中國問題。我每一次回國以後都特別想講點什麼，很多東西憋不住，今天恰是我回國的第二天，所以這股勁是最大的(掌聲)。再過一陣就會被慢慢同化掉了(笑聲)，現在是無所顧忌，覺得不講不行。每次出國，一對比國外，說句不好聽的話，真恨不得踢中國兩腳(笑聲)，覺得中國發展得太慢了，如果不使點勁給中國兩腳，我們這些炎黃子孫就真對不起這個民族了。

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與它在整個人類社會中的地位不開的，我想先從這個角度講起。剛從國外回來，這個對我非常強烈。由於教學任務不開身，這次我出去只待了一個星期就回來了。這次我出國去開的會是國際

天體物理研究中心搞的一項活動，我是這個組織中的一個成員，也是主要的幾個組織人之一。關於我們這個組織內部的一些活動，由於技術性比較強，我就不向大家介紹了，不搞天體物理的對此也沒有興趣。但是有些活動是和我們今天這個題目有關的。在我們六天的活動中，除了技術性活動外，我們還做了兩項重要的科普活動，來宣傳最近自從空間時代出現後產生的一些新發現。大家知道，今年是哈雷彗星回歸年，回歸之後有一些觀測結果。其中有一次是向意大利總統進行科普，一次是向教皇進行科普（笑聲），主要講在這次哈雷彗星回歸中幾個國家聯合觀測發現的新結果、新知識，這次凡是放了衛星參加這次空間活動的國家的代表都來了，美國、蘇聯、日本、歐洲共同體都派人來了。這次發現的新認識，總統、教皇都有必要知道。那裡是民主國家，所以總統來聽講也照樣和平民一樣，坐在下邊，各國專家輪流上台去講。總統唯一特殊的標誌是一邊站着一個兩米高的侍從，帶着古典式的裝備（笑聲），手裡的寶劍象徵着權力。對教皇做科普是在梵蒂岡，教皇是神權的象徵，他不信這些，但我們要他信。這次科普的不同之處是他坐在上頭，我們坐在側面，主講人在他對面衝他講。這兩次活動給我的印象是很深的，說明現在知識的地位。我們講完後教皇答辭表示感謝。他講的話中間其實大部分都是科學內容，例如哈雷彗星、宇宙、黑洞等如何如何，很少有神學內容，除了最後一句「我們上帝的宇宙如何」（笑聲），這說明他也得承認這些知識對我們人類是多麼重要。也說明知識在這些民主國家，或者說發達國家已經有其獨立的地位和價值，而且是每個人都必須懂。上至總統、教皇，下至普通百姓，總之大家都要知道哈雷

彗星裡面的冰塊、磁場到底是怎麼回事，雖然我不知道他們聽了是否真明白，但至少大家都表現出津津有味的樣子（笑聲），這說明知識在那裡是高尚的，作為一個高尚的有地位的人，你不懂這些是不行的。

這一點，與我們國家對比起來差別很大，在這裡我們這些搞空間物理的，搞這麼一次活動，邀請領導人來聽聽哈雷彗星，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會接受，花兩個小時來聽關於磁場、軌道、核如何如何，我很懷疑。這種差別說明知識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別，而知識的地位又標誌着知識分子的地位，兩者是平行的。如果知識的地位是獨立的、重要的、高尚的，那麼知識分子本身的地位也就會處於類似水平。參加這些活動後，我越來越覺得我們的確是一個相當發展中的國家（笑聲），知識分子在我們這裡最好的，說到底吧，也不過是個「依靠」的對象，我昨天剛回來看見科大一張報紙上寫着要相信知識分子，依靠知識分子（笑聲）。可是我覺得知識分子在當今社會上越來越變為一種主導的力量，主導就是歷史的創造者。這個觀點去年我在浙大就講過。

知識分子階層是社會最先進的力量

當今誰是最先進的力量，當然是知識分子這個階層。我們也可以用標準的馬克思主義論斷證明這一點（笑聲），大家知道，用標準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說，誰掌握了最先進的生產力，誰就是社會最先進的部分。我們說產業工人階級最先進，當然是指它是掌握了最先進的生產力的那一部分人，但是現在我們這個社會已經發展了，知識、信息、技術所佔比重越來越大，所以掌握這些的人在社會佔主導地位

，是最先進的成份。政治上也是如此，這是非常標準的馬克思主義論斷，既然可以從它推出工人階級是社會最先進的部分，同樣也可以推出知識分子是社會最先進的部分。

事實上，從歷史發展過程上看也是這樣，現在農民是越來越少了，中國也有大量農民流入城鎮，變成工業人口，現在的發達國家，藍領工人也已經開始下降，數量已少於掌握技術、知識的白領工人。最有發展前途的是擁有文化知識的人，即知識分子。所以不論從理論上講還是從事實上講，我們都會得出這一結論。在一個高科技的社會中，只有代表這一切的人才是社會最先進的成份。當然這是從統計的觀點來看，而不是說我們每個人都一樣。我是從宏觀上來講的。再深入說，還從標準的馬列主義觀點出發，列寧說過農民是自發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所以要讓他們破產，也就是說在他們那種生產力水平上，不讓他們破產，這個社會就無法向前走。這說明農民的破產是一種正常的現象。

再進一步看，是不是工人運動都是先進的？當然這個問題還可以探討，我們可以用列寧對農民的論述來分析工人，我們以美國為實際例子。六十年代工人運動很蓬勃，罷工很多，當時中國也處於動盪年代，人們總以為是我們中國影響到美國，其實這是自大狂，絕沒這種影響（笑聲）。說毛澤東思想影響到大洋彼岸實際上是自欺欺人，為什麼會有這種動盪？當然原因是各種各樣的，但有一個合理的說法是當時美國社會正處變動狀態，不需要技術的大產業開始走向沒落，就是夕陽工業，鋼鐵、汽車、大礦業開始沒落，而高技術佔了經濟的主導地位。從人數上看六十年代起白領超過藍領，在這種經濟背景下出現一種情況，只有大量

需要技術、知識，才能發展生產，而並不需要那麼多直接從事體力勞動的人。所以開始出現大量失業，這種失業造成社會動盪，運動就出現了。這實際上是社會要淘汰落後事物所產生的後果，也就是我們剛才說的要讓它們破產，否則高技術的東西就不能發展，所以這類運動是否是先進的呢？是值得懷疑的。因此在美國要說所有工人運動都是先進的，這種說法就不一定對。所以若把農民、工人、知識分子排一下隊，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知識分子一定是排第一的。生產發展造成這種情況是很合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接受的。這是歷史趨勢，隨着技術的發展，只掌握粗本事的工人就會逐漸失業，這在西方社會是個現實問題，需要採取社會保險的方法來處理。例如瑞典的方法是國家給這些被淘汰的人錢，讓他們受再教育，學先進技術，然後再進入勞動力市場被雇。例如現在很多工種都需要計算機，至少會起碼的計算機操作，不會這些根本無法工作。瑞典是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了，這些人也不得不失業，否則工人老佔在那裡，工廠沒法改造。當然各國解決這類問題的方法不同，美國是個自由主義的國家，失業就不管你了，也有社會救濟，但不如北歐國家那樣好，所以就出現動盪。這說明，只要社會發展，工人（指藍領）就會越來越少，因為他們代表的東西不是先進的。

知識階層應負起領導社會的責任

我在浙大也講過，現在有些年輕人負責黨的工作，建黨方針也得考慮考慮，至少可以研究研究。現在的建黨方針是列寧五十年前定的，大講工人階級，當時農民是落後的，工人是先進的。可是現在若要建立先進的政黨應該發

展誰？這樣建黨方針就不應該是以前的方針，需要重新調整，應當知識分子是最先進的部份，做黨的工作發展黨員首先要發展知識分子，而不是產業工人。這樣來看，知識分子的地位就不僅僅是「依靠」或者「被相信」者，而顯然是一個主導的力量。有人說知識分子應當成爲黨的摯友，摯友是相當親密的，應當敢說直話，在封建社會可以向皇帝直陳己見，即知識分子應當敢向黨直陳己見（笑聲）。當然，直陳己見已經相當不錯了，可是這種看法仍然沒有認識到我們今天的社會發展到了什麼地步，知識分子今天已經不是能否直陳己見的問題了，而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佔領導地位的階層。如果沒有這種認識，我們的社會就不可能進行改革或觀念上的變革。如果你不是一個拒絕吸收新鮮東西的人，那麼只要你出去轉一圈，



要衝擊社會一步步向前，熱血青年在努力着

就會探討到這個問題。所以這些觀點在開放以後是很容易被大家接受的，但是它要在中國實現還那麼容易，得有一個很長的時期。

剛才說到地位問題，可是反過來說，我們在座的人又有很多責任，歷史已經賦予你這種地位，但你自覺沒自覺到這種地位？表現出來就是你有沒有責任，這是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歷史賦予你主導地位，但你有沒有起到這種作用？這是值得探討的，這就是我們說的有沒有歷史責任感、社會責任感的問題。當然要發揮我們的歷史責任和社會責任，在中國的條件下還很困難。這裡所說的條件像在發達國家就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以致大量需要具有技術、知識、文化的人，就必然要走到那一步。當然中國目前還沒有到那一步，農業還佔很大比例，工業仍然很粗。另外從文化條件說，中國很多人沒有受過教育，文盲很多，知識分子佔的比例還很小。在這種情況下，要想發揮知識分子在西方的那種作用，例如請教皇來聽課他也要來，請總統來聽，總統也得來，恐怕還不行。但是我們應當逐漸意識到，我們具有這種責任，因此我們應當盡我們的這種責任，我們在座的每個人都責無旁貸，義不容辭。今天上午我和你們交大的很多報紙的主編、記者談過，也涉及到這類問題，怎樣履行社會責任，這當然很難具體指導每一個人怎樣做。

要衝擊社會一步步向前

知識分子到底有什麼用？我想盡責任，社會讓不讓我盡責任？或者說我想盡責任但對社會到底有沒有推動？或者說的直接點，就是你想盡責任社會還不要你呢！也不會起什麼作用。這的確有這種問題，一個人想想也是勢單力

薄，說兩句話也沒有人聽你的。特別是你又沒有任何學術地位，有什麼用呢？但是不是一點作用都沒有？有很多好心的同學對我說，你講這些東西有什麼用？我在「人民日報」發表一篇文章說要具有全新的意識，就是具有民主意識，舊意識要全面改變，於是四川一個同學寫封信給我，說你提倡全新的意識有什麼用，現在制度是這樣，你提倡全新意識，人家就堅持全舊意識，你明白嗎？（笑聲）當然他跟我直接了當。自然我不是說我提倡全新意識，大家就會變成全新意識，當然不可能這樣。但是不是一點作用都沒有？我覺得還不是這樣。事實上已經有了一些作用。昨天我來之前，上午我們有個小小的聚會，有人告訴我大家都說在中國實現民主是很困難的，從「五四」以來就喊民主，從一九一九年到現在多少年了，可是到現在還有很多不民主。為什麼會這樣？說是社會進步太慢。不過仔細想想，現在又的確有很多與從前不同了。小會上有人說社會上流行一個順口溜，說儘管現在還沒有達到西方那種民主的程度，可是已經有了這種苗頭，用順口溜說就是「東風吹，戰鼓擂，現在誰也不怕誰」（笑聲、掌聲）。的確有這麼一點，現在是誰也不怕誰。有的東西是你不去做，你真去做了就會發現他也不敢怎麼樣。（笑聲、掌聲）民主就是靠一步一步爭取來的，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比方說批評領導人，可不可以，這是民主的一個標誌，我說我們可以批評領導人。當然，反右時批評頂頭上司，比如支部書記都很危險，那就要當右派了。可是現在誰也不怕誰了，雖然去年我在北京大學點名批評北京副市長張百發，找了一通麻煩，不過現在誰也不敢怎麼樣誰了。（笑聲、掌聲）

今年八月份，我在記者招待會上點名批評

了胡喬木，也沒把我怎麼樣嘛！（笑聲、掌聲）所以我說大家至少是可以試探着利用這個權利（笑聲、掌聲）。去年我在北大講那些話，教委發了一個文件，至少是當反面教材發的，可是今年這話已經變成誰說都沒關係了。當然這也不會是我個人的作用，這是因為大家很多人支持，即使不贊成我的觀點，也認為可以說說嘛，允許我進行批評，有了這種氣氛，大家就說，一步步說，今年我就可以再說多點（熱烈掌聲）。去年我說到北京市委，今年我就說到政治局（鼓掌）。我說我可以批評，我說得不對你可以反駁，民主的意思不是我要強加給你的意見，而是我可以表達我的意見，我說你的觀點是錯的，事情做錯了，你可以反駁。所以我說，現在已到了誰也不怕誰的地步，雖不能說已實現了民主，至少也表明一種趨向，所以我的作用還是有的。

學生在中國一直是民主化進步的力量，每個時代學生衝擊這個社會一步步向前走，我想這些大家都是看到的，衝擊多了，一些陳腐的觀念就會摧毀。當你衝擊以後你就會發現，有些東西的確是外強中乾的，衝了也沒什麼了不起。我這話也許有點狂妄，但的確是這樣。我再舉個例子，這是十年前的事了。我是搞宇宙學的，宇宙學是天體物理，可是搞哲學的人總覺得我們這些搞宇宙學的有點不老實，所以老要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管着你，（笑聲）我覺得這樣管着實在是太不舒服了。我對哲學本沒有研究，可後來不得不去研究，為了自己創造一個自由研究的環境，我的研究你哲學不要干擾，我把他頂回去，搞一個防護罩。（笑聲）我研究哲學是這個目的，這樣做了以後，覺得哲學也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東西，就是書上那幾條（笑聲），這幾條你在物理上給他東說西說，

說到他也沒話說，（笑聲）因為實際上我們研究的東西已經是超越他了。我們佔有的宇宙學的東西已經比恩格斯上個世紀總結出來的那幾條東西多多了，我們的武器多得多（笑聲）。有些人貌似很強大，好像領導來指導一切，可是實際你捅一捅他呢，也沒有多少東西（笑聲）。

這是我十年前的經驗，捅一捅這些人他也不敢怎麼樣你。說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指導一切的理論，我一直反對這個觀點，我在上海出了一本書，說從物理學的觀點來看，哲學只是物理學的工具，哲學有沒有用？有用！但是工具要用就用，要不用就不用（鼓掌）。在座可能沒有學哲學的，我這話毫無貶低哲學之意，數學也是一樣，對物理學來說，要用數學就用，不用就不用，這話也是這態度。但我們搞物理學的人和數學家關係一直很好（笑聲），沒有出現數學家要指導物理學家的事情。這是一種非常科學的關係，我發展我領域裡的東西，你發展你領域裡的東西，當然我要把數學當工具來用。哲學也是一樣，也是我們的工具，絕不是指導，這個觀點在這次精神文明的決議中已逐漸佔上風，大家看「決議」，學習文件也要像研究科學一樣，正過來看，倒過來看，倒過來看也是一種方法。我們在研究宇宙學時有一種方法，就是研究存在的問題，比如存在一個人，我就要問人的存在是怎麼一回事。存在化學元素，我就問化學元素存在是怎麼回事，怎麼來的。宇宙學也同樣問，為什麼不存在這個問題，研究不存在的問題，不存在也有道理。這種方法不光宇宙學用，很多學問都能用這種方法。如我們的前校長郭沫若，怎麼評估他，我不管，可他在學術上還是有很多成就的，他的最有成績的工作是甲骨文，甲骨文中有一篇

東西叫「甲骨索無考」，就是甲骨中沒有的東西我考證、考證，爲什麼沒有？我覺得這和我們宇宙學用的方法完全一樣。

現在我們用這種方法來研究一下精神文明的這份文件，「馬克思主義指導」那一段裡頭說馬克思主義指導道德、法制等等，但是沒說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科學研究，如果現在有人對我說要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我的宇宙學，我就告訴他沒有這一條（笑聲）。這也是一個進步，現在我們終於認識到了這些，指導只會做出錯誤的結果，而從來沒有正確的成果。解放以來，所有的學術批判，沒有一次是正確的（鼓掌）。百分之百的錯，這個記錄是相當驚人的（笑聲），所以現在來說在這些方面不是沒有進步的。因此，我們知識分子作爲主導力量還不是無所作爲的。

中國的進步不能只靠上面

目前年輕同志對於社會有各種各樣的想法，這是正常現象。但我就希望我們每個年輕同志都有自己的社會責任感，從自己的角度去認識和發揮自己的歷史作用。社會不是永遠靜止的，我想還是在不斷發展的，當然速度有時可能快，有時可能慢。既然我們說知識分子是主導的力量，那麼中國的責任應當負在我們身上。有的人說中國改革要看上面的決心。如果領導人有決心，很快會推動社會前進，因爲他們的地位不同。但是否只有這一方面，是不是說，如果上面沒有這個決心，中國社會就不能往前走了呢？當然，中國目前的體制和法統的道德觀念決定了上面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有人開玩笑說，中國目前不但要引進技術，更重要的是要引進一個總理（笑聲）。

這個笑話說明了一種看法，就是引進什麼都沒有用，只有引進具有關鍵地位的人才有用。應當承認這是目前中國體制的現實，但問題是中國若只依靠上面的決心，也不可能走到發達國家。因爲依靠上面這本身就不是一種先進的意識，這意思是說如果我們實行民主社會，僅僅靠上面給的民主，那麼這個社會實行的並不是真正的民主（鼓掌）。

再說深一點，民主本身的含義就是首先承認每個人自身的權利，然後組成一個社會。這意味着這個權利不是上面給予的，而是人生俱有的。人權的說法在我國非常忌諱，其實這是很普通的說法，無非是說人生下來就天生具有生活的權利，婚姻的權利，思想的權利，受教育的權利，等等。作爲一個人來講，這是與生俱來的權利，這一權利就是人權，所以不要把人權這個詞看得很可怕。要把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等看作是歷史上值得肯定的遺產，先肯定這些東西，然後再爭取到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而不能靠上面恩賜。上面恩賜的不叫民主，而叫寬鬆（鼓掌）。所以我們一開始就不贊成「寬鬆」這個詞，寬鬆這個詞的含義只是我給你鬆一鬆，原來捆得太緊，直徑只有一尺，現在鬆到五尺，但直徑再大始終有個繩頭在牽着你，圍繞着一個圓心，那麼這個圓心是誰呢？所以寬鬆的觀點是完全錯的，仍然是從上到下的給予。而民主首先是我們本身應當有的權利，而不是別人給予的。既然是應有的權利，那麼只有自己爭取，才能真正得到。爭取可以有各種方式，不一定非要用非常激烈的方式，如輿論方式，會議的方式，都可以作爲爭取的渠道，當然比較激烈的方式包括在內，只有靠爭取得到的東西才會真正得到。



中國學生的遊行是全世界最文明的，確仍為中共所不容！

人民對政府應重新認識

由於我國封建社會特別長，加上文化大革命以來封建的東西又氾濫，所以出現了很多錯誤的觀點，例如對民主和自由等觀念都進行了歪曲的解釋。拿我們和政府的關係來說吧，不是政府給我們什麼東西，而是我們在維持政府，政府只是實行民主管理的代表，所以首先要搞清楚到底是誰給誰。我在大學裡的時間比較長，大學裡有一種很普遍的教育人的方法，對學生說你應當好好學習，黨給你這樣一個好機會要珍惜（笑聲）。當然，作爲一個公民即使對於個人的發展來說，也應當好好學習。但是

說這一機會是黨和國家給你的，是完全錯的（鼓掌）。爲什麼說它是完全錯的呢？因爲它本身從觀念上就錯了。那麼我們就要問，你國家是哪來的，機會是怎麼給你的？要知道受教育是我們每個人作爲公民的一個權利，本身就應當受教育，而不是誰給你的機會。所以上面的說法是一種封建的觀點，好像什麼都是上面給的，其實不然。我們從經濟上說，每個公民繳了稅，這個稅裡包括了給我們受教育的費用，而不是誰給我們的。在發達社會的觀念是，公民是納稅人，繳稅維持政府，政府用這些稅反過來管理大家的事情。出於這樣一種關係，納稅人心理上的感覺是：是我在維持你這個政府，你是靠我繳的錢才能工作，所以你必须爲我服務，不是說你是否准許我上學，而是你必须要我辦學校。

中國也是這樣，大家都繳了錢了，儘管學生沒有繳錢，可是你們的父母爲你們繳了錢（笑聲、掌聲），繳多少都能算出來，我給你們算一算，拿我們科技大學來說吧，教職員工與學生的比例是一比二點九，學生包括大學生、研究生，我們大學生有四千多，研究生五千多，我們科大是五年畢業，即培養的周期是五年，也就是說平均每個教職員五年培養出來兩個多學生，學生是值錢的，那麼兩個學生值多少錢呢？一個學生怎麼說也要兩萬元錢，比如說現在的代培生就要繳錢，分配還有賣學生的（笑聲）。學生具有文化、知識當然具有價值，儘管社會還不承認人才市場，但人才的價值還是可以度量的。那每個學生的最低價格就算兩萬吧，兩個學生就是四萬，所以每個教職工五年的產值是四萬，但他掙了多少錢，大家知道，平均工資一百多元，一年一千多元，五年就一萬，就算一萬五，還剩兩萬五，這金錢到

哪裡去了？當然有一部份錢是用於買儀器等，算作成本吧！但是兩萬五中總有這麼一部份，兩萬或一萬五吧（打一個手勢）沒了（笑聲），這樣算是否對可以討論。那麼這一部分算什麼呢？就是所得稅（鼓掌），所以政府就是靠這些錢來工作，來治理社會，那麼你當然要給我們受教育了，要辦這類事情。所以受教育的費用不是你給我的，而是我繳的。共產黨在開始的時候喜歡說「誰養活誰」（笑聲），這個問題現在也要搞清楚，當然也不用搞得那麼緊張，用人民內部矛盾來說吧，但是也要搞清楚你我，不是你消滅我我消滅你的矛盾，但誰靠誰要說清楚（笑聲）。

所以我們觀念上一定要轉過來，我們生來就有這種權利，民主就是建立在這個觀念上的。只是依靠上面有決心，這種說法只對了一部分，一個社會的民主能否穩定並發達，主要還是取決於知識分子這個階層有沒有民主這種意識和知識分子的意識，自覺地去爭取權利。如果沒有這種意識，只是等待領導來下決心，我覺得這是很可悲的。

要打破政治反覆收緊的周期

我出國時常向外國朋友介紹，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非常悲慘，大學關門了，什麼權利也沒有。當然他們一方面表示同情，另一方面我也可以看出來他們的確有點看不起中國的知識分子，說既然這樣，你們爲什麼沒有表示自己的任何意願，知識分子的意識哪裡去了？爲什麼不表現出你們不贊成，反對文化大革命的種種做法？五十年代的知識分子理想主義的東西較多，這當然是很可貴的。但這一代人受馴服工具論的影響很強烈，你對他再

怎麼樣，他也不吭氣，照樣幹。這種人似乎很有涵養，與世無爭，其實這對一個社會來說並不是有利的，該爭取的東西就應當去爭取，現在是應當改變五十年代知識分子這種素質的時候了。現在的知識分子，當代大學生儘管受到各種評頭品足的非議，但我覺得在這一點上是超過五十年代知識分子的（鼓掌）。當然我還希望，大家能夠有自己獨立的思想，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感覺和意識，這樣才能做出一些事情。否則若是依靠上面賜予你條件，如學習條件、民主權利等，這不能改變原來的面貌。如果中國再來一次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東西，我不希望別人又是同情，同時又說你們爲什麼又是這樣子，如果中國老是這樣周期下去是很悲的力量，這種力量一方面很多人沒意識到，另一方面也沒有敢於顯示出來。只要意識到，捅一捅，影響還是很大的嘛。這一點自從去年下半年以來，給人以深刻印象，只要小小動作一下，全國立刻一片緊張，對不對？（鼓掌）這說明我們是有力量的，但問題是你敢不敢去用（鼓掌），只要我們每個人都意識到，應當給予我們民主，而不是好心賜予我們民主，中國就會改變封建的意識，逐步接近現代水平。

編者按：方勵之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學演講完後，交大同學們非常踴躍地提出一連串敏感問題，方教授生動活潑地回答一再贏得熱烈的掌聲。另一方面，從學生們的發問，也可看出學生們最關心的問題是什麼，借此幫助讀者們從側面進一步瞭解學運的社會背景。

問答部份

(主席講話：我們的條子是百分之百地轉給了方教授，絕對沒有貪污。)

下面是方勵之回答問題，學生的條子簡稱「問」，方的回答簡稱「答」。

政治掛帥現象仍然存在

問：你對黨的領導無孔不入有何看法！(笑聲、掌聲)對一個單位來說，黨委的存在是

有利於工作還是不利於工作？

答：我一個個來回答。這個問題實際上和政治掛帥等問題有關。其實五十年代並沒有這樣，可後來政治的意義無限擴大，所有的事都有了政治的含義，政治就要由政黨領導，就是我們今天說的黨的領導。事情是這麼發展擴大的，並不是一開始如此。現在我們要認識到這種現象當然是不對的，其實有些地方不屬於黨的範圍，你把它給搞掉也可以。我講得更尖銳一些，比如說我認為「四個堅持」提出來以後也是到處擴大，我們這裡就是任何口號每個小節都要擴大到那裡。比如說我們那裡有些人寫物理教學大綱，也要寫上根據「四個堅持」如何如何，後來我把所有這些話都給刪了(鼓掌)。這刪我一點也不怕，因為這是不同領域的東西，我物理教學和你階級鬥爭有什麼關係？(笑聲、掌聲)你不論誰來領導，牛頓力學還是牛頓力學，牛頓力學之定律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反正你就一個個看，不屬於我的東西就給他刪掉，沒關係(笑聲)。這是我們五十年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結果。階級鬥爭一方面搞運動，另一方面是觀念上的不斷擴大化，階級不

是馬克思提出的，但用階級解釋經濟現象的確有它合理的地方，有科學性的，但是若把階級的概念擴大到一切地方，擴大到政治上，任何一件事情都要追究階級烙印，這就不合理。所以在學術上凡不屬於這個領域的東西，不屬於階級管的，就把它驅逐出去。政黨是政治領域裡的概念，所以「四個堅持」只是負責政治領域裡的事情，其它非政治領域，你都沒有權利管，這是兩回事。對非政治領域的事，黨當然不該管，我在上課時就沒必要讓黨支部書記站在那裡看我。我得講我的，對吧！(笑聲)剛才講的我參加的國際活動，有蘇聯人參加，他們來了一個很龐大的代表團，可是他們在報告中從來不談馬克思主義。我們曾把蘇聯當作榜樣，可人家也是這種態度。黨委在蘇聯、東歐沒有一個專門的辦公室，在大學裡，你問黨委書記在哪，絕不要到辦公樓去找，可能你得到某個試驗室去找，某試驗員可能就是黨委書記(笑聲)。

知識分子吃的是草流的是血

問：有人說現在的知識分子吃的是草，吐的是奶，住的是草房，走的是沼澤地，而知識分子唯一感到榮幸的是頭上陽光普照，身旁聆聽鳥叫，而腳來回奔跑，賽過神行太保(笑聲)，對這你有什麼看法？

答：去年我曾寫過一篇東西，是不同意錢偉長先生的意見的。當然我並不是反對錢偉長，只是認為他說了一個觀點沒有說深入。剛才我說大學中教職員工與學生的比例很低，錢偉長說要提高。對於提高這種看法我是同意的，西方大學裡的比例是一比十，一比十幾，我覺得提高是應該的，這我同意錢偉長先生的意

見。可是為什麼提不高，其中有原因，我說因為現在不能提高。條子上說知識分子「兩腳來回奔跑，賽過神行太保」，再要上課多就要比神行太保還太保了，超負荷了。那時知識分子就不是「吃的是草，擠的是奶」，而是「吃的是草，擠的是血」了。(鼓掌)實際上現在我們知識分子的待遇還有很多沒解決。例如現在教授多了，但有人說不能把現在教授的工資和解放初期教授的工資比，這是北京市委的人說的，我揭了也不怕。這個觀點是完全錯誤的。現在有一個問題是，知識分子同齡人中，很多工資倒掛，他們的創造沒有按勞取酬，我認為現在青年知識分子的生活是很苦的，他們的要

求是非常非常低的。

問：你認為中國的貪官污吏佔中國當官的百分比多少？(哄笑)

答：這裡沒有政治學系，若有政治學系，我建議可以把這當作一篇博士論文來作，數字不是絕對不可統計的，只要抽樣調查一下，不妨做一下。(笑聲)不合格的佔多少。

問：對去年北京大學提出的打倒貪官污吏的口號你有何感受？

答：我想這個口號已經有很大影響了，不是馬上就整頓黨風嗎？這不就是這個口號的影響嗎？

問：你對這次會議的主持人所宣佈的錄音磁帶集中的通告有何感想？

答：這有兩個概念。首先我不知道他這裡有什麼管理的規定，如果從言論自由的角度，我覺得這裡沒有任何戒律的(鼓掌)。但如果他這裡有什麼管理上的規定……(主持人插話：是爲了版權所有。)對了，西方社會也有版權所有的概念。

問：你對去年北大「九、一八」學潮有何



看法？「科大」學生的民主權利如何？

答：關於對去年「九、一八」的學潮的看法，去年我已在北大說過，紀念「九、一八」當然是正確的。這些話已經進入反面的文件。科大學生的民主權利指的是什麼東西呢？如果是從民主選舉，辦報自由，言論自由等角度來講，還是可以的嘛。當然科大也是在一個社會背景下存在的，很多事情不是我校長等可以左右的。可是在校長能夠左右的校園裡，可能稍微好一點。

問：宇宙學與宗教關係如何？這次你們為什麼向教皇科普？

可憐中國人沒有新聞自由，只能靠大字報來表達己見！

答：這很難用兩句話講清楚。教皇在西方是什麼地位？他實際上是道德和信仰的象徵。科學和宗教實際上在那裡是劃清界線的。教皇曾說過：科學有科研的自由，宗教有信仰的自由，大家各不相干。教皇也有教皇科學院，那裡研究的很多問題毫無宗教色彩，完全是個學術性機構，研究數學、物理，什麼都有，教皇給錢贊助。所以現在西方的教會已經和大家印象中的加爾略時代的教會不一樣了。今天的宗教和信迷也不一樣，因為中國人很少受到宗教感情氣氛的影響，所以不能理解。我們看見一些老年婦女背着香袋到廟裡去燒香，這其實也帶有一種迷信的色彩在裡頭，這和宗教當然也有關係，但不完全一樣。我們向教皇科普是因為他代表一個道德和信仰的象徵，實際上他也是希望懂得新的科學發展到了什麼地步。教皇是每星期都發表一次演說的，特別這個教皇最近把所有宗教領袖都集中到一塊，去祈禱和平，他不管你是否反對上帝。宗教變成一種象徵性的東西，他的地位在意大利也就相當於女皇在英國的地位。大家見了她都行禮，但這是他們國家一個象徵，而不是說還是封建那一套，教皇的地位也實際上變成類似這種東西。

中央左右兩派鬥爭激烈

問：請您談談您知道的中央「左派」勢力，（笑聲）請不要迴避（笑聲）。

答：應當承認我知道的確實很少，我只講我自己的東西，沒有什麼淵源背景之類的東西。當然中央裡各種各樣的力量是有的，比如說這次精神文明的文件，坦率說它有很多好的地方，比如剛才我們說的沒有寫上去的東西就是好的地方。但是這次文件中也有個地方很多

人不滿意，我也不滿意，就是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口號仍然寫進去了，這個口號是非常不對的，為什麼寫上去？我聽說討論稿中是沒有這一條的，是後來加上去的，而且在各省宣傳部長的會議上很多人都反對。要求把資產階級自由化提法給去掉，因為這個概念不清楚，而且一直是作為棒子用的東西，在中央全會上陸定一同志發言要求把這句話給去掉，而且萬里同志立即附議去掉，萬里同志在軟科學會議上的講話是相當開放的。據說當時也有不少鼓掌，都是後排的（笑聲），後排就是比較年輕的，但是最後據說是彭真反對，說這句話還要再看四十年，情況就這樣。我知道的這些，情況不確實的我負責。我可沒有迴避這個問題吧！（鼓掌）

問：李遠哲（音譯）先生說他對批評「大公無私」感到很難過，你的看法呢？

答：大公無私我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公開地批評過，至少這種批評沒有成爲一種潮流，我認爲大公無私至少是理想主義中的一個好的內容，我和李都是五十年代人，也許有共同的地方。

鄧小平應敢做中國的華盛頓

問：我認爲現在歷史賦予鄧小平的責任並不是在某一個領域進行改革，而是成爲中國的華盛頓，建立一個健全的具有法制效力的中國政治民主制度。

答：我同意這種觀點，我覺得美國人在回憶起他們制度的建立時都很讚賞華盛頓。華盛頓本身的知識結構其實並不是最高的，後來的漢彌爾頓傑佛遜的水平比較高。所以可以建立一個很好的體制，當然美國的社會比我們這個

社會簡單一些，它沒有任何體制，而是新建立一個體制，我們是已經有兩千多年的傳統，再加最近三十年的傳統，這種改變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和美國不完全是同一回事，任務要艱巨的多。你到美國去，他們給你看的國寶就是他們的憲法，當時是十幾個機構訂的，這是他們精神的一個支柱，這種精神的確值得我們借鑑。像剛才這個條子說的，建立一個好的體制的確是我們目前的重要任務，這個體制的核心部分就是要把這種民主體現出來，而不能像我們剛才所說的總是靠上面幾個人物的決心，這樣作為一個制度的保證是不行的。

問：你認為中國當前需要空談家的吶喊，還是實幹家的務實。

答：如果空談家是貶意的，當然是不需要了，實幹家在中國當然是需要的，但這裡包含各種各樣的態度。我們搞物理學的應該有那麼一點心胸，我們有很多人發表了一些文章在物理學的刊物上，這些文章我們知道百分之九十將來要被淘汰的，只有進入書裡才能成為被公認的東西。有些物理學家說我有一百多篇或二百多篇文章，實際上他們的文章最後留下來的很少，很多文章是錯的，或者過時了。再就是只有部分對的，物理學中如果你探索十次能有一次成功，那就比率相當高了，可能探索一百次才有一次差不多有點意思。物理學不大發表文集，發展非常快，這種研究特點對社會造成影響，好像只能說對的話，錯的話必須是三七開等等，其實在探索中你可能談十次只有一次有點道理，這種研究方法造成的價值觀在物理學上很容易接受，物理學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它的期刊可能是多少屋子都裝不下了，但實際上只有四大力學，就那麼四本，就完了，真正留下來的很少。但是這些探索都是有用的，

這條路不行，那條路也不行，最後終於找到一條好的路。

中國的問題關鍵是沒有民主化

問：你對最近深圳青年報上刊登的請鄧小平退休的建議如何看法？

答：我認為表達個人意見誰都可以，有人希望他留着，有人希望他退休，這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

問：你和溫元凱的關係如何，你對溫元凱的看法如何？

答：我和溫元凱的關係是經常在一個食堂吃飯（笑聲），因為我們學校的教師，包括領導都在學生飯堂吃飯（鼓掌），另外今年我向他要了一萬塊錢開國際會議，他表示他要贊助技術研究（笑聲）。在科大，我們贊助多元化的東西，溫元凱同志有他一套改革的設想和方法，在他的系裡搞我們都是支持的，但是不是都要各個系強行和溫元凱一樣呢？我們並不要求。我們是校長負責制，下面是系主任負責制，（中斷）我們這裡是自由而不氾濫（笑聲）。

問：鄧小平答美聯社記者華萊士說黨內有人反對他退休，人民不同意他退休，他本人是想退休的，你的觀點如何？

答：我不知如何評價這個觀點。我可以把退休這個問題拉開來說，現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有很多很多提法，如黨政分家，政企分離，還有年輕化、知識化，我覺得從局部部來看這些觀點都是對的。但是如何保證這些東西能夠發揮正確的作用，關鍵是民主化，所以關鍵不在於年輕化，當然不否認年輕化是對的，太老沒法工作，這是肯定的。但是不是一定到某個

年齡一定要退休，不能當什麼職務。比如在發達國家中，里根的年齡就很大，但仍然讓他當總統，因為他當總統有他的成績，所以人們還是投票贊成他。所以在民主化的含義下可以調整年輕化的內容，是否一定要絕對年輕？我認為鄧小平同志退休不退休這不是關鍵的問題，關鍵是能不能形成一種制度用民主化來決定這件事。



雷根總統不是也很老嗎？但他不能像老鄧那樣為我獨尊。

四個堅持是形式上的信仰，應在實際上改變。

問：你認為知識份子可否用自己的能力取得政權或改變政權？

答：知識份子應負有歷史責任感，知識份子對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大，影響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每個人的地位和條件不同，有人從科學方面，有人從政治方面，也有人從政權方面，分別發揮影響。當然，不可能每個人都去當

官。這是不可能的。但一部份人一定要去當官的。

問：當前在中國社會中知識份子還沒有成為社會獨立的部份，還僅僅是被相信和被依靠的部份，也就是說知識份子還沒有很高的社會地位，那麼如何談得上觀念更新呢？請談談您的看法。如何從社會發展的巨大慣性看知識份子的地位問題？

答：這是一個關於文化傳統的問題。文化傳統改變起來不容易，所以我自己覺得我們中國的確處於一個啓蒙時期。目前在很多觀念上需要更新。我覺得觀念更新不一定要等制度改了以後才能辦到。比如西方國家在文藝復興運動中，社會並沒有完全改變，但其觀念在很多方面却發生了變化。

問：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現象很相近，其實都一樣，我國的政治信仰很單一，看來對民主的實現有阻力，請您談談看法。

答：如果從信仰上，從我國政治信仰很單一上來說，我覺得問題是這樣。但是，不是說單一的問題就絕對不能改變呢？我看不一定。我可以談談這樣的一種觀點：現在我們有很多人要一下子改變很多基本的東西，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有的已經寫進了憲法。但是在這種條件下，是不是就什麼也不能做了呢？實際上還是能夠做些事情的。比如大家談到的「四個堅持」，實際上「四個堅持」還要做許多補充，許多東西正是「四個堅持」並沒有確定的內容。比如什麼叫社會主義，就沒有確定的理解。你可以加進任何你認為應當改變的東西，所以這種方法我們叫做形式上的信仰，實際上是改變了的信仰，這完全是可能的。改革的方式多種多樣，例如英國式，看來是很尊重女皇，但女皇實際上是個象徵，底下的過程她完全

管不着（笑，鼓掌）。英國是個保守的民族，所以才有這樣的改革方式。可能中國人也是偏於保守的，是否也應走這樣的路。有這麼一段科學史：牛頓在創造牛頓力學時，曾經用第一推動力來解釋行星的運動。現在有許多人批判第一推動力，說第一推動力是上帝。牛頓的確說了第一推動力就是上帝的話。實際上大家看看科學史，當時他是為了繞過一個困難。我們知道，當時在科學家伽利略的發明以後，牛頓要解釋這些理論。但當時行星是屬於神劍，它的運動規律都是由上帝來控制的，不是由人來控制的，所以牛頓定律的發現是對神學的衝擊。當牛頓發表他的著作以後，馬上有個叫貝卡萊克的神學家很敏感，寫了三封信斥問牛頓：你的理論裡面上帝的地位到哪去了？這個問題很尖銳，牛頓很聰明，他說上帝有地位，上帝在第一推動上有地位，那麼在第一次推動之後上帝就不要管了。（熱烈鼓掌）現在我們也有個第一推動問題，第一推動之後你也不要管了。（鼓掌）我這個話大家都明白是什麼意思（熱烈鼓掌、笑）我覺得這個方法不是絕對不可行的，可能也就是走「第一推動」的路。

共產黨不能什麼都管

問：昨天在上海市企管協會舉辦的一個報告會上，市經委企管處處長張林提供一個信息：在今後新成立的企業集團和公司集團中不設立黨委一級。對此您有何看法？

答：我想這個問題又有些轟動了，既然在許多方面不屬於政體，當然就不需要黨的絕對領導了。在西方國家裡，政體也是黨在領導；不過一會兒是這個黨領導，一會兒又是那個黨領導；政黨只管政治，而政治也不包括一切。

在我們國家黨要管所有的細節，其實這個觀點我在科學院討論時就提出並分析過。我們這個天體物理室從一成立就沒有黨組，儘管我們都是黨員，但我們沒有黨組織（笑）。

問：共產黨在中國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像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還是像英國的工黨和保守黨？共產黨在中國的前途如何？

答：共產黨在中國的前途，就看共產黨的所作所為（熱烈鼓掌）。

問：鄧小平不久前說中國搞競選也許要等二三十年以後才可能，您也許看不到中國的真正民主了（笑）。

答：的確如此，你們可到農村走走看看，我覺得那些沒有受過教育，在傳統影響下生活的農民心理意識很差；你很難喚起他們的民主意識，他們就是需要一個清官，沒有人管就會不舒服。這就是魯迅說的阿Q精神。實際上現在仍然存在，不僅農民中存在，應當說在我們知識份子中也存在。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我介紹兩個同志去意大利學習，在一位意大利教授手下工作。兩個月後，我又去了意大利，我一下飛機，那位教授就告訴我，你要趕快給你介紹來的那兩位人講講我們西方人的工作方式。教授講這兩個人的能力還是可以的，就是每天老是要問做什麼，使教授感到非常奇怪。西方給了你錢，你就自己去做，到時交任務沒人管你的；你中間要去爬山、遊玩都可以。我們的同志都承受不了這樣的環境，中國人每天沒有人管心裡就受不了（鼓掌）。大家今後有機會出去看看，每天沒有人來叫你做什麼、幹什麼，別總想別人來管自己。這就是中國人長期以來的盼清官心理的直接反映。

問：你是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答：我是黨員，學生時代入黨。反右時開

除了黨籍，後來又恢復了我的黨籍，我的黨齡在科大也是算長的。

共產黨需要被改造

問：你對當前青年人入黨的動機有什麼看法？

答：我在科大講過了，我不再多重覆。我是贊成青年人入黨的。爲什麼呢？因爲有許多人对黨不滿意了，那麼優秀份子進去後，就可以改變黨的面貌。我說這個話最近有位大人物還反對，說我提倡讓學生入黨是爲了改造黨，其實我說改造有什麼錯，我們還要整頓黨風呢！不就是改造黨嗎！（熱烈鼓掌）我們還要改造中國呢！（熱烈鼓掌）把黨凌駕於國家、人民之上，這才是一種封建（熱烈鼓掌）。

問：請問人的權利問題是否有限制，如果有，是什麼限制，遊行示威是否人的正當權利？

答：這當然是有限制的。民主社會是怎麼構成的？大家要組成社會，才能生存發展，民主是一種方式，是少數服從多數，是一種志願。現在有人說民主集中制，這個跟民主制不一樣，大家記住不一樣。民主制其中也包括集中，少數服從多數，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民主是有限制的。遊行示威是否人的正當權利，我覺得大多數人贊成就應當成立，這本身就是一個通過民主方式來解決的問題。

問：您對中庸之道與唯物辯證法之間的區別有什麼看法？

答：這個問題我在今年八月的青島東西文化比較會上專門講了。中庸之道發展成爲中國人的傳統了，那就是也不給人以明確的答覆，好像自己永遠正確。從科學角度來講我不是

贊成中庸之道的。從物理學角度來講，哪怕設計了一個非常錯的模型，但是這個錯的模型也是非常有價值的，後來的人是要紀念這個人的。他做了一件非常明確的事實，後來被明確地否定了，這是肯定。就怕是個彈性模型，參數相當高，不可能明確檢驗，你說錯了也無法校正（笑）。這種模型儘管永遠立於不敗之地，但是它最沒有價值的。科學上的價值觀是，你明確錯了，你也是有價值的；含糊糊糊的不行，儘管你老是立於不敗之地，可是沒價值。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這往往是最殘酷的東西（熱烈鼓掌）。

問：應該在政治領域裡談「四個堅持」，文藝界爲什麼也談？對此你有什麼看法？

答：這個問題我昨天已談了，我不想多談。他們自己說了，現在文藝界情況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有的實際上是沒有充分運用好時機，不敢再往前走。現在對文藝的控制是鬆了些了，對新聞的控制還是很嚴的。但文藝界沒有足夠的突破，給了小說界百分之三十的自由，但他們自己還沒用到，所以文藝界本身也覺得是個問題。

只有多元政治，才能達成民主

問：三權分立在中國有否必要，有否可能？

答：三權分立在中國實現我想也是有可能的，民主化一定是多元制約的，如果是單元的話一定是獨裁，當然在東方國家做到這點是很不容易的，要實現民主化就要權力分散，相互制約。

問：多黨制現在在中國是否可能？不能因爲共產黨最大，其它黨也就不大了吧？

答：多黨制的實質是相互制約。黨內有這個派那個派實質也就是不同的政治觀點。日本的自民黨也最大，但也有很多小黨，多元的結構才能使社會走向民主。

問：在您講的各方面情況中忽略了中國社會的結構本身，請問您看過了「醜陋的中國人」嗎？在中國知識份子內「文人相輕」這種毛病根深蒂固，代代相傳，即使外面氣候相宜，但知識份子的狹隘性，也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成功，至少在短期內。

答：這個問題我又談過了。「醜陋的中國人」這本書我在國外就看了，裡面所說的東西是事實，而且說得很深刻，揭示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弱點。但是得補充一點：這些東西是怎樣來的？不是一種本性？所謂本性就是指中國人自然就有這樣一種醜陋性，如果是這樣，那就很可悲了。我認爲這種醜陋性是中國長期封建造成的。在美國這種社會環境裡，很多中國人也是保持這樣一種醜陋性。比如柏楊在文中講到的 CHINATOWN 保持中國生活方式，有的人生活了幾十年連一句英語都不會說，完全是中國生活方式，如果你把這些人扔到美國人圈子裡，這些人將會發生很多變化。所以只要有足夠的先進文化的衝擊，中國人那些醜陋性也可改變，那些不是本性，是制度造成的，是封建社會的影響。

人大代表應該替人民講話

問：自由競選遭抵制是否是阻礙中國政改的核心問題？

答：如果它擴大到一個很大的範圍，就的確是一個問題。目前是由於沒有合適的氣氛。在科大，那裡長期沒有黨委書記，科大黨代表

大會已經十六年沒有召開了（笑）。按照黨章規定，科大的黨早該取消了。黨委書記遲遲不能任命下來。爲什麼我們不能自己選舉呢？實際上不行，因爲科大是重點大學，要中央書記處點頭才行。我認爲應當改變這種狀況，應該在知識份子中實行民主選舉。

問：科大的校政公開有沒有必要在全國範圍內推開？

答：科大搞民主，校政公開實際上只是一部份，我們馬上就要開教政會，就是讓教師提意見，其中有的教師要詢問科大的錢是怎麼花的。我是負責管預算的，所以我已經宣稱下個月定明年的預算。我是校長辦公室的主席，教師們都可以來聽這個預算，可以在這個校長辦公會上提問題，實行這種辦法很好。西方民主國家採取這樣的辦法是普遍的。美國的市政府開會，市民可以自由參加。會議選規定，如沒有公民參加，這個會議無效（鼓掌）。這個辦法很好。公民可以自由討論，可以了解這些議員是否公正，起碼起到監督的作用。這是市政府的會議，實際上議會更是這樣。上半年我在美國新澤西州住了幾個月，新澤西一位議員寄給我不少材料，介紹他參加了什麼活動和進行了什麼表決，告訴公民他的政績。我在那裡是臨時居民，這位議員也寄給了我材料。美國的議員要讓公民來評價他在一段時間內的政績，要向公民匯報。而我們說資產階級是假民主，那麼我們應當超過他們呀！我們的人民代表又怎樣呢？我在安徽究竟是選的誰當代表也忘了，我也不知道人民代表在幹些什麼，他竟講了那些話，民主的問題到底誰真誰假就很清楚了。既然我們選了你，你就要對選民負責。現在選出的人民代表只是到時候來視察，這錯了！怎麼叫視察？人民代表是代表人民的，你開會

時要去反映意見，你怎麼來視察（熱烈鼓掌）？這個詞是非常封建的，人民代表就應當到人民中去聽取意見，如看看教育的情況，有沒有經費，有沒有桌子板凳等；不做這樣的事情，光是去視察，那算什麼人民代表？根本沒有起到人民代表的作用。

現在誰也不怕誰

問：自由和民主不是由政府給予的，而應是人的內在的權利。你對中國民主進程有何設想？不能一些人老是單槍匹馬地幹吧？

答：現在民主當然不是單槍匹馬，已經有很多人做這方面的事情，而且也已經到了誰也管不了誰的局面；這個局面也不是一個人造成的，是由於大家的共同努力。我希望擴大這種誰也管不了誰的局面。

問：中國民主進程之慢，其根本原因在哪裡？

答：這是中國的封建傳統造成的，我想很難再找出更多的原因。



這一代青年是不會忍受專制的

並不等於民主。

答：最近許良玉同志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他把民主和自由的概念講得很清楚。自由當然是指個人，自己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這是最簡單的思想方式。當然做起事情來要少數服從多數，這叫做民主方法。在自由的基礎上，才有民主。

中國仍然是封建主義為主的社會

問：歷史上農民起義、工人罷工都推動了歷史的發展，知識份子通過什麼手段來領導國家？

答：我想有很多事情需要知識份子去做，而且應當做好。

問：有人說中國是社會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混合體，請你談談這方面的看法。

答：中國社會仍然是一個以封建主義為主的社會。

問：馬克思關於異化的問題，和王若水提出的關於中國社會異化的問題，是否成立？

答：異化這個概念當然是成立的，對中國而言也是成立的。

知識份子仍然不如幹部子弟

問：請您談談對我國高幹子弟大量從政間題的看法，以及解釋一下在體制改革中，幹部提職提薪從不間斷，而知識份子提職提薪却一再拖延的原因。

答：中國選拔幹部的方法本身就決定了高幹子弟大量從政；在中國實行的是什麼伯樂制（笑）。至於提職提薪的問題是由於幹部在掌權造成的，當然弊病很多。

問：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景如何？

答：這要看兩頭，一看上面領導，二看下面推動怎樣。

問：你認為研究生考試有必要考政治嗎？去年已取消，爲什麼現在又恢復了？花這麼多的精力搞這個不是一種損失？

答：我認爲應該取消（熱烈鼓掌）。這是形式主義的東西。這是爆炸式的思想教育，是反教育的，當然應該取消（鼓掌）。

問：知識份子最終處於領導地位和主導地位的過程你想過嗎？會流血嗎？會是一次革命嗎？

答：我們過去長期受「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宣傳影響，實際上現在改革並非一定要靠槍桿子才會「出政權」；不是只有一條道路。北歐那些國家都是議會道路，改變社會絕不是只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一種模式。改革是利於走上更合理的道路的。現在的改革已經造成了誰也管不了誰的局面，這不是很好嗎？

破除共產主義一元化局面

問：社會科學繁榮的前提是信仰自由，請您談談我們中國社會的信仰問題。

答：最近中央的有關精神文明的文件中沒有再提共產主義信仰的問題了，大家注意到了沒有？沒有了，沒有這條了！（熱烈鼓掌）

問：國家每年無償從上海等發達大城市調走大量財富，實行全國財富大鍋飯，上海等大城市爲什麼要承擔這樣的義務？這是不是剝削，保護落後？您對中國實行聯邦制有何看法？

答：關於前一問題是計劃經濟一個很大的弊端，把大量的財富無償調走，等於是強迫上

海多上稅。我在安徽聽到另外一種議論，安徽的淮南、淮北都是產煤區，主要供應上海。但是上面把煤炭價格定得死死的，低於成本，所以煤產得越多就越虧損，在這個意義上說安徽是上海的殖民地。（笑）各有各的道理，所有道理歸結於計劃經濟的不合理，計劃經濟造成了許多畸形的現象。

至於說到聯邦制，當然相對獨立一些是要好一些。是不是完全分開就一定好，我看不一定，我覺得歸根結底還是一個民主問題。究竟是分開好，還是聯合好，各種方法都可以找到反例，就是在民主化的社會裡找不到反例。美國是聯邦制，但是又相當統一的；南美是相當分裂的，按理說分裂應當發展更快。在美洲是統一的美國發達，不統一的南美不發達，關鍵是美國實行了民主政治，而南美仍然是封建政體。

問：中國有大學生的全國學聯嗎？如果有，它幹過什麼事？上海交大、北京大學這些有影響的大學爲什麼不搞南北大學生聯合會？毛澤東說過人多力量大。

答：中國有大學生的學聯，胡啓立曾經是學聯主席。

問：您談過中國應當儘快形成獨立的知識份子階層，這個階層有什麼作用？

答：我說過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有作用。

文革前共產黨就是在

搞極權政治

問：幾十年來中國共產黨是搞民主政治，還是搞集權專制政治？

答：從解放到文化大革命是搞的集權專制政治。

問：你是否贊成中國應全盤西化？

答：我是贊成全盤西化的提法，含義是全方位的開放，就是說沒有理由在西方文化衝擊之前就否定西方的東西。我們要承認我們現在的文化的確比發達國家落後很多了。我們要全方位的開放，讓它受到衝擊，好的自然就留下了，壞的淘汰掉，在這個意義上講要全盤西化。

問：請您粗略評價一下當代大學生的政治素質，並提出你的希望。

答：現在大學生們都在尋找真理，現在至少是沒有「權威」這個觀念了。處於多元的狀態是很好的，這有利於社會的進步。

問：剛才提到知識份子不能自覺地行動起來，怎麼行動？哪裡是突破口？

答：關於突破口，不同的人，不同的條件，有不同的方法。比如說中國現在有幾份報紙完全是個人辦的，這樣的報紙已經有了幾家，「深圳青年報」說是青年團管，實際上完全是獨立的。內地也有這麼幾家，包括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也是相當有獨立見解的，這些人都是從不同角度去宣傳自己的觀點。

只要站起來，

知識份子就有力量

答：清除精神污染只搞了二十八天半天就夭折了，這就表明中國知識份子只要肯站起來就是有力量的。清除精神污染當時勢頭很大，但很多人採取抵制態度，所以這個小文革沒有實現。

問：你認爲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是否你說的彈性模型？

答：當然有些像，實際上在這個體系裡有許多是沒有用的，很多是淺薄的。（熱烈鼓掌）

（文中小標題由編者所加。）

中國需要全方位的現代化

——民主、改革、現代化

（在上海同濟大學的報告·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國內）方勵之

同濟大學的同學到交大來找我，要我到同大講，我現在針對民主、改革、現代化來講。現在的目的是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大家都有一個迫切的心情，各階層都強烈要求中國必須實現現代化，這是人民的意見和呼聲。這個問題對於我們搞科技工作的人來說，意義更加深刻。

中國現代化的提法，越來越深刻，越來越統一，範圍越來越廣泛。現在我們中國是經濟不行，文教、科學也不行，各個方面都需現代化；人們在這方面的認識已大大提高了。我們的所謂精神文明和文化也是不行，所謂的道德水準也不行，政治上也不行。（熱烈鼓掌）

我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要一個什麼樣的現代化？回答應該是要一個全方位的現代化，即沒有哪一個方位上不需要現代化。我們中國要不要全盤西化？這個爭論不是從今天開始的，一百多年前就開始爭論了。中國究竟要不要現代化，我個人欣賞全盤西化的觀點。（熱烈鼓掌）我的理解是應該全盤地、全方位地開放。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文化不是在一個方面落後，而是在所有方面都落後。這時我們怎麼辦呢？我們當然應該全方位地開放。

不要在沒有開放之前就提出那些地方需要堅持，哪些地方需要維持，哪些地方不能動等等，在沒有衝擊之前就提出這樣的限制是沒有任何根據的。（熱烈鼓掌）關於全盤西化的意見，中國一百多年前就有人提出了，不是現在才提出的。要讓所有先進的文化都來衝擊我們的所有方面，包括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教育等等各方面都要接受衝擊。當然好的東西要好好保留下來，不好的東西我們要全部蕩滌，這是我們面臨的形勢。至於為什麼我們面臨全部落後的状态，這要看歷史事實。一百多年來，我們的許多方面在變，但還是大大落後於世界形勢。我的親身感受是解放以後這幾年，我們搞社會主義這段時期，平心靜氣來講，這一時期同樣也是失敗的！（熱烈的、長時間的鼓掌）這不是我的意見，是大家共同的認識。

整個來說，社會主義處於低潮，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搞成功。我認為這是個不能迴避的事實。中國三十多年的社會主義總的來說是不成功的。但一定有人說，我們中國太大、太窮、人口太多，有人認為我們現在搞成這個樣子已經是很不容易了。我們

認為這些理由都不能說明問題。從理論上、實踐上都能找到反駁的依據。有人說是人口太多，但是我們要知道我國人口的密度在世界上並不是最多。我調查了一下，按可耕地的面積來算，中國每平方公里容納七五〇人，而日本比中國高一倍，高達一五〇〇人。為什麼日本成功了，而中國沒有成功？！兩國的起點也差不多，日本戰後的經濟水平在很多方面與我國相類似，所以從人口上是無法說明問題的。當然有人也要說中國底子太窮，我認為這理由也不充分。

從馬克思到毛澤東， 社會主義都是失敗的

我可以舉出社會主義國家的一些例子，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最能說明問題的是東柏林和西柏林。我參觀過東柏林和西柏林，感受太深了。在東西柏林之間有很高的圍牆，把兩邊隔開來，西柏林的人想到東柏林去，沒人管，你要去就去。到東柏林去參觀，買張旅遊票就去了。西柏林物資豐富，但到了東柏林，情況馬上就變了，雖然建築物還是很宏偉的，但商場裡看不到什麼東西，老百姓看上去很嚴肅（笑、鼓掌）特別是通過兩國交界處時非常鮮明，到東柏林去的時候，西柏林這邊簡單檢查一下就完了；可是在回去時，就一個個被趕下車，然後檢查每個人的證件和行李，而且還把車上的東西都檢查一遍，主要是怕東德人跑過去。如果你這個社會是好的，為什麼怕人家跑（熱烈鼓掌）？這是最簡單的邏輯（熱烈的、長時間的鼓掌）。我不是有意要罵東德，只是要說明只有承認自己失敗才行。從社會主義這個體系來看是失敗的。（熱烈鼓掌）我是說社會

主義運動從馬克思、列寧、到斯大林、毛澤東都是失敗的。(熱烈鼓掌)

當然社會主義的出現是有一定基礎的，是有值得欣賞的地方。但是做起來就不是那麼回事了，這需要我們重新思考這些問題。我們在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不要老想到正統的東西，這種正統的東西是比較狹隘的。我們在思考這些問題之前，首先要解脫一個框框，即解脫所謂馬克思主義正統的約束。去年我在北大也講了這個問題，講後被反映上去，當時有人反對；但是現在我發現中央已經把它寫進了文件裡了，承認了馬克思主義的狹隘性(鼓掌)。什麼是狹隘性？雖然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總結了一些人類文明的真理，但在實踐中，我們却只承認這一個真理，把過去的一切都拋掉了，只有解放以來所做的才是好的，把過去都一概否定，把歷史上人類文明以及現代文明和其它民族的長處都加以否定。實際上這些是完全否定了的，這些都是對人類文明的貢獻。

破除各種正統觀念

解放以後，我們總是把自己凌駕於其它民族文明之上的，除了宗教沒有別的。(熱烈鼓掌)關於這個問題，我在北大也講過，比如說我談到我們人類追求文明的精神問題。上個月紀念長征五十週年，長征的確是一些先進份子為追求真理歷經千辛萬苦，從江西走到陝北，這種精神是值得歌頌的。本來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宣傳部門加一些什麼「史無前例的」，什麼只有「特殊材料的人」才能做出的等等，反而使宣傳效果變差了。其實我們中國歷史上早就有過這樣的長征，我覺得可以與之相比的是玄奘西天取經，這也是長征(笑、鼓掌)。實

際上是一樣的，都是為了一種追求。而且我們知道玄奘在歷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玄奘到了印度唸佛學唸得非常好，成了佛學院的第二把手。(笑)他不是靠我們現在的伯樂方式提拔的，而是靠辯論的方式上去的。玄奘和好幾百人辯論，最後他成功了。有個重要的科學家寫了部著作，在書中論述了人類兩千多年的歷史，其中提到了兩個中國人，這兩個人都是研究佛學的，其中一個就是玄奘。他認為他是對人類文明有貢獻的。因此，玄奘西征追求真知的意義絕不比紅軍的長征差。所以，紅軍的長征絕不是什麼史無前例的。(熱烈鼓掌)這樣的宣傳是一種封建表現，說明自己就是正統，其它的都不行，只有我才是最好的，是史無前例的。



擋不住的民主潮。圖為同濟大學黨方幹部禁止記者對示威學生拍照。

瑞典的社會主義搞得最好

所以我們要全方位的開放，把各種文化吸收過來，改造我們的社會，絕不能關起門來看自己，不能說自己一切都好。世界文明是由各種文化組成的，就拿社會主義運動來說，到現在處於低潮，這個低潮的存在已經被承認了。社會主義社會分了很多流派，每派都企圖實現社會主義，許多有識之士在世界範圍內探索、尋找，有人說失敗了，有人說沒有完全失敗。今年七月份，我曾到瑞典去開一個會，瑞典的朋友講，他們搞的才是社會主義。他講，你們的社會主義不也就一個是公有制，一個是貧富懸殊不要太大嗎？我們這裡的公有制企業超過了半數，而且貧富懸殊的現象也很小了。我們感受很深，他們的生活水平很高，瑞典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萬九千美元，我們根本沒法比。他又講你們社會有福利，我們也有，而比較起來他們的社會福利比我們的好多了，是典型的福利社會。意識形態上也宣傳馬克思主義。我到一個展覽廳看壁畫，一幅大壁畫宣傳他們的社會主義民主黨如何到工人中去鼓勵工人開事。(笑)第二幅大壁畫是反映通過議會鬥爭奪得了政權，人民過上了幸福生活。他們還說，電視是一種教育工具，所以他們的電視節目中，禁止播放廣告。(鼓掌)從他們的意識形態到社會發展比我們更有社會主義的內容。(鼓掌)他們講這是社會主義的勝利。

用中產階級消滅無產階級

社會主義民主黨是被列寧斥為叛徒的，列寧把第二國際說成了叛徒，但不管他們是不是

叛徒，他們到底解決了實質性問題呀！如果我們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那麼他們的成功和發展，就比我們的合理、先進多了。他們說你們強調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所以消滅了資產階級，我們也搞社會主義，但我們搞階級調和。社會存在階級、存在矛盾，我們是通過調和的辦法解決的。我們也是經過五十年代的階級調和，消滅了一個階級，但消滅的不是資產階級，而是無產階級。（熱烈鼓掌）他說的是什麼意思呢？瑞典人民大部份變成了中產階級，所以消滅了無產階級。我認為這值得我們靜下來真正認真好好研究的。

我們有許多陳舊觀念在干擾着我們，我們長期生活在這個社會中，好像一切都自然，也這樣過來了。但出去看看，覺得以前的觀念完全不對，是一些錯誤的觀念。我們中國不成功的原因很多，封建的東西在我們這裡真是太多了。

僅僅鬆一下細綁人民的繩子，不是民主

今天講的題目是民主、改革、現代化，關於改革、現代化的必要性已經講了，再講講民主這個問題。前不久我們說要民主了，要寬鬆一下環境。民主的提法是非常明確的，跟寬鬆是不一樣的。民主是什麼意思呢？關鍵是人的權利，或者說是對我們國家比較敏感的一個問題，即人權問題。人權是一個非常非常基本的東西，每個人人生下來就有生存的權利，大腦有思想的權利，有受教育的權利，有婚姻自由的權利等等，這些東西就是人權，而我們把它視為洪水猛獸。人權是非常普通，非常具體，每個人都必須承認的東西。我們現在却把自由、平等、博愛、人權這些東西視為資產階級的東

西一律加以批判，我認為，如果你是民主的國家，這些好的東西就應該比別的國家多，而僅僅只是個概念。（熱烈鼓掌）

關於民主，我覺得應首先承認人的權利，每個人的意願不一樣，可能有不同的意見、方法，但要有民主的方式來加以組成，組成一個國家，形成一個團體。民主要靠大家共同來維護，而我們現在一談到民主，就講要發揚一下民主，這是指從上頭到下頭，讓你發揚一下，這個提法本身就是不對的。（熱烈鼓掌）寬鬆的提法也是不對的，這意味着總是有人拿繩子捆住你，只是叫你寬鬆一下而已，只是讓你跑動、跑動，讓你寬鬆一下。（熱烈鼓掌）這仍是一種從上到下的沒有民主，沒有人的權利，所以我們現在的民主概念與西方的概念完全不一樣，什麼事情都是從上頭下來的，這不是一個民主的意識，而是一個非民主的意識。比如報紙上經常登人民代表到什麼地方去視察。人民代表怎麼可視察呢？大家想想這不對？完全不對的。人民代表是人民選出來的，應該下去聽取人民的意見，到人民代表大會上，到議會上去反映人民的意見，代表人民發言，怎麼能是視察。（鼓掌）用視察這個詞本身就是不民主的表現。

民主首先從個人開始

人民代表應在開會前到下面去聽取意見，然後帶著這些意見到議會，或稱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我們去發言。怎麼能叫「視察」呢？視察這個詞就是個非民主的理解（笑聲）。我們現在人民代表的功能遠遠不能代表我們的意見。其實，我原來也不覺得這很奇怪，認為是很自然的，人民代表駕到了，視察視察我們（笑

聲）。今年上半年我在美國紐澤西一家高等研究所待了幾個月，有些州議員給我寄一些材料，內容是我這個議員最近在議會裡幹過些什麼事情，議會最近在討論什麼問題，我是投了贊成票、反對票還是棄權票，總之，是表明他的政治態度。這是他向你匯報，儘管我不是那裡的公民，只是臨時居住，但他要表示他將尊重任何一個在本州居住的人，讓他們了解自己的工作。你贊不贊成我的意見？如果不贊成，你可以向我提，下次我就到議會去發言。儘管我們說他是「假民主」吧，但他還向你匯報。可是在我們這裡的「真民主」制度裡，我可從沒收到過一個人民代表的匯報，向我報告他在人民代表大會討論什麼文件，投了贊成票還是反對票（鼓掌）。我又不知道你是贊成還是反對，下次我稀裡糊塗還要投你的票，這怎麼行？所以我們的「真民主」還趕不上「假民主」。（笑聲）

在民主國家，民主是從個人開始的，政府要向個人負責。從經濟上說，也是我個人交了所得稅，你的政府才能維持工作，你拿了我的稅錢就要為我辦事、辦學校、辦醫院、辦公共福利、辦市政。從感情上說，每個人都認為政府是靠我交的錢來維持的，就要為我服務，對我負責，這就是民主社會的一種觀念。可是在我們這裡都是反過來的，政府為我們做了點事，我們就說，政府真好。其實這是政府應當做的事情。我們學校在教育學生時常說：你們應當努力學習，珍惜黨和國家給你的學習機會。（笑聲）。這句話前一半是對的，要努力學習，可是後一半是不對的，因為這機會不是國家給你的，而是每個人人生來俱有的權利。憲法上就規定每個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權利。（鼓掌）從經濟上說，也是你們交了所得稅（你們學生

不交，你們的家長交了），政府就應該辦學校讓你們受教育，要擺正這種經濟關係，這種觀念是民主的思想基礎。我們中國封建傳統比較強，什麼都是從上到下的，我覺得這搞顛倒了。什麼是我們精神文明建設中最缺的，正是民主的精神和意識。政治體制改革有很多東西要改，但民主意識是關鍵的東西。

告密滙報無視隱私破壞民主

最近在歐洲有很多暴力現象、刺殺、綁架等。這對於西方人的生活造成不穩定的因素。所以消除暴力現象輿論要求非常強烈。七月份我乘飛機去法國，法國常出現爆炸飛機、機場的事情，於是，最近有人提議，應當制訂這樣一個法律，讓公民看到任何有暴力嫌疑的人或現象要及時報告警察，讓警察採取措施。這也是要保證全民階級的利益（笑聲），但這個法案提出後，在法國議會討論半天，最後被否決了。爲什麼？當然不是因爲大家贊成暴力行爲。持反對理由的說，如果你通過這一個法案，那麼就必然會出現一批告密者，而告密者的出現對民主社會是個極大的破壞（掌聲）。在國外，人們認爲人有尊嚴和隱私（PRIVACY），不允許隨便受懷疑。在我們這裡，我懷疑你，認爲你可能會做壞事，我就去報告，這是很正常的現象，還能說明你警惕性高，階級鬥爭覺悟高，這實際上是非民主的一種表現，不懂得基本的人權。首先人不准許隨便受懷疑，人的生活應在無恐懼的條件中，而中國人常生活在恐懼條件中，在這樣的社會裡就不會出現民主的空氣。如果誰都處於一種老要受懷疑、經常感到恐懼的條件下，是不會有民主出現的。我聽了這套理論也覺得自己的思想很陳舊，在中

國生活習慣了，告密者好像很普通。可人家認爲告密者的存在會破壞民主制度。這些事情都是需要我們慢慢去理解的。

知識具有獨立價值不囿於權力

我再講一點就回答同學的問題。我們在座的都是知識份子，都是搞科學的。科學和民主是並行的，科學不能代替民主，民主也不能代替科學。大學的最大特點是創造知識，這些活動是屬於科學和知識的領域，在這些領域我們有自己獨立的判斷標準。在西方一些國家裡，大學是獨立於政府的。當然，錢還是要的，政府給我錢，我來辦學校，可是辦成什麼樣、有什麼樣的內容、學術標準是什麼，我願培養出什麼樣的人，這完全有大學自己的判斷標準，而不是由政府來判斷（鼓掌）。當然，西方很多大學也獨立於企業，這些都是大學所具有的特點，它說明知識具有獨立性、獨立的價值，這是個保證民主很重要的方面。你只有認爲知識是獨立的，你才能夠在其它方面不隸屬於政府、不隸屬於某些非知識的權威。可是在中國就不完全是這樣。我們大學培養人的最大問題是什麼呢？那就是我們培養出來的人都是工具，而不是人（鼓掌），就是沒有自己獨立判斷標準的人，別人欣賞你了，這工具就很好用，放心了，而不是有自己的判斷標準和不許別人干涉的態度。中國知識份子在這方面還沒有完全把觀念改變過來。比如，我是搞物理的，物理學界對你的評價這才是最有意義的，可是我們中國的情況往往是某個領導人說你好，你的價值就會很高，這說明人的心裡還有一種工具感。社會關係中也有這個問題，我很少接觸其它社會問題。但我從物理角度不得不看一些哲



北大學生燒毀官方喉舌北京日報

學的東西，以便自我保護。但是我發現，社會科學的一些文章往往引用領導人的話來說明問題，如果這位領導人是哲學專家，或哪一門學科的專家，我覺得這還可能是有價值的，有利於學術的論證。但如果他並不是哲學家，那你引用他的話有什麼價值呢？從學術上來講是毫無價值的。這只能說明是給自己心裡壯膽（鼓掌），所以這種關係是倒過來的。可是西方相反，比如你研究經濟，那麼你研究出什麼結果，就是什麼結果，不受政府干擾。反而政府要徵求這些學者和研究者的意見，說你有什麼意見，成果拿來看看，我這政策可否用你的理論作依據。現在倒過來了，是政府引用一些教授學者的話來爲它的政策壯膽（鼓掌），這就說明知識相對於權力是獨立的。不依附於後者。如果知識依附於權力，就沒有它的價值了。這

一點最近在我國也有一些發展。比如說最近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文件中，就再也沒有寫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科學研究。也就是說在科學研究的範圍內，馬克思主義只是其中一家學說，不再具有君臨一切的指導地位（鼓掌）。其實，這種指導本來就是錯的，再加上這種物理哲學指導，實際上又是領導的指導。科學研究本身是具有獨立性的東西，它本身應有獨立的價值標準，獨立發展，而不要顧及我們以前的那一套。解放以來，所有的學術批判百分之百是錯誤的，這種批判當然現在是很少了，但還有沒有呢？還是有的。我自己也有這種感覺。比如說去年出的事情你還可以說我政治上怎麼怎麼樣，可是若干涉到我學術上我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我是「科學雜誌」的副主編之一，去年我們科學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介紹量子宇宙學，量子宇宙學是一門新的學科，它是對還是錯當然我們自己的工作方式來辨別，從理論上、從觀測上來判斷它的合理性。不但可以糾正，甚至否定都可以，這是科學運轉的一個自然的過程。可是這篇量子宇宙學通俗介紹文章發表之後，我們編輯部就收到一封信，這封信來自非常上級，說這篇文章是客觀唯心主義。當然，對科學發展進行批判是可以的，可是用哲學的帽子來加，今天在科學界已經沒有市場了。「科學雜誌」編輯部的很多人說，如果你用科學的文章來批評，那麼我們還可以登出來，可是如果你用哲學的方式，用馬克思主義君臨一切之上的指導方式來批判，我們不予發表（鼓掌）。我們是科學、物理學、宇宙學，我們有自己的判斷標準。哲學和我們有什麼關係？（笑聲）。當然，這封信來頭很大，是當時我們國家意識形態總司令胡喬木同志，儘管這樣，我們一律不予理睬（熱烈鼓掌）。如果你懂

宇宙學，我們歡迎你批評，可是如果你不懂，那麼請你靠邊（熱烈鼓掌）。如果科學界有這樣一種精神，民主才能有保證。我們知識系統應該有我們自己對真善美的判斷，而不受權力的左右，這樣我國才能實現現代化，才能實現真正的，而不是所謂的民主。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熱烈鼓掌）。

由於時間關係，問題可能答不過來，你們授權主席選擇一下好不好？（下面是回答問題）

胡喬木說話不像話

問：去年夏天你在浙江大學的演講中，曾點了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的名，稱其為遊手好閒的廢物，有關部門令你向北京市委道歉，請問你道歉了嗎？

答：的確我點名批判了張百發，但不是在浙大的講話，而是在北大的講話。我說的是事實。前年冬天在美國開一個關於迴旋加速器的會議。這個會議中國去了二十五個人的龐大代表，與這個研究項目有關的科大和高能物理研究所各去了五人，剩下十五人是其他單位的，當然，有些人是與會議有關的，但其中有張百發，張百發根本不懂這個研究項目嘛（笑聲）。我講了他之後，第二天電話就打到合肥，要我方勵之在適當的時候向北京市委道歉。我們校長當時就把它給頂回去了，說方勵之根本沒有必要道歉（鼓掌）。可是到上個月，科學院告訴我，說讓張百發去是對的。為此，胡喬木說科大領導班子是黑舖子，你說這像一個國家領導人說的話嗎？最近報紙上宣傳民主辦校就是對這件事的一個表態。我們科大並沒有一個

後台，儘管我們要辦成具有獨立價值標準的學校（鼓掌）。

問：你和胡啓立的關係怎麼樣？胡是北大學生會主席時你是學生會的一個部長是嗎？

答：胡啓立的確曾是北大學生會主席，不過我沒有當過北大學生會的部長。我和胡的關係在一九五五年北大一次小小的共事中他才認識了我。那次是北大開團代表大會，我們幾個物理系學生覺得會議太沉悶了，講話都是公式化的發言，就小小地鬧了一下事，結果我們物理系總支書記代表上台發言，讓我上台發表意見，因為我聲音比較大。我就說這種沉悶的會議沒有意思，現在培養出來的是什麼樣的人？應當培養有獨立思考的人，光有「三好」還是不行的，「三好」是一個很沉悶的名詞。會議後來就被攪亂了，後繼的發言都沒法發了。這樣一來胡啓立就對我有印象了。第二天作學生思想工作的第一把手，黨委副書記××同志講了一天，說獨立思考雖然好，但現在需要大家安下心來學習。後來我們這批人在物理系當了教師，在反右時全右了（笑聲）。

問：聽說你在浙大演講受到攻擊，勒令你退黨，這是事實吧？你今天來演講有顧慮嗎？

答：勒令退黨並沒有直接對我說，我只是聽說某某大人物在北京「一二九」座談會上說，某某大學的校長講這種話，應當勒令其退黨。有沒有顧慮。當然有顧慮。反右的時候，不但台上講的人是右派，就是聽講鼓掌的人也要當右派。（笑聲，鼓掌）

批判資本主義常常武斷無知

問：資產階級究竟反不反動？

答：資產階級在封建社會革命的時候當然

是非常進步、革命的。

問：現在流行的口號不承認中產階級和白領階級，只承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甚至認為白領階級也是資產階級，理由是他們也參加剩餘價值的分配。

答：關於這個問題我今天上午在社科院講過，我們應當弄清到底是誰剝削剩餘價值，誰占有它。我覺得這並沒有一個定量的分析。現在我們熟悉的概念，往往都是非常靈活的。我們搞物理學的，每一個概念都有明確的定義，可是社會科學中的某些論斷是不明確的。關於資本主義這種情況，總是以資本家占有剩餘價值來說明剝削，可是事實上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毫無推翻資本家的意圖，這是為什麼？當然我相信他們也不會去宣傳或向我們灌輸無產階級意識。事實上我們對資本主義的理解與現實完全對不上號。馬克思和列寧時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情況和現在不一樣，現在到底資本主義怎麼樣？西歐到底怎麼樣，美國到底怎麼樣，很多人並沒有一個實質性的理解。我有一次在美國開會碰到一個中國人，他說列寧說帝國主義是腐朽的、沒落的資本主義，可是這理論和現實完全對不上號，他到底是指誰？當然，如果真是腐朽的、沒落的，就要把它打倒，可到底指誰？這不是一種感情的說法，而是事實的說法。大家說帝國主義就是壟斷資本主義，美國肯定是帝國主義了，可是它還立法「反壟斷」，比如說你的公司太大，它一定要讓你分開。所以說帝國主義是壟斷資本主義這號也沒有對上。我覺得，宣揚上述那一套的這種人都是沒有真正的知識，只是從馬克思主義那裡找一個概念，然後用它來套現實。我們學物理的人，你告訴我一個概念，我一定要問它的定義怎麼下，你說社會主義，我就要問社會主義的定義

怎麼下，用什麼來測量？如果你對一個概念沒有明確它的含義，你先要問他是不是有那個東西，要是沒有，你就不能隨便武斷地下定論。像壟斷這個概念，人家有反壟斷法，怎麼能說人家是壟斷呢？

問：您對最近的留學政策怎麼看？

答：大家最近聽到很多留學的規定，很多人包括我在內都是反對的，制定這個文件是對開放政策的一種倒退（鼓掌）。

問：據說現在的留學政策已使很多老教授擔心手下無人，進一步會使許多人失去出國留學的機會。

答：我是贊成開放的，根本不要擔心中國沒有人，中國有的是人，台灣出去了三萬人，台灣經濟也沒受到影響，照樣發展。而我們大陸出去美國的留學生也就是兩萬多人。所以不用擔心出去這樣一些人中國的人才就走光了。中國有這麼多年輕人。等出去到三百萬時再擔心也不晚。

問：如果當時國民黨沒有被趕出大陸，仍舊執政，中國的現狀會如何？

答：我覺得很難回答這種問題，歷史往往是不可逆的。我也知道台灣現在經濟比我們發達。我在台灣待了一個小時，在機場換機時下來看了一下，我小時候的印象就是國民黨大兵，戴著那種帽子，穿著軍裝，拿著槍。可是在機場沒有看見一個大兵，航空小姐正在聊天，和大陸也差不多。我覺得台灣這幾年經濟是上去了。

問：你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那一種更適合於中國的情況，更能使中國走向文明之路。

答：我覺得現在對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認識也是多元化的，所以這個問題本身並不

清楚。我覺得現在要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各種各樣的模式，現在資本主義也不完全是自由市場式的，西歐的資本主義已有相當多的國家成份。所以它和古典式的資本主義完全不一樣，它還有很多救濟，這些方面也是不一樣的，古典式的資本主義現在已不存在了，同樣古典的社會主義也不存在了。如果你站在現在的社會潮流上，決不能把每個國家簡單地分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戰爭中你可以劃分東方陣營、西方陣營，可經濟型態是各種各樣的，千差萬別，這本身就值得我們每個人研究終生。

問：請你簡單地回答一下，為什麼三十年來我們中間沒有再出現過錢學森？

答：這個我覺得不能怪大學生。外國大學生是普及的，幾乎人人都要上大學，在美國上正規大學的人占三〇%、上社稷大學的大約有五〇%以上，所以大學生已經不稀奇了，人人都是大學生。西方的年輕人和中國的不同，西方是自由社會，年輕人機會較多，自己闖出來的較多。機會多，競爭性強，只要你去，沒有找不到機會的。所以那裡的學生，首先要鍛鍊自己獨立創造的能力，只要有了能力，就能有所作為。而中國是社會給你規定好了上大學學什麼，學數學、物理、化學，然後分配單位。這樣不需要太多的自我創造能力，所以是中國的教育制度影響到中國學生的創造能力。至於中國三十年來為什麼沒出現錢學森，那麼多運動還能出現錢學森？

以民主制取代「伯樂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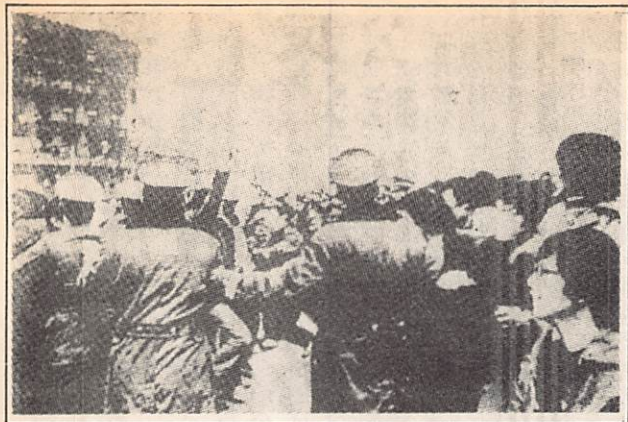
問：你是中國最年輕的學部委員，很多人已老態龍鍾，據統計，學部委員的平均年齡是

七十多歲，中國的年輕人是不是退化了？

答：這個問題很簡單，中國只有一代勝一代，青年人超過老年人是顯然的。以後決定接班人不採取伯樂制，而是採取民主制，這才是關鍵（鼓掌）。我們的幹部選拔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都是伯樂制，由上面挑，挑當然也是一種方式，作為推薦人推薦。可是這不是個民主的方式，採取民主方式幹部才能對下負責，體現民意。

問：在教育系統內如何實現民主辦學？

答：教育系統民主辦學和整個社會的民主制是類似的問題。所謂民主應是立法的一面需要民主程序，而行政這一方面是指令，這是社會運轉的必然方式。在教育系統裡，我想研究教育經費，決定如何辦科研，應當用民主的方式商定，這和管理國家的道理是一樣的。



上海學生示威時，與警察發生衝突。

問：魯迅先生倡導的多讀外國書，少讀中國書，目前是否具有意義？作為改革者應具有怎樣的知識結構？

答：魯迅是個相當激進的人，他主張全盤西化，根本不讀中國書，要讀外國書。把所有中國傳統的東西都批一頓，說中醫是巫醫，把中藥臭罵一頓。的確他的心情是急切地希望中國趕快對外開放，直到今天我覺得這種愛國精神是很值得敬佩的。今天我也希望大家都走出去，對比一下，很多人的觀點會改變。包括魯迅在內，都因為與外國對比受到啓示，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所以應當說魯迅是很愛國的。

問：根據您談的民主思想，我國法制應如何建設？

答：老實講，中國的憲法還是相當不錯的，問題是有沒有認真實行。上面有各種各樣的權利規定，也說是民主選舉，但實際上是不是？我覺得中國的憲法沒有形成意識，也沒有在實際工作中做到。

問：如何看待現在社會上個體戶與大學生收入不平衡的問題？

答：我在浙大也講過，我們社會現在經濟上還不平衡，一部分是計劃經濟，一部分是實行商品經濟這兩部分結合起來了，結合部就會出現不協調，所以就出現知識分子的價值較低，反而個體戶的價值比較高。

政治學習應該自願參加，不能強迫

問：你是否對前幾年出現的反精神污染運動深惡痛絕？

答：我在浙大的講話中就明確地表過態。問：對於當前大學的政治教育，你有何看

法？

答：這要看你教什麼內容，一個人受點道德教育我個人看還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人除了物質方面外還有精神方面的需要，人的精神需要道德來維繫，無論哪個社會，信仰還是有的。例如美國社會非常商業化，可它那裡仍然需要道德的維繫，宗教就是它的維繫方式之一。美國人每星期有五天為賺錢去拼命，星期天去教堂懺悔，得到心靈的平衡。所以我想這種精神上的道德教育還是很必要的。問題是現在我們的政治教育有很多問題，比如說現在哲學的教育就非常落後於現代科學，所以這些東西大家不信，也是個必然結果。又如我們雖然也講道德，可是講的人本身不身體力行，有不正之風，或者自己又沒有民主作風，大家當然對你講的不信了。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有個很有名的神學院，在那裡畢業出來的人都是道德修養非常高的，他們在修道的时候可以看到的確是非常感人的，所以的確有很多人信奉的，因為他們的信教是自願的，不是星期六學習，強迫大家一定要來（笑聲）。他們在傳道時，人們自動來聽，主要是他們這些人身體力行，品德高尚的結果，所以還是吸引了一批人，使社會得到穩定和平衡。而我們這裡有人開玩笑，說這幾年黨的形象不好，宣傳者嘴裡宣傳一些東西，可自己心裡也不相信，台上講完台下變成另外一個人，所以要提高我們的宣傳效果，最好派幾個人出來，唸唸神學院博士。

搞「四個堅持」不能迷信、專制、保守、附庸

問：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是出於發展生產力的要求，還是領導者個人感情的產物？

答：「四個堅持」我覺得是政治領域裡的一個信仰。九月份報紙報導××發表一些意見，說大學應當有自己的精神，我曾經說大學應當有科學、民主、創造和獨立，這篇報導中包括了我的談話。記者後來給我來封信，寄上了他寫好的稿子，說你提的精神很好，科學、民主、創造、獨立，但你的談話記錄是否補充一下，否則給人感覺與「四個堅持」無關，你提的也是四條，是否讓人感覺有點危險？後來我給他寫了封回信，說我可以加一段，說科學、民主、創造、獨立如果和「四個堅持」是矛盾的，那麼就是說「四個堅持」是主張科學對立面的迷信，民主對立面的專制，創造對立面的保守，獨立對立面的附庸（鼓掌）我加了這麼一段，他說你這麼一加就更尖銳了（笑聲）。所以我們可以充分地發揮這種方法，如果有人問你的東西是不是反對「四個堅持」，你可以反問他一句，「四個堅持」是不是與民主矛盾，是不是主張專制。你這樣一問他就答不出來了。

問：你剛才說要保持我們原有的傳統，看來這也是中庸之道，而與你的全盤西化的主張是相矛盾的。

答：我的意思是說，在全方位衝擊之前，不需要說哪些是我們的優點，先堅持，衝擊之後你留下的東西，就自然是好東西，壞東西已經被淘汰掉了。中國肯定是有優點的，你走遍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中國有一種文化是絕對要侵犯全世界的，這就是吃的文化。我到過十幾個地方，那裡都一樣，中國餐館越來越多。比如南美洲加勒比海一個小國家，也有中國餐館，中國餐館到那都絕對站得住腳的，誰也擠不倒的。有時我們請外國朋友吃飯往往自己做菜，他們吃了菜會問，你們菜做得這麼好，怎麼

不去開餐館啊？（笑聲）我們在坐的人，做菜的平均水平是可以到他們那裡去開餐館了。所以我們在這個文化方面是佔優勢的，不說別的優點，就這也算優點了吧？！

中國政治仍處在混亂狀態

問：人民應當有權利了解國家領導人的政治考慮、工作能力、思維方式，可現在只有通過「轉內銷」才能了解，國內為什麼不能看到華萊士對鄧大人的採訪？領導人為什麼總是披著神秘的面紗？種種醜聞和殘酷的權力之爭就這樣躲藏了被揭出，這難道不是對中國人民最大的嘲弄嗎？

答：在一個非民主或者說像我們這樣一個民主還不夠的國家，政治肯定不是透明的。在民主社會裡的政治透明就是說，無論中間隔了多少層，科長、處長、部長……每個人的政治態度都看得出來。中國呢？還是處在宇宙爆炸的初期——混沌狀態。

問：階級分析的方法為階級鬥爭提供了理論基礎，現在是不是應該全面拋棄這個落後的狹隘的觀點，為什麼有些同志還抱著階級鬥爭和階級分析的方法不放，請分析一下他們的思想狀態。

答：階級分析是在馬克思之前的古典經濟學家用來分析經濟現象用的，我想這對於當時的社會也是個正確的概念或正確的概括。然後這個概念進一步從經濟上發展到政治上，我覺得這也是合理的。可是到後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無限地擴大了階級鬥爭的方法，把任何一件事都要進行一番階級分析，這顯然是錯誤的。（鼓掌）無限地擴大階級分析的方法是一種極庸俗的方法，簡單化的方法。這和

毛澤東同志的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理論有關。從反右以來，把什麼東西都刻上階級烙印，其實根本就沒這麼回事。有些角度當然是可從階級論上進行分析的，比如經濟角度，但有時這個意思完全擰了，尤其無限擴大顯然是錯誤的。

問：我們學校會專門組織學習清華高景德的一篇文章「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辦學不能兼容並蓄」，你可看到這篇文章，你對這篇文章怎麼看法？

答：明確說我不贊成這篇文章，實行兼容並蓄這種觀點不光是我講過，很多人都講過。我覺得我們既然是社會主義大學，應當超過舊民主時代的大學，那個時候都敢於兼容並蓄，我們怎麼還不敢？應該比兼容並蓄更多一點（鼓掌）。這篇文章如果用句尖銳的話說，它是違背黨的原則的，我們常說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就是兼容並蓄嗎？所以這篇文章是毫無道理的。我們校務會議堅決反對這篇文章。

問：你有無為榮獲諾貝爾獎而奮鬥，你有這個雄心嗎？為什麼同樣一個腦袋在中國就不能獲此殊榮？

答：中國之所以沒人得諾貝爾獎，不在於中國人的素質不行，而在於中國社會的背景條件不行，這本身就是中國整個文化落後的現象。

問：你認為中國的一黨制是中國現代化的障礙嗎？

答：我認為我去年已經答過這個問題了。民主化必然會出現各種不同的意見，這是必然的。所以我很反對在人民日報曾經登過的一篇很有權威的文章，是人大一個副委員長寫的。說我們國家的人民代表大會往往是三千比零的

表決結果，這要比美國的四九比五一票的表決結果要好。這實際上表現了沒有起碼的政治學常識，政治本身就意味大家意見不同，這是必然的，並不可怕的，所以三千比零才一定是壓迫某種意見形成的（鼓掌）。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但形式上是否一定要多黨制，我看不一定。我看很多民主化的社會也由一黨長期執政，或佔主導地位，比如瑞典，就是一黨老執政，社會民主黨執政五十年了；再比如說日本，也是一個黨老執政，但多種意見都可以自由地發表，所以一個黨也不是絕對行不通的。黨有時只是個形式的東西。

人聞人是封建文化的劣根性

問：當前報刊和雜誌上有很多批評中國人劣根性的文章，應如何看待這些東西？

答：中國人在修養、作風上是有許多問題的，而且我還可以說得更多。我贊成這種分析，但要說得更深入一步，我希望問一下這些缺點是從哪來的？我認為這些東西是長期的封建文化傳統在中國人心裡造成的，而不是中國人生來俱有的，所以是可以改變的。既然是歷史造成的，也可以歷史地加以改變。儘管很多中國人出國後仍然保持自己劣根性的方面，但這種東西在經過先進文化的薰陶後慢慢會改變的。比如說中國人不團結，內耗大，三個中國人不抵三個日本人等這種說法是對的，但為什麼造成的？這是封建傳統造成的，封建統治者就是要故意造成下面的人鬥人，這樣他才能居於統治地位。其實這種例子我們在周圍也能找到，有人就希望人鬥人，這樣他就可以左右逢源，坐在上面，穩坐釣魚台。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封建根子上去。只要實現民主化，把新的東

西吸收進來，就可以改變中國人的劣根性。

問：你認為老一輩知識分子和青年知識分子之間有哪些差別，有沒有代溝？

知識分子政策不利造成出國潮

答：兩代知識分子之間，應該說也有代溝，但不要過份強調這種代溝。有些事情上實際並沒有多少代溝，比如有人對我說，年輕人都想出國，但你看我們就不這樣，這就是代溝。可是這個問題你仔細想想也沒多少代溝，年輕人的確想出國，但出國的原因是因為知識分子政策不合理，科大的青年教師出國，有一半都走掉了。但是不是說中年以上的人就沒有出國的興趣呢？不是這樣，也想出國，不是不想，只是條件和地位不同了。比如說有家有小的在這裡，出去競爭到了四十多歲也很困難。科大的中年教師出國也並非不是個問題，有些人有技術，還有競爭能力，那就出國了。這種潮流一個是因為中國工作條件差，另外就是由於知識分子政策問題造成的。工資低，當然想出去賺點錢，再回來，這種想法是很自然的，有的人就是這麼說的，我在國外先當博士，工作兩年，賺他個兩三萬美元，相當於十幾萬人民幣，可在中國一輩子也賺不了這麼多，我回來可以穩定地在這工作。這種想法不能說不好，應當說我們知識分子待遇太低，這是現實造成的，所以難免有人產生這種想法，到美國要點錢再回來工作。這一點沒有代溝。（鼓掌）我在國外碰到很多中年人，很有技術。比如很多有技術的醫生，出國後在國外不能掛牌，要掛牌必須經美國醫學學會同意，不能掛牌怎麼辦？當然外科醫生還是有技術的，就到醫學院去給人殺動物。我覺得這是悲慘的事，中國培養出這

麼強的人出來，寧願到外國殺動物也不願回來。這就應當檢討一下我們的知識分子政策到底有什麼問題。這也是中年人幹的事情，我看也沒有代溝。

共產主義不能是唯一的理想

問：作為黨員，你認為共產主義的希望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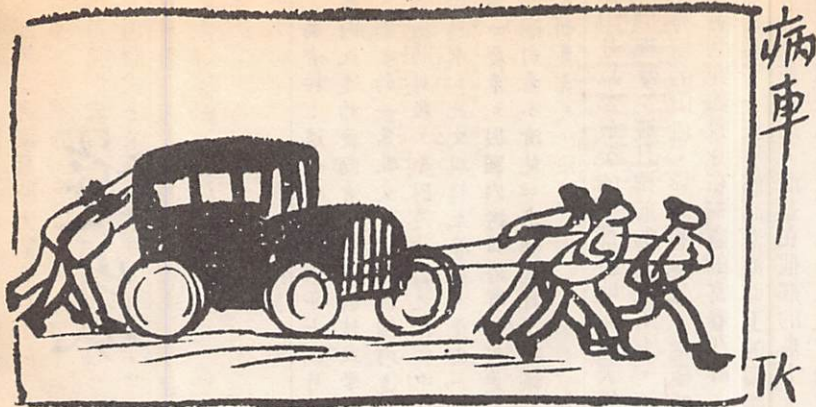
答：我認為共產主義是人類的一個理想，或者說是個信仰更好些。人們都信仰合理、公正，共產主義也屬於這種理想。這次中央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文件，應當注意一個沒有的地方。以前總是說，要培養具有共產主義理想的接班人，但在這次文件中談到理想建設時並沒有提到共產主義理想。這是有實質性含意的。就是說在中國現在各種各樣的理想都可以存在，共產黨員也可以有共產主義理想，其他人如果希望努力工作得到獎金，這也是個理想，科大有些不想做這個想做那個，這也是個理想。理想在現階段也可以多樣化，共產主義理想只是其中一種，其它還有很多種，都要同等對待。過去總說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好像他們要特殊一點一樣，我看這種看法要不得，每一種理想在人類文明中都有它的價值。

共產黨不想改也要改

問：全盤西化難道能寄望於中國共產黨的和平改革來實現嗎？你自己認為共產黨能夠通過自身手術來根除其已經擴散全身的癌細胞嗎？（鼓掌）中國最終是否還需要一次人民革命？

答：共產黨內部的確有很多很多問題。我

們有時關起門來談中國改革時也是很悲觀的。但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這樣一個環境裡，不改也要改。中國已經覺悟了，從學生、青年知識分子開始到知識分子整個階層，改不改已不取決於某個領導人，而是整個歷史推動的。所以我們不要認為黨是可以脫離開人民群眾的，例如，「四五」運動，結果是改變了這種看法，結束了四人幫的統治，所以黨是不可能脫離開



人民群眾的。領導人好當然是好的，可是如果不好，隨着歷史的發展，受西方先進文化的影響，不改也得改。

至於要不要革命，我們往往一想到革命，就想到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也是受某一種哲學的影響。西方很多改革的成功不一定是走了很激烈的道路，當然激烈的改革並不是沒有可能性，歷史上是有先例的。不過從目前來講，

我們的確是今年比去年好，去年又比前年好，至少我講這種話在去年就不敢，而今年就可以，明年可能再升一步級，這樣每年講話升一步，就像經濟一樣，每年只要增長六%，十年以後就可以翻一番，所以每年說話的程度只要多六%，就行了。（鼓掌）

（注：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風（外一首）

——獻給祖國的青年

起風了 迎風站着
讓紛亂憂鬱的黑髮
在流動的世界中吹拂
短短的飄起
沒有長頭髮攙起的波浪溫柔
可它是波浪的根

沒留痕迹的
是匆匆走過的風
沒有形狀的
是不分四季的幻想

有的呢？
是心靈的沉默
是渴望的沸騰
不言不語
却有一股 攪動大海的
活力

春天

（國內）小草

走過冬天
很粗心 只想着自己的心事
窗前鵝黃色的野花
已開出一個春天
走出來吧
早已不是
寒風吹來讓你顫抖的季節

走過冬天
沒在意 只想着自己的往事
明湖已瘦了好幾圈
遊出水面的陸地
正是一片蔥綠
走出來吧
你沒看見那深沉凝重的群山
邊已挽着輕盈浪漫的白雲

● 文藝園地 ●

遊嵐山後記

(國內)方勵之

編者按：這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興起的國內民運的發動者、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的一篇散文。此文在國內遭到官辦刊物的封殺，原因是方勵之在文中批判了周恩來。此文現轉至海外，交由「中國之春」發表。因國內拷貝件質量較差，有個別字句看不清楚。本刊如打字有誤，概由本刊負責。

嵐山是京都最美的風景勝地。春天的櫻花，秋天的楓葉；渡月橋前的大堰川上，清極的河水，秀極的山色，靜極的空氣，素極的浮雲，使你感到宛如置身在桐廬的富春江畔，忘却這裏是異國了。只有偶而沿河而上的海鷗才提醒你，這不是故土，而是在他鄉的島上。

我來京都快二十天了，一直沒有機會去看這個久已嚮往的地方。的確，它是值得嚮往的。你看，周總理一生極少寫過忘情於山川的詩句。然而，其中的一首却是：

雨中的嵐山，
渡月的流水，
……

那還是總理的青年時代，多事的一九一九年中的又一樁值得懷念的事了。因此，這個嵐山，對於中國人來說，更富有一番歷史的情味。

可是，日本朋友却一直沒有帶我到這裏來。是因為沒有時間嗎？不，他們曾有時間帶我去過許多地方。是因為他們不知道那種對中國人的特有的歷史情味嗎？不，總理的詩曾在日本廣為介紹過。到底為什麼呢？

今天，一九八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二日，日本的勞動感謝日（即勞動節）的前夕，我獨自一人來嵐山了。為了遊玩，也為了尋求答案。

一九八一年，似乎遠不像一九一九年那樣，是多事的年代了。不過，我遊嵐山之後的心境却完全沒有總理當年那種怡然於大自然之中的平靜。

是因為嵐山不美嗎？不，嵐山的確是異常秀美的。然而，就在這秀美之中，却有一個令人不能平靜的地方——嵐山美術館。它並不像它的名稱那樣，是一個以嵐山為背景的美術展覽館；相反，它是一個殺機咄咄的太平洋戰爭展覽。我去參觀了。

開始一部份，是武器，即當年日軍用的三八式步槍、九一式榴彈砲、輕型坦克、零式戰鬥機、海龍式魚雷（即一種由活人駕駛的自殺式魚雷）等等。看到這些東西，不免是不快的，因為它立即使你想起「東亞共榮」的年代。但自己在這裏是客人，應儘量地「客觀」地想

想主人。展覽這些東西似還是可以的，因為，武器本身並不是戰爭，作為一種武器史來搜集和研究，還算史家份內的事。

次之，就看到「鎮魂碑」。那是祭奠太平洋戰爭中戰死的官兵的，在其周圍有些「XX總隊全體玉碎」之類的事跡介紹。在這種香煙繚繞的祭壇之前，心中的惡感已是不可抑制的。但若仍然儘量「客觀」地想想，對於死者的親友來說，若僅僅從人倫的觀念去懷想一下這些故者，哪怕他們身具劣跡，似也不是絕對不可理解的。

然而，在第三部份看到的，則是絕對不可理解的了。那裏有百餘幅巨型戰爭照片，其題目是：

- 「日軍在蘆溝橋前線」
- 「XX部進入豐台」
- 「北平東長安街之入城式」
- 「橫渡在黃河上」
- 「行軍於上海郊區」
- 「在南昌的泥濘中挺進」
- 「突入京漢鐵路」
- 「佔領虎門要塞」
- 「登陸於酷熱的潮州」
- 「日軍攻入海南島」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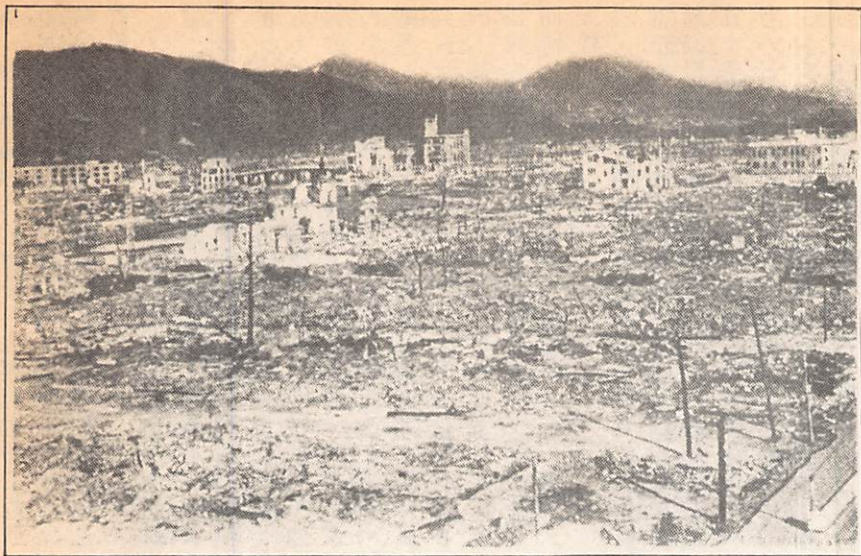
而且，就在這些照片的旁邊，竟用紅字寫着一條標語：

「我愛祖國——日本軍友會」

我再不能像客人那樣忍耐，那樣「客觀」地尊重主人了。我氣憤極了。當時，如果我手中有炸彈，盛怒之中，我必定會把這個展覽廳炸掉的。我氣憤極了，我要發洩我的氣憤。這個展覽廳是不讓隨便照像的，然而，為了抗議，也為了永久記住這個地方，管他什麼規定，我照

了所有我想照的一切。
我想任何一個中國人，處在此時此地，都會贊同我這樣做的。當然，中國人中也有例外，在展品中有一幅唯一的「東亞和平」旗，就是江西南昌一個姓胡的維持會長送給日本軍曹的，他的名字也被我照了下來。
值得深思的是，雖然在太平洋戰爭的初期

廣島被原子彈炸後一星期的情景



日軍不僅在中國，而且在許多其他地方也打過勝仗，但是，這組圖片中却只有在中國作戰的部份。例如，居然沒有珍珠港偷襲成功的圖片。這一點反映着在日本的某些人中潛藏着對二次世界大戰的分析和估計：日本發動對美國的戰爭，是戰略上的錯誤，而打中國則是「正確」的決策？

這個展覽的用意，在它的結束語中說明了，這就是「太平洋戰爭日本雖然失敗了，但三十年後的今天懷想起日軍的赫赫戰功和不朽的大和魂精神，仍是令人（?!）激動不已的。現在的青年（指日本青年）中流行着享樂的風氣，應當用大和魂的精神去振作他們。」

在從嵐山回來的路上，火車高速地穿行在晚秋的京都平原上。這時，我已無心再去領略車窗外的景色了。我看到的是一片矮小的，但却飾滿鮮花的日式村舍，我想到的則是在晚秋的北京平原上一排排豁亮的，但却圍滿玉米秸的土房。我不由得感到，中國人的心地是太善良了。對內，那怕暴君的稍稍一點假笑，他們就往往會相信是真的；對外，那怕強權的稍稍一點假善，他們也往往會相信是真的。

總理青年時代的詩，似乎就是中國人這種善良性格的一種表現。的確，嵐山是美的，「渡月」——「大堰」這一切又多麼富有中國情調，它太容易使任何心地善良的人忘情於其中了，然而那時的嵐山已有對中國的殺機。

戰後，日本應當賠償給中國的上千億的費用，是總理同意一筆勾銷的，總理是正確的，這又是中國人的善良性格的一次表現。不過，我們不能因這種善良的本性，而被假笑和偽善一再地欺騙了。

就在嵐山美術館的隔河對岸，有一塊很大的石碑，非常工整地寫着五個大字：日中不再

戰。碑的背後記述着從日清戰爭（即甲午戰爭）以來的中日之間的不幸歷史。我相信，有不少正直的日本朋友是真心這樣想，真心這樣做的。我的一些朋友之所以沒有帶我到這裏來，或許就是因為在這隔河相對的矛盾裏他們有難言的隱衷。因為，我知道，京都大學一直是日本的一個反戰中心，戰前如此，戰後如此，今天還如此。

是不是也有以「不再戰」來做偽善的人呢？我想也是肯定的。特別是，今天的時代，以戰爭求殖民多少已過時了，侵略已改變了形式。所以，當聽到某些「同文同種」「相互提携」的宣傳時，應當想一想它的內面。

一位日本朋友向我說了幾句心裏的話。一則因為這位朋友是女性，較深地感受到大和魂的內面，再則因為她就職於美國，可以坦率地向我說明一些內面。她說：「日本內部的一些傳統並不是那麼和善的，如果你是個日本人，被別人看到你因不懂而事情做得不好，就要受到訓斥。」因此，她特別建議我：「在街上不要說日文，因為你的樣子與日本人沒有什麼區別，如果再說一兩句日文，就會被誤認為是日本人，那你就可能在街上因不懂而挨訓。索性一字不說，讓別人感到你是個純粹的外國人，這才會表現出謙和。」

遊嵐山之後，我懂了不少。
嵐山是美的，嵐山也有一股殺機。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於京都北白川學舍

補記

十一月二十七日去廣島，目的就是爲了看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歷史，在爆炸的中心點附近現在是一個和平紀念公園，其中留有一座當時唯一沒有倒塌的樓房殘架以及一個和平紀念資料館。

資料館的佈置作橢圓形，復原了炸後的慘狀，有實物，有圖片，有模型，這裏有日、英、法及中文的幾種錄音解說，事件是驚心動魄的，九〇〇〇度的高溫，九〇〇〇米高的火尖柱，（整座城市的直徑不過六〇〇〇米）、強大的高壓跟着是負壓，徹夜的大火、黑雨、大火引起的氣旋風，二十六萬人的死亡，燒死、壓死、輻射死，當時即死的，相繼死亡的。直到今天，即事件的三十六年之後，仍然有當事的人甚至後來生下來的人，既不能死亡又不能正常生活地受着折磨。此情此景，不能不使你同情，不能不使你覺得這樣的殺人是一場失去人性的災難。

許多性格活潑的美國人，在展覽的結束處都沉默了，他們不能不把一些錢放到慰靈碑前的錢箱裏，因為他們感到了內疚，這是美國在日本造成的一次不幸。三十五年來，每年的八月六日都要在這裏舉行一次儀式，是國際性的，有許多西方的人來參加，一方面是祭奠亡靈，一方面是祈求和平。

然而，作為中國人的我，是不能接受解說詞的最後一句的。它說，不能以戰爭的名義大規模殺人。這句話本身並不錯，可是，不應當由某些日本人來說，特別是不能由他們對中國人來說。

廣島，從明治之後，就漸漸變成戰爭基地。它有日本瀨戶內海中的最大軍港和軍艦製造廠，又是日本海軍指揮基地之一。而且，第一次把海軍司令部從東京移到廣島，就是為了準備中日甲午海戰的。因為這裏距戰區較近，被

稱為前進基地。以戰爭的名義殺人，特別是殺中國人，就是從這裏開始的。這就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之前的廣島的部分歷史。所以，它的毀滅，用佛門的語言來說，是惡有惡報。

當然，許多無辜者在這場惡報中的遭際，是十分悲慘的。站在「狂風驟雨中的母與子」「老師和小學生」等幾尊充滿人性愛的雕像面前，男人低下了頭，女人含着淚花，這些無辜生命的最後掙扎，太慘了，是太慘了。

儘管如此，若稱廣島是近百年戰禍中的最大受難地，是最值得同情的地方，以致稱它是和平的麥加、酷愛人道的聖地，我還是要堅決搖頭的。因為，我剛剛看過重慶的在日本轟炸中悶死萬人的防空洞的殘迹，我也剛剛看過南京中華門上至今觸目的彈痕，中國才真正是近百年戰爭中的最大受難地，無論它的悲慘的程度或悲慘的數量。

然而，整個中國却沒有一個和平紀念公園，沒有一年一度的祭奠亡靈的國際大會，沒有慰靈的長明燈，更沒有長明燈前的錢箱。難道中國的亡靈就不需要祭奠，就不需要訴說他們在死前悲慘的掙扎嗎？我不知道，我有些茫然了。

也許，一個民族像人一樣，最悲痛的，往往是既不哭、也不說的。也許，這又是中國這個民族的一種性格。她不願意去訴說自己的命運，即使她的命運是最不幸的。她不願意去講述自己的悲慘，即使她處在悲慘的境地。她更羞於拿出募捐的錢箱，因為，她覺得，哪怕是接受完全出於同情的幫助，似乎也無異於一種求乞。

這些性格，是對，還是不對？我不知道，我有些茫然了。然而，無論對或不對，它似乎都將永存着，和這個民族一起永存着……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方勵之教授生平簡介

（本刊資料室）

方勵之教授一九三六年生，杭州人，父親為鐵路工人。

五二年進北京大學物理系原子核物理專業。在校期間，門門拿五分。

五六年畢業，時年才二十歲，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當助理研究員。

五七年因上改革萬言書，被內定為右派，開除黨籍，改調到當時剛設立，在北京的中國科技大學物理系當助教。但不給教書，也不能參與研究工作。他的愛人李淑嫻，北大物理系

同班同學，畢業後留校當助教，也被定為右派。隨後，方勵之在科大的理論物理教研室從事固態能譜和基本粒子等方面的研究。

六三年提為講師，開始在科大物理系講授量子力學課程。講課深受學生歡迎。

六八年被編入「專政隊」改造。開始從事相對論和宇宙論的研究。

七三年回到已遷往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任教。七八年獲平反，恢復黨籍，直接提為教授

。此後，由於他在愛因斯坦方程、黑洞及重力崩潰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突出，曾赴歐洲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並應英國牛津大學邀請訪問。

八四年被提為科大副校長，在此之前，已三次被提名，因理論物理所副所長何作勝向中央書記處打黑報告，而不獲准。

八六年三月至七月應美國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之邀，赴美進修。

方教授曾發表卅多篇論文，論文均具世界一流水平。方教授生有二子，大兒子現為美國一家大學物理系研究生。

方勵之教授曾發表卅多篇論文，論文均具世界一流水平。方教授生有二子，大兒子現為美國一家大學物理系研究生。



共和國需要這樣的學者

(北大學生報) 戈聖

編者按：「共和國需要這樣的學者」原載「北大學生報」一九八五年七月出版的八五年第二期上。由于刊登此文，該刊剛一印製完畢，就被當局查禁。這篇文章刻劃出方勵之教授崇高的人格、為學的態度和他學術上的成就，也道出了當代「北大人」的心聲。

一九五五年二月廿七日上午，在北京大學辦公樓禮堂裡，青年團北京大學第一次代表大會正按既定的程序進行着，在台上講話的是物理系團總支書記，當他在工作報告中正面提出青年團的工作應當在培養青年的理想方面做出成績時，突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只見代表席的西側站起了一位尚帶稚氣的年輕人，噲噲地跳上主席台，以手示意要做即興發言，並且急不可待地以年輕人特有的激情接下總支書記的話茬發表演講。他說，我們的團代會，首先應該討論一下究竟要把我們培養成什麼樣的人的問題，是培養成老老實實、規規矩矩只會說人家說過的話的書呆子，還是有抱負、忠於祖國、有獨創精神的紅色專家呢？我們除了在學業上要得五分外，是不是還要增強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

這個在五十年代難得但極有見地的主張，打亂了會議的既定程序，使會場由驚愕轉為讚許，進而成為會議熱烈爭論的主題。

三十年過去了，「我們的教育應該培養什麼樣的人」這個當年十九歲的大學生提出的問題，已經由他自己的思想與行為作出了回答。他的名字叫方勵之，一九五二年進入北大物理系，現在是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教授，科學院最年輕的幾個數理學部委員之一。

一、馳名國際物理學界

今年五月七日，從大洋彼岸的美國傳來了振奮人心的消息，我國的一名天體物理學家與日本京都大學教授佐藤文隆合著的「類星體紅移分佈中的周期性是否多連通宇宙的一個證據」一文，獲國際引力基金會頒發的「等獎」。這是國際上這個領域唯一的頭獎。這位把我國的天體物理研究推向國際水平的物理學家無疑就是本文的主人公了。

現代宇宙學把最大尺度的宇宙生成和演化問題與最小尺度的基本粒子問題聯在一起，開關了物理學發展中一個誘人的領域。在大學，他攻讀的是理論物理和核物理。

儘管有人說他「狂妄」，他却是十分尊重老師、踏實學習、幫助同學的優等學生。他可以在揮汗如雨的盛夏，躲在悶熱的燒玻璃室中製作工藝性極強的計數管，他可以解成千道的難題，但更多的時間是涉獵群書與人討論。也許，有人所指的「狂妄」是他對科學、對理想執着的追求。正如他自己所說，年輕的祖國需要專家需要科學家。是的，科學的生涯就從這裡開始了。大學畢業後，他先在核反應堆理論方面工作，繼而在固體物理及激光物理等領域發表了一些論文，這些初出茅廬但出手不凡的研究成果受到老一輩物理學家的重視。他到了科大，又在受激射綫綫寬的量子理論及雙光子過程等非綫性光子理論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後來，他的注意力又集中到光學理論上。

當人們不再滿足於欣賞夜晚群星閃爍的燦爛景象，開始仔細地系統地觀測星星，記下它們的位置時，天文學產生了。伽利略第一次使用望遠鏡觀測星空，發現了令人吃驚的世界，完成了天文學史上一次革命。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更是為行星的運行提供了合理的解釋。但這一切都只是在研究星星怎麼樣，而未涉及到天體究竟是什麼的問題，探討天體的本質，這是天體物理的任務。

星星是那樣遙遠，怎樣才能知道它們究竟

是什麼呢？有兩種方法；一是研究隕石——掉到地上的天體，但它們是那樣的少，並且還是我們附近區域裡的天體；還有一種方法，就是研究星光，但是在光譜分析理論建立之前，誰也沒有想到星光裡包含了那麼多關於星星的信息。射到地球上的無限光綫就是我們了解宇宙，了解天體的主要窗口了，於是關於這些光綫如何負載着遙遠天體的信息，這些光綫有着怎樣的經歷是首先要加以弄清的。

方勵之通過光學的研究由核物理進入了廣義相對論和天體物理領域，那時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了，他被隔離審查了。

一九七二年，「物理學報」復刊，登出了他題為「標量——張量場方程中含物質和黑洞輻射的宇宙解」的論文，國際天體物理學界發現，中國還有一個叫方勵之的也在從事着和他們相同的工作，並且看來有相當的水平，中國物理學也不全是荒漠一片。是的，不但不是荒漠，而且尚存的綠色也在擴展，方勵之在科大組織了相對論天體物理研究小組，開始對黑洞進行研究，他們從觀測角度提出了黑洞存在的可能性，接着用光度指示法系統地研究類星體視星等的紅移關係，開闢了利用類星體來研究宇宙封閉性的一個新課題。他在分析各種確定宇宙減速參量的結果後，給出了存在暗物質的一個可能證據，這篇論文登在一九八二年英國「皇家天文學會季刊」上，引起了國際天體物理學界的注意。

粉碎四人幫之後，方勵之的科學創造力空前爆發，研究領域涉及到恆星物理的每一個分支，在致密天體問題中，他發展了黑洞吸積的觀測表觀理論，他第一個指出電子對產生在吸積區中的重要作用，證明了吸積盤中可能存在迅速冷卻區。他同人合作建立了反常中子星理

論模型，對星系密度波理論，太陽風大尺度結構都有所建樹。近年來，他把目光轉向了極早期宇宙學，他預言早期宇宙學物態相變將有重要效應，暗物質可能有兩種成分，並研究了相變對宇宙比燭的影響。由天體物理到宇宙學，現在又回到了粒子物理領域。

因為「一直保持著學生時代那種緊張的狀態」，因為他科學地選擇了一個個的突破口，方勵之幾年來在一流學術刊物上共發表了一百三十多篇學術論文，這在國內科學界是十分罕見的。隨着科學研究的不斷進展，他的活動也飛出了國界。一九八一年秋，在梵蒂岡舉行了國際宇宙學討論會，他作為廿五位國際知名宇宙學者之一參加了會議；一九八三年，由十二名物理學家組成國際物理中心學術委員會，他是其中之一；一九八三年他受聘擔任國際性年刊「天體物理學和宇宙學進展」主編，一九八四年在波哥大召開的相對論天體物理討論會上，擔任大會主席。他還先後被聘請為羅馬大學物理系客座教授，劍橋大學天文研究所高級客座研究員，日本京都大學基礎物理研究所客座研究員。鑒於他的學術成就和國際影響，一九七九年他被提升為國內當時最年輕的教授，一九八四年被任命為科大副校長。

方勵之的科學研究，不是孤軍作戰。他們的小組結成於四人幫的高壓時代，如今，不管走到天涯海角，他牽掛着的是祖國的科學事業，以及他的小組的工作進程，甚至每個成員尤其是年輕人的工作安排。每次出國，他都是儘量縮短在國外的行程，匆匆趕回遠離他自己家鄉的科大，將最新的信息帶回來，因此，他的小組可以在國際科學進展的背景上以及在活躍的氣氛中工作。最近，訪問中國的國際知名天體物理學家、英國皇家學會會員霍金給方勵之

寫信說：「在合肥，我的所見及你的小組的水準，給了我極深的印象，他們完全達到了天文學及宇宙學的現代發展水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科大天體物理小組已經跨進了國際先進行列，它之馳名於國際物理學界正告訴我們，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也會長出物理學的參天大樹。

二、偉大的科學家也是偉大的哲學家

「有一種『習慣』的『經典』的觀點認為：自從彭加勒、馬赫之後，現代自然科學常常是由一些哲學上渺小的科學家推動的，或者最多是『不自覺』運用了辯證法。」「實際上，指導着或影響着科學研究的思想、觀點、方法本身就是一種哲學或一種科學的哲學。一個人在科學研究上取得了成果，怎麼能用『渺小』來概括指導他進行研究的哲學思想呢？」

方勵之發表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九日「北京科技報」上的這段話，無疑是折斷了橫在自然科學家面前的一根棍子：「偉大的科學家，渺小的哲學家」。他大聲疾呼，在今天科學的時代，必須用科學精神來改造哲學。

他率先開展了這一工作，用實際行動宣告，偉大的科學家也是偉大的哲學家。

宇宙的有限無限問題從來激發哲學家的深思。在中國現實的正統哲學中，「宇宙是無限的」已成爲不容置疑的前提。但是，科學從來不相信什麼永遠不變的命題，即使是真理，也要重新考察。首先，有限無限是什麼意思要弄清楚。我們許多人認爲宇宙是無限的，那不過是一種直觀的現象罷了，處在盧克萊修的水平；他們論證宇宙是無限的，不是從概念到概念，便是把現有的科學定律推廣到整個宇宙來加

以使用，忘了定律本身的適用條件，異化了物理定律；更有人使用一種極其模糊的辯證語言來說明有限和無限的關係，最後也不知怎麼搞就肯定了宇宙無限的絕對性，方勵之指出，人類觀念發展到現在，有限無限已經有幾種含義了，有有界的有限，也有無界的有限，有有界的無限也有無界的無限，你說宇宙無限是指的那一種無限呢？我說宇宙有限是否就一定同你想像中的無限矛盾呢？這是其一。宇宙無限既然永遠得不到證實，宇宙有限永遠得不到證實，那麼這個問題是個哲學上有意義的問題嗎？還能用某些哲學原則來指責科學家的這些探究嗎？最後，關於有限與無限的關係研究不能還停留在什麼「你中有我，相互滲透」的水平上，應該運用科學方法，比如芝諾悖論中的阿基里斯追龜問題，光指出芝諾不懂得空間的連續性和分立性是樹立的統一，是太不夠了。實際上，在阿基里斯追龜問題上，存在着兩種時間尺度，一種是普通人的，一種是芝諾的，「芝諾時」以阿基里斯不斷到達龜原先的位置為循環依據和度量標準，這樣在芝諾時裡，要追上烏龜就需要無窮的時間，一般人把普通時與芝諾時混在一起便導致悖謬。這告訴我們，一種時間尺度達到無限之後還是可以有時間的。如果把這個道理移到宇宙上來，那麼關於宇宙是有限還是無限的爭論也就不會那麼非此即彼了。

在北京大學校刊第三四七期的紅樓版，登載了方勵之的一篇文章，題為「時間的崇拜」，在那種幽默而又不失嚴謹的文字中，他觸及了另一個重大的哲學問題，即時空問題。正統的辯證唯物主義認為，時空是物質的存在形式，因為物質是客觀的因而時空是客觀的，因為物質是無限存在的因而時空必是無限存在的。

方勵之指出，自相對論以來，時間就喪失了絕對的意義。在測量時間時，只有明確地知道鐘沿着怎樣的軌道運動，才能使用它來進行含義明確的時間測量。但是量子論的出現對這種時間概念帶來了極大的災難，因為測不準原理告訴我們：任何物體的運動有一種根本性的不確定性，以致我們原則上不可能精確地確定物體的運動軌道，於是，時間在原則上是不能測量的，準確些說，在 10^{-43} 內，是原則上測不出時間的，這是時間概念使用的界限。有界限的東西，往往都是有起源的，於是，時間也應該是起源於沒有時間的狀態。如果有人要問，這麼多麼不可想像，那麼讓我們回答，科學開始時總是為似乎健全的理智所不容的。如果有人認為這不符合辯證唯物主義原理，那麼請他想想，是自然科學不該這麼發展呢？還是哲學不該這麼不識時務的在自然科學領域指手劃腳？歷史上，自然科學的每一進步都必然導致其領域的擴大和哲學從該領域的退出，但這同樣也是哲學的進步，因為脫離了具體的對象進入更抽象的領域，使哲學更具普遍性。所謂「時間是物質的存在形式」是非常模糊不清的命題，什麼「存在的形式」，存在是不是非要有形式呢？這倒是哲學應該好好思考的問題。

歷來，宗教神學被認為是科學的死敵，但是對於宗教命題，如果不做科學的分析，就加以肯定或否定，那同樣不是科學的態度，本質上還是宗教。方勵之在八四年四月份洛陽會議上就「第一推動」問題發表了看法。他指出，托馬斯·阿奎那因為認定事物之動必有其因，而因果相承又不能推到無限所以肯定：有一個不受其他事物推動的第一推動者，就是上帝。牛頓按其力學理論，為了解釋或預言物體的運動需要知道或給定運動的初始條件，如果一直

追溯運動的原因，最後必定導致第一推動。牛頓之度，古典物理學假定宇宙在時間上是無限的，從而試圖消除第一推動。（我們現在正統哲學的自然科學基礎也正是在這一層次上。）但是這裡存在兩個問題：一沒有任何自然科學證據表明：宇宙已經歷無限過去，二無限時間也不能避免第一推動，因為它還有一個前提：無限時間之外是沒有存在的，但這一點非但不能證實，而且反例極多。那麼，認為宇宙是演化的是否可以消除第一推動呢？也不行，發展觀的第一個理論基礎是熱力學，而按照熱力學第二定律是會產生宇宙熱寂的，現在沒有熱死，那說明宇宙並未經歷無限過去。如果考慮引力，可以避開熱寂說，但是產生了更多的問題，一是能量概念和能量守恒定律失效，二是不可避免會導致宇宙有開端的結論。在這種情況下，看樣子物理學家只有來建立物理的「第一推動」理論了。（從「第一推動」的歷史來看，起初是一個神學的命題，但到現在物理學賦予它以新意，關於這個問題，可敬的哲學家們有些什麼想法呢？）

宗教味道很濃的另一個問題是所謂「靈魂不死」問題，方勵之在一篇文章中明確指出：「討論這個問題的目的是要讓公眾了解什麼叫科學，什麼叫信仰。」他說：靈魂這個概念，一般講是指活着的人有自我的概念、意識和感覺。究竟什麼是靈魂有兩種看法：宗教認為靈魂是非物理的一種特殊的東西，另有人認為靈魂就是原子和分子的運動。這兩種看法都有問題，前一種不能說明靈魂怎麼能左右人的物理行為，後一種不能說明人的自由意志。一個新的解決問題的方式是整體論，這種整體論認為，系統的有些性質是屬於整體的，物理學中的溫度，計算機中的軟件及生命現象中的意識都

是整體的表現。從整體的角度來看，靈魂似乎也是可以提取的，但這種提取跟靈魂出竅的迷信說法是很不一樣的。把這種提取出的靈魂賦予某個機器，代替人的軀體去宇宙航行也是可能的。這不只是科學幻想，而是有它的邏輯根據的。人們現在覺得靈魂決不可復制，那不過是從古到今「人類中心」觀念的一種反映罷了。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第一次打破了這種觀念，人發現自己並不存在於地球中心，哥白尼是第二次，他讓人懂得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達爾文是第三次，他讓人知道人並不是什麼上帝的創造而是同其他生物一樣不斷進化而來的。從這個角度看，靈魂不死就沒有什麼神秘可言的了。

因為很少從事自然科學的研究工作，很少接受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的薰陶，在我們的哲學家的頭腦裡，常常積淀了許多世俗的常識和偏見，並以此來充當觀測世界的理論背景。他們在真誠地堅持「時空是客觀的、無限的存在形式」時，也許正是在受著一種時空圖騰的支配；他們在義憤填膺的指責科學家們模擬思維、提取靈魂是不嚴肅的時候，也許「人類中心」的觀念正在強烈地控制着他的理智和情感。這也沒有什麼，因為我們正處在一個多元化的時代，但是，如果這些哲學家竟要抑制科學家的這些哲學思考，那就完全違背我們這個時代所必要的寬容精神了。當你仔細思索一下方勵之關於這些問題的思考後，你想得出正統的哲學家有那一位曾達到過如此的深度？你還能認定偉大的科學家只是一些不自覺地遵循唯物辯證法的渺小的哲學家嗎？

三、中國社會的良心

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讓科學戰勝愚昧，民主戰勝專制已成為社會進步的重要標誌。知識分子因為一開始便是文化價值的捍衛者，他們擁有超越的精神權威為根據，因而才有可能批判現實世界中種種不合理的現象。知識分子的這種特殊地位在今天科學技術的力量征服整個世界的時代，顯得更加突出。但是，那些僅僅用專業知識來謀生的腦力勞動者，並不能擔當起這種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稱號。

他們必須是在自己選擇的專業範圍裡嚴肅的真理追求者，不會僅僅因為一己利害而拋棄學術莊嚴的獨立性和客觀的準則；他們必須對於公共利益的一切問題都抱有深切的關懷，認定國家之事就是他們的個人責任；他們深信社會現狀的不合理，並能敏銳地發現弊端症結，猛烈抨擊，大聲呼籲正義和德行。正由於此，他們被稱為「人類社會的良心」。

在科學史上，我們看到一批這樣為社會進步和人類幸福努力奮鬥的科學家。伽利略因為用他的觀測事實來支持哥白尼體系而受到教廷的警告，他悲憤地說道：「為什麼教皇把地球放在宇宙的中心？因為他要把教皇的寶座放在地球的中心；假使我對這一切保持沉默，那就證明我抱着貪生怕死的卑鄙動機。愛因斯坦在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方面更是一個光輝的典範。他強調指出，知識分子應對社會負雙倍的责任，面對犯罪行為而保持沉默，那是在犯同謀罪。」

在中國知識分子傳統中，也不乏那些「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剛烈之士，也不乏那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偉丈夫。但是，長期的封建專制統治窒息了大多數學者的獨立人格和奮鬥精神

，傳統的實用知識觀更使中國的學術缺乏應有的獨立性。到今天，這種或者缺乏主人公精神、心甘情願作工具，或者不問世事、自認清高的狀況依然存在，而且相當普遍。然而，也有相當一批知識分子深刻地意識到自己的使命和責任，毅然行使着自己的權利，關心社會問題，關心科學真理的命運。方勵之就是他們當中傑出的一位。

青年時代的方勵之便敢想敢說，疾惡如仇。對於看不慣的問題真誠坦白，直言不諱。為此曾演出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但那次會議主題的突變，後來被黨委制止了，因為當時認為：「教育應該培養什麼樣的人」這個問題，我黨的教育方針已經十分明確回答了，無需再討論；參加這次討論的人受到了批評，報導了這些討論內容的校刊編輯部也公開作了檢討。反右時期，因為他不說假話，不違背良心，結果被開除黨籍。文化大革命開始，他當之無愧地又受到了批判。……解放三十年來知識分子坎坷的政治命運深深觸動着方勵之的心弦，要我們民族真正騰飛，要使科學真正地在這塊土地上繁榮，要使知識分子真正獲得他們應有的地位和權利，需要一種怎樣的社會條件呢？如何才能爭取到這種社會條件？方勵之在思考，也在行動。

要發展科學，不但要引進技術設備、公式符號，更重要的是引進思維方法和科學精神。提倡科學精神，首先要批判宗教精神，「中國雖然一直沒有被有形的宗教統治得太久，但是，中國被沒有宗教形式的宗教統治得太久了！不是嗎？我們總是簡單地認為西方的宗教象徵着愚昧和落後，而忽略了現代宗教作為一種深厚的文化傳統被注入了怎樣新的內容，忽略了通過宗教形式體現出來的那種友誼、母愛、

憐憫、同情等人性；我們當初標榜為大大超過文藝復興的「文化大革命」，不正是在革命的旗號下把人變成神，把社會拉向真正的愚昧和黑暗嗎？在四人幫之後的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中，全國就真理的檢驗標準問題展開熱烈討論，方勵之多次撰文指出，在西方，關於真理標準的問題，早就因為伽利略新物理學的勝利而得到解決，那還是在三百年前自然科學的發展初期，可見，科學精神在我國才開始萌芽，「在科學領域中，傳統和精神因素上的差距甚至比在物質上的差距還要大」。要發展科學，首先要清除這些精神上的障礙。

「思想上的自由是科學的朋友，而任何神靈、準神靈以及他們的各種代言人都是科學的死敵。」方勵之的這句話反映了他的一貫思想。幾個世紀以來，科學家為爭取自己的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進行了堅持不懈的努力和鬥爭，但是在我國左傾路線佔上風的時期，這些科學得以發展的起碼條件被剝奪，五十年代把摩爾根學派定為資產階級學派，六十年代又大反相對論。許多自然科學最新成就如控制論，宇宙學均遭受批判。科學與政治混為一談，學術爭論變成政治鬥爭，中國的自然科學怎樣發展呢？去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第六版有篇通訊，題目是「水城的深情——來自意大利的通訊」，報導趙紫陽同志訪問威尼斯的情況，其中有趙紫陽同志的一句話：「是啊，沒有哥白尼發現的日心學說，我們還不知道地球是圓的呢。」方勵之讀完報紙後，當即指出，這句話是完全錯誤的，地球是圓的，古希臘就有人提出過，而且在古埃及測太陽角度時，測量了地球的半徑。一個是地動說，一個是地圓說，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結果，有人聽完方勵之的講學後就問，這個人所講的是不是有

點反革命。由此可見，社會至今還為末學術自由提供一個適當的氛圍。方勵之僅僅指出趙紫陽同志的話在學術上是錯了的，是不符合科學史的，怎麼就成反革命了呢？為爭取學術自由，方勵之身體力行，不但行使這種自由，而且努力創造和呼籲學術自由所必需的社會條件。在他就任校長之後，有人問他準備幹點什麼，他回答說：「我也不知道能幹什麼事，因為我不知道手中有多大權力，況且有了權也很難辦。比如給房子，調工資，都難以辦到。但我想有一種最不花錢的，而且又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提倡思想上、學術上的自由，這只是只要有決心就可以實現的，我要把提倡思想自由作為我校的辦校方針之一。」方勵之在談他的母校時也說：「中國歷史上曾經有辦得比較好的大學，比如北大曾經就辦得比較好（雖然北大現在也還是有不少優點），因為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樹立了一個兼容並包的傳統。」是啊，提倡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造成整個社會的寬容精神，是科學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條件，而這些條件只有靠我們自己去爭取了。

在中國，知識分子的現實地位一直十分低下，長期以來對知識的鄙視和對知識分子的歧視變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心理，而有些知識分子似乎也已經習慣了而且甘願在那裡任勞任怨，這樣的社會現實，大大挫傷了知識分子的工作積極性，扼制了他們的創造力。方勵之多次指出，在今天的時代，科學是一種最重要的生產力，而知識分子正是這種新生產力的代表，代表着最先進的生產力的人們應該是最革命的，應該是對社會發展和歷史進程影響最大的，因此他們的社會地位就不應該是老九。作為知識分子應該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以一種主人翁的姿態出現在歷史舞台上。但作到這一點

並不是容易的，如果知識分子本身就軟弱，知識面狹窄、無社會活動經驗，那麼讓他們發揮應有的作用當然是不可能的。於是，培養一代新型人才，造就我們民族新的知識分子形象便成為十分迫切的問題了。完成這一任務的是教育。所以，方勵之自八一年以來就開始發表有關教育改革的文章和講話。他認為，我們的傳統教育哲學是工具論，教育是為了培養工具，是為了一顆螺絲釘；我們的教育方法是灌輸知識，而不重培養能力。結果新一代的知識分子依然是一付學究的斯文像，愛發牢騷議論，遇到困難唉聲嘆氣，怨天尤人，重複舊知識分子的悲慘命運。他認為，大學應該培養創造性人才，大學應該是出思想的地方。與時下的改革趨勢不同，他認為大學不能都搞開發應用，也要重視基礎理論研究，任何一窩蜂的改革都必定是片面的和要失敗的。

方勵之常常說，一個自然科學家必須承擔他自己的社會責任，敢於對社會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作的。中國當前正進行着一場空前的改革，方勵之同其他有志之士一樣以極大的熱情關注着改革的進展和出現的問題。小平同志在一個講話中曾說到，一百年後，中國要趕上經濟發達國家，還說到，東西南北問題一百年後依然不能解決。方勵之聽見這種說法後就指出，小平同志這兩個命題的相容性必須滿足一個條件：中國是一個特殊的發展中國家。但中國究竟特殊在那裡呢？它有什麼不同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地方呢？這值得好好研究。在參觀了特區之後，他就特區的前途也提出了自己的疑問，特區繁榮是因為它加入了國際網絡，外資可以自由投入。如果經濟增長率不能長期高於利率，危機便要發生了。現在，我們是靠勞動力的廉價來維持低

成本，從而賺錢的，一旦勞動力不再廉價時，危機也要發生了。對於社會上那些違背科學規律的現象也總是直言不諱地予以指出，並加以抨擊。今年四月十七日『人民日報』第三版刊出『新格局與高效益』一文，完全不符合事實地報導合肥聯大「只用普通大學五分之一的經費，培養出了質量與普通大學相近的人才」。方勵之當即寫信人民日報主編，指出這種「計算法是大躍進式的計算，即把十畝地上的產量算到了一畝地上。並要求該文作者訪問聯大以澄清事實。方勵之嚴肅地指出：「這種大躍進式的新聞對社會的危害，難道我們還沒有嘗夠嗎？」他自覺維護知識分子的正當權益，對摧殘知識、摧殘人才的事情嚴加譴責。今年四月，在關於教育改革的討論中有人提到，「高校學生與教師人數之比亟待提高。」方勵之則認為，問題的關鍵應該是：「這個不合理的原因是什麼？能單純依靠解聘教師的方法來提高這個比較麼？」在這篇未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方勵之這樣深切動人的寫出了中年知識分子的痛苦，我禁不住要把其中幾段照抄下來：

「我的估計，不，應當說親身體會是：如今的中年教師已是繃緊的弦了。三十年來的社會現實，使許多中年人的確不像一些老一代學者那些成績斐然、工作卓著，這是我們這一代仍應努力的。但是，從工作的盡心盡力來說，我希望不要再受到指責了。最近，有的地方對中年教師的死亡率進行過統計，其值之高令人心酸。「四十七八累死白搭」這句新諺，強充諛語，可是怎麼能讓人笑得出來呢？」

「我想，我的這些話，不致被誤解為反對提高學生與教師的比較，反對聘任制，反對利用現有教師力量去辦新的學校。我是完全贊同這些改革設想的。我強調的只是，使這些設想

變成現實的一個必要條件是明顯地改善現有教師，特別是中年教師的生活待遇，降低他們的死亡率，若不顧及這個條件而去追求某種比值，則是有危險的，多半也行不通。孺子牛尚且需要有草料，否則擠出的就不是奶而是血了。

「生活的滄桑，使許多中年人慣于三緘其口。一則沒有知名度，說了也沒人理會，再則工作已將精神耗盡，再沒力氣去說了，何苦呢！在高校裡，許多中年教師至今沒有資格作為博士碩士導師，却無聲無息地為他人做着「奶媽導師」；職稱凍結快兩年了，但是工作何嘗凍結過一天。在沉默中工作，在沉默中期待。也許只有微弱得幾乎聽不到的嘆息，却沒有叫喊，像耕耘着的牛從來不呼叫一聲。然而，這些中年教師心底裡的痛苦聲息，是不是值得更多人去理解，更多人去傾聽呢？」

他是共產黨員，他永遠保持一個共產黨人正直剛強的性格和實事求是的良心；他是知識分子，他從不會因為個人的安危得失而一天放棄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青年學生愛戴他，請他演講，座談，他總是欣然答應，儘管有人暗中阻攔，削弱他的影響。因為他喜歡對社會問題發表切中時弊的意見，因為他不阿諛逢迎，敢於蔑視「權威」，有人在告他的黑狀，有人策劃要批判他。許多朋友也勸他少說幾句，但方勵之回答說：「如果這麼說話有罪的話，那麼我的罪狀早就達到了飽和，多說幾句和少說幾句是一回事兒了。」啊，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國社會的良心！

記得愛恩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時曾經說過：「居里夫人的品德和熱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歐洲知識分子中間，歐洲就會面臨一個比較光明的未來。」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只要中國知識分子都像方勵之那樣，

勇敢地正視自己的社會責任，關心社會問題，關心知識分子的地位和命運，關心科學的真理和傳播，那麼，我民族科學進步的速度許就要大大加快，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許就要大大提高。

一七九二年，法國大革命勝利，著名化學家拉瓦錫因參與舊政府收稅，同其他包稅官一起被押進了革命法庭，當拉瓦錫被判決死刑時，他請求死緩，因為他還有一個關於人汗的實驗未作完。法庭副庭長嚴詞拒絕了這一請求，並自豪地說了一句：「共和國不需要學者。」於是，拉瓦錫那顆「法國長了一百年才長出的腦袋」被砍下了。

「共和國不需要學者」，這是法國大革命誕生的一個怪胎，是愚昧和專制摧殘科學的見證。今天無論是誰都不會同意這句妄言。但是，在中國，需要什麼樣的學者仍是值得考慮的問題。

不是還有人在講「士為知己者用」嗎？不是還有人津津樂道于伯樂發現千里馬嗎？當知識分子衣服貼貼地作為工具，能創造無數的物質財富的時候，這些人是同意「共和國需要學者」的，但是對於那種敢于獨立思考、提出非凡見解，敢于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直陳時弊而又知名度極高的學者，他們未免不會在心裡感到別扭。

讓我寫下一切關心我民族振興事業、一切善良正直的人們真誠的心聲：
共和國需要這樣的學者。

作者注：本文的寫作得到了方勵之教授的夫人李淑嫻的大力支持和協助，李老師在百忙之中通讀了全文並作了仔細地修改，在此謹向她表示真摯的謝意。

胡耀邦被免職給我們的啓示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高楊

自去年十二月份大陸爆發學運以來，事態發展實出乎大多數人的預料。隨着胡耀邦被撤職、方勵之等人被開除黨籍，大陸的形勢急轉直下，中共的改革面臨嚴峻的考驗。儘管鄧小平最近重申改革的政策不會變，甚至指出現在的問題「主要是開放得還不夠」，但人們從現實中已清楚地看到，中共的改革開始「收緊」，種種迹象表明現在已開始走回頭路。

這次胡耀邦被免職，是中共黨內改革派和保守派兩派政治力量較量的結果。隨着經改的深入，在許多方面已經觸及到黨政官僚們的切身利益。出於思想上的僵化和個人利益的牽扯，黨內保守派和軍界早就對改革心懷不滿，一直窺伺時機以求一逞。這次學生運動，剛好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向改革發難的機會。

通過這次大陸時局的變化，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方面啓示：

一、這次事件告訴我們，在大陸，公衆輿論和民意是不起任何作用的，群眾仍被當成「群氓」和「阿斗」。在社會生活中，仍然是「權威」和「長官意志」決定一切。中共領導人對群眾要求民主的呼聲根本置若罔聞，甚至採取敵視態度。他們的政治仍然是「陰謀政治」。對於黨和政府重要領導人變化這樣重大的問題，普通群眾根本沒有發言權。

二、這次事件告訴我們，群眾把希望寄托在少數所謂「清官」身上是靠不住的，「清官」可能被黜，也可能被收買或受壓而妥協而變成「贓官」、「昏官」。自己的政治權利最終還是要靠自身來爭取，而不能靠別人恩賜。大陸的這次事件絕不能歸咎於學潮。如果沒有學生運動，保守派遲早也是要反撲的，他們不是利用這次機會，就是利用另外一次機會。目前之所以發生這次事件，不是因為鬧了學潮，知識分子表達了太多的意見，而恰恰是因為我們過去太軟弱了，我們不能對時局的發展施加更多的積極的建設性的影響。

三、這次事件告訴我們，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作爲一個社會階層，還不夠成熟。雖然其中不乏積極分子，但就整個知識分子階層來看，無論從覺悟程度、組織程度、爭取自身權力的勇氣上，還是從自覺參與的範圍、與廣大群眾結合的程度，都是薄弱的。因此，在以前的歷次政治事件中，它始終是一種被利用的力量，而不是一種能夠提出自己主張并堅持達到目的的一種獨立社會力量。

四、這次事件告訴我們，在中共內部，反對改革的力量還很強大。這次事件作爲大陸政治生活的一個轉折點，標誌着過去一度存在的一寬鬆政治局面的結束。此後，至少在一段時

期內，中共將加強在政治、意識形態領域裏的控制，在經濟領域中也要重新強調計劃經濟的重要性，貶低市場調節的作用。在總體上，如果沒有更強有力的力量干擾，大陸社會很有可能開始向當代蘇聯模式靠攏。

五、這次事件告訴我們，大陸的政局十分不穩，中國的前途一時還難以預料。鄧小平死後，大陸可能面臨兩種選擇：或者民主運動持續高漲，各派政治力量將公開登台較量，經過一段時期的混亂和動盪之後產生新的較爲開明的權威，領導一個較爲民主的政府，或者中共的保守派和軍界迅速左右形勢并倒向蘇聯，使中國重新成爲「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一員。

特輯 支援大陸民運·擊潰守舊派的反徑

普林斯頓留學生要求 恢復方勵之職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國大使館

尊敬的韓叙大使先生：

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教授最近因受學生遊行牽連而被解職。對方教授，我們普林斯頓大學的同學及家屬有着特殊的感情。方教授去年三月至六月曾在普林斯頓進行研究和訪問，並應我校聯誼會的邀請演講述國內的改革形勢。根據我們的瞭解，方教授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博聞強識，海人不倦，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是我們留學人員和青年一代的良師益友，也是一位稱職的副校長。我們認爲解除方教授職務的決定是錯誤的。我們在此通過您請求我國領導人本着有錯必糾的原則，恢復方教授的職務。

順致崇高的敬意。

普林斯頓大學廿四名中國大陸留學生

(簽名略)

學運狂瀾席捲·中國政局激變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馳遼

如狂瀾驟起的大陸學生民主運動，從去年「一二·九」開始後，此起彼伏，延綿不絕，帶着朝氣和韌性跨進了一九八七年。繼本刊上期「全國各大城市聯綫報導」截止去年末月二十六日，學運形勢又有新的發展和突破。在此，根據本刊從各方面獲得的資料，對一月來的學運動態繼續加以綜合、全面的報導。

中共規定「十條」壓制學生

當學運震波傳遍全國之時，中共終於按捺不住，開始「修正、補充」憲法，開始改變學生遊行「符合憲法」的口吻。十二月二十六日，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宣稱任何事先未得警方批准的示威都屬非法，規定街頭遊行至少需在五天以前向公安局提出申請，並規定人民大會堂、中南海、釣魚台國賓館和首都機場的周圍，不准遊行示威。北京市的該項規定共有十條款項，當晚便通過中央電視台全國新聞聯播節目，向全國播放。

這樣的規定，其本身似無可非議，然而具

有諷刺意義的是：中國的憲法自五十年代第一部起，就明文確認公民有遊行示威的自由。然而三十多年來，除了官方組織的、強迫參加的遊行外，民衆在這方面從未享有過點滴的自由，所以憲法中的公民權利不過是一種裝飾而已。而這次學生運動，是建國以來人民第一次自發起來享受憲法所賦予的自由，所以中共才想起來要制定相應規定，否則中共的法官大亨們做夢也想不起來，需要這樣「修正」憲法。

同時，官方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及上海的文匯報，也紛紛載文譴責學生運動。人民日報至二十二日起連續四天在頭版頭條發表社論，指責學生破壞國家政治生活的安定團結和經濟的正常運轉；又指責學運給社會上的不法分子提供機會，企圖以此嫁禍學運。同時，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王大明，也在二十六日晚，在電視發表講話，發出警告，要求人民不得接受「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觀念。北京日報則在二十七日刊出評論，警告北京市民，防止「陰謀分子」利用學生做「犧牲品」，向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挑戰！

在官方壓力日趨加重的形勢下，各地學生並未屈服。上海各高校示威學生自發組織的跨

校聯合小組，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四項要求，並表示如不獲答應，將發動十萬人的大示威。

聯合小組提出的四個要求是：

- (一) 要求市政府以事實報導真相；
- (二) 懲罰毆打學生的犯罪分子（指公安人員），並公諸於衆；
- (三) 要求新聞報導自由；
- (四) 要求檔案公開化。

後來，在與市政府多次對話後，因當局作了部分讓步而暫時取消。

二十七日，南京學生、工人五千多人舉行了連續第六天的示威集會，討論民主、自由以及中國未來之前途。當晚的集會還討論了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人口問題等中國面臨的迫切問題。討論說明學生和民衆是關心國事的，並不像官方報紙宣稱的那樣，損人毀物、破壞社會安定。

在北京大學，同學們繼續貼出大量的大字報。他們對中共領導人獨攬新聞媒介，惡意歪曲、壓制學運的作法極爲憤怒，在大字報上指出：中共領導人的作法，與過去的專制暴君並無二致，並用紅筆書寫了「打倒專制」的口號。大字報堅決支持民主先鋒、中國科技大學校

長方勵之。大字報提到了國務院副總理萬里與方勵之十一月下旬在合肥的一次辯論。萬里在辯論中聲稱：「民主只是我們給予某些人的恩惠。」此語受到北大學生的激烈抨擊。

北京學生突破禁令再度示威

二十九日晚，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對中國的改革進行了徹夜討論。同學們認為中國的政治實現民主自由，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而鄧小平推行的改革已遭遇嚴重障礙，鄧派如不能獨立完成改革，青年學生有責任站出來，為爭民主而奮鬥。討論至後半夜兩點鐘時，同學們群情激昂，當下三百五十多名同學點燃火炬，並抬了許多大鼓，衝上街頭遊行。當遊行隊伍路經人民大學、清華和北大校園時，這幾所學校的同學也從睡夢中爬起來，參加了遊行隊伍，使參與「黎明前的大遊行」人數達到三千多人。

這次遊行是在北京市人代會發佈禁止未向公安部門申請不得遊行的禁令三天後發生的。同時，全國各地大學的師生，亦不願官方關於張貼大字報將被判三至五年刑的警告，在校園內繼續貼出大量的大字報。官方操縱輿論，大肆污蔑學生示威遊行的活動，是這些示威繼續發的導火綫。

同日，以蘇州大學為主的蘇州市大學生也開始了示威遊行。幾百名大學生高喊民主的口號穿街而行，此消息由同情學生的外籍教師傳給了外國通訊社。同時，大同、太原等市也有學生遊行活動發生。

自國內政治改革輿論興起後，灰溜溜沉寂一時的中共保守派理論權威胡喬木和鄧力群，於二十八日突然跳了出來，公開在中共報刊上

發表講話，攻擊學生們要求民主改革的熱忱，指學生們的愛國行動和向西方民主方式學習的呼聲是「民族虛無主義」，強調「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精神仍然值得宣揚。與此同時，政治傾向保守的中共領導人王震、薄一波也發表講話，指責學生們示威遊行。這是至十二月五日學運爆發以來，中共中央領導人第一次出面表態。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全是阻礙改革的保守派，這說明中共黨的守舊勢力已經對學運無法容忍了。

但是，地方上的改革派則借學運繼續傳播放開言論。如「上海法制報」發表文章呼籲保障人民議政權力，打破政治問題不能討論的長期禁區。該報指出：「儘管憲法中對人民參政議政有明確規定，但在現實生活中沒有法律制度的保障」。這種觀點是對學生反對中共派額人大代表行為的有力支持。

軍委會擬採「全國軍管」

據新近由大陸外出的人士透露，二十五日結束的中共中央軍委會會議上，部分中共領導人擔心由於改革失控、學運蓬勃、物價飛漲、百姓不滿等原因，曾討論實行全國範圍的軍事管制，派軍隊進駐學校和工廠。會上，鄧小平、彭真主張嚴厲制止學生運動的事態繼續擴大，考慮出動新成立的「人民武裝警察部隊」鎮壓遊行學生。如無效，則動用軍隊。陳雲則主張，待學生放假之後，再行處置學生領袖，或者畢業分配時秋後算賬。趙紫陽則主張繼續擴大經濟改革，在保守派的反對下，趙總理也氣憤地說：怕什麼，大不了實行軍管。中共領導人的表態說明，高層雖有矛盾，但在維護中共一黨既得利益上，還是大同小異的。



北京大學生元旦不顧「十條」禁令舉行示威與民警對峙。

中共腦羞成怒，言論禍指海外

面對聲勢浩蕩的學生運動和人民廣泛的不滿情緒，中共不僅沒有深刻反省自身政策的失誤，反而惱羞成怒，嚴厲指控外電有意煽動學潮。新華社指控美國之音呼籲示威學生「不要洩氣」。「美國之音」對要求改革的學生示威做了大量報導，許多中國學生都是靠美國之音來得知其它省市的示威情況，從而互相溝通。而中國大陸的幾百家官方報紙和電台，不僅封鎖學運新聞，而且加以歪曲。這樣，美國之音就成了唯一可以了解學運發展的客觀報導，成了撕不掉的「空中大字報」。

同時，北京市人民檢察院也指控台灣的「自由中國之聲」電台，對在中國大陸的秘密工作人員發出指示，要他們選擇機會開始活動。指台灣特務煽動學生鬧事，企圖以此製造口實，鎮壓學運。

元旦北京大示威要求取消「十條」

元旦當天，北京市公安局從早上八點就封鎖了天安門廣場，僅留下長安街供行人車輛通過。十時前後，北京各大學學生和市民開始聚集在長安街上，達三千之眾。群眾向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移動，與警察發生了衝突。當學生們試圖衝過警察的封鎖綫時，有四十幾名學生被警方強行帶走，其中有二十二人被捕。

學生們手持的標語上寫着：「支持鄧小平和四個現代化」「反對保守派和反動分子」「自由萬歲」「民主萬歲」「取消十條」（指官方限制學生遊行的新規定）、「反對暴政」等口號。學生們高唱「國際歌」，不斷地向警察的封鎖綫衝擊。示威一直持續到下午五時，聚集的人群方才散去。

北京學生的此次元旦大示威，給中共當局以巨大打擊，因為學生們無視當局限制遊行的十條規定和逐漸升高的輿論恐嚇，仍舊在天安門廣場（禁止遊行的地區）舉行了示威遊行，使中共高層極為震怒。

被釋放學生受到英雄式歡迎

元旦當晚九時，當北大同學得知有二十多名學生被捕後，約兩千多名學生包圍了北大校長丁石孫的住宅，要求丁石孫出面向當局要回被捕學生，保證不處罰示威同學和允許報章報導示威事件。

丁石孫在學生們的壓力下答應兩小時內答覆。同學們無心等待，開始向市中心出發遊行。當隊伍行至人民大學校園時，「人大」的一千多學生也加入了遊行隊伍。當隊伍行至友誼



北京學生元旦當晚再度示威，要求當局釋放被捕同學

賓館時，接獲了被捕學生已被釋放的消息，整個遊行隊伍頓時爆出一片歡呼聲。

元月二日，當被捕同學回到學校的時候，受到同學們英雄式的歡迎，被一群熱情的同學拋了起來。他們的女友則表示，如果他們被判刑她們將「等一輩子」。同學們通過這次行動，體會了團結一致的力量。

方勵之違令競選獲最高票當選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廿九日，國內民主運動領袖方勵之教授，以自薦候選人身份，公開站出來與官方指定的候選人競選安徽省合肥市基層人民代表。結果，方勵之以該選區最高票當選。

方勵之公開站出來，向官方進行挑戰並取得勝利，是國內民主運動近年來最重要的進展之一。

方勵之，男，五十一歲，現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於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內定右派」，開除黨籍。方的夫人，北京大學教授李淑嫻同年被打成右派。夫婦兩人受盡摧殘。

方勵之一九八四年被提為科大副校長。一九八六年三月至七月，他和夫人李淑嫻教授在美國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進修。

方是共產黨員，這麼高的幹部違黨令而競選者，為第一人。尤如當年台灣的許信良違國民黨令競選桃園縣長。

北大學學生抵制污蔑焚燒「北京日報」

元月四日，北京大學數百名學生在午飯時間，在食堂門前公開舉行燒報儀式。向官方喉舌污蔑學生示威活動的行徑進行抗議和抵制。學生們將「北京日報」收集起來，以火焚之。當烈火點燃起來的時候，群情激昂，觀看的人群發出一陣陣喝彩。一些學生由宿舍裡將點燃的報紙從窗口扔下，並放起爆竹。學生們表示，他們之所以要燒「北京日報」，是因為這份報紙是官方新聞媒介中，最不準確，也最不公平報導一個月來學生爭取民主自由的示威行動的報紙。學生們同時要求官方對學生的示威行動，給予一個公正的評價。同時，北大校園內貼出的大字報說，官方報紙妄圖利用「不公平的報導」，在學生和群眾之間挑撥離間。官方報紙污蔑學生遊行的動機，把學生示威描述成不成熟的行為和受到一小撮滋事分子的誤導。官方報紙還故意找來一些逢迎拍馬的所謂

五日北大大學生燒毀「北京日報」抗議
污蔑——一言堂的言論自由



「群眾」「訪問」，指責學生擾亂公共治安。學生們還說：「北京日報一貫對我們存有惡意，我們憎恨這份報紙。我們要求中國有更多的民主、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

中共保守派反撲整肅民運領袖

元月初，中共政治局秘密召開緊急會議，下令對學運採取強硬措施。出席會議的除鄧小平、趙紫陽、胡耀邦外，尚有彭真、楊尚昆、薄一波、胡喬木、陳雲等中共保守派巨頭。在會議前夕，彭真曾率領軍隊系統內保守強硬的頭目們，遊說於北京中央各個機關、各大部委，組織力量，壓迫中央對學運強硬表態。在這次會議上，保守派領導人紛紛發難於胡耀邦的書記處和書記處屬下的中宣部。鄧小平在此情勢下，態度突然轉變，對學運強硬起來，並指示說，一些「有地位及有影響力的」中共黨員

，沒有站出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派份子」。中共官方「光明日報」立即發表措詞強硬的社論，攻擊矛頭直指知識分子。「人民日報」也發表社論「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該文說，黨內一些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對要求民主的學生起了煽動作用，違背了「四項基本原則」。「北京日報」亦發表評論說，「某些專家正在推銷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自由化，並且正在影響學生。」各報還引述鄧小平三年前的話說：「無論是什麼專家、學者、作家或藝術家——只要他是黨員，就不能認為特殊，認為在政治上比黨聰明，或者走它自己的路。」這些強硬的言論，已經透露出中共要對開明知識分子開刀的寒光。

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

三人首被開刀

元月九日，各方消息證實，中共開始整肅黨內「有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知識分子，將首先宣布開除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的黨籍，撤消其在科技大學的職務、一向敢言、專揭中共黑幕的「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和思想解放的上海著名文藝理論家王若望等人的職務。

據消息證實，鄧小平提名道姓地指出，方勵之「不應該叫他退黨就算了事，而且要對他進行整肅。」鄧還說，他一年前就建議開除王若望黨籍，有關方面就是不辦。而針對此項決定，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表示強烈反對，與鄧小平本人發生分歧。中共黨內部開始出現公開分歧，導致了後來的保守派對改革派的大整肅。

保守派組織意識形態大反攻

元月十日，中共當局把大規模整肅的輿論進一步升級。中共官方報紙說，中國要花一百年的時間，才能達到目前西方的開發程度。改革必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逐步進行，對於那些急於實行全盤西化，把西方的標準置於社會主義的原則、目標以上的人，必需予以徹底批判。

這一輿論不僅是中共準備大規模整肅「資產階級自由化知識份子」的先兆，同時也表明，黨內的頑固派、守舊勢力開始轉占上風，他們已搶先占領了輿論陣地。

在守舊派的這一輿論攻勢中，「光明日報」說：「大家不能期望中國這個擁有十億人口的貧窮國家，很快就達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化了兩、三百年才達到的開發程度。」

上海「文匯報」的頭版評論文章則更是鋒芒畢露地說：「最近少數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有影響人士，把持了言論，發表文章擁護完全西化的錯誤觀念，詆毀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制度。」並表示：「對於那些領頭對社會主義從事這種攻擊的人所具有的破壞本質，不可等閒視之。」

「農民日報」也表示，中國八億農民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有徹底的了解，他們痛恨剝削制度，反對奴役迫害，也痛恨社會動亂。

鄧小平不惜流血鎮壓民主 大發淫威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下達了一九八七年的「一號文件，號召全黨、全國全面反擊「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在文件中甚至說：「如果必要的話，我們必須對那些違抗命令的人嚴厲處置，流一點血也沒有關係。」這個文件選以一九七九年「民主牆」時期的民運領袖魏京生

爲例。鄧小平說：「你看魏京生，我們把他關起來，民主運動就消失了。我們到現在還沒有放他，可是在國際上也沒有惹起什麼麻煩」。鄧的這番話表明，中共最高層已下決心，不惜違反國際輿論，鎮壓民主運動。鄧對於近幾年來中國民主化的論調是：「這幾年來，我們對遏制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太放鬆了。允許一點右派影響存在是必要的，也是正確的，但我們走過頭了。」隨即，中共黨內的保守派紛紛發表講話，抨擊知識份子追求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王震、薄一波、宋任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等紛紛指責十二月份的民主運動是「公然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企圖否定黨的領導，擺脫黨的領導」，甚至是一「狂妄份子想取代黨的領導」。

改革派失去時機陣營遭毀

保守派在這次反撲中，它採用了共產黨的拿手好戲：分而治之。他們把工人、學生、高級知識份子分爲三段，首先切斷工人與學生運動的聯繫，然後置學生於一邊，先打擊高級知識份子。這期間，方勵之被軟禁在北京，並受到監視。北京充滿了火藥味，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在這種緊要關頭，中共高層的改革派採取了可悲的步驟，導致了中國政治悲劇的開始。高層改革派並沒有站在群情激昂的人民民主運動前面，也沒有站在民主運動的後面，此時幻想「捨車馬保將帥」，讓出橋頭堡，以求全身。趙紫陽八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機構會議上宣佈：今後黨中央的報導、宣傳、出版管理工作全部由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負責。這樣，改革派即交出了「喉舌」，也就失去了吶喊和哀

鳴的能力。然而保守派在卡住了喉嚨後並沒有息手，而是繼續用力卡下去。

胡耀邦抵制整肅被迫下台

槍打出頭鳥。元月十二日新華社發佈消息，中共中央委員會以「長時期在不同場合散佈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言論」和「疏忽職守，導致學校中的思想及政治工作被削弱」爲由，同時罷免了方勵之和管惟炎的科技大學副校長和校長職務。與此同時，胡耀邦也因「疲勞過度」，沒有露面接見本應由他接待的日本客人；在黃克誠的葬禮上，胡也成了唯一沒有露面的高層領導。顯然，任何「疲勞」都不能阻止一個共產黨國家的首腦出席重大的國事活動；衆所周知，即使連路都不能走了，也可用輪椅推出來。胡耀邦的隱面表明了中共軍方守舊派與政界保守派聯合「逼宮」的情況下，中共高層的改革派已經力屈；同時這種社會主義所特有的「政治感冒」所造成的隱面也表明胡耀邦本人已處於將遭罷免的門檻。

方勵之、管惟炎的革職激起了學生們的激烈反應。中國科技大學的一千多名學生再次上街抗議他們的校長被革職，並簽名請願。但此時，中共高層內保守勢力已占了上風，並決心以這次學生民主運動爲契機反手覆雲。元月十三日大陸各報章繼續升格猛烈攻擊「資產階級自由化」，「紅旗」雜誌並首度聲言學生的抗議事件背後有「反革命份子」煽動。紅旗雜誌以「人民民主專政」爲題發表評論員文章說：「一小撮人發表『錯誤的』、『反革命的』言論，煽動並鼓勵學生製造麻煩，在最近的示威、抗議中扮演了一個『惡毒的角色』」。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也於元月十三日發佈了極

爲嚴厲的通告，警告：「共產黨員必須嚴格遵守黨章。不管是誰，其地位有多高，名聲有多大，如果違犯黨的政治紀律，違背四項基本原則，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必將「受到黨紀處分」，絕不「寬容」，「絕不允許有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又堅持不改的特殊黨員」。彭真，作爲這次保守派反擊中的前鋒大將，在「人民日報」和「紅旗」上重新發表其「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指導思想的幾個問題」的講話。同時，在這些嚴厲的輿論攻勢下，中共當局進一步擴大整肅。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上海作家協會理事、黨員作家王若望，以長期「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屢教不改」爲由遭到開除出黨。劉賓雁危在旦夕。

在中共高層，以這次民主風潮爲突破口，展開了激烈的鬭爭，改革派與保守派長期以來的較量白熾化了。元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胡耀邦被迫辭去黨中央總書記職務，由趙紫陽代任。會上，對胡耀邦「進行了嚴肅的批評」，胡本人作了一「檢討」，承認在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期間，「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失誤」。會議對今後中國政治發展方向的定調是：「繼續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的路綫、方針和各項內外政策，繼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胡耀邦的下台大大削弱了改革派的力量，胡啓立甚至趙紫陽日後的前景都令人擔憂，鄧小平的改革宏圖今後要向哪裡走，怎樣走，令人矚目。知識份子的地位在這次較量中受了打擊，保守派得到了充實。但中共高層兩派的鬭爭並沒有結束，下一個焦點很可能集中在總理人選上，李鵬和李瑞環的爭鼎可能將出現兩派力量消長的變化。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對當前中國大陸政治危機的聲明



(一九八七年元月十二日)

自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份在全國範圍內掀起的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震撼了專制制度，也震撼了整個世界。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中共黨內胡耀邦、趙紫陽和胡啓立等改革派未能借用民主運動的東風，因勢利導地把改革引向深入；他們反而在中共黨內守舊派的強大壓力下，忍痛犧牲了一貫為改革鳴鑼開道的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知識份子，並拋出了中宣部長朱厚澤等做為替罪羔羊。

現在，中共黨內守舊派猖狂反撲，神州大地風聲鶴唳。在中共中央一九八七年一號文件指導下，一場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名，以整肅知識份子和民主力量為實的黑風，在全國刮起。守舊派的矛頭直指革新勢力，目標是迫使胡、趙下台，並消滅日益茁壯的民主力量。

我們認為，這次民主運動興起，是經濟改革失調、政治改革拖延的結果。從這次民主運動學生們直接要求選舉自由、新聞自由、加速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可以看出，民主運動是支持改革的，但我們要求的是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的配套改革。

在洶湧澎湃的群眾民主運動面前，中共黨內守舊勢力嚇破了膽。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們開始採取鎮壓措施。為了攫取更多的政治權力，黨內守舊派把「出亂子」的原因歸咎於改革派的「寬鬆」政策上，並迫使胡、趙改革派交出權力，放棄改革政策。

在這種形勢下，胡趙改革派面臨兩種抉擇：或者與民主運動聯手，力挽狂瀾，打垮守舊派的反撲，把改革繼續進行下去；或者為求自保，向守舊派投降，出賣支持改革的知識份子和手下幹部，斷送改革。後一種選擇必將使中共改革派更加孤立，使自己處於危險的境地。

讓我們回顧一下歷史的教訓：一九六六年，當毛澤東借助林彪的力量向劉少奇、鄧小平施加壓力時，劉鄧先忍痛犧牲吳晗、鄧拓、廖沫沙的三家村，後來又拋出了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反黨集團」做為替罪羔羊。然而，這一切都未能挽救劉、鄧最終被毛澤東整肅的結

局。一九七八年，當鄧小平向華國鋒施加壓力時，華國鋒先出賣了李素文、吳桂賢、姚連蔚和孫健，後來又拋出了吳德、陳錫聯和紀登奎。然而，這一切也未能保住華國鋒的寶座。現在，胡趙改革派面臨着同樣的困局。

這裏，胡趙改革派也有另外的選擇，那就是，向西班牙的卡洛斯王子學習，與民主運動聯手，用上下結合的模式，打垮守舊勢力的猖狂反撲，把中國帶上民主的道路。胡趙這樣做，必將為中國的民主化做出貢獻，否則，民主運動的滾滾潮流必將把一切阻撓它的勢力衝垮。

在此，我們重申支持黨內改革派推行改革的立場，但我們反對向守舊勢力無原則地妥協。

鑒於守舊派的逆流大規模的反撲，在黨內進行整肅，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鎮壓，重演「反右」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悲劇，扼殺中國的改革生機，我們向人民發出呼籲：不要再等待了，不要再沉默了，勇敢地站出來，保衛改革的成果，擊退守舊派的回潮逆流。

我們民主運動再一次向黨內改革派伸出援助之手，我們希望黨內改革派不要延誤這歷史的機會。如果胡趙改革派不認清形勢，以不斷打擊民主派人士來保住自己的地位，那麼，改革派就會蛻變為守舊派，歷史將無情地把他們一起淘汰。

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改革成功的先例，改革派始終充當着悲劇的角色。從現在中共改革派的表现看，我們擔心他們也會重蹈王安石變法和戊戌維新的後塵。歷史的規律是：改革失敗後，隨之而起的將是社會的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這次中共黨內守舊勢力的猖狂反撲，是他們的一次迴光返照式的垂死掙扎。

我們向海內外同胞呼籲：組織起來、行動起來，為未來民主力量 and 守舊勢力的總決戰做好準備！

聯合起來，擊潰守舊勢力的反撲！
民主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中國大陸留美學生一千人發表

致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公開信

編者按：在中國大陸的學運風起雲湧，如火如荼的鋪展開來，最後導致改革派遭受打擊，胡耀邦下台後，大家的目光都關注到海外的中國留學生身上，看看他們究竟會有什麼行動？是沉默不語呢？還是勇敢的站出來聲援國內的學運和改革派？在一個多月後，終於有了答案。

自大陸的學運起來後，海外的中國領事館就奉命疏導及壓制在海外的留學生，不使有響應的行動。但現在終於壓制不住。全美的中國留學生團結了起來，起草了這份文件，有一千多人同意，並且有四百八十二人署下了他們的真實姓名。這種行動，着實令人感動。歷史將為這四百八十二人的勇氣作出見證。

但在這份文件的後面，突然出現了讓許多簽名者十分詫異的六點聲明，因為這六點聲明是他們事先不知道的。這六點聲明主要是針對、並打擊中國之春的。中國之春已就此事正式發表聲明（聲明見本報第三頁）。

中國之春這幾年所遭受的打擊已不在少數，然而這並不能動搖中國之春，反而使她越來越壯大，要把中國推向民主的道路的決心也越來越強。歷史將會為種種的謠言、譴責和打擊作出判斷！

以下是公開信全文：

中共中央、國務院：

我們這些在海外的公、自費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們十分關切近來國內形勢的變化。我們難以理解在學生遊行已經平息之後，中央為什麼反而採取一系列嚴厲措施，使胡耀邦總書記突然去職，並對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進行懲罰處置。這種突然變化不能不引起我們深深的憂慮。

(一)自粉碎四人幫以來，胡耀邦同志為我國的思想解放運動、平反冤假錯案、開拓改革局面，以及在文化思想領域創造寬鬆氣氛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的去職將極大地損傷全國人民進行改革與建設四化的積極性，使我們感到震驚和不安。

(二)對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等人的處置和批判，在國內外都使人感到這是打擊知識分子、壓制思想解放歷史悲劇之重演。這種做法不僅失信於民，大大降低了黨和政府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威望，而且動搖了我國政策的穩定性與連續性，嚴重損害了我國的國際形象，這不利於安定團結、不利於民主與法制的建設、不利於發展對外經濟合作，也不利於祖國的統一大業。

(三)在黨的報刊上，又出現了對人們的言論斷章取義；無限上綱的現象，使我們感到打棍子、扣帽子、抓辮子的極左的作法又重新統治了宣傳與思想文化領域。這種作法，使我們這

些在海外的中國學生對我國的經濟與政治改革前景深感不安。我們擔心文革中流行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政治局面再次出現。

我們以為，近來事態的發展是與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國策背道而馳的，並使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等權利受到了嚴重侵犯。發展下去會斷送我國的經濟政治改革。

國家興亡，人人有責。我們強烈期望黨和政府堅持改革，反對倒退，堅持民主法制，反對以言治罪。出於對祖國的責任感我們認為不能不公開向中央和國務院表達我們的心聲。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九日

附：六點聲明

- 一、本公開信只代表以上簽名者的意願；
- 二、以上簽名者與「中國之春」及其他一切政治組織絕無任何關係；
- 三、以上簽名者一致反對「中國之春」的立場和一貫的作法；
- 四、以上簽名者一致反對國民黨宣傳機構的立場和一貫作法；
- 五、任何組織或非簽名者利用本公開信進行活動都是未經授權的；亦為以上簽名者所強烈反對；
- 六、本公開信的簽名者是自發聯名的，在公開信見報後任何簽名者的言行只代表個人。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九日

簽字者名單

編者短評：這一期我們以激動的心情轉載了中國大陸在美留學生致中共中央、國務院的簽名公開信。我們相信，這封公開信將作為歷史的見證，永遠載入中國民主運動的史冊。它將鼓舞着海外留學生和大陸留學生為中國的政治民主化作進一步的貢獻。

回顧近代中國的革命歷史，從孫中山先生在海外組織革命力量起，各派進步力量幾乎都把海外作為宣傳革命主張和發動群眾的一個基地，然後把革命力量逐步輸入國內。這次大陸的學運雖然被鎮壓下去，但支持國內改革、要求民主政治的熱潮却在海外轟轟烈烈地擴展開來。我們相信，這次海外的學生運動，必將對整個中國民主運動產生深遠的影響。它也說明：對

群眾要求民主的熱情靠高壓政策是無濟於事的，其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壓而不服，鎮壓愈烈，反抗愈甚。

在此，我們對那些關心國家大事，大膽地簽名表示自己意見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欽佩。這說明海外留學生並沒像某些外論所說的那樣「不問國事」，「在歌舞昇平之中」，而是無時無刻不在關心國家大事。這說明中國是有希望的，中國走向民主的道路是有希望的。它也說明，民主政治成為中國人民迫切關心的大事，並已廣泛深入人心。

得人心者得天下。中共現領導人應該順乎歷史潮流，認真傾聽廣大群眾的呼聲，認真做一些有利於政治改革的事情。否則，一意孤行下去，必然是人心喪盡，後果不堪設想。

本刊發表的這份名單是轉載自紐約發行的報章。

全美大陸學生已行動起來支援國內民運。這是公費生鄭為民在柏克萊大學貼大字報。



元月中旬，大陸留學生在美國路易維爾大學活動中心前張貼標語，支援大陸學生運動。



到週一（元月十九日）為止，中國大陸留美學生致中共中央及國務院公開信，共獲得五十一院校的一千名學生同意簽名，其中四百八十二人願意公開名字，以下為全部簽字者名單。（學校名字後的第一組數字為發表真名字的人數，第二組數字為不願發表名字的人數。）

阿拉波帕荷社區學院：（一，一）王鞏、亞利桑那大學（一四，五〇）顧益民、何端峰、胡洪耀、胡遠征、李雷、牟勤、龐幸生、潘國成、蘇宇、司馬洪、王石、吳圓、姚潔、周茂謙。

德州貝樂大學（一，一）董其奇。

波士頓學院、波士頓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布蘭戴斯大學、東北大學、康州大學、麻州大學（四五，一四四）白小慧、俞福新、唐大鈞、曾新生、高云、郭保剛、王鷹、劉森、黃小東、志堅、周圓、劉林、李威、許建華、楊鑄、齊穎勇、王小凡、俞強、李岩、姚煒、莊志剛、曲中、張強、李凌、張文明、洪成吉、胡君、許虹、馮平、劉小明、徐文約、馬洪江、程學恒、那松青、劉紅、徐海昇、馬曉云、吳月、龐小東、劉星、劉志剛、蔡金勇、呂匡輝、于強、劉子君。

紐約布魯克林學院（一〇，一一）曹南薇、曹育羣、丁亞明、費英偉、甘強、李焱、丘心偉、黃福明、尹曉明、張奇剛。

布朗大學（二四，三六）蔡偉、曹玉林、常向前、陳偉、范江平、高建平、黃鶯、紀敦木、林伏雨、林壽康、馬戎、毛德根、梅海、孟國武、孫剛、童璋、王啓進、夏曉光、楊冀川、葉錦武、張慶、張秀川、鍾建暉、周寒青。

加州理工學院（二六，二十九）白崗、

常春、陳冠華、陳偉峰、馮季渝、郭跃进、韓明生、侯志昆、蔣慶、劉剛、劉偉、陸凌、馬思、馬宏、彭正偉、申雪花、孫雲、譚國富、王海明、王龍崎、溫俊山、夏仁立、尹東平、張家駿、周華偉、左林。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十四,十五)黃孝培、沈越、胡千跃、林海青、張家杰、楊斌、陳文杰、華新民、劉偉強、洪雪琪、楊照明、白重恩、周劍波、王錫棣。

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〇,一)卡內基梅隆大學(十四,十四)朱銀、鄧東平、董浩林、李為冲、廖沙美、羅孚、彭征宗、唐品芳、田小為、王陽敏、楊超平、張千帆、張萍凌、趙建輝。

芝加哥大學(三十四,三十七)程玉、龔兵、胡捷、胡小平、胡義、金立平、賴肇偉、勞開勤、李三元、黎洪年、李征、梁在、劉楚衡、聶上游、錢水香、邵志峰、史貝利、斯其苗、湯超、王振綱、王十慶、王知雲、文貫中、吳鐳、吳曉忠、伍曉東、徐耀昌、王海邊、姚斷平、余明德、張捷、周蘇閩、丁子江、吳小明。

紐約市立學院(一,三)陸建平。
科羅拉多大學(〇,十三)
哥倫比亞大學(二七,五二)陳東、陳開友、董志華、黃碩、幹繼林、勞勇、李占柱、李曉林、劉龍斌、龐瑾、阮丹青、史天健、王勁峰、王波明、王希、汪藝、吳愛羣、吳曉毅、謝文、徐曉韻、閻兵、嚴小勇、楊丹、楊壯、張友學、張壽武、趙修利、朱永昌、朱方。康乃爾大學(二二,五五)陳英、馮戎、胡越、黃念生、李光煊、李振勤、林鳴、劉世平、劉世軍、盧偉、駱寧、宋小珏、宿文沛、田秀春、王紹光、王石慶、吳彤、楊先潔、楊

向忠、楊志剛、張冰、趙玉珍,以及卅二名同學。

丹佛大學(三,三)陳閩、裴衛、張海明。

佛羅里達州立大學(一,一〇)李春光。哈佛大學(三五,三五)陳衛、曹亮、范松苗、方羣、裴敏新、黃業生、胡平、胡建祥、高華建、梁煌、呂喆、李向東、馬俊、喬一德、蘇維加、蘇立山、屠志明、吳向華、王淵、吳虹、汪洋、許成鋼、徐建勛、徐學平、楊永棠、葉凱蒂、楊周美、楊志、袁鈞英、葉靈之、俞慧、于世保、張愛平、朱彥、張慧。

伊利諾大學(一七,五九)艾沂洪、陳向力、陳厚琦、高思危、郭京平、李開明、梁明、劉海勃、陳舒農、馬南南、寧羣、王慶、王菁、吳越、易綱、趙衛國、張華華。

愛荷華州立大學(二五,六五)常湘濱、承曉光、朱小玲、竇羣、葛曉佳、郝志東、季力、雷海燕、林藍、劉曉溪、沈小蓉、盛穗楚、蘇林、孫家方、唐德明、王建、王衛平、王學文、席小兵、謝維勤、許仁、許仲開、張潔、張翔、張澤民。

肯塔基大學(〇,三八)路易西安那州立大學(一,一)卓子凱。馬利蘭大學(一,一)呂良。墨薩鄉村社區學院(一,一)吳小娟。密執安大學(三八,四〇)白杰、陳杰、程杰、朱允、朱智良、戴舫、段吉文、方武、甘路、郭濤、何暉、胡明、冀晉、江帆、林東平、林倩、劉令南、劉憲、陸平、馬震魁、潘一飛、齊光、錢學煜、史斌強、湯凱、湯曉東、王海林、王琦、王政、謝平、辛周平、薛小林、葉寧、郁介云、張平、張欣、張志宏、周易。

密執安州立大學(〇,二八)明尼蘇達大學(五二,五二)方慶平、田國強、陳斌、蔡智靈、田游、陳潤田、林少辛、廖怡、瞿德霖、方季春、葉雁、吳哲、王武、程杰、王羣、倪曉光、于放、陶業、馬亞民、王紅斌、秦志寧、徐峽、羅朗、陳友君、蔣效東、王英民、檀中恕、陳大興、董紅紅、王建林、熊秋菊、鄧志、馬潤林、宋曉暉、潘偉雄、潘厚堯、沈立鳴、華益民、謝敏、劉海英、林德璋、劉建軍、于曉華、趙依理、廖青、關源泚、宋健健、徐細根、劉曉陽、鄧令毅、張智羣、顧援朝。

蒙塔拿州立大學(〇,二四)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一,一)馬桂芳。

紐約大學(一一,一一)華龍、李浩、李小建、劉亦心、孫近、王景東、王耘、汪康懋、吳畏、周俊偉、周勵。

西北大學(一五,二六)蔡申甌、程海平、郭駿、何三雄、林璋、李純、梁曉玲、馬明榮、孫立、譚瑤、于宙、王跟太、趙家林、周平、洪岐。

俄亥俄州立大學(〇,四)賓州大學(五,三五)曹建國、葛若文、洪與健、劉迎新、于讓塵。匹茨堡大學(九,九)方向、馮哲川、侯書苓、蔣祺、李銀河、王小波、謝平、于書英、遠航。

普林斯頓大學(一〇,一〇)陳加林、丁敏芳、陶欣、胡之祜、宦國蒼、李少民、劉英莉、余小薇、楊小凱、于大海。羅特格斯大學(一,一)宦國禾。南加州大學(八,八)曹洪、陳曉非、馮偉、金安蜀、譚小青、夏曉東、朱暢、張朝陽。

史丹福大學(一,一)楊平。

紐約州立大學奧本尼校區(四,四)陳燕

南、黃海音、劉英莉、張軍蕾。

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校區(二,二)程鐵

軍、路愛國、王浩賢、黃剛。

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校區(一,一〇)權

華。

紐約州立大學史東尼布魯克校區(〇,三)。

天普大學(一,一)陳嚴。

德州大學達拉斯校區(一,二)冉茂新。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一,一)孟致偉。

衛斯理揚大學(一,一)彭克昂。

中國大陸留學生的公開信

聯絡者公布姓名電話

繼續接受同學簽名

中國大陸留學生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公開信，繼續接受各地中國大陸留學生簽名。請各地學生將簽名信寄往下述聯絡人，并與他們電話聯繫。

聯絡人：于大海

Yu Da-hai

Dept. of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

Princeton NJ 08544 電話

聯絡人：白崗 王尤崎

Bai Gang

Dept. of Applied Physics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

Pasadena, CA 91125 電話

聯絡人：馬戎 楊冀川 王啓達

Box 1916

Brown University

Providence, IR 02912 電話

電話

(401) 421-1094

(401) 274-6793

(本刊記者)馳遠

來函照登

對簽名信「六點聲明」的聲明

在「公開信」上簽名的幾名中國留學生

「中報」和「華僑日報」於一九八七年元月廿一日刊登了我們近千名中國大陸留學生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公開信。我們是公開信的簽名者和積極推動者。令我們感到驚訝的是，簽名信公開發表時，附有所謂的「六點聲明」。

我們在此指出：我們當初簽名時，并未見到這「六點聲明」，只見到公開信。

我們已向簽名者最多的幾所大學進行了解，我們發現，密執根大學、哈佛大學、明尼蘇達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愛荷華州立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等院校的簽名者，均不知有這附加的「六點聲明」(目前我們尚未找到對這「六點聲明」的負責者)。這「六點聲明」之所以出現在「中報」及「華僑日報」上，我們推測有如下可能：

一、中國領事館動的手脚；

二、個別簽名收集者動的手脚；

三、兩份報刊編輯同時動的手脚。

無論如何，這「六點聲明」顯然盜用了廣大簽名者的名義，這是不合適的。我們常批評中國共產黨內保守派人物胡喬木和鄧力群等人強姦民意，難道「六點聲明」的製作者不也是強姦民意嗎？

「六點聲明」指出簽名信與中國之春無關并聲明一貫反對中國之春的立場和作法。我們并非中國之春的成員，但我們認為，作上述聲明是不妥的，因為：

一、使某人有意蓋彌彰的感覺；

二、聲明的邏輯不通。中國之春如果也支持這個簽名信，聲明的簽署者的「一貫反對」不就自相矛盾了嗎？

我們感到，這「六點聲明」的水準很低，實為畫蛇添足。

我們願在此提出，簽名信的活動本身就是

一項嚴肅的政治活動，簽名者已表示了與鄧小平的「不同政見」。一旦簽了名，想想看，胡喬木、鄧力群、彭真之流會白白饒過我們這些簽名者？大家應該同舟共濟，何必踩中春一脚？

另外，我們也要為中國之春說句公道話，他們這幾年為我們留學生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如幫助辦經濟擔保人和替留學生家屬陪讀呼籲等。凡有良心者，都不會抹殺中春的工作。

我們希望「六點聲明」的製作者能夠光明磊落地站出來，澄清事情的真相。我們保留採取進一步行動的權利。

此稿同時投往「中報」、「華僑日報」、「世界日報」、「人民日報」和「中國之春」。

幾位大陸留學生

一九八七年元月廿三日

一九八七年元月廿三日

一九八七年元月廿三日

一九八七年元月廿三日

一九八七年元月廿三日

一九八七年元月廿三日

一九八七年元月廿三日

一九八七年元月廿三日

一九八七年元月廿三日

一九八七年元月廿三日

一九八七年元月廿三日

一九八七年元月廿三日

一九八七年元月廿三日

鄧力羣強姦民意又一例

人民日報捏造「留學生來函」

《中春》編輯：

一月十五日接到我老同學從美國西岸打來的長途電話，他二話不說，劈頭蓋臉地把我臭罵一頓。我笑着問他：「怎麼啦？哪兒得罪你啦？」「得罪我？小事。得罪了十億人了！人家冒生命危險上街遊行，你倒好，躲在美國有汽車洋房，還說風涼話。大作登在人民日報上，這下可好，名字響噹噹囉！」「甬跟我開玩笑，我什麼時候給人民日報投過稿？」「裝什麼蒜？」

我趕緊從牆角翻找出剛寄來的一月十一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翻開第二版，一看，差點沒把我給氣瘋了。我從來沒有看過這封信，更甬提寫它了，但信末赫然印着我的名字。其他幾個名字，我沒一個認識的。我立刻掛電話，找我幾位要好的同學，他們分住在那串名字後的地方，或他們有同學住那兒，請他們幫我打聽。結果是，另一個名字上報的同學，和我一樣，全不知情，氣都氣哭了。另外幾個人的名字，在當地乾脆就找不到，名字全是假的。

人民日報如此強姦民意，實在叫人氣不過！我希望借貴刊一角，揭露此事，和你們一起控告人民日報。隨信寄上剪報。順致
敬禮！

一位受害於人民日報的自費留學生

一九八七·一·廿一



編者按：本刊同仁讀了人民日報海外版一月十一日第二版上的「留學生寄語」——致國內大學生一文後，都覺得十分不忿。能有這樣的文章嗎？每一個人都在問。沒多久，就收到據說在信後簽名的一位同學的來信（見上），才知道鄧力群控制的人民日報又在幹著強姦民意、欺騙、造謠的老把戲。現將人民日報上的文章全文刊載，使讀者們明察。



親愛的同學們：

我們是在美國自費留學的中國同學。最近，我們不斷從報紙、電視上瞭解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大學生，不時舉行集會遊行、要求「民主」、要求「自由」。有些集會遊行參加者，毀壞車輛等公共財物。我們海外赤子，身在異國他鄉求學，關心祖國形勢，對於突然間席捲全國的「學運」，想借黨報，談談我們的意見和感想。

中華民族多災多難，「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更使祖國滿目瘡痍，傷痕纍纍。現在，中國共產黨已經總結了經驗教訓，撥亂反正，正在誠心誠意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把經濟搞上去。同學們應該看到，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已基本走上了正軌，政府也實行了對外開放政策，實施了一系列對國對民有利的民主政策。今天和八九年前比較，無論在文化思想、經濟領域、精神文明物質文明方面已有明顯變化和好轉。同時也要看到，由於過去遺留下來的問題太多，傳統的習慣勢力根基太深，而且，當今的改革是史無前例的，黨和政府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把問題解決得十全十美。因此，人民應該相信政府，相信執政黨。給予一定的時間，相信中國共產黨是能夠把中國搞好的。

同學們，我們浪費的時間難道還不多嗎？現在，同學們應該把時間和精力完全徹底地集中在學習專業知識上，不應當把它們消耗在無謂的運動中去。以往，每每提及運動，大家都會談虎色變。現在，黨和政府早已明確表明，今後不能再有大規模的運動出現。而今天，我們自己卻又要掀起一場「學運」，我們還沒有吃夠運動的苦頭嗎？同學們應該明白，中國共產黨已經領導了中國將近半個世紀，黨的領導和權威是強有力的，有著堅實的基礎。當前的頭等大事，是堅定團結在黨和政府的一邊，大家齊心協力把國家的經濟搞上去。我們深信，只要黨和政府堅持實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正確政策，堅持實行有效大膽的

改革政策，我們國家的創傷不但能夠痊癒，而且一定會有一個民主而自由、繁榮而強大的明天。

同學們，把時間和能量投入到重建美好家園中去吧！同學們，發憤努力學習，加入建設者的行列中去吧！我們暫時在海外的學子，出外並非謀生或發財，我們是來求學的，海外留學生，絕大部分一定學成歸國，我們仍然相信共產黨政府，相信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堅信，中華民族立足於世界之林的一天一定會到來的！

王家麟	來自上海，密執安大學，	王志華	來自上海，加州大學，
鄧中健	來自上海，南加州大學，	齊光	來自青島，密執安大學，
夏國	來自上海，佐治亞大學，	黃天文	來自上海，丹佛大學，
秦麗	來自北京，東密執安大學，	李麗	來自北京，康乃爾大學，

留學生寄語



致國內大學生

人民日報(海外版) 1987年1月11日 星期日 第二版

舊金山僑界及學界致中國政府公開信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合眾國舊金山總領事館並轉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僑居美國的愛國華僑和中國留學生、訪問學者謹在此對中國大陸近一個多月來所發生的嚴重局勢表示深切的關注。

我們認為，自去年十二月五日開始於安徽合肥中國科技大學，以學生為先導和主體的民主運動是一次完全符合我國憲法的正義行動。它表明了廣大中國人民對於中國社會本身所亟須的、並由中國共產黨本身所倡導的改革處於停滯狀況的焦慮。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本身都十分清楚地認識到，我國經濟改革之所以難以縱深、徹底地發展，乃是由於我國現行政治體制的阻礙，而我國現行政治體制中的根本問題在於缺乏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和多元。我國人民為了國家的前途，為了本身應有的權利和平地提出他們的要求是完全正義的、合理的。為此，我們僑居美國的華僑、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對於他們的要求表示完全支持，對於他們的行動全力聲援。

我們讚賞我國政府對於這次民主運動表現出較以前克制和容忍的態度。但是，我們也注意到，我國政府並未理解人民的要求，並未認識到這次民主運動深刻的涵義。甚至有消息表明，中共中央已下令開除了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的黨籍，逮捕了一些參加和平遊行的工人，並企圖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來全面遏制和平息這次民主運動。對此，我們表示深切的遺憾和憂慮。

我們希望，中國政府能夠保障所有直接和間接參加這次民主運動的人士的人身安全，恢復並保障其應有的社會地位和工作職務，立即釋放所有因參加本次和歷次民主運動而被捕的政治犯，認真考慮並接納人民合理的民主要求，理性地檢討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現實，清醒地認識到如果擴大事態所必將面臨的嚴重後果。

我們請求中國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館總領事先生將此信轉交給中國政府，並公諸於中國人民。謝謝。

一群愛國的華僑、留學生及訪問學者敬上

一九八七年元月十七日

● 國內民主運動新高潮 ●

你不應該再沈默

當國內的同學，
以血肉之軀奮起，
你不應該再沉默！

當全世界的同胞，
以正義的呼聲，
支持同學們的要求，
你不應該再沉默！

不論你所學何科何系，
不論你來自東南西北，
是青年的精英，
為民族的未來，
起來！

腐朽和專制，
必將被自由、民主、法治所取代！

強烈呼籲中國留學生們以一切行動支援國內
同學們的热血行為！

加大柏克萊中國留學生聲援國內同學行動組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我們對國內大學生示威遊行的看法

● 美國南加州七十三位中國大陸留學生

看了最近對國內大學生遊行集會的連續報導，感觸甚多。很多話悶在心裏，不吐不快，在忙中偷閑，寫了這篇小小文章，談談我們對當前學生遊行和有關政治體制現狀的一些粗淺看法。

有着幾千年封建史的中國，至今仍未完全擺脫它的陰魂。它像無形的枷鎖，禁錮着人們的思想。中國的改革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艱難地向前邁進。改革的成敗，將決定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命運。在這關鍵的轉折點，作為社會最有活力勇於創新的當代大學生，深感其責任重大。他們懷着極大的愛國熱情，為掃除封建思想殘餘，建設更加完善的民主制度，走出校門，將民主、自由的思想傳播於社會。遺憾的是，我們的報導並沒有對學生的愛國行動給予更多的正面肯定，而過多地強調一些枝節及個人的過火行為。安定團結的局面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前提。但是，如果人們的思想及意見不能得到公開發表，只能增長社會不穩定的潛在因素。只有造成一種寬鬆的政治氣氛，讓人們潛在的思想意識能以憲法允許的方式（直接、間接的，平靜、激烈的）自由表達，而不是將意見深深埋入心中，才有社會的長期穩定。學生集會遊行是憲法保障的發表意見的一種方式

（雖然不一定是最有效的方式），是有利於社會長期安定團結的有力保證。

人大代表是公民對政府進行監督，影響其決策的重要媒介，是選民的代言人。因此，代表應通過公開競選而產生。改革選舉制度，使人大代表真正來自於選民，服務於選民，代表選民的利益，應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一旦人民可以通過其代表自由表達自己的意願，遊行將因是一種較為低效的表達意見的方式而自然消失。

大學應是新思想、新學科、新流派的誕生地。沒有思想、學術的自由，這將是不可能的。推行校長負責制，讓教師、學生參與民主管理學校，將是產生民主、自由的學術氣氛的重要前提。只有在這樣的環境裏，才有希望產生不愧於時代的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而不是他人理論的解說家。在目前情況下，在高校範圍內，學術和思想的自由探討是必要的，也是有條件的。在這方面，中國科大已邁出了卓有成就的一步。應在各大學推廣。

新聞、出版自由是憲法規定的每個公民的權利。然而，在目前尚不完善的社會體制下，它受到來自各方的干擾和限制。儘快制定詳細的新聞、出版法是保障公民的新聞、出版自由

的先決條件。改革政府對新聞、出版的管理，應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個獨立、有效、完善的傳播媒介應將政府的各項政策，社會動態，及時、準確、完整地傳送給每個公民，同時也將公民的意見及時反饋給決策機構。這將極大地減少決策的重大失誤。更廣泛的新聞自由是使矛盾不導致激化的有效途徑，是社會穩定、迅速發展的有力保障，也是使文革悲劇永不重演的必要條件。

作為海外留學生，我們無時不關注着祖國改革的過程。對目前政府以較民主的方式，所採取的謹慎、寬容的行為感到欣慰。希望政府對方興未艾的學生運動採取更加積極的態度，珍惜學生的愛國熱情。認真考慮學生的意見，促進改革。同時，在改革的過程中，增強民主意識。也希望海外留學生，基於對祖國的強烈責任感，對祖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貢獻其聰明才智，充分發表其真知灼見。使改革這一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變革迅速地向前期的目標前進。

美國南加州七十三位中國大陸留學生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此稿曾寄「人民日報」未予發表）

加州理工學院部分大陸留學生和華人教授 就目前局勢致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公開信

說明：自去年十二月始於中國科技大學並迅速波及全國的學生民主運動在海外引起了巨大的反響。雖然對這一運動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見解，但是學生和提倡改革者所表現的愛國熱忱和報國之心則是毋庸置疑的，而政府在這一事件中已表現的開明與民主也是目共睹的。這些正是中國未來的希望之所在，也是我們海外遊子信心之所源。然而，最近有迹象表明（參見「中報」一月十二日新聞和最近「人民日報」的社論），存在一種巨大的危險，一種倒退的徵兆，這不能不引起我們極大的憂慮。為了不使三十年前的反右悲劇在中國大陸重演，為了不致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轍，也為了避免近年來改革所取得的成果毀之一旦，我們，加州理工學院的部分大陸留學生和華人教授，向中共黨和國家領導致以公開信（見下文），並邀請所有大陸留學生、進修學者和愛國華人在此信上簽名以表明我們對最近事態發展的深切關注。

凡同意我們觀點並支持這一行動的同胞們，請您在此信或其複件上簽名（中英文真名或筆名均可），並於一月三十一日之前，發往下列地址：

PROF. YUK I. YUNG 170 - 25, CALTECH, PASADENA,
CA. 91125 或轉給 MR. BAI (818) 356 - 4815 OR
(818) 793 - 4301。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呼籲所有的愛國同胞們，為了國家的民主與進步，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加州理工學院部分大陸留學生和華人教授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我們海外學人時刻關注改革的前途和命運，衷心希望祖國安定團結，改革成功。去年年底在中國大陸各城市興起的學生民主運動在海外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和震動，這個運動的產生和發展一直受到了我們極大的關注。我們贊賞學生和提倡改革者的愛國熱忱以及黨和政府處理這一事件中曾表現的開明和理解的姿態。然而，我們對這一事態的發展特別是中共中央八七年一號文件和人民日報最近的一系列文章報導與社論以及可能引起的後果深感憂慮。

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人民已飽嘗各種政治運動所帶來的深重災難。我們希望歷史的悲劇不會在今天的中國大陸重演。為了維護近年來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和安定團結的局面，我們向黨和政府提出以下三點請求：

- 第一：根據憲法和黨政分家的原則，對於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無論黨內如何處理，都不應涉及他們的黨外職務。黨和政府應給予他們作為學者和作家所應有的工作條件，保障他們作為中國公民所應有的基本權利，包括言論和行動的自由，學術討論和研究的自由。
 - 第二：我們認為這次學生運動的主流和本質是應該肯定的，是與中央的改革方針一致的。因此，學生的愛國熱情應當受到理解和保護。對於這個事態的報導和評述也應當是全面的。黨和政府應當制止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打擊和懲罰參與遊行等活動的學生。
 - 第三：鑒於歷史的教訓，我們籲請不要再搞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動。對於改革過程中所出現的不同意見應當以民主的、討論的方式謀求一致。我們認為每個人都應當有平等的權利公開發表自己的見解，包括申辯的權利，黨和政府有義務保證這一權利。
- 我們相信絕大多數中國大陸留學生、進修學者和愛國華人都會和我們有同樣的要求和願望。

中國大陸留學生及海外學者（簽名）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日

從學生運動談大陸新聞自由問題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劉衛民

中國大陸幾十個城市的大學生，在「一二·九」紀念日前後舉行的旗幟鮮明的要求民主的示威運動，震撼大陸的集權專制社會，也震撼了世界輿論。這次席捲大陸的民主運動，學生們首次提出了一個振奮人心的口號，那就是「強烈要求新聞自由」。這個偉大的口號使大陸的民主運動更加深入、更加具體化了，這是射向集權專制社會的一把利劍。

正是這把利劍的威力，使中共當局嚇得胆顛心驚，不但沒有半點改進新聞一言堂的可悲局面，反而在這次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中表現得更加專制和獨裁。大陸的新聞媒介一邊倒地對這次偉大的學生運動進行封鎖、控制，即使最後在世界輿論的壓力下和在民衆的強烈要求下，迫不得已的報導也是顛倒是非，蠱惑人心，繼續充當專制社會的打手。當「北京日報」拙劣地扮演這個丑角，斥責、恫嚇學生的民主運動時，富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北京大學的學生們，憤怒地焚燒了「北京日報」，充分表達了學生們對新聞不自由的嘲諷和控訴。爭取新聞自由成了中國學生民主運動中一項新的主要奮鬥目標，這對中國朝着民主社會邁進是個劃時代的舉動。

實行「新聞一律」的悲劇

新聞事業肩負著任重道遠的責任，攸關人民大眾的視聽，攸關社會的進步與落後；無論是報紙新聞，或電視、廣播新聞的處理，都要

求新聞媒介公正、客觀、多元化。新聞自由也可說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民主的試金石。凡實行新聞自由的國家，都會給這個社會帶來文明、進步，同時又充滿活力和朝氣。

反觀中國大陸的新聞事業，被視為黨和國家的專政武器，而排除了新聞在政治上的制衡，在經濟上的商業作用。大陸的新聞事業完全是中共的喉舌，必須按照中共所設置的各種清規戒律而運作。三十六年來，大陸的新聞事業完全由一黨控制，中共領導反復強調「就是要新聞一律。」胡耀邦在一九八五年又重申「新聞必須一律。」大陸的新聞媒介統一在一個口徑上，在中共的指揮棒下，千人一面，千口一言地呆板，機械地緊緊追隨中央，誰敢違抗，無情撻伐，慘酷清除。在這種集權專制政體下的新聞事業是非常可悲的。我們看到獨裁的黨犯錯誤，新聞界也跟着犯錯誤，中央說假話，報紙也跟着說假話，每個大陸人都為之而深受其害。大家都清楚地記得，三十多年來，報紙可以根據中央精神任意胡說八道，什麼「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敢產萬斤田。」「十五年趕上英美。」「大批判帶來了大變化。」「大學就是大家學。」「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狠批精神污染，促進人的思想革命化。」「要中國的現代化，不要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等等，說假話、說大話、說空話，是大陸新聞界的一大特產，導致這樣不斷發生的悲劇的根本原因是「新聞一律」。新聞是黨的宣傳工具，黨不斷犯錯誤，新

聞界也不斷犯錯誤，人民也跟着遭殃，國家也動盪不安，這是專制社會的一大特點，也是集權國家的必然產物。

在這「新聞一律」的控制下，大陸的新聞界經過一番奮鬥，要想有所突破，也最多只能批評社會風氣，而絕不能批評政府和黨的政策。這樣，就使政府和黨的官僚機構沒有人民的任何形式的監督。隨着新聞自由的呼聲日益高漲，也有的新聞機構敢冒險跳出來說幾句真話，但定將遭來橫禍。大陸一家全國性報紙在一九七九年支持青年廚師陳愛武揭發商業部長王磊在豐澤園（餐廳）白吃白拿，醜聞見諸報端後轟動全國，引起中共官僚們一陣恐慌。國務院一位副總理壓抑不住內心的憤怒，在一個群眾大會上說：「告訴這家報紙，我也在豐澤園吃過，我還要去吃，又怎麼樣！」這是公開地向人民示威。在專制社會下，這些官僚們把人民根本不在眼裏，對自己控制的報紙絕對只准搞一言堂，誰敢犯上作亂，當然是自取滅亡。哪家敢於摸老虎屁股，批評中共官僚的報紙也為此吃盡了苦頭，隨後也乖乖地成了小綿羊，百依百順，俯首貼耳了。

這次大陸的新聞媒介對學生的民主運動也照樣採取「新聞一律」的做法。這些官方新聞突出學生運動中的一些過激行為，說外人混水摸魚；甚至譴責「美國之音」和台灣國民黨政府的煽動，掩蓋了學生要求加速改革的愛國熱情，和爭取民主、自由的各項要求，甚而借用鄧小平對「北京之春」的專斷撻伐，指責學生們擁護黨和社會主義為口是心非，欺騙、愚弄民衆，再一次充當了鎮壓民主運動的急先鋒。但是學生們不是好欺負的，北大學生勇敢地焚報抗議，這是對新聞不自由的抗議。

更可笑的是中共當局指責「美國之音」和

「自由中國之聲」挑唆學生鬧事，更是暴露了其獨裁、專制的嘴臉。十幾億大陸人在自己的國土上看不到報紙、電視對學生運動的真實報導，而只有借助於外台廣播來了解、證實，這只能說明新聞不自由的黑暗。中共當局居然還要出來抗議，沒想到這只能在大陸人民心中留下更多的不信任的陰影，在世界輿論面前更加暴露自己的醜相。

開創多元化的新聞自由局面

要開展民主運動，喚起人民真正當家做主的意識，必須運用新聞這個強有力的武器。有了新聞自由，公正才能發揚，正義才能伸張，是非才能辨明。要達到這樣的民主環境，應由社會上不同利益的團體來作多元的解釋。要做到這種多元解釋，就必須廣開言路，實行新聞事業民主、自由、多元化。

新聞媒介的民主、自由可分為兩類，一種是中立性的態度，一種是參與式的態度。中立性的態度是指大眾媒介報導新聞時，持消極處世的态度，在報導時採取客觀超然的態度，其原則是不歪曲事實，意見充分發表，自由爭鳴。美國為此做出了示範。美國的新聞事業是這個國家機器的一個有效的制衡系統，它起到了促進社會進步和繁榮的強有力的作用，被人們光榮地稱為「第二政府」。美國的新聞自由，有憲法保障，通過法律的不同規定予以貫徹。美國有名望、成功的大報，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都採取客觀態度，他們的立場不是政黨、政府的立場，而是代表作者的立場，代表報紙的立場，獨立性很強。最近幾月來全美新聞機構揭露政府賣武器給伊朗的醜聞，以及無情地批評總統應承擔責任，就是一個

頗有說服力的例子。試問中國大陸的新聞界敢有這樣的立場和為國家、人民負責的精神嗎？！回答一定是否定的。美國新聞界力求多元和客觀，崇尚民主、自由、人權，真正成為與人民群眾不可分離的知心朋友。

參與式的方式則是指新聞報導所展現的是較主觀，涉入新聞事件之中。不同的新聞媒介各有其不同的特性。這種方式主要是與政黨掛鉤，歐洲和第三世界一些國家以此為模式。首先是在新聞自由的前提下，每個政治集團均可利用大眾傳播媒介將自己的立場、觀點告訴大眾，當然這就不免有偏頗、扭曲事實的傾向，但在多元化的爭鳴過程中，合理的、進步的輿論總是會被人民接受，為政府所採納的。我們不可能亦不應該要求所有的新聞媒介都採取中立的態度，一個有新聞自由的國家應當是多元化的、立體的報導態度。

當前大陸面臨政治體制改革，而新聞自由則是其中必須考慮的一項重要機制。首先要革除「新聞一律」這一嚴重阻礙社會向前發展的弊端，必須實行多元化的新聞自由局面。黨內外應一視同仁都可自由辦報刊，人民群眾理所當然地可參與新聞事業，真正起到監督國家機器的作用。大陸應該儘快制定符合民主、自由精神的新聞法，而絕不可能是什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中共一手操縱的新聞法。在屬於人民的新聞法的約束之下，活躍新聞事業，發展新聞事業，真正出現一個「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只有這樣才能對政府、對各黨派起到有效的制衡，社會才能走向文明與進步。

開放報業是當務之急

值得慶幸的是大陸學生勇敢地提出了新聞自由這一中國人長期不敢喊出的口號。要讓民主運動進一步深入，要讓神聖的口號變為現實，就必須儘快爭取開放報業，打破一黨獨霸新聞事業的天下，讓人民群眾自覺地走到這個舞臺上來。

中國歷史上與旺盛發達的時代恰恰是與廣開言路不開的。春秋時期，百家爭鳴，言路廣開，百業興旺，整個社會充滿着朝氣和活力。執政的中共當局應當看到，在經濟改革走進死胡同，社會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民主運動深入人心的歷史關頭，應該順應這個歷史潮流，開放報業，為這個急待振興的中華民族打開一個百家爭鳴的新局面。在這場偉大的變革中，中共當局應勇於正視時局，改造自己僵化、過時並且早已被實踐證明走不通的陳腐體系，學起科學和民主這兩面旗幟，那麼將會給這個民族帶來轉機。如果中共當局一定要一意孤行，繼續推行封建專制的一套把戲，相信十幾億中國人民是不會沉默的。青年學生已經走上了街頭，就是中共當局發出了所謂的「十條」禁令，富有獻身精神的學生無所畏懼地依然衝上街頭，甚至衝進了天安門廣場，抗議專制，要求民主自由，這一偉大舉動令全世界人民深深敬佩。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的高潮已經來臨，希望海外華人，尤其是大批留學生應該站出來，肩負起民族振興的重任，想一想上海人民廣場和天安門廣場上在寒風瑟瑟，警察監視下的成千上萬的高呼民主自由口號的大學生們，我們還有什麼理由不付之於行動呢！每個中國人都來積極聲援、支持大陸的民主運動，爭取大陸的新聞自由，屬於我們中國人夢寐以求的和平、民主、自由的文明社會就一定會早日到來。

學生運動不應抓工人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秦 俠

轟動了中國和世界的大陸學運，引起各方輿論的緊張關注。人們普遍擔憂的是，中共會否對學生運動腦火而忍怒不禁，改採高壓手段阻止學潮。迄今為止，除了官方報紙的立場日見強硬外，中共並未長期關壓被逮捕的遊行學生。北京市公安局在元旦期間曾逮捕一些學生，但在學生們的抗議下，第二日便予釋放。但奇怪的是，北京、上海、蕪湖等地，竟有十數名工人被捕，筆者認為，這是十分不恰當的舉動。

務必尊重法律的嚴肅性

這次要求政治改革的學潮，既不是工人引起，也不是以工人為主流的，僅在各處學生遊行時，有許多工人和市民圍觀，並隨隊遊行。如果遊行過程中有個別違法分子，亦不可能只是工人羣衆，學生難道就沒有越軌行為？可見這並非成理之詞。當局抓起工人，是一種「牆頭起火，殃及池魚」的歪打辦法，不僅於事無補（並未起到「殺雞儆猴」的作用），反會引起工人羣衆的委曲與不滿，鬧不好可能引起廣泛的怠工甚至罷工，影響國家的經濟建設。所以，我以為不抓學生是應該的。但不抓學生反抓工人，就顯得十分沒有道理。憲法規定了公民有遊行的權利，並未說這種權利只給予學生，不給予工人。學生可以遊行而工人就不可以遊行。這又是一種變相的唯成份論作祟，而無

視法律的嚴肅性和平等性。奉勸中國當局不要以某種動機或心態，對工人羣衆過份嚴厲，以免因不公平而引起工人的不滿，擴大事態。

中共唯恐學運擴延

社會各階層

當局對工人參與遊行特別敏感，採取嚴厲的管制措施，其用意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要防止這場學潮從學校擴大到社會的各階層去，特別是擴大到工人和工廠企業中去，那將會引起整個社會的動盪以及使國民經濟蒙受損失，這樣的想法，處在當局的立場上，固然是情有可原的。但是，筆者不認為工人羣衆就因此而不許享有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

城市經濟改革出現許多始料未及的麻煩和問題，如物價問題，獎金發放問題，都給大陸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很多困擾；各地的黨政幹部假改革以營私，官僚主義猖獗，更是引起廣大工人和市民的普遍不滿情緒。因此，當學生們示威遊行時，許多工人和市民在一旁喝彩，甚或加入遊行隊伍，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所以，解決問題、平息民怨的根本辦法，在於中共如何突破城市經改的瓶頸，切實搞好改革，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對於改革遭遇的困難，如果中共以民主方式，把難局向人民交代清楚，想必人們是會通情達理，體諒政府的難處的。反之，如果中共把心機放在如何阻撓人民發

洩不滿情緒上，如在學運中嚴懲參與的工人羣衆，甚至破壞法律的嚴肅性和平等性，那是十分不智的，只能使民怨深積，形成負面的破壞力。願中共對此危險傾向能夠有所悟察，儘快改變不當作法。

領導階級名存實亡

共產黨的理論歷來認為，工人階級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階級，是最大公無私的。但是，在中共建國後的三十多年裏，由於政治不夠民主，經濟建設又搞得十分糟糕，工人階級根本沒有成為什麼領導階級，主人公的地位更是因黨的官僚主義作風而大打折扣。實際上，黨政幹部以權謀私，形成了高高在上，脫離人民的新階級，遂直接造成了中國社會的發展緩慢，產業工人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力受到壓抑。而這次學運中高層領導居然對工人的參與從嚴懲處，實在是對中共無產階級專政的莫大諷刺。這難道不值得革命一輩子的中共領導人們引咎自責、捫心自問嗎？

人民議政權利、渠道極待改善

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如何居於領導地位，的確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帶普遍性的課題。在一黨獨政的中國，這個問題很難得到圓

從胡耀邦去職談今日之鄧小平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宋佳佳

滿的解決。然基於現實，筆者還是希望中共能夠在未來的政治改革中，著實地對「人民的主人公地位」加以改善，如人大代表的選舉方式，工會的獨立性問題，工人罷免不積極的領導幹部等。在這些方面，還是有許多它國經驗可以借鑑的。譬如，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委員會

，就享有很大的獨立性和權利，可以選舉和罷免工廠的領導。波蘭的團結工會，亦可直接同政府交涉不同的政見（由於蘇聯的壓力，已成非法）。西方國家的工會組織，也反映了社會的民主程度。

中國領導人欲推動中國走向經濟現代化，

近年來以鄧小平預定的接班人自承、並被人們看好的胡耀邦先生辭職了。海內外驚訝莫名，一片嗟嘆之聲……。

中國民聯負責人在去年歲尾就大陸學潮所作的形勢估計中，曾指出這一運動有可能導致中國高層某一派系的代表人物倒台。

言猶在耳，胡耀邦先生已不復是中共總書記矣！

筆者無意捧中國民聯負責人為先知先覺，而是希望指出，在中國大陸那樣一個一黨專制的人治社會裡，政治鬥爭的起落和政壇人物的浮沉是有前車之鑒可考的。今天中南海裡發生的宮廷鬥爭，正是毛澤東臨終前最後一次交接政治權力棒的翻版。

衆所周知，毛澤東先後樹立又打倒不止一位政治接班人。及至「毛澤東時代」的最後階段，由於沒有真正中意者，這位年過八旬的病夫只得勉力玩弄平衡權術，對務實派周恩來、鄧小平和激進派王、張、江、姚皆又拉又打，而自己則居於一言九鼎的家長地位。到了舉世震驚的「天安門廣場事件」爆發，毛澤東終於徹底淪為與人民為敵的獨夫民賊，把當時萬眾

歸心的鄧小平掃下台去……。

歷史是一面鏡子。我們不難發現，今日之鄧小平業已成為已故毛澤東的轉世化身。他在黨內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玩弄平衡權術，而自己居於一錘定音的地位（其權威地位遠遠不及毛澤東，實不能也！）。當舉世矚目的大陸學生運動洶湧澎湃地展開之時，鄧小平終於將其共產黨人的歷史局限性暴露無遺，把黨內較具溫和色彩的胡耀邦掃下台去……。

幾年來，海內外對鄧小平推行的種種改革措施寄予厚望，對鄧公身後之事做出種種估測，却鮮有人指出鄧公「堅守最後一班崗」對於改革本身的危害性。

毛澤東晚年多次宣諭「安定團結」的指示，沒有理由認為這是他的違心之言。然而，恰恰是毛澤東本人的存在，構成了當時政局最不穩定的因素。今日之鄧小平時時高唱「改革」之調，沒有理由認為這是他的欺人之談。然而，恰恰是死抱著「四個堅持」不放的鄧小平本人，構成了今日中國實行更深層次改革的最大阻力！

我們要問：何其相似乃爾？！

就不可避免地要調動全國人民的政治熱忱和創造力，放寬對社會的政治控制，出現反對聲音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正確對待之。無論學生、知識分子還是工人羣衆，都有權過問國家的事情，監督黨和政府的政績，這是中共需要接受的一個現代化觀念。

我們自答：毛澤東和鄧小平雖有五十步與百步之差，本質上却無不同。他們都是注定要帶着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的共產黨人。儘管由於所處年代及自身稟質不盡相同，毛澤東和鄧小平的許多做法大相逕庭，但就其最終目標而言，却只有一個！那就是要實現共產主義……

今日之鄧小平，猶如昨天的毛澤東，業已站到與人民為敵的立場上去了。

馬克思在其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說過一段名言：「據說，歷史有時會重覆兩次——一次是作為悲劇的英雄；另一次是作為笑劇的丑角。」（註）

鄧小平昔日被毛澤東罷免，他是悲劇的英雄；

鄧小平今日罷免胡耀邦，他是笑劇的丑角。

如果我們把注意力僅僅放在鄧氏、胡氏或者其他中共大人物身上，必然會感到悲觀無望。所幸，「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他們能夠載舟也能覆舟，他們將決定未來中國的命運。

註：身在新大陸，難閱馬列書。這段話是憑記憶寫出的，可能個別字詞有出入，但大意絕無差錯。

學生運動與體制改革

(中國大陸研究生·美國) 金戟



上海人民廣場上的學生遊行隊伍

正當國內政治體制改革之潮濤聲鼎沸、激浪空前之時，近月來，又不斷傳來各大城市學生運動風起雲湧、騷動不息的音訊。海外華語輿論界、乃至整個世界輿論界都對其投之以極大的關注。傳聞與猜測當然如期而至：認為「學生們受人利用，又一次充當了政治鬥爭之犧牲品」者有之；認為此次學潮「乃中國專制政體全面解體之先兆，改革必導至天下大亂」者有之；認為「學生運動打亂了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正常步驟，授柄於保守派，不利於改革順利進行」者有之；甚或認為「學生運動乃係國民黨特務參與謀劃，與台灣當局不無關係」者亦有之。猜測與傳聞顯然都離不開猜測者、傳聞者政治與意識形態上的立足點與出發點，因此很難避免主觀發揮或以偏概全。

筆者以為，考察與分析當今中國的學生運動，如果忽略了當今中國之整體社會背景是不可思議的。我們知道，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運動之前，中國無任何自發的羣眾運動，更無學生或市民上街遊行之類的舉動（當然指反政府傾向）；十年內亂期間，遊行、示威之事當然不勝枚舉，但那一次遊行都是所謂的「響應號召」之舉，其實質是受人奴役與利用，充當他人政治鬥爭的工具，而非人民羣眾有意識地、自覺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是一次重要的轉折，其主要標誌就是示威、聚會或遊行等不再是響應某些

個人的「號召」、「號令」，成為少數人權利意志的外化，而是一般的學生、工人、市民等自發地行動起來，不平則鳴，言出肺腑，表達自己的願望，抒發自己的心音，行使自主的權利。「四人幫」倒台後，隨着「思想解放運動」與對外開放、體制改革的開展，整個中國大陸逐步全面進入了一個「人的自覺」的時期！即一般民衆，尤其青年一代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主體與個體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人天生的權益與選擇的可能。從西單民主牆，到北京各高校的競選人民代表，乃至去年北大、人大等之高校學生的「九·一八」運動，都是這種一旦醒來，就無法再昏睡的民主意識的寫照。

然而，世界上許多國家「民主運動」的血之經驗表明：若無社會體制的變革，若無健全的法制保障，民主運動很容易為專制、獨裁者浸於血泊之中。這樣的先例比比皆是，遠的不說，七十年代末以「西單民主牆」為標誌的民主運動的結局，就是一次自身的現身說法。但今天中國的特殊背景在於，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結構激烈變動的時期。尤其是今暑以來，政治體制改革在當局的積極倡導之下搞得如火如荼！各種「過激」的言論頻頻出現在官方報刊上，諸類政治體制改革專題討論會此起彼落，乃至連實行「兩黨制」

、「多黨制」、「取消四個堅持」、要求「言論出版完全自由」等一年前尚屬禁忌的命題也變得司空見慣，不足為奇；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之下，學生們上街遊行，表示一點熱血青年的憂國憂民之心，當然是極為自然，極為正常，極為順理成章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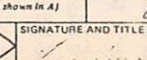
因此，此次學潮之席卷全國，乃屬自發與自覺的民主運動，是中國大陸實行對外開放與體制改革，必然，是一般民衆尤其是青年一代民主與自由意識普遍覺醒的表現。理當視為中國社會生活有可能步入民主化正軌的良好開端。

基於這一點，筆者以為，如果大陸當今的當權者真有誠意（而不是「葉公好龍」）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實現社會生活的真正穩定（而不是虛假的、表面化的「穩定」）真有誠意把中國建設成爲一個「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現代化強國，就沒有理由害怕包括當前學生運動在內的任何民主運動，就不應當把自己置於民主運動與民衆相對峙的位置上，而應意識到學潮乃是體制改革的必然，是社會生活正常化的標誌。

當然作爲一個建立在數千年封建廢墟上的國家，要能做到上述各點並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民主傳統不是虛構的神話，不可能於一夢之間變爲現實。在這個漸進、有時甚至於徘徊的過程中，先覺者有時是要付出代價的。據報導，上海已有參加遊行的學生被起訴；北京也發生了武裝警察拉成人牆，阻止學生們去市中心遊行的事件。然而，統治者須知：一堵牆，不管是人牆、石牆，還是鋼絲、鐵網，都是無法阻擋滾滾而來的民主之潮，無法阻擋奔騰呼嘯的歷史前進之巨浪的。閉關鎖國已遭擯棄，專制獨裁更會失去民心。當今世界，畢竟是科學

技術與人的思想觀念高度發展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了，使用暴力壓制民主運動，是與對外開放、體制改革無法相容的。早在我國的春秋戰國時代，著名政論家與改革家韓非子就曾以「守株待兔」的寓言告誡處於動盪與變革時代的統治者：不要墨守傳統的統治成規，而要隨時代之變化而變化，他指出：「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對於當今中國大陸的當權者們來說，對於學潮以及一切民主

運動的明智態度，顯然這是一種時代與歷史的必然，更是當前中國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必然，從而尊重、珍視並保護青年一代的憂國熱情，充分張揚民主與自由之風，並在此基礎上不斷健全法制，保障社會民主生活的正常化，保證整個改革真正走向深入。若反之，仍將學潮與民主運動視爲洪水猛獸，因而對其施以暴力，只能失去民心，失去社會體制改革的良好轉機。

U.S. Postal Service STATEMENT OF OWNERSHIP, MANAGEMENT AND CIRCULATION <small>Required by 39 U.S.C. 3685</small>		
1A. TITLE OF PUBLICATION CHINA SPRING	1B. PUBLICATION NO. 07358237	2. DATE OF FILING Sept. 30, 1986
3. FREQUENCY OF ISSUE MONTHLY	3A. NO. OF ISSUES PUBLISHED ANNUALLY 91,000	3B. ANNUAL SUBSCRIPTION PRICE US\$ 24.00
4. COMPLETE MAILING ADDRESS OF KNOWN OFFICE OF PUBLICATION (Street, City, County, State and ZIP+4 Code) (Not printers)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Queens		
5. COMPLETE MAILING ADDRESS OF THE HEADQUARTERS OF GENERAL BUSINESS OFFICES OF THE PUBLISHER (Not printers) Ditto		
6. FULL NAMES AND COMPLETE MAILING ADDRESS OF PUBLISHER, EDITOR, AND MANAGING EDITOR (This item MUST NOT be blank) PUBLISHER (Name and Complete Mailing Address)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EDITOR (Name and Complete Mailing Address) Mr. Wang Bing Zhang P.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Y, NY 10185 MANAGING EDITOR (Name and Complete Mailing Address) Mr. Lam Hew San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7. OWNER (If owned by a corporation, its name and address must be stated and also immediately thereunder the names and addresses of stockholders owning or holding 1 percent or more of total amount of stock. If not owned by a corporation, the names and addresses of the individual owners must be given. If owned by a partnership or other unincorporated firm, its name and address, as well as that of each individual must be given. If the publication is published by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ts name and address must be stated.) (Item must be completed.)		
FULL NAME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COMPLETE MAILING ADDRESS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8. KNOWN BONDHOLDERS, MORTGAGEES, AND OTHER SECURITY HOLDERS OWNING OR HOLDING 1 PERCENT OR MORE OF TOTAL AMOUNT OF BONDS, MORTGAGES OR OTHER SECURITIES (If there are none, so state)		
FULL NAME	COMPLETE MAILING ADDRESS	
9. FOR COMPLETION BY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UTHORIZED TO MAIL AT SPECIAL RATES (Section 423.12 DMM only) The purpose, function, and nonprofit status of this organization and the exempt status for Federal income tax purposes (Check one)		
(1) HAS NOT CHANGED DURING PRECEDING 12 MONTHS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2) HAS CHANGED DURING PRECEDING 12 MONTHS <input type="checkbox"/> (If changed, publisher must submit explanation of change with this statement.)		
10. EXTENT AND NATURE OF CIRCULATION (See instructions on reverse side)	AVERAGE NO. COPIES EACH ISSUE DURING PRECEDING 12 MONTHS	ACTUAL NO. COPIES OF SINGLE ISSUE PUBLISHED NEAREST TO FILING DATE
A. TOTAL NO. COPIES (Net Press Run)	7,583	8,000
B. PAID AND/OR REQUESTED CIRCULATION 1. Sales through dealers and carriers, street vendors and counter sales 2. Mail Subscription (Paid and/or requested)	3,820 1,572	3,813 3,258
C. TOTAL PAID AND/OR REQUESTED CIRCULATION (Sum of 10B1 and 10B2)	5,392	6,071
D. FREE DISTRIBUTION BY MAIL, CARRIER OR OTHER MEANS SAMPLES, COMPLIMENTARY, AND OTHER FREE COPIES	1,192	1,177
E. TOTAL DISTRIBUTION (Sum of C and D)	6,584	7,250
F. COPIES NOT DISTRIBUTED 1. Office use, left over, unaccounted, spoiled after printing 2. Return from News Agents	1,000 509	750 512
G. TOTAL (Sum of E, F1 and 2 - should equal net press run shown in A)	8,093	8,512
11. I certify that the statements made by me above are correct and complete	SIGNATURE AND TITLE OF EDITOR, PUBLISHER, BUSINESS MANAGER, OR OWNER 	

PS Form 3526, Dec. 1985

(See instruction on reverse)

中共改革派所面臨的抉擇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史華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國大陸的學生示威遊行活動，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短短十幾天裏，十餘座大城市裏成千上萬的大學生，冒着凜冽刺骨的寒風，走上街頭，高呼「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等口號，要求中共迅速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這一行動，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和廣大人民群眾對於過去幾年裏中共領導所搞的「經濟體制改革」進展之緩慢以及所暴露出的種種弊病的強烈不滿，表達了全中國人對於進行徹底全面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迫切願望。面對人民群眾的這一合理而正義的要求，中共的改革派們將採取什麼態度和行動呢？

回顧過去八年的歷史，可以看出，中共的改革派一直在進行「兩條戰綫」的鬥爭。一方面，他們要利用人民群眾的力量，打擊中共內部的保守派，為「改革」掃除障礙。另一方面，他們要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專政工具（主要是警察和宣傳機器），打擊、鎮壓人民群眾尤其是知識分子中的「過激分子」，以免使「改革」偏離他們預定的軌道。一九七八——一九八〇年間，中共改革派利用「西單民主牆」所代表的民主運動，清除了以華國鋒、汪東興等為首的「凡是派」。緊接着，改革派封閉了「西單民主牆」，逮捕監禁了魏京生、王希哲等民主運動活躍分子。並且，鄧小平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並把它寫進了「憲法」，取消「憲法」中關於「四大」的條款，以後又掀

起「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反精神污染」等運動。與此同時，改革派首先在農村，然後在城市進行了一系列的經濟體制改革。客觀地說，這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尤其是在農村更為明顯。然而，隨着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鋪開，改革派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這些壓力來自兩個方面，即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人民群眾和黨內的保守派。

由于中共改革派在改革理論上的根本缺陷，他們所搞的「改革」產生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在政治上，中共改革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核心是中國共產黨一黨掌握政權，這就剝奪了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大眾民主參政的權利。如果一九四九年以後，共產黨的確代表了全國人民的利益，的確有能力領導人民建設一個繁榮富強的新中國，那麼中共一黨專制還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必定會得到人民的擁護。然而，三十七年來的中國歷史證明，中共一黨專權給中國帶來的是政治腐敗、經濟貧窮落後、文化凋零（當然，與世界上任何一個搞和平建設的國家一樣，新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這些成就距離人民群眾的要求甚遠）。人民群眾尤其是知識分子強烈地意識到，如果繼續搞一黨專權，他們就無法監督國家權力的正確實施，也無法抵制和糾正中共的錯誤領導。因而，人民群眾強烈要求在中國實行民主政治制度，實行真正的普選制，要求有民主參政的權利。這就是去年十二月學生示威遊行的主要原因。

其次，在經濟理論上，中共改革派搞的是所謂「雙軌制」。一方面，他們要搞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和私有制經濟；另一方面，他們又不能完全拋棄舊有的計劃經濟和一公

有制」經濟。從好的一面講，中共改革派搞的這種「雙軌制」混合經濟模式，是希望既保持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又學到資本主義經濟的長處。然而，這兩種經濟體制在理論上是不相容的，實踐上則是兩種體制的弊病大行其道。中共一搞「擴大企業自主權」，各個企業頭頭就不惜損害國家的利益，以謀求自己企業的利益。濫發獎金，偷稅漏稅，鑽兩種體制的空子進行投機倒把，哄抬物價，貪污腐化，大搞特權，這些現象風靡全國。其結果是極少數掌握政治經濟大權的人，發了財，而多數人民群眾尤其是知識分子相對貧困化。這些問題怎麼不使廣大群眾感到憤怒？他們當然不願意倒退到改革以前的那種經濟體制，因為歷史證明，舊的經濟體制只會帶來貧窮。要使中國富強，唯一的出路是徹底拋棄過去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資本主義經濟。

然而，中共的保守派却站在與人民群眾相反的立場。在政治上，他們在共產黨一黨專制這一點上完全是和改革派穿連襪褲的。但是，保守派反對幹部體制的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反對擴大地方和企業的自主權和廠長責任制，尤其反對私人經濟的發展。他們一心嚮往的是「文革」以前的「太平盛世」，竭力想回復到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制。在思想文化領域，保守派一直堅持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一切，鼓吹「愛國主義」、「民族化」和「中國精神文明優越論」，大肆叫嚷「反對全盤西化」、「防止西方腐朽沒落文化的侵入」。批判人道主義、「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精神污染」等運動就是保守派支持一部分改革派幹的。如果說保守派一點好事都沒幹，那可能有點過分。由保守派所控制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除了尋找藉口打擊

改革派人士外，的確也整了一些損公肥私、違法亂紀和胡作非為之徒。然而，保守派的最終目標，是使中國恢復蘇聯模式的「正統社會主義制度」，因而，總的來看，他們是在開歷史的倒車。

面對人民群眾要求進步、保守派要求倒退的巨大壓力，中共改革派怎麼辦？擺在他們面前的有三條路。第一條是倒向保守派，鎮壓青年學生和人民群眾的民主運動。這樣做的結局不僅將會使中國歷史暫時倒退或停滯，也必定斷送改革派的政治生命。因為改革派起家的本錢就是搞改革，他們的基礎是支持主張改革的知識分子和人民大眾。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保守派全面復辟，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人必定會像納吉、杜布切克那樣上斷頭台。

第二條道路是「舉起右手鎮壓學生運動，舉起左手逼保守派讓步」，也就是繼續搞「兩條戰綫」作戰。問題在於，在新的形勢下採用舊「法寶」，它仍然會像過去那樣靈驗嗎？中共一直牢牢掌握着強大的專政工具，要強行把學生民主運動鎮壓下去是不困難的，儘管已不如當年封閉西單民主牆、抓魏京生那麼容易。可是，要削弱保守派的力量就很難辦到，這是因為現在的中共保守派遠遠比當年的「凡是派」強大和有力量。當年的「凡是派」多是文革中飛黃騰達的暴發戶，只是一些沒有根基的「空軍司令」。現在的保守派是中共內部從中央直到基層由于共同的既得利益糾集而成的一大幫人馬，其中有在黨政軍中央機構仍然大權在握的老保守派，近年來由于幹部體制改革而退居二線的大批幹部，還包括相當一部分新上台的新保守派，這是一股相當強大的政治勢力。改革派一旦失去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的支持，不僅打不倒保守派，反而會被保守派吃掉。其

結果仍然與第一條道路一樣，使中國的歷史發大倒退。

但是，無論是第一條還是第二條道路所帶來的歷史倒退只是暫時的，不能持久的。因為，堅持進步和改革的人民群眾的力量日益增長，其增長速度之快遠遠超過保守派力量。我們只要回顧一下過去幾年內保守派種種倒行逆施的短命生涯，對比一下八五年一九·一八—北大學生遊行和去年十二月全國學生運動的規模和政治口號的變化，不難看出中國民主進步力量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成長壯大。如果說，迄今為止，公開起來以和平手段反對保守派的主要還是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學生，那麼一旦中共改革派與保守派同流合污，那時候席捲全國的風暴則遠不僅是青年學生的示威遊行，還將出現大規模的工人罷工、市民罷市、農民抗稅，以至于部分軍人的武裝造反，中國將再一次出現大動亂、大分裂和大流血，整個中華民族將付出慘重的代價，而中共保守派和改革派也將被徹底埋葬！這一幅可怕的圖景，望中共改革派們三思。

改革派的第三條道路是，認清歷史發展的方向，順應民心民情，依靠人民大眾的力量，清除或削弱保守勢力；在政治上廢除中共一黨專權制，實行民主政治；在經濟上廢除計劃經濟體制，大大削弱「公有制」或「全民所有制」經濟，鼓勵私有制經濟的發展；在思想文化領域採取更為開放更為自由的政策，切實保障各階層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只有這樣，中國才能走上現代化的康莊大道，中國共產黨才能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改革派才能作為中華民族的有功之臣而載入史冊！

孰利孰弊，何去何從，望中共改革派三思而後行！

學運的啓示與歷史的沉思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楊漫克

一九八六年末，一場浩大的學運，顯示了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大變革的時代。儘管這次學運是一次自發的、沒有組織和政治綱領的、缺少行動方略的、甚至有人說它是激烈浪漫的、幼稚衝動的、暴起暴落的群眾性運動；儘管它以推動政治改革的純正目標開始，以中共改革派遭到整肅、改革中挫這樣一個「幫倒忙」的結局而告段落。但是，它就像歷史上的五四運動、一二·九學潮、和天安門四·五運動一樣，對現代中國的意義，是深遠的，難以估量的。學運造成的政治影響、動態的效果、正反兩面的經驗教訓、以及可能引起的中國社會政治結構的長足的變化，都是值得人們加以記取和總結的。而從歷史發展的趨向上看學運，將可對它有一個時代感的了解。

民主趨勢成為中國政治主線

從鴉片戰爭使中國面對世界，面臨了西方新型文明的衝擊和威脅起，中國的朝野上下、知識分子以及億萬民衆，便一直爲民族的復興、國家的趨強而求索，直至今天。在這百多年的歷史裡，出現過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共產黨革命以及中共和國民黨政權下的一系列民主運動，中國人民進行了無數種嘗試和不屈不撓的鬥爭。

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強權政治和殖民時代的世界環境裡，中國政治的主線，一直是民族的生存和獨立，而民主、自由、人權等現代文明的理想，一直處於次要地位，服從於民族主義的神聖使命，不能成爲中國政治的主流。加上中國農業社會的貧窮落後，中國一直做爲專制政治的溫床，亦是一個十分合理的現實。在帝制消亡、軍閥割據的亂世裡，中國產生出兩個學生的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前者則試圖建立極右的德、意式的獨裁政治，後者則試圖建立極左的、蘇俄式的專制政體。結果，在戰爭與革命風靡的時代潮流裡，命運的陰差陽錯，使中共的蘇俄式革命佔了上風，在大陸建立起共產黨的專制政權。

戰後的世界，經過五十年代民族獨立和東西方的冷戰後，出現了一個長期的、漸強的整體緩和趨勢，全球各種發展層次的國家，或多或少地都實現了經濟的增長，並由此而引起社會結構的變遷。到了七十年代，便導致各國政治由專制向民主的演變。而這一演變，在亞洲、太平洋經濟起飛的國家中，尤其明顯和迅速。中國大陸，經過毛澤東時代的鎖國和文革的專制瘋狂的浩劫後，也在鄧小平新體制下開始實行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力圖使中國大陸步入現代化的國際社會，並以此而挽救三信危機下的中共政權。然而，在這項政策推行了

不到十年的時間裡，一個令中共政權不期而至、爲之驚恐的民主、自由傾向，便迅速地出現在神州的地平線上。這個現代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已使中共處於欲進又止、欲罷不能的窘境。中共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極權合璧的專制政體，正面臨着一場新的較量，一個時代發展必然出現的挑戰。在這個挑戰面前，中共或者經歷一次自身的演變，放鬆對社會的控制，或者放棄現代化宏願，退回到俄式正統的計劃經濟模式中去。而這後一個選擇，由於面對着一個民主變革的世界和一個一個民智漸開的中國，似已成了一條中共不能選擇的回頭路。總之，隨着歷史的進化，民主政治的趨勢，已經成爲中國向前發展的主線。這次波及全國的大學潮，清楚地顯示了這是一個不可抗拒的趨勢。

民主意識的社會認同 與歷史增長

回顧中共建國後三十七年的歷史，民主與專制的鬥爭，也從未停頓過。其中，較重要的幾次運動有：五七年的大鳴大放和後來的「反右」運動，文革後期的天安門四·五運動，以及七九年北京的民主牆運動。將本次學運與以往的歷次運動加以比較，可以看出中國社會已經發生巨大的變遷和全社會民主意識的增長。每次運動的政治背景、社會條件和民主力量的主流角色，都有明顯的變化。

在五七年大鳴大放和反右運動時期，中共正處於春風得意的鼎盛階段。中共結束了與美國對峙的朝鮮戰爭，在蘇聯援助下順利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整個社會相當穩定和繁榮。至今許多人還喜歡回憶那段太平歲月。於是，中共在沾沾自喜中，對政治和社會的控制亦有

了放鬆的趨勢，毛認為人民內部矛盾，已取代了階級矛盾，而成爲社會的主要矛盾。共產黨號召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向黨提意見。結果，民主黨派的梁漱溟、羅隆基、章伯鈞等人提出了「政治設計院」和各黨派輪流執政等民主要求，觸犯了共產黨的戒律，便立刻掀起了反右運動。除了民主人士外，大批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都被劃成右派。其實，當時具有民主意識的民主黨派人士，是少之又少的。而在擴大中劃爲右派的青年，如王蒙、劉賓雁、林希翎這些人，都堅信共產主義，只是對官僚主義流行表示些不滿而已。民主思想在當時的中國，是微乎其微的，民衆是虔誠擁護共產黨的。

文革後期的天安門四五運動，則是人民對毛澤東五人幫的倒行逆施忍無可忍，於是起來反抗，並要求被打倒的鄧小平、彭真等人出來執政。儘管運動中也有反專制、反暴政的口號，但是並沒有人提出西方式的民主思想概念。說到底，四五運動仍然是一場反貪官、擁清官的運動。由於十多年來社會處於左傾極端上，當時不可能提出任何違背馬列正統的主張，而只能採取「打着紅旗反紅旗」的策略作法。所以，在政治主張上，民衆覺悟上，這次運動很難稱得上是一次民主運動。

七九年，中國社會經歷了文革後的大逆轉，被打倒的「右派」和「走資派」被平反，正醞釀着從「凡是派」手中奪取中央的權力。社會上，共產黨在民衆中的威信降到了最低點，出現了「三信危機」，人心思變。於是，在知識分子和城市工人中間，湧現出一些民主啓蒙者，如魏京生、王希哲、徐文立等。他們以大字報和自印的刊物來宣傳民主、自由和人權的現代觀念，尤以北京西單的民主牆最爲著名。這場運動由於得到鄧小平、陳雲等「在野」的

遭到整肅的劉賓雁(下)
與王若望(上)



共產黨人的支持，加之當時北京滯留着數萬的各地訪群眾的參與，一度聲勢浩大。但是，民主意識在當時的廣大民衆中尚未及形成共識，連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階層的參與者也甚清寡，故社會基礎極其有限，遂又被鄧鎮壓下去。但這場民主發軔的運動却代表着一個時代的潮流，喚醒了社會各階層的民主意識，它深深影響了中國後來的政治發展。

鄧小平體制確立後，爲了挽救共產黨(這一點值得強調)，鄧小平推行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政策，使中國投入了經濟現代化運動。這項政策，一方面，使共產黨喪失了的威信有相當的回升；另一方面，由於致力於現代化的改革本身與現行政治體制之間有着根本上的不相容性，從而引發了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新呼聲。與以往不同的是，這種呼聲不僅來自知識分子階層和社會上的廣大民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共產黨內的高層改革派，這是過去的民主

運動從來沒有過的現象。如果對近年來中共的組織路線加以分析，人們是不會對此感到奇怪的。

黨內外民主成份及可能走向

首先，一大批五七年的右派和文革的走資派平反後，佔據了中共黨的高層領導崗位。這些人中的很大部分，意識到了中共統治的脆弱性和危機，希望適時地改變共產黨，使之加強民主化的成份。如此次遭到整肅的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都是五七年的右派；如胡耀邦、萬里、朱厚澤等改革派人士，都是文革中受到衝擊的走資派。他們雖然不希望共產黨垮台，但希望它脫胎換骨，變成民主的開明黨。

其次，由於經濟現代化的需要，大批的知識分子被吸收到共產黨內，在思想、文化和教育領域得到重用，如文化部長王蒙、科技大學的方勵之、科委主任宋健等。這些知識分子不是黨幹出身，馬列正統意識不強，思想較第一類人要開放。他們傾向於西方的民主制度，希望中國搞全盤西化和資本主義經濟。他們多爲中共改革派的智囊，對改革派思想造成很大的影響。

復次，開放政策推行的八年中，也產生相當大的社會積澱作用。隨着與外界的交往，西方現代社會的各種觀念在中國社會傳播開來，從比基尼泳裝、股票交易，到多黨制和新聞自由，凡外面有的，中國人都在談論。而擁有四千萬黨員的共產黨，是中國社會的一部份，同樣置身於西方現代文化的衝擊中，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這是就整個共產黨的狀態而言。所以，這一次以大學生爲主體的民主運動

，並不是一場普通的學潮，而是整個社會正在醞釀的大變革，從敏感的青年學生中發生的預示性悸動。從民眾到知識分子，從共產黨到軍隊，新舊勢力的衝突已經十分尖銳，正等待着最後總爆發的時機。這個時期，可能在鄧小平逝世之後，亦可能因某種因素的觸發而提前出現。

再次，中共對有影響的持異見的知識分子精英的管制能力，也見削弱。如五七年劃成右派者，或者在原單位被管制起來，或者流放到邊遠地區，根本無法再產生社會影響。但八二年的清污和這次整肅受到打擊的知識分子，其政治威信迅即上升，社會影響亦無法消弭。這種「越批越香」的現象，表明中共對社會的極權控制已十分薄弱。長此以往，遭到整肅出黨而又無法限制其影響的聞人逐漸增加，可能就會形成一種共產黨外的政治力量，與中共抗衡。中共對持異見的知識階層和社會精英的政策，經歷了社會管制（文革前）、納入黨內（文革後）兩個不同的階段，而未來可能的情形是，由共產黨分化出來的政治精英形成黨外政治勢力，形成新的政治格局。

改革失敗中共亦難挽救

「歷史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共產黨政權今日面臨的新舊衝突的危機，與清朝末年戊戌變法前後的歷史變故，頗有類似之處。

一八九八年，光緒皇帝看到了清廷統治面臨的危機，在康、梁改良派的輔助下，決意維新變法，改革政治體制。由於新法觸動了清廷貴族的既得利益，遭到了以慈禧和榮祿為首的守舊勢力的殘酷鎮壓。守舊勢力儘管得逞於一時，終不能阻止舊制度崩解的趨勢。戊戌變法

失敗三年後的一九〇一年，親手廢掉新法的慈禧太后，又不得不拾起光緒及康、梁設立的新政，立憲法、開議會，被迫推行了政制的改革。然而，僅僅三年，清廷的信譽喪失殆盡，挽救清廷的措施已時不我予，滿清政權不久便在辛亥革命中覆滅。

中共改革派推行的改革，面臨着同樣的瀆結。中共在文革浩劫後痛定思痛，於崩潰的邊緣力圖挽救中共政權。這個舉動，曾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中國人民也曾給予這場改革莫大的期望。共產黨的威信，有所回升。改革推行八年至今，由於遭遇了政治體制瓶頸無法突破，政治體制改革遂迫在眉睫。然而，由於政制改革將觸及中共統治階層的既得利益，導致黨內保守勢力的激烈反對，黨內兩派的矛盾日趨尖銳。同時，整個社會也幾乎同聲要求政制改革和民主。無奈，這場要求民主、力推政治改革的學運，却導致關鍵人物鄧小平態度轉變，黨內保守派對改革派進行了整肅。

可見，鄧小平和共產黨此次因學運而對知識分子和黨內改革派的整肅，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與民意和時代潮流背道而馳的政權，將很難維持長久。即使中共在不久的將來，意識到危機的嚴峻而再度進行挽救政權的政治改革，也可能為時已晚，無可奈何矣！人民在無望的時候，將可能作出任何方式的選擇。清廷因變法失敗而傾覆就是一個很好的歷史之鑒。

中共的整肅將負沉重代價

這次整肅，從眼下看，至少造成下述幾個嚴重後果：

(一)改革遭遇挫折、難於繼續。即使鄧小平認為，這場對自由化知識分子和黨內改革派的

整肅，不會影響改革政策，然局勢已十分清楚，黨的高層的調整將使整個開放和改革受到影響而倒退，未被整肅的改革派如趙紫陽、胡啓立等，將被保守派束縛而無所作為，也可能是第二批被整肅者。

(二)中國的國際信譽下降，世界對中國的改革無望。中國現代化極需的外資，因政局的變動而不敢投入。

(三)鄧小平的個人威望暴跌，人民對中共不再寄望。此次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整肅，同五七年反右如出一轍，民心大喪，社稷傾危。特別對劉賓雁這樣的民望極盛的人加以整肅，勢必引起廣泛的社會怨氣。鄧小平在文革後竭力重建的中共威信，一朝即毀。

四九七即將回歸的香港。民心浮動，資本外流。台灣的和平統一亦會因此次政治危機而成泡影。台灣人民將不願意相信中共所作出的任作承諾，自決與獨立傾向將上升。

政局反轉和動亂

從長程的政治發展來看，不外乎下述兩種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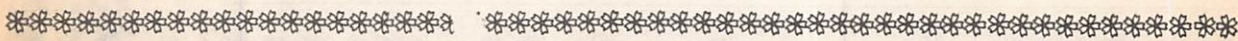
(一)失勢的改革派捲土重來。在適宜的機會與條件下，如改革徹底失敗，天下大亂；再如鄧小平身後，民運再起，改革派會乘勢接管權力，清除保守派，徹底改造共產黨，繼續改革。此次遭到整肅的領導人和知識分子，肯定在民眾中成為英雄式的人物，聲望大增，對他們的批判將遭群眾抵制。他們只是暫時失勢，日後必會東山再起，復得權力。鄧小平就被整肅過三次，反而建立了個人政治聲望；劉賓雁、方勵之等也是第二次被整肅。而胡耀邦此次失勢，反會因禍得福地成為未來可能的領導人。

原來只靠鄧小平扶持，則很難避免鄧小平死後的權力之爭，也難操勝算。歷史上，任何極權政治的領袖人物的逝世，都會引起極化的政治局勢，向另一極端搖擺。斯大林、毛澤東死後莫不如此。

(二) 社會出現動盪，中共政權失控。改良不成則勢必引發革命，這是歷史反覆證明過的。改革失敗則中共政權既難於維持下去。中華民族長期生存在極權政治之下，養成一種雙重的民族性格：即一方面具有極強的忍耐力，另一方面又有極強的革命性。人民總是對統治者極力容忍，達到忍無可忍程度的時候，則爆發革命，推翻統治者的政權。中國人在歷史上推翻過二十六個王朝，在世界各民族中是罕見的。歐洲中世紀八百年間，只有一個教皇三個王朝。所以，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妥協的民主政治文化，很難在以暴易暴的中國社會裡積累起來，這種雙重的民族性格，是重要的緣故之一。

群眾運動在高壓下可能暫時平息，但很快即會以更大的聲勢出現。保守派的黨中央體制，很難渡過四月的清明節，預計在這一傳統的事變日子裡，如有猛烈的群眾運動，政局會再度動亂。毛澤東時期那麼嚴酷的政治環境下，都難於阻嚇住民衆，而今日的中國人民更非昔日可比了。熟悉大陸政情的人們，普遍感到現今的形勢很像文革後期七六年的社會狀況，而鄧小平似乎正在步毛澤東的後塵而「晚節不保」。當中國的權威人物過世而中共又信譽掃地時，民意則會決定中國社會的走向。今天被整肅的改革派人物，則勢必成爲社會潮流的代表。

毛澤東在生前曾明智地作了一個預言：他死後，右派要翻天。這個預言已被證實。今天，不知鄧小平是否會產生相同的預感。那就是，他死後，中國的民主派要翻天。



● 文藝園地 ●

情歌兩首

(美國) 巴江

一、初遇

我爲什麼要重新歌唱？
在我心弦上，
充滿成人的憂傷。

因爲我相信妳是真的。
像金子一樣真實；
像早霞一樣輝煌。

我曾有過多少次幻想？
但全都是
折斷了的翅膀。

在淺藍的微波上。
站着的妳，
酒滿了金色的朝陽。

敞開窒息的腔腔，
妳走了進來！
顫抖的心要放聲歌唱！

一九六七年五月於廣州

二、重逢

十二年，
只是日曆輕輕翻過。
十二年，
只是一個無底的夢。

當我掘在那褐紅的山崗；
蹲在濕暗的牢房；
月夜，
疾走在山間的羊腸……

妳躑躅廣州街頭，
游移着那迷離的目光？
還是像隻籠裏的夜鶯，
躲避灼人的日光？

我們間，
只殘留着短詩幾行？
只像那
過去了的時光？

……

西沉了，
「那不落的紅太陽！」
我行立在西太平洋，
還是極目向你張望。

初冬的海風，
能否把我的呼喚送放？
聖誕老人，
會否長着一顆月老的心房？

成堆的郵信，
變成七四七的翅膀。
巨鳥馱負着雨中的彩虹，
妳終於飛越大洋！

我貼近妳的面龐，
翻閱那歲月的風霜。
輕嘆命運的無常，
再不能高聲歡唱。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子夜雨中於美國



爲了民主必須付出代價

李台彥譯

(譯者按) 本文係西德明鏡週刊(DER SPIEGEL)駐中國大陸特派員 STEFAN SIMONS 先生訪問兩位參與一九八六年底、一九八七年初中國大陸學生示威活動的學生領袖的一篇訪問稿。基於安全的考慮, 本文隱去受訪人的真實姓名, 而僅用「陳」、「李」來代表兩位受訪人, 「記」代表記者。本文原文刊載在明鏡週刊一九八七年第三期上(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二日出刊)。

記：集會、標語、示威的大學生，出於對官方傳播媒體的不滿而焚燒報紙，這些是不是意味著另一次新的文化大革命的開始？

陳：不，從前是上面操縱的派系、路線鬭爭，這一次我們要求的是民主。二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介於毛澤東、鄧小平和劉少奇之間的鬭爭。

李：這一次的出發點不同。這一次的動機是和我們切身相關的新聞思想自由和人權，另外還有對抗不但阻礙改革、箝制人民自由而且特別可惡的官僚主義。

記：官方的傳播媒體責怪你們散播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思想。人民日報甚至用多年不見的語調來提醒階級鬭爭的必要性。年紀較長的知識份子都嚇壞了。

陳：這是共產黨的老調。他們希望藉此一方面來嚇阻老百姓，另一方面來對學生施加壓力。中國大陸不會再發生文化大革命，但是共

產黨正是利用老百姓這一種對文化大革命的恐懼心理來壓制這一次的示威活動。因為從前的種種運動也都是從北京大學開始的。

記：中共一再宣稱，這一次的學生抗議行動完全是台灣的地下工作人員和「美國之音」煽動的。

陳：這些根本是無稽之談。中國大陸的大學生既不笨也不會輕易地被人誘拐。這樣的說辭無非只是要騙騙那些無知的老百姓罷了。

記：很顯然地，他們也達到了目的。大部份的民衆對你們的示威都沒什麼好感。

李：他們都被官方的宣傳所矇蔽。官方的傳播媒體只報導消極的影響，對積極的影響却隻字不提。

記：有積極的影響嗎？

李：有的，人們的意識已經有所轉變，這是一種轉變是擦也擦不掉的。種子已經播下去了。

記：中共指責你們挑撥離間，破壞團結、安定，違反了「四個堅持」。

李：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事實上大部份的學生並不反對這些。我們在乎的只是改正錯誤和社會主義異化的問題。我們真正關心的是未來的改革和它所隱含的最重要的內容——如何對抗官僚主義的問題。

陳：對於這一點我有另外的看法：我認為，不論是對國家或者對黨，「四個堅持」都是最大的障礙。如果取消「四個堅持」我們的國

家便可以發展得更快。在本質上，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相當進步的理論，但是問題就出在它被官僚主義騎在頭上。共產黨的領導其實就是一黨專政，目標呢就是獨裁專制。

記：多黨制在中國行得通嗎？

陳：不可能。至少在未來的幾十年之內不可能。

李：這並不是眼前的問題。眼前的問題是，由於長久以來受傳統封建主義的影響，現在的做法是黨說的就算數。我們年輕的這一代對民主有所瞭解，我們認為，在這一點上，共產黨的做法是不對的。

陳：即使是八十年代的中國，也一直依然是封建主義的延續。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只不過是多加蓋了一頂社會主義的帽子，從封建主義社會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這只是一個天生不足、早產的社會。正因為如此，整個黨以某一個人的意志為意志。現在站在政治舞台上的鄧小平，就什麼都照著他的意思做。從前在毛的時代則什麼都得聽他的。俗話說：「狼和老虎那個壞？」鄧小平還是總書記胡耀邦？口口聲聲說集體領導，他們還不都是同一夥的。

記：目前有其他的選擇餘地嗎？

李：沒有。如果較年輕而且受比較多教育的幹部能夠逐漸地接替老幹部的職務，情況大概才會有所改變。但是這也不容易，因為年輕的幹部也都是老幹部們親手挑選的。可是也有例外，比方說，大元帥陳毅的兒子，現任北京市的副市長陳昊蘇不但受過高等教育，而且也是頗有前途的接班人。將來的領導幹部最好都是像他這種人。

陳：所以每次有老幹部去世，我就很高興；因為這意味著，我們又多埋葬掉了傳統裡的

中國之春月刊·1987年3月·總第45期

一份腐朽。

李：這樣子的說法不太公平。雖然那些老幹部跟不上改革的地步，但是他們也有一定的歷史價值。改革必須一步一步來。所以，我們並不要求馬上實行多黨制，這太不現實了，我們要求的只是最起碼的民主自由。現在中國老百姓最大的願望就是除去中國的官僚主義。

記：你們的要求並沒有什麼新奇的，可是怎麼突然上街遊行起來了呢？

李：我來說明一下前因後果。事情是從安徽省開始的。合肥工業大學應該選出兩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可是這兩位代表的產生並沒有經過選舉的程序，而是由校方直接指派的。學生們知道了這一件事情之後認為，這兩位代表並不可能成爲他們的代言人，替他們爭取權益，而且，爲什麼學生們不能享有選舉權。起先這一件事情只是在學生之間引起了激烈的討論，但是還沒有達到公開上街遊行的程度。

記：這是十二月初的事，可是學生的抗議行動又怎麼蔓延到上海的幾個大學呢？

李：是透過合肥大學方勵之教授在上海同濟大學的一次演講。緊接著，上海的公安警察在一次搖滾音樂會上逮捕了六位青少年，報紙說他們是滋事份子，於是情況起了變化，變得有些緊張。在一次談話裡，方教授要求副總理萬里做更多的民主改革。萬里說：「我已經給你們足夠的民主、自由了。」方教授馬上拍桌子反駁說：「什麼叫做足夠的民主？你這個副總理的職務還不是靠老百姓的幫忙才弄到的。爲什麼老百姓就不能享有更多的民主呢？」

記：萬里不是屬於改革派嗎？

陳：要是萬里經過深思熟慮，或許他就不會這麼說了。可是從萬里的談話裡我們就可以

看清楚政府是怎麼想的。這並不是說他笨，而是他根本腦子裡沒有半點兒民主的觀念。方教授最近也因爲這一件事被開除了黨籍。

記：學生的抗議行動又是怎麼蔓延到北京大學的呢？

李：原因之一是受上海示威行動的影響。早在一九八五年的秋天北大就曾發生反對日本經濟侵略的抗議活動。然後再加上對校內改革的爭執。

記：示威活動是誰組織的呢？

陳：沒有人。完全是自動自發的。

記：那學生們又如何知道其他城市的動態呢？報紙都沒有報導。

陳：我們各個學校的學生團體彼此都有聯繫。

記：可是這些學生組織不都是在黨的控制之下嗎？

李：沒錯，可是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基本上，黨領導共青團，而共青團又控制了學生聯會。學生聯會專門舉辦舞會和文化活動，他們從來不敢參加政治方面的討論會。於是在這一方面便產生了其他的學生團體。

記：高幹子弟在這一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嗎？

陳：他們在群眾的眼裡是什麼？是狗屎！大家對他們都很反感。

記：在上個星期你們的示威之後，對於你們的要求你們有沒有什麼斬獲呢？

李：可惜沒有。相反地，政府管得更嚴。北京市政府公佈了十項規定……

記：……，對於示威活動的新規定。

陳：不錯，這一項公告的目的就是要封住人們的嘴巴，要壓制學生的示威活動。

記：學生的集會帶來了什麼樣的效果呢？

陳：我個人覺得，總得有人挺身而出，來喚醒大眾，認真思考我們所提出的要求。否則的話，他們永遠也不會去思考這些問題。

記：前些日子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說，參加示威遊行的學生在數量上還不到全國大學生總數的百分之二，他們所代表的只是極少數人的意見。爲什麼學生的抗議行動這麼孤單、無助呢？

陳：當然，比起中國八億的農民人口，學生只能算是少數團體。但是我們可以因此就說學生的要求毫無意義嗎？政府當然會說學生沒有資格代表全國人民發言。

記：你們自認是在爲全國人民發言嗎？

李：我們至少是在爲知識份子講話。

記：爲什麼工人和農民不加入學生的抗議行列呢？他們不贊同民主嗎？

李：在全中國仍然缺少民主的觀念，即使是大學學生也不例外。大部份的大學生在思想上和工人、農民一樣的落伍。

陳：事實上，中國向來採行的都是愚民政策，知識水平不高的人，關心的只是個人的生計。

李：爲什麼北京的工人不參加示威遊行？他們不敢。工人們的政治意識並不比我們差。他們有他們的經驗和感受，同時，也有他們自己另外一套的表達方式。

記：好像也沒有大學教師幫你們講話。

李：他們心裡很清楚，但是不說出口。他們心裡明白，學生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不敢講。他們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都被迫害過。中國共產黨怎麼整人，他們最清楚。

記：一九七九年的民主運動被中共鎮壓下去，一些當時的領導人物都被捕入獄。像魏京生現在仍然被關在牢裡。

李：但是他們都已經逐漸地被人們淡忘了。

記：你們不怕也有同樣的遭遇嗎？

陳：爲了爭取民主一定要有人流血犧牲。

記：聽起來很激昂慷慨……。

陳：事實就是如此。國家有難，一定要有人挺身而出。假如沒有人願意流血，那人們將不會清醒。而面對這一種危難，光靠個人的力量也是無濟於事的。

李：歷史上的每一次運動，學生總是站在第一線。學生並不是天不怕、地不怕，而是學生比較沒有後顧之憂，可以堅持自己的原則和理想。

陳：換句話說，學生比較有犧牲、奉獻的精神，正如俗話所說的：「初生之犢不怕虎」。

記：雖然不怕虎，只怕不久就要被帶去屠宰場了。那二十四位被捕的學生可有消息？

陳：他們可苦了，將來前途一定受影響，也不可能入黨。想出國唸書？門兒都沒有！

記：現在各大學都開始期末考試了，緊接著是四個禮拜的寒假。這一次的學生抗議活動

就這樣告一個段落嗎？

陳：只是一個小段落，而不是整個民主運動的結束。

李：這一次的學生運動是多年來不斷發展的結果。長久以來中國的知識份子不時地自問：中國向何處去？大家都認爲中國沒有前途。再加上現實生活裡的種種問題、物價上漲。所以，這一次的學生運動正是一種普遍不滿心理的集中表現。

記：以鄧小平領頭的改革派做得還不夠多嗎？

李：太少了。

記：你們覺得鄧小平這個人怎麼樣？

李：在所有中共的政治領導人物裡，他算得上是最聰明、最進步的一個，但是却不是最好的。我們覺得他沒做多少事。中國現在根本沒有好的領導人物。

記：假如中國明天舉行自由選舉，鄧小平會贏嗎？

李：當然會，因爲沒有其他候選人。但是時代在變，中國需要新人，我們總不能老是換湯不換藥吧。

搶新聞的訣竅

西方記者杰克住在王府井的北京飯店。他突然聽說安徽合肥學生舉行遊行，便搭火車趕到了合肥。結果沒有搶到新聞。又聽說武漢學生在關示威，於是飛機趕往武漢，結果又落在別的記者後面。又傳來昆明的學生在關示威的消息，他又趕往昆明……，這樣，他一連跑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楊漫克

通中國十幾個城市，總是搶不到頭條新聞，於是詛喪地回到北京飯店，當杰克向飯店小姐訴苦時，小姐教給他一個辦法：「哪裡還沒有學生示威，你就去哪裡守待，准能搶上頭條新聞。」

杰克聽罷連連讀道：「訣竅！訣竅！」

自由

一九六八年作於獄中

李伯特

何爲苦？

失却自由奴。

古來豪杰丟妻小，

中外英雄拋頭顱，

皆爲自由故。

樂最甚，

莫如自由人。

五洲若無文字獄，

四海擺脫奴隸魂，

勿將自由扔。

(一九八三年，個人曾將最後三句改爲：「欲使
香江無苦水，安得港島絕怨魂？勿將自由扔。」)

星星

鐵欄外一顆明亮的星星，
像寶石般閃爍迷人。

它每夜都對我親切招手，
想喚我和它一道前行。

多少個痛苦的失眠之夜，
伴着我的只有這顆星星。
它常常在我身邊低語，
那聲音親切而又知情：

飛吧，展開你矯健的翅膀，
飛出那黑暗而恐怖的牢房，
讓我們一同去尋找光明，
尋找那充滿自由和善良的地方。

● 文藝園地 ●

「輿論」能製造嗎？

王若望

編者按：中共中央已在一月十四日正式開除「作協」理事王若望的黨籍，神州大地又是一片肅殺之氣。但王若望究竟犯了什麼錯？現本刊轉載他於去年十二月廿七日



王若望（右）及劉賓雁（中）及王若望的妻子羊子

在「團結報」上發表的「輿論能製造嗎？」一文。讓讀者們看完之後能夠深思：「王若望真有錯嗎？」

「輿論」是社會公眾對周圍發生的人和事的評價，也就是「民意」。按照唯物論的認識論的解釋，「輿論」是客觀存在的羣體觀念，檢驗這種觀念的正確與否只有一個標準，那就是「民意」對客觀現實的反映如何。客觀事物是黑是白，是馬是鹿，是由事物的屬性決定的，所以誰也不能製造，更不允許摻進個人主觀成分。我們通用的「製造輿論」、「大造輿論」，另有其含意，是指服從一時的政治需要去大肆宣傳而言。

過去流行過這樣一段很權威的話：「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作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通行多年的「製造輿論」與「大造輿論」便是脫胎於此吧。

這段話只說對了一半，其中「總要先作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這在推翻一個政權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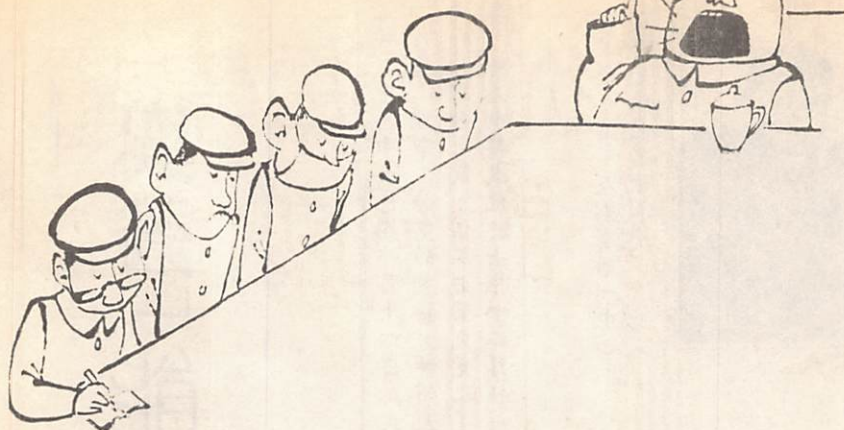
或之後都是適用的，但把意識形態方面的作用未免強調得過份，而忽略了它的先決性條件。列寧對此倒提出了這樣的條件：一個是統治階級已到了不能再維持其統治，一個是人民已普遍不能忍受這樣的統治，並有了打碎反動的國家機器的決心。我國推翻了國民黨反動統治，就符合列寧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論斷。當然，「先作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對於發動民衆、鼓舞士氣、堅定信心是不可少的，可說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不是首要的作用，更不是決定性作用（先要有江河，有水有波，才談得上推波助瀾）。上述這段話原只適用於反動統治被推翻之前，如果一直貫串和平建設時期，就會導致不抓人民生活和物質生產，只抓意識形態和「大造輿論」之類的政治運動；這就犯了戰略決策上的輕重倒置的錯誤。

這種輕重倒置的戰略錯誤，在我黨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已得到了糾正。不過積重難返，長期「製造輿論」和「大造輿論」的作法却延續至今，還被當作金科玉律一樣信奉始終。

像黨中央開了一個重要會議，黨的某領導人發表了三言兩語，或新出一本什麼重要著作，全國報刊接二連三發表態文章，連篇累牘發表二十幾個省市第一書記的表決心談話；鋪天蓋地的標語口號以及層層傳達，民主黨派和知名人士紛紛集會座談等等，竭盡「製造」之能事；以爲這種大雨傾盆的「滿堂灌」後，全黨全民就統一思想、統一行動了。殊不知千百萬羣衆對重複了幾十、幾百次的東西不會重視，甚至是產生了厭倦。那效果好比組織送電影票包場一樣，上邊用心良苦，但看的人很少，羣衆中爲此倒出了這樣的輿論：「公家花了錢，買個不落好。」

有鑑於此，朱厚澤同志對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決議怎麼進行宣傳的談話，一開頭便說：「新聞宣傳工作不要急急忙忙發號召、搞表態，不要在報紙

民主



言論自由

、廣播、電視上大造聲勢，千萬不能刮風。」他的語氣如此堅決。可以看出我們的宣傳部長對「大造輿論」的作法也是很反感的。

「製造輿論」是用「滿堂灌」的教育方法，老師講，學生聽，不能啟發學生自己的想像力，不尊重學生的理解和思考能力，這種教學法早已被淘汰了。把羣衆看成劉阿斗，才需要製造輿論「滿堂灌」，你不尊重學生，學生也就不尊重舌敝唇焦的老師。

「製造輿論」的另一個弊端就是默許和鼓勵宣傳機器可以弄虛作假。既然是「製造」和「大造」，爲了宣傳的實用主義，就可以摻假、浮誇、誑報數字。特別是挑選活的典型，在製造輿論中，人爲樹立起來，正面的典型好麼好上天，而且不許任何人說一個不是處；表揚過的勞模先進也是鐵飯碗，這跟神化領袖相仿，是在同一指導思想下「製造」出來的。所以各級幹部只按上級的意圖行事，看準勢頭予以配合，馬上就能抓出本地區的典型人物來加以證明。誰要是躋身「正面典型」的行列，他在一夜之間就可以紅得發紫，連自己也不知道的事迹全堆到他身上。但這些幸運兒中的好多人並不幸福，在派性鬥爭中，活典型往往成爲殘酷鬥爭的活靶子，弄得頭破血流，左右不是人。若是作爲反面典型被製造出來，那更是大禍臨頭，一切專政手段和輿論工具都對準你來。從巴金在本年（一九八六年）第十期「文匯月刊」上寫的「懷念胡風」一文，可以看出當年如何製造輿論的情景。

重視輿論是民主政治的開明的表現。上文已講了，「輿論」，是民意表達的一種形式，「辭海」裡解釋爲「衆人的議論」。真正的輿論應該是從下邊來，從羣衆中來；但我們却長期把輿論變爲從上邊來，從個別領導人的喜怒

好惡中來了。如果是前者，只須重視聽取、搜集和整理即得，用不著製造的。如果把「輿論」認定只有上邊來的一條渠道，這就把輿論的概念弄顛倒了。這種顛倒就導致了一系列的顛倒效應，由於自上而下的輿論帶有先天的排他性，它容不下別一種的輿論；不論是從羣衆中來，從橫向中來（包括從海外這個渠道），它都會撕下臉皮打擊之，排除之，甚至斬草除根。於是追查呀，株連呀，逼供信呀，「惡攻」啊，鼓勵小報告等等，十八般武藝全用上了。幹這些殘忍的事就是爲了保持輿論的一律，這時，羣衆的輿論不僅聽不進去，而且把羣衆的輿論當成顛覆政權、推倒輿論一律的異己力量。

本來，言論的自由開放，是迅捷、全面獲得羣衆輿論的最有效的渠道；如今把輿論看作是從上邊來，這就在幹部和羣衆中培植了唯上意識，並嚴格控制言論自由。因爲言論自由與上邊造的輿論總不那麼一律，爲了圖六根清淨，只愛聽一個聲音、一句祝辭、一個腔調；這時「輿論」二字已失去了它原有的意義，變成「個人主觀意識」的同義詞了。但是爲了保持「輿論」的外殼，不得不靠人爲地製造舉國響應的效果，實際就是鼓勵大家說假話、表假態。

那麼，基本上的「輿論一律」有沒有呢？有的。用辯證法的觀點，只有尊重和包容羣衆輿論不一律，才有宏觀意義上的基本的輿論一律。（一個國家中，真正的完全的輿論一律永遠不會有。）古語云：「泰山不讓寸土，才能成其高；大海不擇細流，才能成其大。」用排斥「異端」和「唯我獨革」的精神來維持形式上的輿論一律，那不過是唯意志論者的個人妄想而已。

從上海學運 說到謝希德

(美國)李日



謝希德(右二)與作者(左一)家人合影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經由設立於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發難，掀起了中國大陸各地大學生的「反專制，爭民主」的遊行示威，其中以上海的規模最大。學生們聚集於上海人民廣場的情況，美國三大電視系統之一的美國電視台曾在「夜線」(NIGHT LINE) (CENTRAL) 專題報導中作重點播出，而中西報刊圖文並茂的報導也給人深刻的印象。

據報導，上海學生所以如此「豁出去」，除了對中共一黨專制和老朽獨裁的舊恨新仇外，還有各校之間「別苗頭」的可能。憶往昔，上海的學生運動史從來是復旦大學為首，交通大學第二，然後才是同濟大學、光華大學、滬江大學、聖約翰大學等等(後三個大學現已不存在，早在五十年代初被中共或合併或撤銷了)。然而，今次的學潮，却是在同濟大學先動起來，復旦大學和交通大學的學生也許深覺愧疚，來個急起直追，後來居上。由於各校之間的廣泛串聯，上海學運轟轟烈烈、有聲有色，無愧於前輩的學長們。

根據大陸學運蔓延的線索，不少人認為學生們的獨立思考程度，與各校領導人的思想解放程度有關，尤其從中共對學生運動的株連措施見此端倪。首先是中共總理趙紫陽一月八日在北京的一項中央會議中宣佈了中共開除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的黨籍，隨後又發表了將該校校長管惟炎和方氏一同免職的命令。鄧小平更是荒唐，竟以君臨天下，逆我者死的口氣，公然對日本來賓胡說八道，把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三人說成是「壞份子」。因此，不妨可以認為，凡是在這次學運中落後一步的院校，與學校各領導不是「壞份子」有很大關係？！

謝希德是上海復旦大學校長，一九八六年

十一月廿三日晚，我與家人在紐約唐人街一家餐館和她餐敘，隨後我瞭解到：謝女士祖籍福建，其父謝玉銘先生在一九二五年時就獲得芝加哥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著名物理學家袁家驊曾是她父親的學生。一九四六年，她的父親離美，一九八六年三月廿日在台北逝世，其骨灰則運往菲律賓安放。

基於家學淵源，謝希德女士一直從事於物理專業。一九四六年，她畢業於因抗戰而暫遷於福建長汀的廈門大學，隨後擔任上海滬江大學助教。一九四七年她到美國留學，一九四九年在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獲碩士學位。接着就讀於麻省理工學院，一九五一年，她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一九五二年，她回到上海，一直在復旦大學任職。

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革期間，由於她的父親謝玉銘在台灣，她本人曾留學美國等因素，謝希德被管制與審查，受夠了精神與肉體的折磨。一九七三年她獲「解放」，開始帶實用物理學的研究。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垮台後的第二年——一九七七年，以華國鋒為首的中共召開全國科學大會之後，謝希德在復旦大學籌辦現代物理研究室。

一九七八年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後，中共有關人員着手清理冤假錯案，謝氏獲平反，但所謂「結論」，先後做了兩次才選她一個清白無辜，隨後出任復旦副校長。

一九八二年，中共召開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謝希德女士被圈定並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第二年，被任命為復旦大學校長。她在學術界的兼職分別為：中國科學院數理化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主席團成員，上海科學技術協會主席，中國物理學會副主席等。

作為中共中央委員的謝希德校長，每年一

次或兩次出席中共中央全體會議。會後，根據中央全會決策的精神，聯繫她的本職工作，予以貫徹。在每次中央全會上，中共中央委員們都有機會講話，表示意見，但是否為中共中央高層所接納，從而發生效果，就不知了。每次中共中央全會都有一個主題，一九八六年的六中全會的主題是「建設精神文明」，雖然這次會議時間短，但由於準備充分，效率比以前的高。在過去的全會上，中央委員只是分別在小組上發表意見，而六中全會則可以在全體大會上發表意見，但原則上總是少數服從多數。

當我問起關於外傳改革派所提「政治體制改革」在六中全會上引起爭吵，因而擱淺一事時，謝校長說：「當然有人很關心政治體制改革，但這次會議主要談精神文明建設，而不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怎樣改？因國家大，所以應該穩一點。」謝校長的「穩重」於此可見一斑。

謝校長的兒子於八一年獲獎學金，在美攻讀機械工程。兒媳也在美攻讀生物化學。由於講學、參觀或接受榮譽稱號等原因，謝校長多次來美，她對西方的文明和體制不僅瞭解，而且有很深的接觸。至於在她腦海中泛起的思潮是「全盤西化」？「中西合璧」？或者是「洋為中用」，就不得而知了。

寫到謝校長當然讓我想到方勵之，因他們是同行，同是物理學家，在中國科學院同是學部委員，比較一下這兩位學人在中共所謂「開放」中的遭遇，身處海外有所感慨也是極其自然的。就歷史賦予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而論，後人將把謝校長遠拋在方教授之後的原因極可能是：謝希德可能僅只是滿足於中共對她的照顧和安排，而不願懷有高度甚至以犧牲自己為代價的社會責任感。

據稱中國大學實際行政職權的歸屬問題，以前是共產黨黨委掌權；目前是校長掌權，黨委則負責訓練黨員和吸收黨員，進行思想教育。而一般大學校長都是學有專長的科學家。方

●特稿●

支持學生要求民主的運動

——與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商榷（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朱益民

針對近期來全國各地大學生要求民主的示威、集會，據說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在一系列場合發表了關於學生的主要任務是學習的講話。

作為中共中央委員，謝希德教授顯然是按上級旨意，要制止學生爭民主的行動。

如果按謝希德教授的邏輯，學生的主要任務是學習。那麼物理學家的主要任務應該是搞物理囉？作為物理學家的謝希德怎麼當上了中共委員，從政來了呢？

我是復旦大學畢業的，深知謝希德校長是品德高尚的學者，並非為貪圖享受而做官的。我們有些優秀的科學家，他（她）們以拳拳赤子之心，無私地為祖國辛勤工作，學術上造詣頗深，但他（她）們在政治上十分幼稚。當統治者以「安定團結」，「國家建設」等為誘詞，要他（她）們撲滅學生的民主熱情時，他（她）們常常認真地執行上級指示，並以為是為國家做了好事。我想，謝教授就是這樣一位老好人。

我們不會忘記，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當局充分利用了學生的愛國熱情，組織學生拋開課堂學習，參加集會，

勵之雖被整除，但目前仍任校長的謝希德和大陸各院校的領導，我們希望他們能步上方勵之的後塵，完成他所未完成的一切，為人類共同的財富——民主、自由、法治、人權而努力。

遊行。那時，如果誰不參加這種活動，會被說成「政治態度有問題」而遭麻煩甚至迫害。現在，學生們從以往的迷茫中解脫了出來，自發組織示威，集會，要求民主，却遭到官方批評。當政者今天說這，明天說那，完全是為確保自身利益而見機行事。

中共保守派解釋他們的政策的常用的理由是「安定團結」。什麼「安定團結」是一切建設的根本，「消除一切不利於安定團結的因素」等等。孰不知一個社會如人民表達了他們的思想會引起不安定（其實是動搖這個政權），那正說明這個社會的結構本身是不得人心的，是需要修改，重建的，怎麼可以用扼殺民衆言論作為保障「安定團結」的方法呢？

中國長期的專制統治，是因為社會上從來沒有建立起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中共可以用他們控制的宣傳工具為他們的行為辯護，學生就不能用集會來表達他們的觀點嗎（注意：學生是不能公開發行自己的報刊的）？自然科學的發展是靠各種學派的平等競爭。社會問題的討論也應該讓每一方有權平等地參與。學生的集會、示威正是要求對治理國家有發言權。一切希望中國走上民主、強盛之道的人都應積極聲援、支持這種學生運動。

守舊派全面大反撲，中國將有內戰危險

胡耀邦解職失勢，趙紫陽危在旦夕

(國內)
柳平

中南海的新戊戌政變內幕

中國政局在一場學運後出現劇烈動盪。國內很多人把這時的胡耀邦去職，保守派的全面反撲，稱做「新戊戌政變」。這種稱法是將此次政局變動，與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相對比而提出的。從前人們稱改革為「胡趙新政與紫陽變法」。一八九八年光緒在康、梁的輔佐下搞「戊戌維新」，欲圖富強中國。然而，三個月後，因新法觸及清廷貴族利益，遭來慈禧太后與榮祿的反撲。守舊派軟禁了光緒皇帝，處死了「六君子」，康、梁外遁，維新破產。

這次中共改革的失敗，亦是因觸動中共特權階層的利益，守舊強硬的左派軍方與黨內保守派合流，進行了一場全面反撲，迫使改革派敗下陣來，全面否定改革，完全是一次新的戊戌政變。下面我們就國內所見所聞，講講這次政變的過程、背景和做一些概略的分析：

一、軍方早有行動，揚言要「二胡」下台

這次中共改革派之所以一敗塗地，主要是由於軍方左派頭頭組織力量，勾結黨內彭真、陳雲、薄一波、胡喬木等保守派巨頭，暗中結成聯盟，而掀起的一場政變。

在去年九月至十一月，北京的一些軍區大院和軍事機構，便出現一些流言說：「明年非叫『二胡』（即胡耀邦、胡啓立）下台不可。」

「不想這個流言這麼快就應驗了。軍隊領導人早有此心，一直未得機會。我在「中春」雜誌前幾期有過一些報導，四十一期那篇「老將反對胡耀邦掌軍」已講過這樣的問題。

為什麼軍中強硬派頭頭對胡耀邦如此仇恨呢？國內一般人這麼認為：首先，胡耀邦的裁軍計劃，使左派軍頭十分仇恨。八五年四月份，胡在出訪南太平洋的新西蘭時，就突然宣布，人民解放軍要裁掉一百萬。這個計劃和數字，當時連國內的一些高級將領，都不十分清楚。所以胡耀邦作此宣布，遭來軍方很大非議。因為胡的裁軍是為當軍委主席做準備，讓老將們都退休。軍方的老將當然不滿。

第二、胡、趙推行的改革政策，軍方沒有得益，反而觸及了老資格的軍人們的利益。故軍隊一直對改革沒有好感，希望改革停滯或出現混亂，軍隊便可出來「接管」接管權力。

另外，軍隊為了發展勢力，曾幾度想擴大中越邊境的戰事。胡耀邦多次到邊境「慰問」，同時壓制軍隊的好戰情緒，也使軍隊的領導人對胡很反感。

最後，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胡對軍隊的反感亦有所憂慮。故胡便開始插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把這支部隊變成自己的嫡系衛隊，以牽制和防範軍方勢力的威脅。這種作法更使軍方震怒和緊張。

所以，儘管胡耀邦到各地檢閱部隊，慰問

指戰員，還發出號召學習軍隊傳統，「舉行新長征」等，都不能取悅於軍方，而是使他和軍方的矛盾日趨擴大。

二、胡耀邦勸黨內元老下台，引起戒心

胡耀邦在去年十二屆六中全會前後，多次勸黨內元老如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下台，引起中顧委中的許多人反感。去年十月裡，胡耀邦的書記處曾下達了一個文件，範圍是黨內高級幹部，內容是討論黨內元老的退休問題，特別是鄧小平的退休問題。國內個別報紙也跟着討論起鄧小平的退休問題。胡的意思是讓黨的元老們早些把權力交出來，以防將來有權力鬥爭的麻煩。最好在元老們都在時，胡的勢力完全接管權力。這個舉動則觸及了包括鄧小平本人在內的黨內元老們之利益和權威。他們認為胡的行動有些像林彪當年的搶班奪權。故黨內元老們非常惱火，紛紛向鄧小平反映情況，在此次促使胡耀邦下台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三、軍委會議發難

此次政變乃發端於去年十二月十一日至二十五日的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這次會議由鄧小平主持，趙紫陽發表了講話，但胡耀邦

並沒有發表什麼講話。這是因為軍方不喜歡胡對他們講話，據說許多老軍人在胡耀邦出席會議時對他怒目而視。在討論由誰來接替鄧小平軍委主席的班時，出席代表皆表示應由楊尚昆繼任，而不許胡來接這個寶座。

正巧在軍委擴大會議期間，各地學生的示威便開始了。這給予軍方一個巨大的震動。他們很怕胡的力量借民意而鞏固。軍方的政治系統的人，便強烈指責，這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並認為黨內有人慫恿學生的自由化。他們當即串聯起來，並找中央領導人串聯，主要是彭真、鄧小平和陳雲。軍方表示如果學生的示威再不定，軍方便要介入政局，對全國實行軍管。於是鄧小平也就在軍方連同黨內元老的要求下，提出對學運的態度要強硬「必要時可流點血」，要態度明朗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還指責了胡對學運的處理不利。此時，彭真已經完成了軍方與黨內元老的結合工作。在會議結束時，已準備向胡耀邦開刀。胡的命運已經被確定。

四、彭真、胡喬木借機報私仇

黨內的保守勢力對改革的不滿，隨着改革的日漸深入而加強。首先，他們與胡有路線分歧，趨向於計劃經濟，習慣於以專政手段嚴密控制社會。

更重要的是，他們與胡曾結下了很深的個人恩怨。此話怎麼講呢？在前一段打擊經濟犯罪的運動中，許多保守派領導人的子女都不乾淨，許多人成了重點打擊對象。如彭真的女兒傅彥、胡喬木的兒子胡世英等都因憑借老子權力而搞違法亂紀的事，結果遭到打擊。而胡耀邦、趙紫陽的兒女們却都毫無痛腳可捉。所以，彭真、胡喬木等人懷恨在心，這次借機以報私仇，表演得十分露骨。正是胡耀邦領導了打擊經濟犯罪，並指示「不管什麼人，不管誰的子女，有事一律法辦」，這就是有名的北京「打虎」運動。因此，彭真、胡喬木才對胡耀邦恨之入骨，這次矛頭對準胡耀邦。

五、胡耀邦調兵自保未能如願

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軍委擴大會議後，胡耀邦已預感到局勢的嚴峻，會暗中聯絡自己手裡的武裝力量，主要是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和國家安全部系統。

可是，「薑還是老的辣」。胡的行動被彭真察覺，立刻帶領領薄一波、喬石等人到北京武裝警察部隊去安撫，在今年年初召集該部隊領導人開了一個黨委擴大會議。彭在會上大講四個堅持，並影射胡耀邦等黨內改革派領導人支持、慫恿了資產階級自由化，並要求該部隊聽從黨的領導，對無產階級專政效忠，不要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

這樣，胡耀邦手裡唯一可以動用的武裝力量，被彭真給壓制住。同時，國家安全部部长、胡耀邦的下屬賈春旺也被暗中監視起來，可能亦會在此次的整肅中丟官黜職。

如果人們回顧一下「四人幫」七六年倒台的情形，則非常相似。當年四人幫在北京上海等地搞的工人民兵武裝，就是怕毛死後軍隊會支持對立派。胡耀邦近年成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亦是做的同樣安排，以防患鄧小平死後軍隊效忠黨內的保守勢力。遺憾的是關鍵時刻沒有發揮作用，胡耀邦終於因槍桿子的後盾不牢而失去權力。

六、鄧胡之間分歧難平 激烈爭論

在去年底的中央書記處會議和今年元月初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與自己選定的接班人胡耀邦，發生嚴重分歧。鄧要鎮壓學運，整肅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自由化的知識

野心家彭真想架空鄧小平



萬里與胡耀邦共患難



分子，胡則極力諫止，結果犯了鄧小平的「龍顏」，遭到鄧的嚴厲批評。鄧的批評主要有三點：第一點曰胡在黨內拉勢力搞山頭，破壞集體領導的原則；第二點曰胡耀邦鼓勵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犯了嚴重政治錯誤；第三點曰胡迫使黨內元老退休，是一種搶班奪權的行為。

胡在認清自己地位不保的情況下，也不顧一切地直言犯上，與鄧小平發生了激烈爭吵，據說胡在會上講：「我們黨應該到了結束老一輩人控制一切的時候了。」他說老一輩人應當退休讓位，使黨更有活力。胡還強烈反對整肅知識分子，認為那麼做會失掉民心，對黨會有危害。胡說學生運動可以理解，代表着一種自下而上的改革要求。這些看法被與會者群起而攻之，使胡不得不辭掉總書記職務。

七、改革派紛紛表態自保 唯萬里與胡共患難

在會議上，一度盛極一時的改革派陣營發生了破裂。在鄧小平態度急轉的情況下，改革派領導人紛紛表態擁護整肅行動以求自保，胡啓立是胡耀邦一手提拔，這時也不得不對胡反目，與保守派一起激烈批評方勵之等高級知識分子。趙紫陽為求保住經濟改革成果，也向胡耀邦發難批評。

改革派中唯有萬里一人，表示願與胡耀邦共患難。萬里亦不同意整肅的決定，最後在保守派控制了會議形成決議後，只好同胡耀邦一道作了「自我批評」，說自己去安徽合肥做方勵之的工作時，也同意過方的許多言論。故萬里也提出辭職的要求。但辭職的要求被鄧小平拒絕，讓萬里繼續做下去。這是因為萬里屬於元

老圈子中的人。鄧小平在會上儼然以太上皇自居，讓誰幹誰不許不幹，讓誰走誰不得走。

八、軍方胡派不穩， 鄧派楊得志出面安撫

在胡耀邦辭職，政局生變的消息傳出後，全國噪動，一片怨氣。黨政軍高層亦出現人心不穩的狀態。特別是北京以外的幾個省的大軍區，風傳有些軍人要出來打抱不平。胡在八〇年上台後，一直插手軍隊，畢竟有些結果。某些軍區司令和野戰軍的集團軍領導人，是胡耀邦班底中換上的人。他們擔心胡的失勢會使他們一起被牽進去，故胡的勢力所及之軍隊，亦向中央表示不平。鄧小平見狀危險，立刻將楊得志等人派往各地，安撫軍心，以防效忠胡的軍隊發生兵變，導致內戰。

九、除掉胡耀邦鄧已早有此心

一個最令人關注的問題是，在這次解除胡耀邦職務的事情上，鄧小平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和作用？是迫於軍方壓力呢？或是只因學生鬧事胡處理不利呢？還是鄧小平本人早有心解除胡的職務。

一般的估計是，黨內保守派和軍方的壓力是一個重要因素，但鄧小平也早有心想除掉胡耀邦。其原因有兩點：第一、胡曾多次勸鄧辭職，並用文件的方式在黨內高層進行過討論。胡此舉其實意不在鄧，而在於向鄧小平看齊的一批保守派元老。但不想，鄧小平年事已高，頭腦老化，疑神疑鬼，竟認為胡的要求是搶班奪權，像當年林彪對老毛一樣，因此大為憤怒；第二、鄧小平也認為胡耀邦是一個「扶不起



老鄧認為胡是扶不起來的阿斗

的阿斗」，鄧曾講過，他的心願就是在他去見馬克思之後，國家能夠穩定。要使國家的政局穩定，就先穩定軍心。可是，鄧小平發現胡耀邦在軍隊裡的威信很差，過不了軍隊這一關，也就接不了班。如果硬把胡提上軍委主席的寶座，可能就留下一個日後生亂的禍根。故基於此種考慮，老鄧便下決心要換掉胡耀邦，為軍權的安全轉移做好準備。

這樣，主觀的一面加上客觀的一面，則促使老鄧下了決心換掉胡耀邦。

十、趙紫陽目前處境—— 腦袋後面有槍桿

另一個令人十分關注的問題就是，趙紫陽目前的處境問題。北京的各個機關大院，對趙都是這麼看的：趙紫陽在關鍵時刻——政治局討論時，嚴厲地批評了胡耀邦，完全倒向了保守派與軍方聯盟一邊。國內的人們對趙紫陽很有好感，都很能理解趙的處境，認為趙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守舊派的槍口，正抵在趙紫陽的後腦勺上。趙紫陽說什麼或不說什麼，已完全被保守派操縱了。

趙紫陽接胡的總書記一職，也是此次保守派最狡猾的一招。因為趙的權力班底在國務院，在黨務方面根本沒有權力和能力做任何事情，已完全被架空起來，就像元帥離開自己的軍隊一樣。而保守派最終要翻案的，正是經濟改革，胡耀邦不過在那裡喊了一通政治改革而已，實則一着未動；而趙紫陽則是搞了八年的市場經濟，大行資本主義之實。

保守派已經在向趙的國務院班底開刀。如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是為趙紫陽的改革鳴鑼開道的。該雜誌班底即是趙紫陽的喉舌，又是他的幕僚和智囊。趙在政治局會議上，不得不忍痛割愛地提出來，要批判經濟領域裡的其他幕僚中，有嚴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

趙此次的表態與他在八三年「清污」時的表態相比判若兩人。那一次，趙親自去找鄧小平，向鄧施加壓力說，再搞下去就沒有外商投資了，經濟改革會停滯。使「清污」運動搞了二十八天就停了下來。趙在去年四月的「馬丁風波」中，也明確指示，經濟領域裡沒有資產階級自由化。可見趙此次的表態是違心的。是迫不得已的自保措施。

另一種看法是，趙紫陽試圖以在意識型態

上的退讓，來守住經濟改革之成果。鄧力群已經派人接管了「世界經濟導報」等研究機構，等於割掉了趙紫陽的舌頭。至於趙紫陽能否保住經改的成果，顯然是難上加難了，胡趙在改



胡耀邦失勢，趙紫陽唇亡齒寒

革中是唇亡齒寒的關係，胡已失勢，趙亦難保矣！

從改革的實質上看，保守派不僅痛恨胡耀邦，而且也痛恨趙紫陽，因為胡只是煽風的，

真正點火的人是趙，真正推行改革的人是趙。據我們了解，趙的思想是中共領導人中，向西化走得最遠的人，趙的主張，已經完全是西方經濟學的主張，趙的所有制改革，將國營企業股票化，則等於將中國的社會主義斧底抽薪。對公有制加以徹底的改造。這就徹底地動搖了吃大鍋飯的黨官僚們的利益，也觸及了軍方的利益。但保守派沒有當即整肅趙紫陽的原因，一則因為他們同時整肅掉黨和國家領導人，會引起國家經濟政治的一道混亂，天下亦可能大亂；第二、他們想讓人民再抱一點希望，不至迅速唾棄共產黨，以便日後一個一個收拾。趙的前途岌岌可危。

十一、總理人選大角逐成了 權爭焦點

目前由於保守派一舉反攻成功，總理人選呼聲最高的，是他們所喜歡的李鵬。第二個可能人選是田紀雲，但目前局勢田的可能性不大，因為田是趙的長期得力助手，田若上去，保守派架空趙紫陽的陰謀便不能得逞。同時，在過去一個時期的城市經濟改革受阻後，保守派將物價失控、特區失誤等責任，全都推到田紀雲身上，使田的處境很難。第三個人選就是喬石，此人政治態度不明朗，各方都無敵人，是嶄露頭角的一匹政治黑馬。再一個就是壓制學運的天津市長李瑞環。概言之，不管李鵬、喬石、田紀雲誰上去，都會修改趙的路綫。特別是李鵬上台的話，中國的改革就會像蘇聯模式方向轉，那是十分危險的。

十二、胡的大隊人馬將下台 ，威信却大增

一個中共權力鬥爭的不可避免的結局是，

樹倒猢猻散的胡耀邦的共青團系統，科技、教育、文藝界等的人馬將大批地下台。到目前為止已經下台或可能下台的有：中宣部長朱澤厚、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已停職檢查，胡啓立也正在檢查，國家安全全部部長賈春旺將被免職，科學院正副院長盧嘉錫、嚴東生已被免職。

胡耀邦畢竟在權力系統經營了六年，部署安排了很多，故這次的整肅奪權，將是全面性的。這樣大規模的整肅，將像五七年反右和文革一樣，埋下一片復辟的種子，開啓了將來中國新一輪權力大搏鬥的楔子。

一個並不奇怪的現象是，隨着胡被整肅，其威信反而大大提高。原來胡的威信並非很高，大家看不慣「扶不起来的阿斗」，認為胡的領袖風範不夠。但這次的整肅，却使胡成了十足的直言犯龍顏的英雄，富有正義感，力保方劉王，大家知道了胡為知識分子和學生運動講了公道話，好感激增，有人把他樹為新的民族英雄。看來胡在未來中國的政治舞臺中，還是一個重要的角色。過去中共領導人下台，很少有像胡這樣獲得人民的廣泛同情，連海外的留學生都以真名請願聲援。

十三、守舊勢力反攻倒算 全面反撲

隨着胡耀邦的失勢，保守派開始了全面反撲，開始清算改革成果。

在政治上，彭真等人強調黨的領導，各地黨委及政工組整人幹將，紛紛從僵死中復活，躍躍欲試，氣焰囂張。

意識形態方面，胡喬木、鄧力群重新掌握大權，輿論機構一篇接着一篇文章出籠，對知識分子進行批判，清除資產階級自由化。全

國較為開放的一大批報章如上海「社會報」、「科技導報」、深圳「青年報」、「工人報」等紛紛被查禁關門。同時，除方、劉、王等人，一大批主張政治改革、言論開放的知識分子都被迫停職檢查，如福建社會科學院院長李洪林、社科院政治所所長嚴家其、文學研究所所長劉再復、馬列毛研究所所長蘇紹智、作家張賢亮等，皆遭整肅。

在經濟方面，彭真主持了人大代表會議，方向大轉，強調計劃經濟，批判消費主義，重彈勤儉建國，大公無私等文革老調。國務院下達了管制物價的通知。趙紫陽的策劃完全流產，所有制改革被停止；黨委重新全面抓權；剛剛通過的企業破產法被禁止執行；下放到地方的自主權被收回；人代會下達穩定物價的通知……總之，經濟改革的成果均遭取締。

留學政策方面，公派留學已經完全停止，自費留學加強政審，保守派已開始修改對外開放政策，叫嚷「留學政策會使資產階級自由化在中國愈演愈烈，共產黨統治要喪失。」等，神州大地黑雲滾滾，一片風聲鶴唳。

根據北京外交界人士的消息，彭真、陳雲、李鵬等保守勢力，正和蘇聯進行秘密靠攏和交易，甚至傳說他們正在向蘇聯請求經濟與軍事援助，看來整個國策可能會有一百八十度轉變，可能修改經濟親西方政策。

中國的政局已開始動蕩。胡耀邦的下台，可能是中國走向大動亂的起點。北京軍隊的大院開始傳出消息說，軍隊近年新提拔的軍師團級軍官，已開始串聯，一些軍事沙龍已經掛起作戰地圖和軍事地形圖。而不管同情還是不同情胡耀邦，這些年年輕心雄的軍官，已經不滿老軍頭們阻止軍隊現代化的進程和妨礙他們的晉升速度。軍委參謀部的人說，中國可能處於內

戰的邊緣了，他們感到十分憂慮。

政局不穩的最可怕的因素是民心大變，人們已對改革和四化失去信心，也就是說對共產黨不抱任何希望了。中共的政策亂變與統治無能，使人民的耐心和信心全失，人心浮動，人心思變。各省地方官僚勢力採取瞞騙、抵制手段，將大量資金聚在手裡，拒向中央上交，以防天下大亂時本省經濟崩潰。中央亦有人逃離北京，躲避權力紛爭，李先念在上海稱病不歸京城，拒絕參加任何中央會議。

十四、鄧小平成了「毛二世」 ，梯隊接班大混亂

北京的老百姓在此次政變之後，感到政情猶如七六年毛澤東逝世前的情況，他們把鄧小平稱作「毛二世」，因為毛澤東當年搞「老中青三結合」，提拔林彪然後又剷除，後想培養王洪文不成，又把權力給了華國鋒。鄧小平現在也呈現了老化狀態，提拔胡耀邦，自己又將他整肅掉，三梯隊式接班計劃完全混亂，一位中央辦公廳的秘書講，一些有野心的中共實力人物，都紛紛藏起鋒芒，保存實力。他們好像並不想乘亂晉升，因為真正的全力角逐還在後面，現在爭來的權力都可能是白爭，鄧小平死後真正的角逐才會開始。到了那個時候，中央將成為無權的朝廷，軍方及各省的實力人物可能各霸一方。

據悉，劉賓雁已經被廣州軍區的實力人物保了起來，而這次倒台的人，可能都會離開北京，回到自己有力量的省市去「避難」，以圖再逞。未來的中國，可能出現新的諸侯割據的「戰國時代」，中共政權正自己走向危機四伏的懸崖！

台灣回歸者的肺腑言

(美國華僑) 英華

八月中，筆者偕內人回去中國大陸西北旅遊。行程是由香港經北京，乘飛機轉道烏魯木齊，然後沿河西走廊回甘肅、青海，再去內蒙和哈爾濱。

我們的旅遊團抵達烏魯木齊之日，剛巧是「少數民族運動大會」的閉幕之期，祇見烏魯木齊的大道上，裝點得彩色繽紛，許多紅布條的橫額寫滿了「維吾爾」民族的文字，各旅遊區及市區內，很多身穿運動衣及旅遊打扮的人群，景象煞是熱鬧。

當我們去參觀一個葡萄農場時，剛巧與「新華社」的一批年輕記者們遇上了。大家攀談起來，一位記者對筆者說道，這個「少數民族運動會」，有很多少數民族的跳躍射騎表演，錯過了參觀的機會真可惜，他並報導，此次前來參觀運動會的嘉賓，還有萬里副總理、香港知名度很高的霍震霆夫婦，以及一大批日本和台灣遊客等等。

聽說台灣人前來參觀運動會，筆者好奇地問：「台灣同胞能夠組團回來嗎？」他答：「他們是在日本跟日本旅遊團回來的。」

後來我們又去參觀天山麓的游牧家庭，筆者從老遠望見那些羊皮帳幕下，砌了八至十英尺高的水泥台基，發現這又是「樣版」家庭，

好奇之心頓然消失，於是拿着攝影機獨自跑開去拍攝風景照，正在調鏡頭之際，身後忽然走來一位六十開外的漢人，一看他那身裝束，就知道不是從外面到來的人。他詢問筆者：

「兄弟是華僑吧？」

「是。」筆者回答。

「從那裏回來的？」他再問。

「美國三藩市。」

「回來過嗎？覺得祖國怎樣？」

「回來過了。現在很不錯，跟前次回來比較好多了。可是官僚勢力還是一樣的嚴重，這一點都沒改變過。」筆者素來是心直口快的，一開端就觸及到政治問題。

「兩邊比較如何？」他說的「兩邊」當然是指台灣與大陸。

「憑良心說，還是台灣好，不論政治、經濟、教育，大陸還是比不上台灣進步。別小看香港是個小地方，可它的成就比大陸還高呢。不過不管台灣也好，香港也好，都是中國人和中國的土地，我們身為中國人，就希望中國人不再搞內戰，千萬別毀滅了門外那兩個幾十年努力奮鬥得來的成果啊！」

到此再談下去，筆者就明白到這位仁兄先前的攀談不過是「投石問路」，想弄清楚筆者

本人的「政治立場」而已。因為大陸人民到目前為止，仍不大相信「開放」是否是個「引蛇出洞」的陷阱。跟着他就自動講出自己的身世。

「我的父母都在台灣，他們成天嚷嚷要回來定居。」

「你為什麼沒跟他們去台灣？」筆者問。

「現在就讓他們回來骨肉團圓嘛！」

「不，我正在籌劃送孩子去美國留學呢。

自己已經痛苦夠了，他們這麼老為什麼還要回來受這個苦！」

聽他一提起「痛苦」，筆者就敏感到一定又是「文革」的災難。順口就問：「文革時候你進過牛棚吧？」

「這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因為文革沒搞到邊疆來，我才幹過三個月勞動，比起南方的人民，我是幸福多了。我說的痛苦，不是指肉體上的，我是指精神上的痛苦……」

「……」看他有點淒然的模樣，筆者也就默然不再問下去。

他繼續講出自己的身世：「解放前我在北京上大學，我是個社會主義的追隨者，崇敬毛澤東。四八年跟父母去了台灣，我上過台灣大學，因為跟同志們搞政治在台灣待不下去，五年跟好幾位同志回來了。回來以後，國家給我們的待遇很好，本要安排我在文學院當教授，但可惜幾十年過去了，我沒正式幹過自己份內的工作，我的工作都是違反自己意願的。一天到晚就是負責招待台灣回來的同胞。」

「如果你當了真正的文學院教授，說不定已經給鬥死了。現在這個工作不錯嘛，蠻輕鬆的，經常跟老朋友們敘敘，多開心呢！」筆者的本意是提醒他這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哈哈，你說的是。」他苦笑着往下說：

「這幾天因為運動會的緣故，我又去幹這種差事了。一個人，如果終身都不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工作，而且還要經常說違背良心的話，我自己就覺得活着沒意思。尤其那些被招待的人，都跟自己一樣說着違背良心的話，那我們都不像在做人，而像在做戲。你不知道，我一天到晚就聽他們說着相同的話『噯喲！祖國多美喲！我們都想回來定居啦！看你們工作得那麼積極，我們沒回來參加建設祖國，說起來不知有多慚愧呢！』可他們回來吃了最好的，住了最好的，然後拍着屁股又回去過他們榮華富貴的生活了。噢！一天到晚就聽那幾句台詞，

特輯 支援大陸民運·擊潰守舊派的反撲

就國內民主運動 紐約部分中國大陸留學生致北京政府的公開信

中國—北京

黨中央、國務院：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卅日我們中國留美學生八十多人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召開了一次「中國學生民主運動討論會」。會議本着理性、坦率的原則認真討論了目前國內學生運動的形勢及其有關的問題。會議經過充分地討論與民主磋商，由全體參加會議的中國留學生慎重表決，一致通過如下聲明：

- 一、我們中國留學生堅決支持國內的學生民主運動，我們認為學生進行遊行示威是履行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
- 二、我們認為這次學生運動與當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學生運動證明了進行實質性的民主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 三、我們認為迄今為止黨和政府對待這次學生運動的態度是理性的、明智的，我們希望學生與政府在非暴力的範圍內進行對話解決問題；
- 四、我們堅決反對鎮壓學生運動的任何企圖和行動，因為這將使中

連我自己也在編台詞，多討厭！」發完牢騷稍後，他再問筆者。「你認識陳若曦嗎？她最近又回來過了。」

「不直接認識。看過她的小說和訪問，對這個人有很深的瞭解。」

「她最好，她夠勇氣。如果你想知道我們從台灣回來的人生生活怎樣，心裏想什麼，你看她的書就最清楚了。」稍後他續說：「雖然父母都八十多了，可我寧願今生見不到他們也決不讓他們回來。」

「親生骨肉不見最後一面，似乎遺憾吧？」
「你說的祖國現在很好，這是表面的。我

們才清楚，上面在暗裏鬥爭得激烈呢，不知道那一天又刮起風來，讓兩個老人回來不得善終，這是我的罪過呀！」

以上一段跟「回歸」者的談話紀錄，到此為止，至於牽涉及其他知名人物的談話內容，在此不便多所披露，以免影響這位仁兄的安全。但是跟大陸人民在私底下談話，我們可以體會到，在鄧小平的實事求是的開明政策下，人民講話還是表裏不一，是人民因教育感染而積習難返，還是人民因教訓而明哲自保呢？

國幾年來的改革成果毀於一旦，並必將觸發新的社會動亂；

五、我們切望黨和政府公開承諾不對參加民主運動的學生進行任何打擊報復的立場，積極鼓勵學生為中國的民主改革獻策獻力；

六、我們呼籲黨和政府採納學生提出的正當要求，切實進行真正的民主選舉和實行新聞自由；

我國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說過「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民主是當代世界的歷史潮流，任何政黨或個人想遏阻這個潮流必將被人民所拋棄，中國的黨和政府只有順應這個歷史大趨勢，加速進行實質性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支持。

致 崇高的敬禮

參加「中國學生民主運動討論會」的全體中國留學生 敬啟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卅日於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中國留學生與中國政府的留學生管理政策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吳眉山

中國收緊留學政策，已引起海內外的反響。在「美洲華僑日報」、「中報」、「中國之春」及其它刊物登載了有關評論文章後，此問題更引起了人們的關注。然而，與留學政策收緊相伴隨的留學生管理政策的加強似尚未引起應有重視。如果說留學政策的收緊更多地影響國內數以千萬計的留學爭取者的話，中國政府的留學生管理政策，則直接涉及每一個已在海外的中國留學生。

留學生管理政策從未公布過，該政策有些是具體的，有些是非具體的，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無形的。一九八六年以來，該政策的宗旨是：加強管理。一個初來乍到的留學生會被關心地問起：「你剛來吧，報到了沒有？」，或是「請你填寫一份『留學人員登記表』，好嗎？」。開學不久，某位新生偶然遇見一位中國留學生聯誼會幹部，同是故鄉人，自然是一番親切交談。分手時，這位幹部真誠地對他說：「請將你的姓名、地址、系別和電話號碼留給我們，以便今後聯誼會更好地為你服務。」在感謝之餘，此新生忽然想起他剛下飛機時由於茫然無頭緒曾掛電話向該聯誼會求助，回答是：本會力量有限，無法承擔接新生和安排住處的工作，請諒。與那位幹部交談後不久，這位留學生接到一個電話，發話人說：「你已被分在聯誼會的自費留學生組，我是該組的組長，今後由我與你直接聯繫。」

有些公費和自費公派的留學生不時被使館

教育處或領館教育組官員召見，通知說國內所在單位又來函電，嚴令按時回國，不得延長。一些正在準備碩士論文的留學生可能被提醒道：「再有半年就夠了吧。國內四化建設需要人才，拿到碩士就應該回國貢獻力量，沒必要讀什麼博士了。」而快拿到博士的則被告知：「國家不鼓勵讀博士後，還是早點回去大顯身手為好，多賺幾個錢實在沒什麼意思。」留學生回國前夕，他所在的留學生小組或許會召開全組會議，對他留學期間的表現給予鑒定。大部分學生由於身子正而不擔心有不良鑒定，然而，那些平時有自由化傾向，意志力不夠堅定，經不起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引誘的少數留學生心裡恐怕總難免惶惶然。

某些西方國家由於與中國有良好關係，答應配合中國政府做留學生的管理工作。因此，留學生在申請延長簽證、實習、轉校或轉換國家時，該西方國家的移民局可能會先徵求中國有關部門的意見。最令留學生擔心的或許應屬「延長護照關」。護照有效期五年，到期時再續五年，這是過去的做法。但一九八六年年中以來，形勢陡變，留學生護照只被允許續一年者有之，只續半年者有之，根本不予續者亦有之。此招着實不虛，留學生縱有千種個人意願，萬般韜略於胸，又能奈「國家政策」與「國家需要」幾何？

筆者曾在國內的文化沙龍裡聽過幾段有關早期中國留學生的議論，頗有感覺。洋務運動

時期的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五年，清政府派耶魯大學畢業生容闈率公費生一百二十名赴美國留學。原定十五年完成學業，結果由於清政府加強限制管理而容闈和留學生們堅持要少受不必要的干擾，這批留學生被清政府提前於一八八一年召回中國。回國時，一百二十人中，只有兩人完成了大學學業。約十人在美國留下。洋務運動的失敗自然不是由於清政府提前召回留美學生，然而此舉對中國當時學習西方的努力却甚有影響。二十世紀初年，清政府大員張之洞一方面主持向日本派遣大批中國留學生，另一方面則與日本政府配合，對留日學生實行嚴厲繁瑣的管束措施。留日學生奮起反對，一名學生以自殺示威，大批學生舉行罷課鬥爭，更有為數不少的留學生憤然起程回國。三十年代初，留學政策和留學生管轄更趨嚴格。一九三一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有關文件規定，留學生須奉行三民主義。一九三二年，教育部長朱家驊宣布，公費留學生須大學畢業且有兩年工作經驗，所學專業由政府指定。同時，政府在海外建立起留學生管轄機構，並派有專人負責管理工作。但是，實行嚴厲的管轄政策除引起留學生的更多反感外，並未收到明顯效果。由此可見，中國政府自上一世紀起就試圖對身在萬里之遙的海外留學生實行嚴格的管理，然而，是成是敗，是利是弊，歷史業已提供了答案。

馬不喝水強按脖，何益於有？部份學生留

外不歸，乃正常現象，大可不必過分反應。長遠來看，這部份人或能對中國產生現在看不到的重大作用，也未可知。台灣留美學生便為一例。何況，有多少留學生會因政策和管束趨嚴而頓起留戀，又有多少留學生會因無望繼續合法滯留而鋌而走險，實屬未定之天。至於新政策和行政管理措施意在保證「國家需要」之說，也有值得商榷之處。「大煉鋼」出於「國家需要」，「深挖洞」出於「國家需要」，「全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還是出於「國家需要」。然

特輯 支援大陸民運 ● 擊潰守舊派的反撲

中國民聯的告諭與中國民主運動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張 森

民主運動高潮必然來臨

中國民聯早在一九八五年底其二大的文件中就指出：中國「民主運動的高潮有可能在下列情況下出現：(一)改革徹底失敗，保守派全面反撲時；(二)共產黨內有影響的改革派人物公開支持和投入民運時；(三)改革停滯在一定程度而人民又尋求進一步突破時；(四)有外在力的衝擊，如國共接觸、台灣政治力量涉足中國大陸時。」(《中國之春》總第三十三期，「我們對中國大陸目前形勢的看法以及對民運策略的建議」)

中國大陸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出現的以學生民主運動為先導的遍及全國的民主運動，證明了中國民聯早在一年前對中國大陸形勢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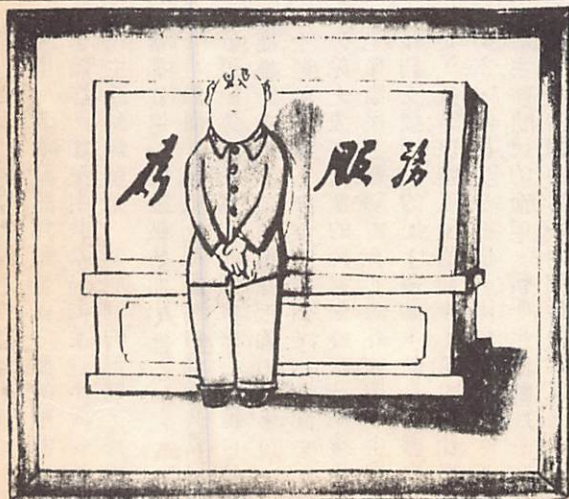
而，理智的決策，民主的程序以及個人的應有權利往往被忽視了。其實，就國家與個人關係而言，「國家需要」固然重要，但它也要以個人的權利為一定基礎，否則，個人的積極性便無從發揮。在中國，一味強調「個人義務」而肆意踐踏「個人權利」的教訓早已不在少數。作為炎黃子孫，能不愛國，能不願為祖國和人民效力？然而，「國」又是能強制以「愛」，「力」又是應被迫而「効」的麼？

實行開明政策，提供方便而非設置障礙，

和預見是正確的。中國民聯在上述決議性文件中曾預示，中國的民主運動在一九七六年「四五」後進入穩健發展時期，民主力量經過重新聚集力量，總結經驗，制定新的路線、方針，發展壯大，必然會迎來新的高潮階段。今天，這個高潮來到了，而且它比「四五」運動更猛烈，「四五」運動主要在北京，而這次高潮卻從安徽發起，遍及全國。「四五」運動中雖然提出了要求自由、民主的口號，但這次高潮中人們却更強烈、更明確地提出了要在中國徹底實現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四五」運動是由基層的民運人士所發起推動，而這次高潮中，像方勵之這樣在中國共產黨內已有一定地位的民主人士，却親自點燃了這次運動的導火綫。這充分表明了，民主在今天的中國不但已經得到了廣大人民的認同，而且中共黨內的開明之士

政府與留學生皆大歡喜。來去自由，留學生便無回國前之多慮。無實質性的管束，覺悟再低的學生也不會再對使、領館及聯誼會敬而遠之。政策得當，回國與否都其樂融融；政策嚴厲，留與不留都胸懷不暢。於是乎，放寬留學政策，放棄不恰當的管理，對中國的留學事業，對中國的對外開放和社會改革，對中國的現代化和民主進程，皆有大利，何樂而不為？

、有遠見之人也已認識到民主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大勢所趨，民主事業在中國已成爲上下一致的人心所向。



立此存照

王 米

中國民聯二大的文件指出了民主運動到來的四種具體契機，而這次高潮正是在「改革停滯在一定程度而人民又尋求進一步突破時」爆發的。中共在打倒「四人幫」後，首先推行了經濟改革，這無疑是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有益的事。但經濟改革一旦展開必然要向縱深發展，必然要求政治體制做相應的改革，從而解脫對舊經濟體制的束縛。而人民也必然在經濟改革中逐步認識到阻礙中國經濟向現代化發展的是專制的政治體制，只有民主政制才能救中國，才能解放中國的生產力。然而一涉及到舊的政治體制，就觸動了保守派的切身利益，他們寧願自身和中國一起崩潰，也不願自動退出政治歷史舞台，而使中國大踏步地向現代化邁進。正是在保守派這種本能而必然的抵制下，政治改革幾談不得誕生，從而反過來阻礙了經濟改革向縱深推進。經濟改革停滯了，甚至可以說整個的改革停滯了（因為政治改革根本尚未推行），人民要尋找中國的出路，突破這一瓶頸。人民從改革以來的事實和中國的歷史經驗中認識到，只有實現政治民主化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才是使中國經濟發展的唯一途徑。於是八六年十二月的民主運動高潮爆發了。

● 爭鳴園地 ●

中共不中國

（中國大陸新移民·美國）

懷荃

中國具有特別漫長的封建歷史，雖然古代的哲人曾有過「天下為公」的思想，但歷代帝王心心相印的信念却是「朕即國家」。辛亥革

竟有多大的切實性，這次民主運動高潮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中國民聯既不是一偉大，也不是「先知」，它只是對形勢進行了理智的、實事求是的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做出了合理的判斷。

團結起來， 把民主運動推向成功

那麼這次民主運動會向哪些方向發展呢？我們認為，如果全國的民主力量能縱橫串聯，擰成一股繩，如果中共當局的保守派和改革派達不成妥協，這次民主運動很可能把中國推進到一個新的局面。所謂縱橫串聯，「橫」是指地區，即各省市的民主運動要互相聯絡，彼此配合、呼應，好像撞擊大門的人群一樣，一個人撞一下撞不開，大家一、二、三一起撞就撞開了。「縱」是指學生運動和工人、軍隊、甚至警察串聯，要和海外的民主運動力量串聯，形成不是社會中一部分人的民主運動，而是整個社會、海內外民主力量一體的民主運動。這樣的民主運動便不是孤立無援的，而是互為依托，整體推進的民主運動。現在學生已經起來，點燃了民主之火，那麼整個社會就像乾柴一樣，投入火堆，使民主之火燃燒得更猛烈吧！

中共當局對這次民主運動最初表現出的是

不知所措，保守派和改革派互以此次攻擊對方。保守派不承認民主已是中國的大勢所趨，指責正是改革派倡導改革才放縱得使這批小子起來鬧事。改革派認為正是保守派的壓制才使舊瓶子爆炸。如果中共當局兩派達不成妥協，那對民主運動無疑是一個有利的形勢，民主運動應當抓住這一間隙破竹而出。

然而，我們也不能不看到中共當局兩派十分可能達成妥協，他們會採取強力的手段。因此民主運動的戰士應該認識到，團結起來，保護像方勵之先生這樣的民運先導就是保護自己，就是保護民主運動本身。海外的留學生們應該認識到支援國內的民主運動，就是保護自己的手足，就是保護祖國的前途。無論在什麼困難形勢下，團結就是力量，團結才有希望，團結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留學生們雖然身在海外，能幫助向國內寄一封聲援信，就是給國內的民主運動一份力量，能參加一次集會，就是對國內民主運動一分的鼓舞。因此，團結起來，行動起來，就是這次民主運動的希望，就是祖國民主事業的希望，就是祖國前途的希望。民主之火永遠不會熄滅，即使它被壓下去了，但它永遠保留着火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命在形式上消滅了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皇朝，可是「朕即國家」的陰魂仍然時時縈繞于各派政客的大脑海中。從帝制自為的袁世凱到專橫跋扈

的北洋軍閥無一例外。國、共兩黨儘管你死我活，勢若水火，但在這一點上却是一丘之貉：一個言必稱「黨國」，另一個口口聲聲「黨和國家」；一個罵對方是「毛共」，另一個反譏曰「蔣幫」。一言以蔽之，他們心中共同的政治模式是「領袖即黨」，「黨即國家」。除去中項，結論還是「朕即國家」。現在台灣的情況有沒有好轉，筆者沒有去過台灣，不能妄言

。而中共統治下的大陸依然如故，却是「在甜水中泡大」的筆者可以斷言的。

在中共看來，黨就是國家，或者說中共就是中國。于是，如果你對中共不滿而離開大陸（或想要離開大陸），中共就會給你加上「叛國」的罪名（不管你是不是還在中國的領土上）。如果你對中共表示好感呢，它就賞給你一頂「愛國」的桂冠。卅多年來，不知有多少冤魂在這種可怕的罪名下呻吟！也不知有多少善良的人被這種廉價的桂冠所誘惑！筆者現在要大聲疾呼：中共不等于中國！

衆所周知，政黨僅僅是由一個國家的部分人口組成的政治集團。即使它掌握了該國的政權，也并不意味着它就等于那個國家。在任何民主國家，反對黨都是合法地存在的。公民如果僅僅反對執政黨而并非危害國家的行爲，根本不能構成「叛國」罪。只有那些極端專制的封建統治者才會把反對他們的人誣蔑爲「叛國」，俄國的沙皇和中國的滿清皇室就曾用這種伎倆。由于在暴政的嚴密統治下人民根本沒有任何自由，爭取民主的人士往往被迫先在國外從事宣傳鼓動工作。俄國的民主戰士赫爾岑僑居英國直至去世，孫中山先生大半生都在海外奔走呼喚，沙皇和滿清把他們視作「叛國」的罪犯，但在人民的心中，他們却永遠以愛國者的光輝形象而存在！

今天中國的情形也是如此。自從中共取締西單民主牆，公開禁止人民以任何形式發表言論以來，民運人士被迫把運動的重心轉移到海外。對於《中國之春》和其它海外民運刊物，中共是既恨又怕。他們不敢站出來公開與之論戰，就故伎重演，把在海外從事民運的人士一概誣之爲「叛國」，想用這個罪名把民主運動搞臭。據最近幾年從大陸來美的留學人員反映

，他們出國之前參加「集訓」時，中共總要向他們灌輸「中國之春那批人是叛國分子」的爛言，理由是這些人批評中共，不回大陸。筆者要問中共兩個問題：

一、爲什麼批評你共產黨就是「叛國」？難道中共就是中國？

二、如果民運人士回到大陸，你們有胆量讓《中國之春》或其它民運刊物在大陸出版發行嗎？

如果你們是「無所畏懼的唯物主義者」，就請回答吧！

中共畢竟是靠理論宣傳起家的，儘管三十多年的不斷說謊和自食其言已使它信譽掃地，但它還能製造一些新的花言巧語來蠱惑人心。有一句頗能迷惑海外學子的話是「兒不嫌母窮」（或曰「兒不嫌母醜」），其大意是：雖然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貧窮落後，但中國人民不應對之有絲毫不滿。許多留學人員返回大陸時以這句話爲口頭禪，并用來指責那些暫時不準備回去的人。我們能理解許多人說這句話是出于善良的心願，但必須指出中共對這句話大肆渲染是爲了騙人。從前中共總是恬不知恥地把它自己吹噓成中國人民的「母親」。經過「文革」的災難以後，中共自己也覺得沒有臉再這樣吹了，于是就故意含糊其詞地說什麼「兒不嫌母窮」。表面上看來，這就叫人民不要對國家有什麼不滿，但骨子裏却是不准人民對中共有任何不滿。因爲在中共心目中，它就是中國！而在實際上，中國大陸之所以貧窮落後，毫無民主，也正是中共一手造成的！

我們認爲，中國確實是我們的母親。不但我們這些暫時留在海外的中國人這樣想，就是那些定居海外幾十年的炎黃子孫也是這樣想的。人誰不愛母親？但目前的現實是：母親不僅

窮困，而且身患重病。此時此刻，光是泛泛地說一聲「兒不嫌母窮」是不能解救母親的。真正愛母親的兒女們應該四出奔走，求醫訪藥，首先使她痊癒、壯健，然後才能想法讓她擺脫貧困。那些嘴上侈談什麼「兒不嫌母窮」而對母親的重病視而不見或諱疾忌醫的人，不知究竟是出于什麼用心。

那麼，中國的病根在哪裏呢？我們認爲主要在于一黨專政、沒有民主。環顧當今世界，各國的經濟繁榮都是與其民主程度成正比的，中國也決不能例外。只有全國人民共同努力實現政治上的民主，中國才可能真正繁榮富強起來——這就是我們從事民主運動的目的。

我們熱愛中國，中國是我們的母親！我們批評中共，中共使母親貧病交加！中共不等于中國！

未來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歐陽也

未來，被施以N種力量，
未來，被加以M種想像，
然而它却是第N+1種現實，
它的可能是M的平方。

爲了忘記的回顧

——八三年北京監獄的女囚側記

(中國大陸作家·巴黎) 張 諄

自序

記得，在我離開北京半步橋監獄的那天，在隊長的值班室裏，被人稱作「侯隊長」的和另一位被人稱作「河北虎」的隊長，仔細搜查了我的衣物用品後，曾極其嚴厲地對我說：「監獄裏的事情，到了外面不准亂說。妳如果亂說了，讓我們知道，就抓妳回來重新坐牢。」

這句話我一直記在心裏，不能、也不敢忘却。

尚在國內時，每逢有人向我打聽獄中情形，我總是感到緊張，怕「隔牆有耳」，因而儘量搪塞過去。後來到了國外，常想到自己恐怕是八三年那會兒被抓進去、又十分幸運地被放出來，並且極快地出了

國的一個「幸運兒」。只是，我總無法忘記，八三年在獄中的生活，特別是那些曾在我面前流過眼淚的女人，曾戴着鐵鍊從我的門前經過，一去不返的「死囚」，還有，那些讓我感動過的故事。

開始，我總覺得時間久了，這些記憶會漸漸地淡薄，忘却。可是，事過境遷，已有三年之久，仍然鮮明如故。

那麼就傾吐吧，做一番爲了忘却的回顧。也許，當它屬於別人時，我說是那些肯看這「回顧」的人們，它，就不完全屬於我了。我呢，則可以在這壓抑了我許多年，甚至可能永遠壓抑我的記憶的夢魘下解脫了。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寫於巴黎

一、七月二十八號是個

晦氣日子

一九八三年的夏天，是個不尋常的夏天。特別是七月二十八號的夜半十二點後，在北京東城區炮局胡同裡，座落於深處的「王

字樓」，而形狀其實像個「王八」的陰暗大樓裡，突然燈火通明，人聲鼎沸，哭聲、罵人、吆喝聲此起彼伏，不絕於耳。

據那位在七月二十八號之前，唯一住在這外界罕知的「北京市公安局炮局拘留所」監獄的女囚回憶：

「我是六月十七號被逮進來的，那個時候，這地方只有我和一個叫孫桂雲的女殺人犯，一天到晚聽不到人聲。除了隊長（看犯人的警察之尊稱）來扒扒門縫，就是送飯的人來三趟從門下的小洞塞進兩個窩頭一碗湯，悶得人簡直要自殺。

孫桂雲還老哭，老說她沒殺人，弄得我也心煩。以後警察忽然把她帶走了，這兒又剩下我一個人。

閒得發瘋了，我就從早到晚看監獄發的『人民日報』，一個字一個字讀，連標點符號都不拉下，細看一遍，我就背誦它，差不多每篇我都能背下來。有一個多月我一個人就這麼過的。

二十七號晚上可就熱鬧了，半夜十二點，我正睡着呢，就聽着外面走廊裡的鐵門噹噹叮叮地響起來了，只聽隊長們拚命地喊，還有好些女人拚命地哭。

我扒着門縫兒望外看，心想外面的人都發瘋了怎麼着？只見隊長帶着一個一個女犯人進了『號』（牢房的俗稱），每一個女的都哭得鼻涕哈拉的，大多數還都是年輕漂亮的『三蜜』（當時北京對風流女孩子的諺稱，讀時發『蜜』聲）。老實點的乖乖地進了號，厲害的就在那兒罵，有的還敢和警察推推搡搡。有個女孩讓警察硬拉到號門口了還不肯進，她哭呀、喊呀，兩隻手就那麼死死地握着門口，直說冤枉，鬧不清爲什麼警察抓她之前死也不進去，還喊她爸爸媽媽來救她的命。不過到底是警察的勁大，好幾個人就把她的手指一個個地硬扳開了，塞進了號裡。半夜的功夫，抓進來了二十多個女的。

從那一夜以後，一連一個多月，不論是白天和黑夜，隔不了幾個鐘點，就聽到外面有人

哭，然後是鐵門叮噠一響，大家心裡都「明戲」(明白的意思)，這是有「姐兒」被抓進來了。粗數一下，前前後後有一百個多人呢。我開始還挺納悶。好久了，這監獄裡只有我這麼一個壞女人，不對，這是北京市拘留所，所以我覺着全北京市才只有我這麼一個下了獄的壞女人，可是怎麼一晚上的變化，這世上的壞女人一下子多了好多？變也變的太快了。不過也好，原先我還有點悲觀，心想別人都是好人，只有我這麼一個壞人，今後釋放了也沒臉見人，現在壞人多起來了，咱們大家都一樣，誰也無所謂丟人了。說真的，我真希望把全世界的人都抓進來。

她這話說的夠毒的，但下過獄的人可以理解她。

其實，她真可以滿足一點了。因為她新增的伙伴兒，還不僅僅這「炮局」胡同的百十個女伴兒。在北京市每一個區、每一個縣的「大獄」裡，都還藏了七、八十個呢。加上「半步橋四十四號」的五、六十個，北京市已有了二、三千像她這樣的壞女人陪她了。假如她知道這場「嚴重打擊刑事犯罪」及與此相應的「清除精神污染」已將全中國的近百萬「男女壞人」拋進監獄，她總該感到特別欣慰吧。

二、誰們進了監獄？

先問誰是大爺？警察，警察才是大爺。警察是社會治安的衛士，專與壞人搏鬥，因為他們向邪惡鬥爭，所以比旁人「明察」，就像長了年紀有威嚴的大爺們一樣，不容易出錯。

這場七月二十八號開始的「大抓」壞人運動要靠誰？當然要靠「鏗惡治邪」的警察大爺了。這一回，他們似乎比以往更加奮勇爭先，

起着「先鋒模範作用」。至於他們是出於對壞人的憎，還是出於對錢的愛，那有待另做研究了。因為在八十年代一切「向錢看」的中國社會，已不比五、六、七十年代那樣一個還有理想的社會，僅憑「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愛，對階級敵人的恨」就可以「刀山敢上，火海敢下」，「黨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的了。警察夜間「出動」，已有了額外的「犒賞」；誰抓的人多，還另有特別獎勵及升官加爵的機會可乘。這些因素不可能不與警察奮勇抓人的幹勁有所關聯。

誰也不敢抹煞警察有過抓「壞人」的功勞，這裡被北京警察抓進來的百十個女人們，有殺人的，有害人的，有偷人的，有賣人的，還有賣淫的。此外，做投機倒把的種種「女商人」和走私犯們也佔了不少。這些人都犯了中國的某條法律，所以，警察要抓，誰也說不出什麼來。

但是，有幾個人，真是進來的奇怪。

A：青年人都喜歡談戀愛。可是，過於真摯的愛情，有時會給人帶來些意外。

某號裡面有個姑娘，進了獄就罵自己，「我怎麼就這麼笨，我怎麼就這麼傻！」而後哭個不亦樂乎。原來，當天上午，她和她的男朋友從家裡出來，剛到胡同口，就被警察攔住了，一見「逮捕證」，抓住她的男朋友就走了。這姑娘竟是如此不識相，她不是趕緊往回跑，反而一路跟了上來，流着眼淚，請警察放了她的心上人。開始警察還有耐心，叫她回去，別跟着走。是呀，人民警察抓壞蛋，後面跟着個大姑娘哭得像淚人似的，讓路人看到，還以為是國民黨來抓壯丁，逼人妻離子散呢。

那姑娘一路哭、一路跟、一直跟到警車跟前，好像至死不回頭。終於，警察了解人意了

，說：「好呀，妳這麼離不開他，就和他一塊進去吧。」

說罷，一把將她拉上警車，「嗚拉」一聲，姑娘隨着愛情進了監獄。

B：某號裡還蹲了兩個姑娘，一臉的晦氣，假如世界上有人後悔自己生了條舌頭，除了她們還會是誰？

這天她們經過一個警察局，從門口那看到裡面亂嘈嘈的，原來是才抓的一群犯人。姐倆個覺着新鮮，就倚在警察局的門口瞧熱鬧，誰知，天下也有瞧不得的熱鬧呢？

可不，警察大爺過來了，聲色俱厲地說：「走開，走開，這兒有什麼好看的。」

兩個大丫頭被人迎頭一頓喝斥，心中自然不服。一邊走一邊罵：

「瞧他那個臭德性，有什麼了不起？狗子！」

「狗子」本來是舊中國老百姓罵警察的，相當於美國人、法國人罵他們國家的警察是「小雞」。不知道這兩個女孩從那兒把這兩字學來了，用到了新中國的警察身上。

偏偏那個發凶的警察又是個頗有「文化」的人，恰好也懂得三十年前人們罵警察的「規矩」。

「什麼？妳們罵誰？誰是狗子？回來！」他大眼一瞪，發出命令。警察都有這種「鬼」給的本領，他讓老百姓走，老百姓不得不走；他讓老百姓回來，老百姓不敢不回來，全世界都見過這種「鬼」。

結果，爲了說出「狗子」兩個字，她們就住進了「號」裡。誰想到了呢。

C：她呢？儘管她是個結過婚的女人了，但也不該太大意，讓別人看見她與她丈夫的「

私房事兒」。

這個女人，嫁給了一個在中國工作的伊朗工程師。夫妻和睦，還生養了個兩歲的大眼睛小兒子。

不清楚她是怎麼想的，有一天，她把她的同事們請到她家吃飯，而後還給他們放錄像，欣賞照片。在厚厚的一摞照片中，有位同事發現了一本她與她的外國丈夫赤身裸體大做房事的照片。後來，她還承認與丈夫拍過同樣的錄像。

這件事就這麼捅出去了，因為她還是中國人，就按中國人的習慣被抓了進來，「思想腐敗」、「生活墮落」、「流氓行爲」，隨便可以給她算上一條。警察們會說：

「問題不在於你們是不是夫妻，問題在於你們爲什麼拍這些照片？別人爲什麼不拍？只是你們夫妻要拍？流傳出去，就是對社會的污染。」

魔鬼也會相信這個女人不會把自己與丈夫的「幸福鏡頭」流傳外界給別人看，但警察硬這麼分析你也只好聽着。只是，她的外國丈夫因爲是「外國的」，所以沒遭此「厄運」，這大概由於警察尊重「各國習慣不同」吧。

D：這個被人拋棄的女孩，也該提一提她。

她真是不幸，這般的不幸天下也是難得。她曾經與一個新西蘭的留學生在北京相識，戀愛了不久，這個洋小伙就要回國了。他臨行前對她說：

「我還會再回來，那個時候，我們就結婚。」

這種諾言自古以來人們就聽說過。有的，真的回來的，成了流於人間的佳話；有的，一去就不再回頭，留在人心一層不再信任的陰影

。這個高個子的漂亮姑娘就遭逢了這後一種經歷。

新西蘭情人開始不斷地給她寄來愛情和希望，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寄來的愈來愈少，這當然是不祥的預兆。

他到底還是誠實，那封最後發出的信上說：「我回不去中國了……」

這個失戀的姑娘還沒把失戀的悲哀忘却，她的單位的領導却把她出賣給了警察。

「她與外國通信頻繁，有出賣情報的嫌疑。」

的確是「情報」，但確是「愛情之報」呀

。誰讓這姑娘心高氣傲，私下裡已經得罪了單位的領導，被人暗中監視着書信的往來。可是，尤其不能忽略的是在那炎熱的一九八三年之夏，中國還流行了一種奇怪的「治安瘟疫」，叫「單位推荐，公安局抓人」。就是叫各個

單位揭發、檢舉壞人，由警察負責拘捕審查。可怕。那些與單位領導有矛盾的「眼中釘、肉中刺」，一下子處於「天網恢恢」之下。各單位的狗官們大可趁機借「無產階級專政」之掌

，狠打一頓平時與自己作梗的「小子們」了。法律下放到警察還不夠，八三年之夏，抓

人的特權已經下放到那些官僚的手中了。官僚，也許揭發出了一些真的犯罪分子，

可那位已經不再與新西蘭情人「魚雁傳書」的姑娘，倒爲了那幾張令人望見生淚的舊紙，來

坐這無情的牢獄了。

不知，那新西蘭情人還會記得有位「北國佳麗」，如知，是否也爲之心碎？

這僅僅是A、B、C、D而已，還有E、F、G……更多。

北京那時傳着句話，叫做：

「警察沒有錯抓的，只有錯放的」。

因爲七月底開始的瘋狂大抓捕後一個月，每個監獄都暗開側門，悄悄地釋放了一些人，所以，才會出現這麼一句怪誕的言論來。自然，這些釋放出來的人按這句話來說本不是「抓錯了」，而是「放錯了」。警察會這麼「笨」嗎？！

要一個政府承認自己的錯誤，似乎是一件特別難爲的事情，要讓警察們承認一九八三年有抓錯的犯人，大概只有等到像華國鋒政府代替江青政府那樣的機會才可能出現。

一個國家，警察的權力要大了，保准壞事

三、八月到十月，有四個女人，死於槍聲中。

A：她不是美女。絕不是。

這個王士鳳，住在北京半步橋四十四號監獄六號裡。她死的最後一個夜晚，曾做過一個奇怪的夢：

「我夢見我一個人走在我們村子外面的野地裡，天陰沉沉的，不知道怎麼搞的，我突然覺着害怕，撇開腿就跑。跑呀跑，怎麼也跑不快。我正急得不行，忽然又覺得腳底下冰涼的，猛地把我絆倒了，我抬眼一看，是條黑呼呼的大蛇纏着我的腳。」

她從夢中驚醒，神情怪異地把這個夢講給了同牢的一個女犯。

「真怪，這夢做的。我想妳夢見的那條蛇可能因爲妳腳上帶的這副腳鍊。」女犯人幫着她解夢。

王士鳳摸着她那副被她細細擦拭過的、光

亮的腳鍊，搖搖頭說：

「我活不過今天晚上，我知道。」她很肯定地說。

這一夜，別人都在睡，只有她倆沒睡着。號裡的燈光是不熄的「永明燈」，她們睜着眼睛，等待，——黎明，或者……：後半夜裡，外面下起了浙浙瀝瀝的小雨，她們聽着，都想起了那個奇怪的夢。

四點多鐘，走廊裡響起了一串咯咯地腳步聲。因為是一串，而不是一個人的腳步，對熟悉了聽少有聲息的牢房動靜的人來說，它太反常。兩個人對視了一下。

「咯嗒」兩聲之後，牢房門打開了。王士鳳已自覺地抬起了身子，瞧着門口那兩位不同平常裝束的，全副武裝的，戴着白色手套的女警察。

「王士鳳，穿衣服，出來。」女警察涼涼地命令。

別的女犯被吵醒了，蠢蠢地想爬起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情。

「妳們不准動，在床上躺着。」女警察大喝一聲。女犯人像被定住了似地再不敢扭動一下。

王士鳳快地穿上衣服，又朝那位與自己知心的女犯用嘴角笑了一笑，好像在說：

「妳還記得我那個夢吧？」

王士鳳穿戴好了。在警察的厲眼下，幹什麼都得特別快。

「報告隊長。」那個「知心」的女犯道：「可以讓她梳梳頭嗎？」——王士鳳沒有梳子，老是借別人的用。

隊長同意了。

王士鳳梳了幾下頭，人顯得利索了些。

「走吧。」警察又下令了。

「我走了，再見。」走到門口時，王士鳳笑笑地輕聲和大家告了別，跟着警察出了牢門。

她沒再回來。

警察令人把她的東西從號裡面全部清理出去了，但是，沒有人敢問警察：「王士鳳為什麼不再回來了？」

二十天後，一個才從外面抓進來的女人帶來了新鮮的消息：

「八月初北京槍斃了三十個人，其中有個女的，叫王士鳳……」

這個新來的女人，睡到了王士鳳生前睡過的舖板上。

王士鳳死了。她是一個殺人犯，一個殺死三歲兒童的狠毒兇手。

原先，她是北京郊區農村的姑娘，在她還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時，就與年輕的生產隊長發生了關係。誰也不知道他們之間是否真正有過美好的愛情，但是結果，年輕的隊長一面與她時常偷眠，一面又在外村找了個漂亮的媳婦，說她漂亮，也不一定，但如果不比王士鳳強些，隊長何必捨近求遠？

隊長與別的人結婚了，王士鳳哭也罷，樂也罷，總是做不得別人的主。倒是生產隊長來找她說：

「妳別難過，我還和妳好。」

因此王士鳳又當了隊長的「外室」。而且她還聽了隊長不讓她結婚嫁人的話，就那麼悄悄地忍着，背地與他幹那些「見不得人的勾當」。

隊長有了兒子，兒子長到三歲時，隊長不知怎麼想的，又找到王士鳳說：

「妳二十四、五了，不小了，嫁人吧，只是別在本村結婚，找外村的，嫁的遠點。」

隊長又催又逼，王士鳳終於在外村找着了婆家，定了婚。

乖乖，這麼多年忍氣吞聲的王士鳳，把自己的青春都無償送給了隊長的王士鳳，心裡暗藏了多少委屈和怨恨呢？

王士鳳出嫁的前幾天，心亂的很，覺着自己活的窩囊，不像個人樣，她開始恨她的老情人，結了婚還霸佔自己的那個男人。自己真像只破鞋，讓他穿夠了，穿的不耐煩了，一脚踢開了。

這天，她一個人坐在自己的家門口，盯着在門口玩的幾個孩子，有個三歲的小男孩，正是她那無情的情人與別人生下的兒子。

她對別人回憶說：

「也不知道我那時是怎麼回事，我就站起來朝那孩子走過去，說：『你來，我給你買糖吃去。』那孩子真聽話，跟着就一直出了村。村外邊有一口井，我在那兒找了根鐵絲和磚頭，先把鐵絲拴在磚頭上，又把另一頭拴在那孩子的脖子上，然後我就抱着他往井口去，我往下扔的時候，記得那孩子朝我咯咯地直笑……」

孩子，天真的孩子，無辜的孩子……

王士鳳，就有這樣一個故事：一方面，她是個被男人欺辱霸佔的弱女子，一方面，她是世間最殘忍的嬰孩殺戮者。欺辱她的是那個男人，她殺死的是男人的孩子。三個人之間，誰是悲劇的製造者？——那個「土皇上」的生產隊長！

可是，孩子死了，王士鳳死了，那個悲劇的製造者還活着。活得還頗能感人：——「我的兒子被人扔到井裡去了！」——一個動人的、傷心的父親的形象。完全不像個造孽的父親。

法律只管殺人的殺人者，不過問「逼」人殺人的殺人者。

但「六號」的女囚們却常常回顧王士鳳的好處。

——號裡兩牆之間拉了條普通電綫粗細的綫繩，是女囚們唯一可晾衣物的地方。

「這是王士鳳用給監獄織手套時省下的細綫，一根一根、一截一截地搓出來的。把她手都搓紅了。」

——趕上送囚飯送的菜少時，大家從一個舊紙包裡掏出一點點乾鹹菜分食。

「這還是王士鳳那會兒把多出來的鹹菜留起來晾乾藏著，趕上沒菜時用，沒想到讓咱們吃了。」

——地上髒了，人又說：

「王士鳳那個人真是勤快，她在的時候，這地上一絲灰也看不見，連水泥地的溝縫，都讓她用掃帚上拆下來的草棍，裹著棉花搥乾淨了。」

不管怎樣，王士鳳是個殺人犯。

不管怎樣，王士鳳又是個平素討人喜歡的人。

有一點是真的，她也是個心靈受到嚴重傷害的人。

她的命抵了那可憐孩子的命。

但誰，願意彌補她那被一個惡男人踩得血爛的心呢？

B：一個淒涼美麗的死囚。

孫桂雲，前面提到過她的名字。她是個非常美麗的女人，孱弱的樣子，連女人也要見憐於她。見過她的人，誰也不會相信她會殺人，連警察也會說過：「我們相信妳，妳沒有殺人。」可是她被殺了。從北京「炮局拘留所」轉

到「有進無入」的北京市半步橋四十四號看守所的兩個多月後，在九月十九日中秋節的下午三點後，她帶著沉重的腳鐐，嘩啦啦地趟出了女牢七號的灰門，最後一次經過了狹窄却乾淨的甬道，不再回來了。

六號的一個女人被叫出去收拾孫桂雲的遺物時，大家心裡就明白了她一定是去死了。監獄裡生活的萬般單調，養成了犯人極其的敏感。每一陣腳步，大家可以判得出是那位隊長來了。每一聲嘶叫，大家都知道聲音出自那間牢房。那一個犯人帶走，大家從時間上可以判斷出她是被提審，是見律師，是接審判書，還是，與生命告別。

可是，孫桂雲生命的末日，來得有點出人意料。

這是中秋節。雖說監獄的中秋節過起來更使人思親傷感，愁腸萬斷，但中秋的前一夜，



馮

到底還是發過象徵親人團聚的月餅。只是這月餅並非每人一塊，而是發給那些在監獄積極勞動，遵守紀律，讓警察看得順眼的犯人。不肯勞動改造的，得罪過警察的却只有看着別人吃的份兒，任憑口水往肚裡一口一口地嚥，那情形，比小孩子看着別人嘴裡的糖更難過十倍。因為不僅僅是感官上饑飢的反應，而是摻雜了受污辱和被虐待的理性痛苦。住在缺乏起碼的人道主義教化的野蠻冷酷的中國監獄，還得學會忍受警察製造的犯人与犯人之間尚分三等的「不平等關係」，確也是件不容易的事。便有好心人想分食予你半塊月餅也不行。警察說了：

「不許把月餅分給他們。」「他們」指那些警察看不順眼的人。

不過，幸運的是這天也發了撲克牌，這倒是讓所有人可以參加的娛樂活動，儘管警察只限玩兩個小時，並警告玩時不准大聲說話，不許笑。但無聲的玩牌，也總比沉默地坐在床板上思親念友要好應付這不如不過的佳節將至的前夜。

轉天的佳節，獄中竟宏恩浩蕩，中午時分分給每人一個白麩饅頭，另一碗肥豬肉熬粉條扁豆。與平素的玉米窩頭青菜湯相比，這是人間最美味的珍饈。犯人們打搶樣地抓過一個饅頭、生怕別人把大一點的拿走。分菜時，每人的眼睛都死死地盯着分菜者的勺子，為了某人多得了一塊指甲大小的豬皮，也要發生一場爭鬥！長期的飢餓感和對肉味的饑涎，讓君子也變成了計較的小人。

便是有人為自己的饅頭比別人小，碗裡的肉塊不如別人大而快快不樂，但嚼肉的快感總是沖淡了許多往日的陰鬱。雖僅是三、四塊肉而已。

女人的心，總是比男人會算計，——在生活上，在小事上。已經落到這朝不保夕的「囚人境遇」，仍然不忘安排自己的生活，讓它變的「美好一點兒」。

每一個女犯心中雖感到這碗中的肉塊太少，湯中的油星兒不厚，恨不得再添它十碗八碗，可吃到最後時，每個人的碗中還是留下了半碗湯，一、兩塊肉。

她們要把它們留起來，留到晚上那一頓吃，她們要把這誘人的肉香帶來的節日的愉快，延長到晚上。那些噴香的白麩饅頭也不例外，人們吃它，總愛先從皮兒吃起、而且先從底下的皮兒吃起。這兒的皮在鐵鍋裡蒸時，因貼近鍋沿，所以有些焦黃，吃起來頗像外面賣的麩包，只是硬了點。吃了饅頭皮，再細細地撕下幾小塊在口中慢慢嚼爛，努力地讓自己能長時間地咀嚼它，時間愈長，嘴裡就可以品出一股糖味來，如此，饅頭因產生了「麥芽糖」，就「變成了甜點心」，而後咽下，滋味與匆匆下咽大大有所不同。這樣富有「變化」的饅頭，可惜也只能吃一半，剩下的留着晚上吃，或者夜裡，餓得發慌睡不着覺時，吃下去，嘿，那才叫過癮，連皇上的「飛龍魚翅湯」也比不得它給人心靈上那麼大的「解饑解餓」的滿足！

這頓飯「吃完了」後，有幾個女人收到了家裡人送來的生活必需品——牙膏、香皂、肥皂、毛巾、以及衣物鞋襪。家裡都是檢着最破爛的衣物送來，牙膏、肥皂、臉盆、牙刷等則是最便宜的「賤貨」。因為監獄不但不給犯人吃飽吃好，不許家裡送食品來補養犯人的身體，而且在所有的「物質生活」方面對犯人進行「思想改造」。「犯了罪了，還想吃好肉好？」就是這種「犯人不是人」的混賬邏輯。連女犯人的月經紙也不能用柔軟一點的新型貨色——

「婦女衛生巾」，而一定要用那些將廢報紙、爛紙頭回爐再造的，觸膚生痛的粗糙「衛生紙」，讓那些在獄外甚嬌的女子望而生畏。

到底是親人們送來的，東西上似乎還有着手足的溫熱。大家激動地亂翻瞎摸了一回，便一一珍藏。至於那些包香皂的包裝紙，則成了女犯人的「奢侈品」，她們或將它疊起收於用衣物做成的「枕頭」薰香，或者把唯一的一條手帕包在其中，自然也是爲了取一點香味。有女人十分幸運地收到幾袋用塑料紙裝着的擦臉香脂，這會兒聞起來，真比在獄外見到一瓶法國的「CHANEL 5」香水還要香的令人醉倒，馬上就洗了一把臉，狠狠地往臉上塗了一層。

女人對美的追求，是至死不渝的執着。

但是，大家的眼圈都紅紅的，甚至掉下淚來，喜的是恰在佳節聞親音，悲的是身在獄中嘆伶仃。沒有收到東西的人，巴巴兒地看着，樣兒更是楚楚淒傷。一個賣假藥的女人，她女兒在給她送來的棉褲襠裡，寫下了幾行鋼筆字。「家書抵萬金」，可是在警察檢查時被發現了，所以整整一塊褲襠被生撕下了，女人收到手時，褲襠裡的棉花都朝外翻了出來。這是一條新棉褲，是女兒特意爲雙腿患嚴重關節炎的母親特別製做，竟被警察的利爪撕成了條「翻毛棉褲」。

警察已經是十分寬容的了，她們說：

「往獄裡偷偷帶信是違反監規的，按理說應該懲罰妳和妳女兒，這條棉褲要沒收的，看妳腿有病，我們還給妳，下次再犯，加倍懲罰！」

女人哭得鼻涕眼淚一把一把，口口聲聲罵女兒：

「這丫頭真不懂事，往新棉褲上寫什麼字

？我又不認得（她是個不會寫自己名字的文盲）還讓隊長們罵了我一頓，又糟塌了東西，又讓妳老媽丟臉。」

這女人窮得一塌糊塗，過去常靠到菜站撿白菜葉過日子。他丈夫掙五十塊人民幣，養一家四口，女人又是個「病鬼」，每月非吃一大把藥不可，因為她沒工作，所以藥費不能「報銷」，全得自己掏腰包。八十年代經濟開放後，她跟別人合伙做「小本生意」——往普通的香脂裡放點粉紅顏料，假充「雀斑霜」賣，雖說這「假藥」與人無害，但到底是行騙的。在一九八三年這場大抓大捕中，她被抓了進來，幾年來攢下的三千元人民幣因爲「來之不易」，都還存在銀行裡「捨不得花」。這是窮慣了的人的特點，結果全被沒收。

中秋節的中午，就是這樣渡過的。

午睡的鈴聲把大家都趕到了床上睡了午覺；起床的鈴聲又把大家都從床上趕下了地。於是大家準備好肚裡的屎尿，一聽到隊長「放茅」的指令，就以最快的速度奔向廁所，再以最快的速度刷完了尿，爾後以同樣的速度返回「號」裡，慢一點，或者誰講話，隊長就在屁股後頭開罵了。

當大家又整齊地一排坐在床板上開始「坐牢」時（真是「坐牢」，因爲除了睡覺時間，不准躺、靠，只准兩腿垂地的坐在床前），「佳節」的氣氛也開始慢慢消失了。晚上，不會再有那市面上賤的沒人買的小月餅，也沒有撲克牌，至於肉燉粉條，將由高頭和熬土豆代替。幸好，每人留下的半碗，還擺在牆角的小桌，癡固了的白色豬油，一圈一圈，像死魚眼一樣地瞪着大家。大家，眼下唯一的興趣，也就是時常瞟一瞟它們，不時地將想衝過去把它們填下，使半飽的肚子的「邪念」壓下去，準備

着到晚上再好好地「對付它們」。

於是，下午三點鐘到了。那個美麗的死囚被叫出去。

大家緊張地聽着那鐵鍊聲遠去了，神色都變了。也許，人走向死亡的脚步聲與平常有着不同？

「准是槍斃，准是！」

「怎麼能是今天？今天是中秋節，警察放假了。而且槍斃人一般都是早晨四、五點鐘。」

「不是槍斃是什麼？如果是提審，應該是上午，如果是接審判書，就該下午五點左右。」

「也許是見律師。」

「放屁，今天律師不工作。」

「妳們別爭，到吃晚飯的時候還回不來就明戲了。」那個「老號」（住監獄時間長的人）說。

不到吃晚飯時，屋裡的「勞動號」被叫了出去，叫她出去大家倒不很緊張，她不是「死號」，沒有被槍斃的危險。但大家盼着她回來，也許，她可以帶來點什麼外間的「新聞」。

「七號」又有了動靜，有人偷偷掀起「瞭望孔」的黑布帘往外看，看見警察監督着勞動號往外搬東西。

「嘿，」看的人小聲說：「孫桂雲可能真被槍斃了，要不然怎麼把這些東西往外搬呢？」

「也許是轉到一監去了吧？」（「一監」即北京第一監獄）。

「胡扯！轉一監還用得着別人給她收拾東西嗎？她又是死號，轉什麼一監呀。」

過了一會，勞動號回來了。進門先搖搖頭，一屁股坐到床板上，鼻頭就一抽，挺難受地

說：

「孫桂雲真夠慘的，我去給她收拾東西，沒件像樣的，幾雙破皮鞋，扔到垃圾堆也沒人要。末了還給槍斃了，這種人活了一輩子是幹嘛來着？我就說那些省吃儉用的人是白活着的。」

昨晚發的月餅，她還留着呢，放在茶杯裡藏着。今中午吃的菜，她留了半碗，裡面還有幾塊肉呢。饅頭也是，剩了大半個。」

女犯人聽着，臉上都露出了同情的淒容。

「怎麼隊長不讓她把東西吃完再走呢？」一個女人感到惋惜地說。

「廢話！」別人噙了她一句。警察就是警察，不是菩薩。她連這也不懂嗎？」

「妳怎麼不和隊長說，把她剩下的菜和饅頭月餅帶回來吃呢？」有個鄉下人問。

「妳缺德不缺德？死人的東西妳也琢磨？」有人罵道。

爾後，大家就一直議論關於孫桂雲的故事，到吃晚飯時，捧起自己剩下的半碗肉燉粉條，人人又想起了孫桂雲的那半碗。

「她幹嘛不吃完？」這個遺憾，深深地留在每個女犯人的心裡，像被烙鐵烙上去似的。

孫桂雲，在臨行前，有沒有這種遺憾呢？這最後一次的節省，為誰省來？孫桂雲。

她是山東人，細皮白肉的膠東半島女子。年輕的時候，她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一家軍醫院裡當護士。後來，她與當軍官的丈夫雙雙退伍，帶着兩個男孩子來到北京定居生活。那時，他們真算命運的幸者。

福兮禍所伏。到京後不久，她的丈夫竟患病不治，溘然逝世了。留下一個三十多歲的年輕寡婦和未成人的二個男兒。

原本是弱女子的孫桂雲，擔負着養家餬口

，扶養孩子的雙重責任，在生活相對貧困的中國，薪水有限之極，每週工作六天，一日長達八小時，又況交通不便，居家與工作地點路途遙，整日地奔波，為孩子為工作為家庭而傾盡人之力所及，如何不讓一個單身的女人身心憔悴？

終於，有人伸出援救之手。

他是公司的黨委書記，姓王，王書記找到她，表示了對她境遇的同情，並答應幫助她解決家居甚遠，上班不便，難以照料正在讀中學的兒子們的困難。

在她那樣的情形下，有人關心她，又是個男人，女人的心會受到怎樣溫暖的拂拭呢？

就這樣，孫桂雲成了王書記的「情婦」。情夫對情婦，一般地都很「大方」。可王書記不是。他與孫桂雲第一次幽會時，的確專門購下了一包價值人民幣一元左右的「北京果脯」，不想孫桂雲已是四十的大人了，對這類

哄小孩的東西不感興趣，只略嚐一、二而已。不不怕的，王書記自會把它們收拾起來，放進自己的公文包裡，下次幽會時不忘記再帶來，吃

不吃則是孫桂雲的問題。

從他們開始到最後的一次見面，這包「北京果脯」還未吃完。此外，王書記再不想用其它的東西來買「千金一笑」了。

至於王書記的諾言——換近一點的房子呢？這只是更加遙遠的神話了。

男女間的爱情，其實要依靠物質與情感兩個力量組成。物質這方面不行了，情感呢？孫桂雲終於發現自己只不過是「六宮粉黛」，三千佳麗「中的一個小角色。王書記是個大色棍，他以自己的職權做優勢，引誘本公司「下水」

的女人還有好幾位。

孫桂雲吃醋了？假如她愛上了這色棍。

孫桂雲吃醋了？假如她愛上了這色棍。

孫桂雲吃醋了？假如她愛上了這色棍。

孫桂雲傷心了？假如她把心給了別人。

孫桂雲知道是受了騙了，這是真的。可自己的照片和信一大把都攔在王書記手裡，而她也的確與他幹了為世人所不恥的事情，她能對別人說什麼？忍吧，自釀的苦水往自下肚裡流吧。

可孫桂雲到底是個美人兒，就會有蝶兒來戀這朵快凋謝的秋菊花了——飽經風霜的花。

那個三十一歲的大男孩子，呆人大出現在她的面前，血氣方剛，仗義直腸，才不像王書記那樣的糟老頭子。

他們就愛上了，還想着要結婚——兩個人差十來歲呢。這到也沒有什麼，年紀歸年紀，孫桂雲的臉蛋兒却年輕的像二十多歲的姑娘，有人說：那臉上都看不出皺紋來，皮膚細的和小孩似的，模樣兒也像小姑娘，不知道她怎麼長成這樣，呆人大看上去比她還老呢。

孫桂雲還頗為「純情」，把自己與王書記那段讓人作嘔的「孽情」講給了呆人大聽。呆人大也真是個女人面前的大丈夫，他原諒了孫桂雲的「失足之過」，只道全是那王書記對不起孫桂雲。

當年王書記只知道把孫桂雲往屋子裡引，「床上見功夫」。呆人大就不這麼低級了，他帶孫桂雲上街，逛公園，看電影，還時時疏財，請孫桂雲下館子吃飯。

這幾乎成了孫桂雲這個山東土出身，當了幾年大兵，又嫁了大兵，壓根兒沒享受過大都市青年戀愛生活的女人一生中最高光燦爛的一章。在獄中，她不斷與別人提到這段歷史，細細地講他們如何地愛吃「魚香肉絲」、「宮保雞丁」和辣絲絲的「肉片榨菜湯」。這些飯館菜單上最普通的「經濟菜」，常引得一些在外面見過大世面的女犯人恥笑，但，呆人大只是

個小工人而已，能做到這一步，還不算在女人面前敢疏財的大丈夫嗎？算！

人愛的太深了，就要「清除異己」了。

王書記那兒不是還留着孫桂雲寫給他的情書和照片嗎？這，得要回來了，以表示「我和你一刀兩斷」的決心。

一天，呆人大和孫桂雲商量好了時間，一塊兒奔王書記家算賬。如果他老老實實地把東西還了他們就算了，如果不，就……，反正，呆人大還準備了把刀。他與王書記本來無怨無恨，可自從有了孫桂雲後，孫桂雲的仇人就是他的了，甚至恨的比恨自己的仇人還「切齒」。

那天晚上，孫桂雲遲到了一會兒，到了之後，她又開始猶豫害怕，直在王書記住的樓下轉悠，不敢上去。待她鼓足勇氣進了大樓要登樓梯時，呆人大已一股旋風似地衝了下來。

呆人大把王書記殺了——為了他心愛的女人。

這兩個人跑到北京的玉淵潭公園，將行兇的匕首扔進湖中……從此，他們陷入自造的一個黑暗、恐怖、不安的深淵裡，吃不下，睡不着，雙頰一日日消瘦下去，心裡充滿了懼怕。孫桂雲回憶那時的呆人大似乎變了一個人，不再要講話，精神也有些失常了。

半個月後，他們被發現了，他們承認是自己做的，並且，帶着警察到玉淵潭公園將那唯一可以證明是他們殺了人的匕首撈了上來。這樣糊塗地殺了人，又這樣自動將殺人的證據交給警察，可謂幼稚未泯的可憐。他們何必去殺人，他們又何配去殺人？一個沒長大的男人和一個幼稚軟弱的女人，兩個沒生頭腦的人呀。

收監以後，愛的絲縷並沒有斷。呆人大雖然是殺人犯了，却仍是孫桂雲心中的「好人」。



「他是好人。」

別人一問她時，她老唸叨這一句。也許失去丈夫後的女人，尤其是弱女人，對男人給予的溫暖感受尤深吧，特別是經歷了王書記那番欺辱之後，相形之下呆人大不是偉男子是什麼？

不曉得警察們究竟對孫桂雲說了些什麼，讓獄中的孫桂雲心中存了好多的希望。

「警察說那王書記的確是個大流氓，玩弄了二十多個女人，這種人也該殺。」

「呆人大開始不想殺王書記，是王書記不肯把東西交給他，兩人就打起來了，呆人大動大，又有刀，就殺了他，不算是故意殺人的。」

「殺王書記時我不在場。警察說我不是殺人犯，還說我是受了王書記的騙，也是一個受害者呢。」

「他們說了，不會判我死刑的。」
可是，這個天真的「受害者」，沒參加直接殺人的孫桂雲，到底被判了死刑，和着她那忠心耿耿的情人呆人大，團聚在中秋節皎月下的刑場上，為那作惡多端的王書記「抵命」，雙雙血祭王書記醜惡的靈魂去了。身後，留下兩個少年孤兒……。

C：人口販子，張秀榮和她的婆婆。

「以命抵命」，這條在中國興了幾千年的「法律」，任憑光陰轉換，始終未從人們的意識中消失，更未從歷代的法典上劃去。

這就難怪，張秀榮和她的婆婆感到那麼「不公平」了。「我們沒殺人，怎麼會被人殺呢？」

到死的那一天，十月的三十一日，她們還在為這用常識所無法解釋和接受的苦惱所纏繞着。

張秀榮，二十五歲上下。北京人氏，十四歲時因有偷盜「流氓行爲」被判成了三年勞動教養。釋放後，她的家庭認為這樣一個行爲不好的孩子不配做「張家的人」，因而被逐出家門。從此，張秀榮這個十七歲的姑娘成了在社會上流浪的「流氓無產階級」。後來，通過別人，她嫁給了河北唐山附近的一個農民，終於有了個着落。

八〇年初，共產黨的人民政府還沒有開戒讓老百姓走「發財致富」的道路，全國農村還處於貧困綫下的半飢餓狀態中。

但是，人總是渴望富裕生活的。手段，則是各顯神通。

張秀榮所在的鄉下，掀起了一個「介紹對象」的發財致富的「運動」。

不要以為所有的中國男人都可以找到老婆，否則就不會出現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官辦「

婚姻介紹所」了，並在許多大陸報章上鄭重其事地談什麼「要提倡開辦舞會，讓超過婚姻年齡的大男大女們有互相交際的機會」等等了。這些，只是為城市當中找不到老婆的人們「大開綠燈」而已，人們難以想像在偏僻的山野鄉下，會有捧着一把老姑娘「玉照」的官派「婚姻介紹所」幹部來為農民介紹對象，也無法想像見了抽水馬桶就撒丫子逃「洪水」的鄉下漢子來參加什麼扭屁股舞會。

可是，結婚，對中國人來說是件多麼重要的事情。為了傳宗接代，為了發洩性慾，為了有個生活的伴兒，也為了，活的和別人一樣，在中國人眼裡，一個一輩子不結婚的人簡直像個「無罪的罪人」，不是說他「怪物」，就是說他「那玩意」不管用，性低能。中國人沒有不結婚的自由。反抗者，終生將受人蔑視。

為找不到老婆的鄉下漢子、下窰挖煤的「煤黑子」，以及一切最「卑微低賤」的窮苦漢子們做「月下老人」，是黨和政府不曾顧及的未開墾的「處女地」。

張秀榮，和她的丈夫、公婆及其一伙的鄉親們，瞄準這個有利可圖的走「致富道路」的時機，進軍「處女地」。

他們結夥向全國各地出發，專門往最窮最苦的地方鑽，只要有人烟，必然有女人，這些地方的女人有窮到連褲子都沒得穿的地步的。她們對生活沒有什麼選擇，她們只要吃飯，誰給她們吃飯她們就跟誰走。而且，她們上有父母，下有弟妹，她們得讓自己年輕的童子之身換些錢來，報答父母生養之恩。

張秀榮和同伙們，千里迢迢把這些窮女人帶到那些找不到老婆子的鄉下漢子和礦工面前，結成了一對對「姻緣」，爾後伸手要「報酬」，根據女人的年齡相貌，八百元至一千五百

元人民幣不等。這是「手續費」。

她們要的太多了點。其實官辦的婚姻介紹所也收「手續費」，少一點，而且歸公，因此是「合法」的。中國那時還不興「私人辦企業、事業」，張秀榮的「婚姻介紹所」不會「註冊」，賺的錢全進自己腰包，這自然是「非法」的。其實她稍等一等，到國家允許辦「私人婚姻介紹所」了，申請個執照，每年按實納稅就好了。只差那麼一點點，她就不會讓人當成「人販子」槍斃了。

確實，張秀榮和她的同伙們想不通自己為什麼被人稱做「人販子」。一個被判了死緩的同伙說：

「我們又不像過去電影裡的人，強按着別人按手印賣自己。現在又不興用繩子捆人，火車上都有警察，我們要是捆着人去賣，警察還能饒得了我們？」

我們就是介紹對象罷，事先把男的情況和給她的錢大概講一講，她要是同意就和我們走，不同意就拉倒，誰還逼她吔！」

「人家說有的女的到了男的那兒就逃跑，還有自殺的。」別人問。

「嗨，就是談戀愛結婚的人後來也有打架離婚開自殺的，像我們這樣介紹的當然也有不好的，有的是男的不好，有的是女的不好。有些女人她們就專門讓人賣她們，賣一次她帶了錢就跑，再賣一次就再帶着錢跑。說我們賣她們賺錢，她們是受害者，真是瞎說白道的，這天底下什麼人沒有呀？她們還靠我們發財呢。再說，也有不少正經過日子的，孩子都養下來了。這種事，就碰上誰了。」

她頗為振振有辭，讓人不得不服上三分。道理畢竟只是道理。而八三年嚴重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大綱上已經把他們劃入「人口販

子」，並且要特別「打擊」的一欄，黨的決定，是不考慮這些「業餘婚姻介紹幹部」的道理的。命苦的是這一次被抓進來的「人口販子」，不是槍斃就是死緩，最輕也是無期徒刑。

有個女人整天在獄裡埋怨：

「我那個死鬼（她丈夫），二年前就是因為販賣人口進了監獄，才判了四年刑就得了。我呢？我才幹了兩次。我丈夫不在了，我得賺錢養我的孩子，可到好，偏趕上這個打擊刑事犯罪的倒霉時候，一判就給我判的死緩。要說我賣的人，我賺的錢都比他少的多，說實在的，我要是沒他這個倒霉丈夫，我也幹不了這種事呢！」

早知有今天，我還不如當初和他一塊幹，一塊入監呢，判上四年，忍忍就過去了，省得現在動不動就槍斃。」

陰陽先生看來要重新掛牌營業了，有些人就是時辰上出了誤差，不該送的命也就送了。

張秀榮是個不大愛講話的人，爲了這個，監獄特意把她送進三號女牢，伴陪一個文化大革命中最重要的女政治犯——聶元梓。

聶元梓在半步橋住了整整六年後，於八三年夏轉入北京市第一監獄服刑。她已是近七十歲的老人了，一頭白髮，戴着副斯文的眼鏡，誰也想不出她是寫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人，這張大字報受了毛主席的讚賞，於是她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點火人」，當年曾何等光輝過。據說她入獄後，兒女們都與她疏遠了，只有一個侄女兒可以來看她。她是重要政治犯，人又老，所以生活上略有優待。比如，她可以吃侄女兒送來的肉罐頭，張秀榮和另一個女犯人，都兼有在起居上對她有所照顧的責任。

不過，從不准有知識的人物與聶元梓同號

，所以人們疑心監獄把張秀榮這類「死號」與聶元梓這類歷史人物關在一起，不是因為張秀榮不愛講話，而是因為張秀榮是要死的人了。她，不可能將聶元梓在獄中講過的一切流傳到外界去的。聶元梓，和許多政治犯一樣，是「死了的活人」。

張秀榮死後，她的遺物就被扔到走廊的一旁。女犯人外出「放風」、「放茅」時經過了，想想她昨天還是個活生生的人，不禁有些兔死狐悲的情傷。那床紅絨子棉被，雪白的被褥子翻了出來，提花的枕巾，也是濼洗的乾乾淨淨的，讓人看了打心裡舒服，只是看上去，有一些淒涼的味道——無人理睬地亂堆在牆根，主人却不知上哪兒去了。

人人都在想，假如張秀榮十七歲時從勞動教養所出來，她的家庭如果肯原諒這個初次犯錯的少女，社會肯施溫暖懷給這個已受了三年懲罰的小姑娘，她會不會也像那些所謂教育良好的規矩人家的小姐一樣，成爲一個別人眼中的「正經女子」呢？未必不成。如果有人肯把她當公主養，她長大自然也做得了女王。女王算什麼了不起的東西，不過是命好投入帝王胎而已。

可憐張秀榮投在貧困、愚昧的下等人家，自幼不得「高貴的教育」，一旦失足，無人勸導幫助，只是挨打受罵、驅出家門。而社會呢？對她只是懲罰。「勞動改造」了三年之後，把她在社會上搞的聲名狼藉了，不想幫她在社會上找個立足的機會，而是推出「勞教所」的大門就不再理睬，讓她這個別人眼中的壞女孩如何謀生？只得與壞人混、混、混吧。警察就是這樣，你在難中，他不會幫助你的；你因爲生活所迫走向犯罪的深淵時，他就跑來槍斃你了。張秀榮的短暫生命，就是這樣的一個悲劇。

。 九月三十日的上午，張秀榮和她那病得半死，終日在獄中乾嘔呻吟的病鬼婆婆，與若干名男性人口販子，在北京，爲了次日的國慶節，做了豐盛的「祭品」。國家需要「安定」，殺掉這幾個不欠人命的「壞人」，可以給國慶節的慶典帶來「天下太平」的意徵。對！國威，從來就靠殺人顯示。

並不想，爲殺人犯開脫罪責，也不想，爲犯了罪的女人臉上塗抹脂粉。

只是，不想把她們當成一個殺人犯和罪犯看待，而是，首先把她們還原成一個人，有過去的生活，有她們做人的悲哀，讓這些不爲人知的卑賤的下等女囚們，也有向別人敘述自己做人的故事。

人道主義者，反對殺人。不管什麼藉口的殺人行爲都不是人道主義者所容許的。政府，殺戮那些殺人的殺人犯，這習慣，沿續了幾千年，並沒見到了從此人們就不再殺人。何況，仇人相殺，或政府懲罰那些殺了人的人，無非還是一個殺字，這，並沒使這個世界少流一滴血，反而多添了些兇殺的血腥氣息。

文明的過程，是個極漫長的過程。最早的人類，興許有過吃屎的野蠻。比如嬰兒，也時常出現這種怪誕的行爲，因爲他還不懂。現在的人，有許多是文明到不肯殺人的程度了，可還有人擺脫不了這種殺人的野趣。那麼就教化吧，教他愛人，教他從野蠻走向文明吧。

這要有耐心，要等待，要付出血的代價——當他們野性發作的時候。但千萬不要爲了「報復」去殺他。相信，每讓這歷史上少一滴人血，對人心的淨化就多一分努力，人類走向最高的文明就多一分希望，這是人道主義的理想，不是共產黨人的鬥爭哲學。

王炳章率領演講團

全美各大學巡迴匯報演講

各團體如願邀請請速聯絡

為了向海外中國留學生和各界僑胞匯報中國大陸民運發展近況以及講解胡耀邦辭職等政局變化內情，中國民聯總部決定由王炳章博士率領演講團，到各地巡迴匯報演講。演講時還將播送方勵之教授國內演講錄音，講解民運策略和工作目標等。

演講團已應邀在加州戴維斯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斯坦福大學、賓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進行了演講、座談，反應熱烈。演講團還將應邀前往俄亥俄州立大學、新澤西州立大學、新澤西理工學院、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路易維爾大學和休斯頓大學等校。

各地學生團體和學術團體如有意邀請王炳章先生前往，請速與下述地址、電話聯繫，以便安排。

P. O. Box 243
New York, NY 10185
Tel: (718) 429-6777
(718) 507-6442

中國民聯總部

一九八七年元月廿六日

請您訂閱 中國之春 月刊

姓名：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地址： _____

訂 費 (每年)

寄達地區

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	(港、澳地區)
機關：60美元	200 港元
普通訂戶：24美元	96 港元
學生訂戶：18美元	84 港元

寄上 _____ 幣 _____ 元，訂閱由 _____ 年 _____ 月 (第 _____ 期) 開始

北美地區：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香港及世界其他地區：3-7710410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611 號萬隆大廈 1206 室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BOOK STORE

贊助 200 美元或港澳地區 500 港元以上之訂戶為永久訂戶

除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另加郵資：

航空：10 美元 · 平郵：5 美元

徵文啓事

捐款獎勵優秀作品

我是華盛頓地區的一名僑商，一直向往祖國走上繁榮富強的康莊大道。最近，我訪問了闊別多年的大陸故鄉。我深感到，維系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和精神支柱已經崩潰，急需樹立新信仰和價值觀念。在此情況下，中國之春傳播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和多元的觀點，可謂正逢其時。

為表示我對民主運動的支持，我再捐助貳千美元，掀起中國之春月刊新的徵文活動，獎勵自第四十三期至四十六期上的優秀文章，以鼓勵投稿，提高中國之春的質量。獎金為：一等獎——壹千美元；二等獎——陸百美元；三等獎——肆百美元（編輯部另付正常稿酬）。要求：文字內容與中國民主之前途有關，體裁不限，但力求有新的創意，徵文截稿日期為一九八七年二月一日。

美國華盛頓僑商 廿次 奔

一九八六年九月廿五日

本刊徵稿* 稿酬從優

中國正處於大變革之中，十五年內，必有巨變。新一代的留學生，將影响着中國未來的命運。請大家拿起筆，加入到探討和變革中國命運的運動中來。

本刊近期擬組如下專題，請大家撰稿

▲此次民運高潮的起因、後果和對未來的影響；

▲歸國留學生的待遇問題；

▲中國駐外人員（包括外交官員）的待遇問題；

▲改良還是革命——民運策略的研討；

▲台灣政情的發展對大陸的影響；

▲如何打破「革命——專制——革命」的惡性循環。

凡探討中西方政治、文化、經濟、思想及報導中國現狀內幕的稿件，本刊均表歡迎。

中國要民主！要法治！要自由！要人權！

中國民聯擴大招收盟員

這次國內掀起的民運高潮，使我們對祖國的新一代、對祖國的未來充滿了信心；而中共高層守舊勢力的反撲，則使我們更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潛在的危機，更堅定我們選擇的道路！

中國的大變革已為期不遠，只有大家團結起來、聯合起來、組織起來，才能形成力量；您的加入，將促使中國民主化的過程加速！

〈中國民聯總部〉

- 歡迎您加入民運的行列！
- 齊心致力中國的民主大變革！

民主 ■ 法治 ■ 自由 ■ 人權 ■ 多元

■ 主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 編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 通訊處：(美洲) P. O. BOX 4873, NEW YORK, N. Y. 10185, USA
(香港)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11號萬隆大廈1206室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市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歐洲)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OCRATIE
B. P. 169 77315 Marne la Vallée C

(澳洲) G. P. O. BOX 376F, MELBOURNE (3000)

■ 電話：(美洲) (718) 429-6777 ; (718) 507-6442

■ 零售價：(美) 2.00美元 (加) 2.50加幣 (港) 8.00港幣

≡ SECOND CLASS ≡
≡ POSTAGE PAID ≡
≡ FLUSHING N.Y. ≡
≡ ISSN 0735-8237 ≡

T. P. Lee #4372 10-45 (F)
Parkview Tower 1109
701 West Gate Ave.
St. Louis, MO 63130 5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